

辛灝年講演錄・第一卷

中國命運與臺灣前途

中國近代史的正本清源

直視臺灣的命運和前途

辛灝年 著



辛灝年講演錄・第一卷

中國命運與臺灣前途

辛灝年 著

目 錄

自序	9
第一篇：《誰是新中國》北美洲巡迴講演錄（2000）...	23
前言	24
一、唯有中國國民革命才有可能創建一個新中國	27
二、中華民國像一個新中國	29
三、是訓政過渡，不是復辟專制——兼為蔣介石辯護	34
四、抗戰是誰打的？是誰領導打的？	40
五、南京國民政府非因腐敗而失敗	47
六、從「反共反獨」走向「抗共求獨」與「和共求獨」	55
七、共產革命不可能創建一個新中國	62
八、蘇俄是怎樣誘發中國共產革命的？	68
九、蘇俄指揮中共武裝顛覆中華民國	77
十、中共對外高喊抗日，對內決策「日蔣火拚」	84
十一、中共是怎樣發動內戰、打敗國民黨的？	100

第二篇：驅除馬列，恢復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2003） 127

前言..... 128

一、不是中華要驅除馬列，而是馬列禍害了中華..... 132

二、中華民族民族精神喪失的四個表現..... 163

第三篇：誰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2005）..... 235

前言：「一個立場，兩個標準」..... 236

一、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就是「大中華民國的衛國戰爭」. 239

二、大中華民國衛國戰爭的中流砥柱，

只可能是國民黨、不可能是共產黨..... 241

1、從理論上來對比國民黨和共產黨..... 241

2、從力量上來對比國民黨和共產黨..... 242

三、國民黨 14 年衛國抗戰是血寫的事實..... 244

1、是抵抗，不是不抵抗..... 244

2、是安內攘外，不是只安內不攘外..... 245

3、是積極抗戰，不是消極抗戰..... 248

4、是血寫的事實，不是墨寫的謊言..... 254

四、共產黨「領導和堅持抗戰」是墨寫的謊言	257
1、前六年共產黨在幹什麼？	257
2、後八年共產黨在怎麼幹？	261
五、中共自稱建立並領導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是一個「彌天大謊」	280
1、蘇共為中共制定了「繼續武裝保衛蘇聯」的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280
2、中共建立了一個「只鬥爭、不聯合、志在奪取政權」 的「革命統一戰線」	282
六、大中華民國國民不可能因為共產黨假抗日、 不抗日甚至賣國通敵而選擇共產黨	285
 第四篇：中國命運與臺灣前途（2006）	289
前言：我有三個說明	290
一、中國是中華民族的國家	292
二、兩個中國的出現及其不同的性質、歷史和命運	297
1、兩個中國的出現	297
2、歐洲四大共和國的性質、歷史和命運	299
3、大「中華民國」的性質、歷史和命運	309
4、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性質、歷史和命運	313

三、兩個中國與臺灣命運的關係	333
1、馬列中國與臺灣的關係	333
2、大中華民國和臺灣的兩個關係	351
3、中國必定走向共和的三條理由	353

四、臺灣如何應對兩個「中國」	359

第五篇：孫中山與共產黨的三個分野（2007）

365

前言：已經造成的歷史誤解和亟須製造的政治謊言	366

一、孫中山與共產黨的思想分野	367

1、孫中山至死只有一個主張「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	374
2、鮑羅廷為死後的孫中山製造了一個「新」三民主義 ..	376
3、共產黨宣誓要為孫中山三民主義的徹底實現而奮鬥 ..	379
4、共產黨改口稱他們宣誓的是「革命的新三民主義」 ..	381
5、毛澤東汙蔑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是「舊的、假的、 偽的、過時的、不革命的和資產階級的」	383

二、孫中山與共產黨的革命分野	388

1、孫中山領導的是要「走向共和」的中國國民革命	389
2、共產黨遵俄命發動的是要復辟專制的世界共產革命 ..	390
3、共產黨指責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革命是 「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革命」	392
4、孫中山不是中國共產革命的先行者	395

三、孫中山與共產黨的建國分野	396
1、民族分野	397
2、民權分野	398
3、民生分野	401
四、同樣用民族、民權、民生來檢驗共產黨	403
1、從民族歷史和民族文化的傳承上來看	403
2、從對外獨立和對內平等上來看	409
3、從天下唯黨和民權喪盡來看	416
4、從兩度共產、盤剝殆盡來看	421

附文

【專訪】辛灝年：連宋登陸 國共俱傷（辛菲）	431
辛灝年講演藝術初探（葛陵元）	453

自序

一

當我讀到這本《講演錄》的校樣時，我才想起他應該有個「序言」或是「後記」什麼的。

這是我的《講演錄》第一卷，是我「自我流放」以後第一個十年裡的講演錄「選集」。雖然他並不包括那幾篇可以獨立成書的系列講演，比如系列講演《太陽最紅的年代》和《辛亥三問》等。

凝視著校樣，我不由想起，1994年早春，當我決心拋棄一切，離開大陸，以求在一個自由的環境下完成那本歷史著作的時候，我完全沒有想到，此後我會在海外的華人世界，為講演而四處奔走。那時，我想得很簡單，就是悄悄地用任何人也不知道的「辛灝年」這個筆名出版那本書，之後，便悄悄地回到大陸，繼續寫我的小說。因為，我對中華民國史的研究，就是從寫小說開始的。我原來就是一個「沒有特殊貢獻」的小說家^{註1}。

然而，誰能想到，正是講演，才使我「等是有國歸不得」了。那本書還沒有出版，我就因為講演而暴露了自己的「真身」：「辛灝年，就是中國作家高爾品」——香港的報紙作了如是的報導。因為，1999年春天，當我應邀赴香港大學參

加會議和講演時，香港特區政府竟給了我一張拒絕入境的通知，理由便是接到了中央政府的指示。雖然同道的民運人士都能夠進得了香港，雖然我的那本書直到半年之後才在美國出版。顯然，是講演才給我惹下了「禍端」。

1994 年秋天，我因為在多倫多大學講了一場《中國新文學的大趨勢》，美國和加拿大東部的一些大學，便開始連續邀請我講「中國新文學史」，而我「透過文學史的煙霧」所講的「中華民國真史」，贏得了許多留學生及其教授們的歡迎，比如來自捷克的著名女教授米列娜。特別是因為紐約著名報人李勇先生的熱情推薦，甚至是一再地親自主辦講演會，竟讓時在哥倫比亞大學做訪問學者的我，受到了紐約和美東地區僑學界的一再邀請。此後，紐約的老華僑們常常自費陪著我飛向美國東西部的的一些大城市，《全美學自聯》也在美國中部的幾所著名大學安排了我對留學生們的巡迴講演活動。我常說，倘若沒有這個時期與學界和僑界的討論，甚至是辯論，那本書也是寫不好的。因為從「一言堂」的大陸來到了自由的北美洲，不僅讓我聽到了更多的真實歷史，也讓我聽到了種種的「奇談怪論」。甚至正是這些奇談怪論，才迫使我進行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辨析。大陸超過半個世紀的「洗腦」，不僅使留學生們，甚至也使得海外的華僑，於無形中接受了「專制復辟者」蓄意製造的種種「概念，理論，歷史和謊言」。所以，正是這一階段的講演，才使我擴大了眼界，展開了心胸，感到自己因十年思考和研究而得出的思

想和理論，已經愈來愈得到了支持；而自己對中華民國的信念，也因之而愈加堅定。

二

1999 年 10 月，書終於出版了。

10 月 10 日，在紐約中華公所，31 個華僑團體聯合起來為我舉辦了《新書發表會》。

此後，北美洲九個大城市的僑學界為我舉辦了《誰是新中國》一書的發行式。

有關《誰是新中國》主題的學術講演，頓時在美國和加拿大鋪展開來了。

北京終於在《光明日報》網站發表了 30 萬字的《為新中國辯》，對我施以「文革式大批判」，指罵我的書，尤其是我的講演：「毒害了整整幾代中國人，特別是毒害了青年一代」，一再地公開叫嚷要「將我從地球上徹底消滅」^{註 2}，同時也使我的講演開始進入了一個更其艱難的階段。

原因是北京對海外大學和僑社的滲透愈來愈廣泛，也越來越深入。芝加哥被滲透的中華會館竟以投票表決的方式，通過了「五年內不再邀請辛灝年赴芝加哥講演」的決議，他們因此而在五年內獲得了中共對他們的經濟支持。然而，第二天的晚間，我就收到了從芝加哥寄來的一只美麗花籃，裡面盛滿了鮮花和美食，還有一封充滿情義的道歉信，信上說：

「五年後，我們一定要重新將你請回芝加哥」。果不其然。當我提筆寫這篇「自序」的時候，要是從那時算起，我已經是第三次從芝加哥講演歸來了。

北京為了堵住我的講演，甚至收買外國大學的東亞教學和研究機構，以斷絕他們對我的邀請。當我應邀在英國的倫敦政經學院、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講演了「驅除馬列，恢復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系列之後，劍橋大學東方系便要請我赴該校作研究工作，對此，北京立即下了狠手，該校的副校長——一個社會主義者，居然立即找到了該系的日本人系主任，說：「……如把此人請來，他會搞亂劍橋……」。我的講演從大學開始，而今幾乎是「無疾而終」。因為北京將能夠收買的西方大學，特別是其中從事「中國問題研究」的西人教授們，大約也「統戰」得差不多了。

這些年來，類似的事情發生了很多。以致我 2012 年應邀去溫哥華講演時，UBC 的一些來聽講演的中國留學生，居然將自己化妝成了「老頭或老太婆」。至於派人在教室的門口阻攔、威脅、登記來聽講演的留學生，早已是家常便飯。我甚至因在溫哥華講演，而遭遇了北京駐溫哥華總領事館精心策劃的綁架，誰想天不滅我，就在最危險的那一刻，我在溫哥華的朋友們居然破門而入，救走了我們夫婦。雖然，那個從日本調來的「殺手」，那個「黃頭髮」，居然跟蹤到紐約，走進我太太工作的地方，公然地威脅她，甚至在大街上一次又一次地將我撞倒在人行道上。而他們精心設計的三次「下

毒案」，雖然使我兩度「命懸一絲」，但是，我還是活過來了，並重新走上了講台。

國民黨雖不致於像共產黨那樣，卻始終對我採取「全面封殺」。太多的臺灣華僑，特別是僑領們，為了我能夠去臺灣講演，以提高臺灣人民對於中華民國的信心，近 20 年來不知給臺北政府，特別是臺灣國民黨，公開發出過多少次呼籲，私下裡寄去過多少封懇求信，甚至一個個親自上門去敦請國民黨政要能夠邀請我去臺灣講演。然而，他們不是屢屢遭遇冷遇，就是當場聽到了「辛灝年是匪諜」的回答。遲至 2011 年紀念「辛亥革命一百週年」之際，當「芝加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秘書長郭自生博士，向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的委員長吳英毅詢問「國民黨為什麼不邀請辛灝年赴台講演」時，吳英毅仍然用「有人說辛灝年是匪諜」這樣一句陰冷的話，將老朋友郭自生先生頂了回去。就不說台港海外的著名報人，北美《世界日報》的創辦人之一，辛灝年海外講演的開創人李勇先生，20 年來，為了辛灝年赴台講演而霉頭觸盡的「故事」了。不久前，他還在給馬英九總統的復信中，為了辛灝年的「20 年委屈」而大大地罵了國民黨一通呢！

臺灣國民黨不僅持續汙衊我是「匪諜」已近 20 年之久，並且利用他們所控制的海外勢力，採取種種手段，企圖抵制我的講演，消彌我的聲音，我「在臺上講演，在臺下受氣」的太多情景，至今歷歷在目。直至今日，當我的「紀念抗戰勝利 70 週年講演」系列正在北美洲巡迴之際，中華民國臺北

政府駐美國代表處的處長先生沈呂巡，居然為了配合中共紀念抗戰 70 週年的「海外戰略」，公然違背臺北政府「6.25 通知」要求，做出了對不起中華民國前人和今人的事情，在逼迫我主動謝絕華盛頓的抗戰講演邀請之後，竟又指令芝加哥代表處臨陣「換人」。或許他不知道，我是來海外講演「國民黨抗戰」的第一位大陸學者，也是許多海外華僑和僑領們所「鍾愛」的一位講演者；他更不會明白的是，他不可能成功。因為芝加哥的僑學界早已擁有了抵制他「為共驅辛」，利用權勢破壞辛灝年講演的「免疫力」。

至於臺灣的一些出版商們，則因「畏共自律」，或是別的什麼原因，一次又一次地拒絕了《誰是新中國》在臺灣的出版。臺灣已有許多陌生的讀者致信給我說：「……當臺北重慶大道的一家家書店裡，到處都擺滿了歌頌共產黨和毛澤東的書時，為什麼書架上就是沒有你的《誰是新中國》出售？」

我只能「無語」。

許多年來，當我看著一批又一批形形色色的「人士」，甚至包括北京潛伏在海外所謂民主陣營裡面的特殊工作者們，都被國民黨及其政府用種種名目一次又一次地請到了臺灣，我雖然「徒有羨魚情」，心裡也難免有憋屈之感，卻從未對「中華民國的臺灣」稍生怨懟之心。因為，那是國民黨變了，中華民國並沒有變，何況我就要自己去叩開臺灣的大門了。「因為那是民國的門，他屬於我，屬於你，屬於他，

屬於全中國渴望自由和民主的人民」。

在我的「問題」上，儘管「國共合作」得如此地和諧，但是，歐洲，美洲和大洋洲的許多華僑團體，各地的僑學界，仍然是一次又一次地抵制了來自北京和臺北的雙重阻擾和反對，圍堵和破壞，從而讓《誰是新中國》的「天問」，《辛亥百年講演》的系列，和《祖國在危險中》的開講，還有我《紀念抗戰勝利六十週年》的講演——《誰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紀念抗戰七十週年講演》——「國共抗日戰略之對比」……，不僅越來越廣泛地傳播在海外，而且通過互聯網傳到了中國國內，傳到了中國人的心裡。成千上萬封來自大陸的聽眾來函，大陸 80 後、90 後的熱血青年，和大陸年輕農民工們給我發來的熱情來信，特別是整個大陸那一波又一波正在迅即湧起的「民國熱」，以及大陸人民對於「光復民國大陸」的鮮明政治訴求，在在都於我的心裡凝聚成了誰也摧毀不了的力量。任何汙蔑和圍堵，都動搖不了我要「為中華民國正名，為中國國民黨歷史辯汙，為 1949 年的失敗者辯護，為光復民國大陸而艱難奮鬥」的決心；都絕然摧折不了一個「匪諜」對中華民國的堅強信念，和對「民國真史」的那一份刻骨銘心的「癡情」。

今天，當我「這個老人」站在海外的講壇上，雖然常常會面對著許多老淚縱橫的光榮前輩，我卻能夠透過那一雙雙昏花卻又滿懷希望的老眼，看見民國大陸那無數雙年輕而又熾熱的眼睛裡正在閃耀著的革命火花。

21年了，我幾乎是剛剛登上北美洲的土地，就開始了我的講演，更在講演裡煥發過我中年的激情。而今，又將我一個老者的深情與期望，化盡在我每一場講演的談吐之間。

21年了，雖然臺灣的大門對我總是冰冷的深閉著，但是，他們同樣阻擋不了那一封封包藏著正義、愛心、理想和青春激情的飛鴻，阻擋不了他們飛掠大洋，飛到了我的眼底和心頭，為我，更為大陸許多懷有光復民國心志的大陸人民，帶來了扯不斷的希望。

21年了，我的講演生涯似乎還沒有走到盡頭，雖然我自知已經遠不如從前。然而，只要北京「一不小心」又讓我多活了幾年，我就還要講，還要將孫文革命，民國真史，和我對國人，特別是對兩岸青年的期望，記錄在我講演的人生里程上。因為：「民國的歷史，本無盡頭，不過是經歷了一場又一場的動亂，倒退和專制復辟而已。與當年的法蘭西共和國，俄羅斯共和國，和那些推翻了共產黨統治，重續了自己民族國家傳統的東歐諸國一樣，他的前景必將是無限光明。」^{註3}

三

我並不是一個口才很好的人。比起臺灣「講真話」的名嘴和大陸「講假話」的名嘴來，我豈止是略遜一籌。就不說那些有著渾身解數，卻又無處可講，無處敢講的大陸「真正才俊」們了。

不過，我始終以為——

講演是要用真心去講的。真心才會使你口無遮攔，講的都是真話；也只有真話，才能博得聽眾的理解和傾心。

講演是要用真情去講的。唯有真情，才能化卻誤解，融化冰冷的心腸，將自己的心跳和聽眾的心跳悄悄地合到一起。

講演是要用信念去講的。只有信念，才會讓聽眾感受到你的精神意志，感到信念之下，一切私念，都會變得那樣的渺小，那樣地微不足道。

講演是要用知識去講的。唯有那裡面埋藏著歷史的真實和現實的真相，才會向聽眾傳達出真理，描繪出明天。

講演是要用思想去講的。因為有了思想，就像在一個美麗的脖子上，掛上了一串閃亮的珍珠，閃爍著邏輯的光彩、主題的力量，和靈魂之美。

有關歷史和現實的講演，將要求你持之以恆地關心「家事、國事、天下事」，從而一天天地將他們積累在感情和知識的庫存裡，當你面對聽眾的詰問時，你才不會「枉顧左右而言他」。

講演還需要愛，尤其是面對著我們的民族、國家和人民正在遭遇著「層層專制統治集團」持續蹂躪的痛苦之時，唯有真愛，才能使一個講演者煥發精神、口若懸河，卻不會偏離人民的追求和期待。

.....

我是在太多的講演中才漸漸地懂得了他們，實踐著他們。

這，或許便是許多聽眾會喜歡聽我講演的原因，或是某些聽眾總是要對我咬牙切齒的原由。

我的口才真的不是很好，所以我在每一場講演前都會潛心研究，認真準備。一次系列講演，他的「帶資料提綱」，總是密密麻麻，至少有 60 頁之多。即便是一次兩小時左右的講演，我的「帶資料提綱」，也足足有 20 多頁。因為做事情，需要「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做學問，更需要「廣所以求深，深所以思廣。沒有廣就沒有深，沒有深也就沒有廣」。講演也是一樣。

儘管如此，每一次講演前，我還要再做一次講演卡片，甚至在臨講演前 10 分鐘，我還會像一個臨考的中學生一樣，藏到一個無人的角落裡，去重溫一次講演的要領，並將他們在心中迅速地默誦一遍，唯恐忘卻了某個人名，某個地點，或某個事件發生的年、月、日。直到已經走上講台，我的情緒才會慢慢地從緊張中鬆弛開來，因為我的全副身心，已在漸漸地投入到我必須同時付出理性和感情的講演之中。雖然聽眾們看見的，總是空著兩手走上講台的我。

我之所以說了這些，就是想藉此回答許多朋友的詢問，想告訴他們，講好一場講演，你不僅要付出功夫心血，還要付出人格的力量。因為沒有他，你就會心神恍惚，吞吞吐吐，「一句真話三分假，半拉假話半拉真」，「既要拍馬，又要撇清」，「既要改良，卻談革命」，那麼，你又如何能夠感動別人，讓別人來接受你的理念，你的思想，你的「心聲」？

講演不難，難在你的心，你的情「究在何方」？對我們大陸人來說，難在你究竟怎樣才能「去假存真」。做一個真實的人，一個「性情」中人，是一個講演者必須具備的人格要素。

或許，這便是我的經驗，不，是我的甘苦。雖然，我離「講得好」還很遠，很遠。

四

我的《講演錄》第一卷就要出版了。我不能不在此謝謝那些與我的講演永遠扯不開干係的朋友們，包括認識的和不認識的。因為我無講稿，所以，我的「講演錄」都是朋友們聽打出來以後，再由我校對、修改或補充的。《透視中國》獨立攝製組的聽打朋友，臺灣那些與我還無緣謀面的聽打者，黃花崗雜誌執行副主編丁毅博士，對他們，我實在不能不藉此機會，向他們表達我難以言述的感激之心。

我還要好好感謝的，就是《透視中國》獨立製片人林丹女士，紐約的攝影師阿彪兄弟，芝加哥的攝影者林占同先生，舊金山的攝影者徐政博士，英國的攝影者羅元教授，好萊塢的外景攝影師——我的好友「老夏」等許多朋友，他們不僅是一次一次日以繼夜地趕制著的我的講演視頻，而且他們還常常要頂著來自外部和內部的壓力，堅持將我的講演搬上螢幕。我傾慕他們的精神，欽佩他們的意志，欣賞他們吃苦耐

勞的精神。要是沒有他們，國人縱使「翻牆」，也沒有可能看到我的那些講演的。

我絕對不能忘卻的，還有歐洲、美洲、大洋洲許多為了舉辦我的講演會而默默無聞地奉獻了太多辛勞的卓越僑領，學者，和黃花崗雜誌的副主編李剛博士，副社長孫雲先生，義工編輯年輕人逸非，英國的李桂華博士，澳大利亞的姜希莉碩士等太多朋友。他們總是將工作摺在一遍，家事放在腦後，在三大洲一個又一個國家的講演中，他們或是為我做現場的同步翻譯，或是為了保障我外出的安全，或是為了能夠及時寫出有水準的報導，或是為講演會的會務耗費了他們太多的精力、時間，甚至是錢財。我若不藉此《講演錄》出版之際，對他們表示我深深的感激，我又如何能夠稱作他們的朋友或戰友？

最後，我還要感謝的，就是眼下在臺灣還是一家小小出版社的《博大》出版公司，他們以無畏的精神，在臺灣為我出版了第一本書——《最後的侮辱》。現在，他們又要為我出版這部《講演錄》，並且就在我和我的同道們，決心要「不請自去」地扣響「民國臺灣」的大門時，他們要讓我的這部《講演錄》問世在臺北我的講演會上。他們都是普通的人，但他們從「佛法」裡得來的那一股凜然正氣，豈止讓我感動，而且讓我欽佩。我們來路不同，但去路一致，就是「自由」，並且是為我們大陸的人民去爭取種種的自由，自然包括出版的自由。這樣的出版社，別看他今日不大，但他一定會比兩

岸那些蠅營狗苟的出版商們對我們民族、國家和人民的貢獻要大得多。因為他才符合時代發展的方向，是伴隨著我們痛苦的人民正在追隨的世界民主潮流向前走的。就此而言，非但無大小之分，而且又焉知他不會大起來，不會成為未來華文出版界的一方「既博且大的鉅子」？

總之，我的《講演錄》，是集體智慧和集體勞作的成果。他絕不僅僅屬於我一個人。

是為序。一位普通講演人的自序。

2015 年 8 月 2 日於美國舊金山佛瑞蒙歐龍山下廬人居

註釋：

1、1991 年，我被相關部門批准為第一批「國務院特殊貢獻專家」，本單位只有一老一少兩人。當安徽省文聯的黨組辦公室主任親自來我家請我填表時，我即寫了一張條子請他捎給黨組，條子上說：「我是個寫小說的，靠賣文吃飯，沒有特殊貢獻，誰想要就給誰吧。」結果，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沈培新便認定我「不像過於老實，而是心有異志」。我默然。

2、請參閱大陸「光明日報網站學術交流中心」欄目和「毛澤東思想網站」等。

3、摘自我的「講演錄」。

第一篇

《誰是新中國》 北美洲巡迴講演錄

自 1999 年 10 月起，《誰是新中國》北美洲巡迴講演各部分曾分別應邀講於紐約中華公所和美加眾多僑學社、哈佛大學、麻州理工學院、華盛頓聖喬治大學、華盛頓美國國會、俄亥俄州立大學、威斯康辛大學、芝加哥僑學界、明尼蘇達大學、史丹佛大學、舊金山僑學界、洛杉磯僑學界、亞特蘭大僑學界、達拉斯僑學界、德克薩斯僑學界、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和溫哥華僑學界。美加一些城市、地區或大學曾多次邀請講演《誰是新中國》，講演次數約為 50 餘場。

前言

各位留學生朋友們：

謝謝你們能夠邀請我來和大家一起探討《誰是新中國》。我承認，每當我要給自己祖國的留學生們講演的時候，我的心裡就總有一種很「虛」的感覺。因為我知道，我所面對的，都是當代中國一批既聰明、又優秀、同時也是最幸運的青年知識份子。但是，正因為我同樣知道，你們又都是真正的「中華兒女」，不再是「馬列子孫」，就是將來老了，也絕不會再說「要向馬克思去報到」，所以，我才特別希望，能夠與你們一起來探討我們祖國這一部紛繁駁雜、迷霧重重的現代歷史，一起來探討我們人民艱難困頓的過去。因為，誠如 19 世紀俄國思想家赫爾岑所言：「向後看，就是為了向前進」。因為，「若要邁向正確的未來，必需先有一個正確的史觀」。

我在講述《誰是新中國》之前，首先，要向大家說明的是：我本人，既不是共產黨，更不是國民黨；既不是一位民運人士，更與臺灣的朝野、特別是李登輝時代的臺灣中國國民黨，沒有任何的關係和聯繫。我只是一個來自中國大陸的普通學人，並且來到海外的目的，或者說自我流放的目的，就是為了能夠在一塊自由的土地上，寫作《誰是新中國》這一本書。

其次，我要向大家聲明的是：今天，我將要為 1949 年的失敗者辯護。也就是說，要為失敗的中華民國南京國民政府和當時的中國國民黨辯護。而為失敗者辯護，應當沒有「勢

利」之嫌。但是，我要辯護的對象，只能是那個曾作為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的中華民國，和曾創建並捍衛過這個民主共和國的中國國民黨。也就是說，我所要辯護的，絕不是那個「一方面企圖將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的歷史傳承予以腰斬，一方面卻企圖誘導整個臺灣走向分裂祖國和割斷歷史之路的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如果這樣的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已經出現、或有可能出現的話。」這兩句話，白紙黑字地印在《誰是新中國》這本書的「作者聲明」裡面。那個時候，臺灣的中國國民黨未曾在大選中失去政權。

再就是，我特別需要向大家介紹的是：

第一，我本人之所以決心赴海外寫作《誰是新中國》這本書，其根本原因，就是因為我親身捲入了中國大陸民間歷史反思的潮流。大家都知道，「四人幫」垮臺後，在中國大陸曾迅速地掀起過一波又一波歷史反思的浪潮。痛苦的大陸人民，曾因反思中共文革而否定了中共文革，曾因反思中共「反右」而否定了中共「反右」，亦曾因反思文革前 17 年中共的所謂極左路線，而痛感自 1949 年之後，絕大多數中國人從來就是「生活在紅旗之下，浸泡在苦水，甚至是血水之中」。然而，只因為 1985 年中共為推行對臺灣的新一輪統戰，而突然公開宣布 85 位戰死在抗日戰場上的國民黨將軍為抗日烈士，才破天荒地為中國大陸思想界、知識界和廣大民間，從反思「抗戰究竟是誰打的，究竟是誰領導打的」這一重大的歷史是非出發，走向了對於辛亥之後整個中國現代歷史的

再認識。直至將這一場民間反思潮流，推向了對於三民主義與國民革命、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孫中山先生及蔣介石先生進行再認識的嶄新歷史階段。難以計數的歷史反思著作，歷史紀實文學，雖然被加上了形形色色的政治「包裝」，卻如長河潰堤，一發而不可收。其潮流所向，確已影響了中國大陸的社會與人心。

第二，正是因為受到了整個大陸民間歷史反思潮流的巨大衝擊和深刻影響，我們，中國大陸的新一代學者、專家、記者、知識分子，甚至是軍中或民間人士，才從日漸深入的歷史反思中，逐步地認識到，唯有使用共同的歷史標準，才能對我們祖國這一部紛繁複雜、迷霧重重的現代歷史，進行根本上的澄清。因為，中國近代以來屢遭外患的痛苦歷史，無疑已經帶來了一個「愛國還是賣國」的大是非；而自中國近代開始的，從專制向民主的艱難過渡，又給我們帶來了一個「是推動了民主進步、還是造成了專制倒退」這樣一個「進步還是倒退」的大問題。也就是說，凡是在國難當頭、民族危亡之際，能夠為祖國、為民族勇於犧牲或委屈求全者，就都是愛國的；凡是在辛亥之後民主與專制之艱難、複雜和長期的較量中，推進了民主歷程和民主發展的，就是進步的。反之，則是賣國的和倒退的。留學生朋友們，這顯然是一個公正的標準，一個客觀的標準，一個大家都樂於接受的標準。而也只有擁有了這樣的「共同標準」，我們才能對中國現代歷史上形形色色的黨派和個人，即一切社會力量，進行公正

的研究、分析和判斷，才能撥開重重疊疊的歷史迷霧和形形色色的政治謊言，揭穿假相，辨別實情，回答種種的誣蔑和詰難。

第三，也許正是因為「共同標準」的產生，才為我們提出了「誰是新中國」這樣一個重大的歷史問題。反過來說，就像有些朋友所說的那樣，對辛亥之後先後創立的兩個新中國提出「誰是新中國」的問題，實際上就是對 20 世紀中國歷史所發出的「天問」。而「共同標準」恰恰就是回答這個「天問」和辨別「誰是新中國」的一個科學方法。

留學生朋友們，這，才是我在中國大陸時，便要努力研究「誰是新中國」的問題；到了海外，便要奮力寫作《誰是新中國》一書的根本緣由所在。這本書的資料，幾乎全部來自大陸民間的反思成果，是大陸民間和作者自己對歷史覺悟的產物，既不依賴海外和臺灣的資料，也為海外、特別是臺灣的一些學者所難以理解，甚至難以想像。

一、唯有中國國民革命才有可能創建一個新中國

今天，為辨別「誰才是真正的新中國」，我的講演將分為兩個大的部份：一個就是國民革命和中華民國，另一個就是共產革命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不用諱言的一個歷史史實就是：在近代中國，曾出現了兩個革命。一個就是孫中山先生發動和領導的中國國民革命，這個革命在 1912 年曾創造了中華民國；另一個不待言便是中國共產主義革命，這個革命又

在 1949 年後的中國大陸創建了一個「馬列中國」，其國號曰：中華人民「共和」國。因此，要辨別這兩個中國，究竟「誰是新中國」，便要辨別這兩個革命，究竟誰才有可能創建一個新中國。所以，在第一個大問題裡面，我首先要講的就是：「由孫先生所發動的中國國民革命，究竟能不能創建一個真正的新中國？」

第一，眾所周知，中國國民革命的第一個原因，是「王朝衰亡」，即已經綿延了二百餘年的滿清王朝，已經走向了他最後的衰亡期，第二個原因，是「制度衰變」，也就是已經產生、發展、綿延、維繫了兩千餘年的中央集權式君主帝制，已經走向了他最後的衰變期。第三個原因，是「強國欺凌」，就是東西方列強、甚至包括那些民主列強們，都在用堅船利炮和鴉片毒品來欺侮我們和毒害我們，而清政府卻無力自保。第四個原因是清政府一再地拒絕了政治改良的要求——既以殺頭的辦法，拒絕了以康梁為代表的政治行為改良；又用欺騙的辦法，鎮壓了立憲派的制度改良要求。從而造成了人民、包括改良派的最終絕望。正是上述原因，早期曾為朝野「公棄」的孫中山革命，才終於獲得了天下「共擁」。一場不可避免的國民革命，又稱民主革命，也就因此而爆發起來了。

第二，革命是不可以沒有理論的。中國國民革命的理論，就是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我將在後面詳細談到三民主義的歷史正確性、政治科學性和現實必要性，以及他在世

界政治文化中的崇高地位。在這裡我只想說：主張「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的三民主義，不正是三百餘年來全世界各個國家、各個地區和各個民族的人民，所共同追求和一再追求的根本方向嗎？這個始終順乎世界自由民主潮流的思想和理論，又有哪一點是不對的呢？

第三，大家都深知，既是革命，就有對象。無論這個革命將採取和平、暴力、或其他的任何形式。那麼，中國國民革命的「物件」是什麼呢？一言以蔽之，他的物件就是腐爛的滿清王朝和已經走向了末路的君主帝制。顯然，這個物件沒有錯。

第四，革命不僅要有物件，更要有目標。而中國國民革命的目標，就是要創建一個民主共和的新國家，即亞洲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

現在，在我們明白了中國國民革命的原因、理論、物件和目標之後，我們已經可以說：由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中國國民革命，是完全有可能創建一個新中國的，換言之，就是完全可能創建一個擁有先進民主共和制度的新國家。

二、中華民國像一個新中國

我要講的第二個大問題，就是從兩個中國的歷史來看，誰才是新中國？

讓我們首先來檢驗中華民國的歷史。中華民國的歷史，我將他試分為三大階段。第一階段自 1912 年至 1937 年。第

二階段，自 1937 年至 1949 年。第三階段自 1949 年至今。在他的第一階段，又分為前後兩期。前期為 1912 至 1928；後期為 1928 至 1937。

現在我們就可以來探討本階段前期的中華民國，和他的兩個鮮明特徵。

第一個特徵，就是剛剛創建的中華民國，確實像一個新中國。

首先，在政治上，連中共御制的教科書——中國社會科學院主編的「中國近代史」，都這樣地稱讚中華民國說：「……民主空氣濃厚，民主潮流高漲，民主憲政在試驗中。僅 1912 年，即中華民國元年，中國出現的新政黨，已註冊者即達 85 個，政治團體 22 個。各種政黨合法並存，和平競爭，三權分立的國家體制基本上得到維繫，各類法政學校遍布全國。以宋教仁為代表的民主革命家，力圖通過合法鬥爭的手段，推行政黨政治，組織政黨內閣，獲得了很大成就……」當時，倘若不存在一個妄圖復辟帝制的袁世凱，則中國的民主憲政未嘗沒有一個十分光明的前程。而這個民主憲政的性質，不僅劃開了中國數千年「專制國統」和剛剛誕生的「共和國統」的界限，而且劃開了「君主憲政」和「民主憲政」的界限。前者被孫中山先生稱為「不完不備的共和」，後者則被孫先生稱之為「直截了當之共和」。更何況，孫中山先生還親自主持制定了史所未有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主持創建了史所未有的、擁有上下兩院的國會。而由參眾兩院的議員們，

於 1913 年擬訂的《天壇憲草》，不僅繼承了《臨時約法》的民主建國精神，其開宗明義的第一章就明文規定：「中華民國永遠為統一之民主國」。他的第一百一十條更專門規定說，中華民國共和民主的「國體永遠不得為修正之議題」。大家看一看，這個由中國國民革命的勝利所創建的中華民國，到底像不像是一個具有真正民主共和性質的「新中國」呢？

其次，在經濟上，同樣是這本中共的近代史教科書又這樣說道：「辛亥之後的中國，迅速扭轉了革命前民族工商業的蕭條局面，各種實業團體紛紛建立，各類私營企業競相出現……自辛亥前 40 年中國民族、民間工業誕生至 1911 年止，資本萬圓以上的廠礦有七百家，資本總額僅一億三千萬圓。然而，自 1912 年至 1919 年的八年內，大型廠礦建成 470 多個……新增資本達一億三千萬圓以上，相當於辛亥革命前 40 年投資的總額……」。於是，這本近代史教科書繼續寫道：「1914 年 3 月 15 日，由民間籌備的『中華全國商會聯合會』成立。」這豈止是在中國數千年的歷史上所不曾有過的事情，而且也是自 1949 年以來，在中國大陸所絕不准許發生的事情。試問，在今天的中國大陸，那些民營企業家們又有哪一個敢去籌備一個「沒有中共黨組書記」的全國民間工商聯呢？不用說全國了，就是一個鄉鎮的真正民間「工商聯」，也沒有人敢去籌辦的。由此可見，這個剛剛誕生的中華民國，即便是在中共的近代史教科書裡，是不是也像一個正在建立真正自由經濟、發展真正市場經濟的新中國呢？

再者，就是在思想文化上，同樣用這本教科上的話來說，就是「民營報紙猶如雨後春筍，蓬勃而起，至 1913 年，已經達到五百多份」。1916 年，袁世凱稱帝前後，全國報紙群起而攻之，遂使得「敢有帝制自為者，全國人民共擊之」的誓言，成為歷史的事實。在中共的「四人幫」時代，如果中國大陸人民也能擁有五百家民辦報紙，不說毛婦江青橫行不了十年，就是橫行十個月也做不到。如果自 1949 年之後，中國人民能夠擁有五百份自己的報紙，那麼，毛澤東的種種倒行逆施，中共的一次又一次的屠殺和迫害，還有可能發生嗎？如果在所謂「改革開放」的今天，中國大陸人民已經擁有了辦報、辦刊的自由，則中共大大小小的貪官污吏們，還敢於「吃完被告吃原告，吃喝嫖賭都報銷」，直至「工資基本不動，老婆基本不用」，其吮吸人民血汗，動輒便是百萬、千萬、上億萬嗎？

誠然，「政治、經濟、新聞和言論的自由，勢必要帶來文化的蓬勃發展。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之所以只能發動在辛亥之後，中國的白話文運動之所以只能成功在辛亥之後，中國的新文學之所以在歷經晚清改良文學的自將磨洗之後，亦能夠成熟、成形、成功在辛亥之後，中國的五四愛國民主運動之所以只能夠勝利在辛亥之後，其根本原因，就是因為由辛亥革命所創建的中華民國，是一個已經創建了共和，並正在艱難地推進著民主、反對著專制復辟的新中國。

朋友們，俗話說：不比不知道，一比嚇一跳。我們只需

要將初創時期的中華民國在政治、經濟、思想和文化上的歷史進步性，和 1949 年之後中共統治下中國大陸的種種大倒退，比上一比，誰是新中國的問題，是不是確實值得我們提出來問上一問呢？

本階段前期的第二個基本特徵，就是剛剛誕生的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如同世界上所有剛剛創建的嶄新共和國一樣，立即迎來了專制勢力的公開反撲。其時，雖然被逼退位的遜清王室所懷抱的復辟願望，歷久難泯，所謂「一息尚存，此心不已」，但是，復辟的最大危險，卻來自那個既曾權傾舊朝，又曾兵迫革命的袁世凱。因此，袁世凱希圖復辟帝制所引發的形形色色復辟要求，張勳的復辟滿清，和北洋軍閥「假共和之名義，以行專制之實」的混戰，實在是給剛剛誕生的中華民國帶來了長期的紛擾和混亂，也給國民帶來了很深的痛苦。然而，他非但不能說明中華民國不是一個新中國，相反，他恰恰說明，形形色色的專制勢力，企圖復辟舊中國和舊制度的必然性和瘋狂性，並由此證明了，中華民國才真正是一個完全不同於以往的新中國。

所以，一切以辛亥之後的歷史陣痛，也就是局部的歷史混亂來指責辛亥革命，甚至指責中華民國不是一個新中國者，都是因為沒有窺見這個「歷史發展的本相」，才產生了種種錯誤的認識。更何況，在本階段前期所出現的這種「歷史混亂」，他雖為形形色色的專制復辟勢力所瘋狂製造，卻又為一切真正的民主力量所堅決反對。人民因此而「厭棄專制之

心，遂以明確；寶愛共和之心，因以勃發」（陳獨秀語）從而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波瀾壯闊的反復辟浪潮。這一巨大的反復辟浪潮，不僅戰勝了袁世凱的復辟帝制，戰勝了張勳的復辟滿清，而且在歷經中國人民的兩度「護國和護法」，也就是為捍衛中華民國的「嶄新國統與共和法統」，而進行的兩度反對軍閥混戰之後，而終因蔣介石領導北伐打倒了軍閥，使亞洲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初步地獲得了和平與統一。今天，當我們回過頭來認識 1912 至 1928 年那個「混亂」的中華民國時，我們無疑應該認識到的是：混亂只是他的「表相」，而他的「本相」卻是「國民革命和專制復辟的反復較量和公開較量」。並且，這個較量完全是由形形色色的專制復辟勢力所公然挑起和製造的。這，才是我們賴以解開辛亥之後和中華民國創建之初，之所以會產生歷史混亂的一把鑰匙。

三、是訓政過渡，不是復辟專制——兼為蔣介石辯護

中華民國第一大歷史階段的後期，是 1928 年至 1937 年。這個迄今為止，曾被許多正派歷史學家稱為「十年黃金時代」，卻又是被中共一直指罵為「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時期。但是，他果真是一個「反動統治」的時期嗎？15 年來，由中國大陸知識份子在民間所掀起來的一波又一波歷史反思的浪潮，及其成果，已經能夠用大量事實來證明，這不過是一個荒謬的指罵罷了。

歷史的事實是，1928 年蔣介石領導二期北伐成功和東北

易幟之後，中華民國不僅獲得了初步的統一，而且走上了「外求和平、內求發展」的嶄新歷史階段。連蘇聯的托洛斯基都為中國制定了一個「中國政治狀況和反對派的任務」的政治綱領，認為「中國已經進入了政治安定和經濟復甦的時期，中共只能要求召開國民會議以解決國家的最重要的問題」；原中共領袖陳獨秀也於 1929 年 7、8 月間，連續三次寫信給中共中央，反對中共無視國家民族的「武裝保衛蘇聯」方針，反對在蘇聯侵略中國東北時，中共與蘇共「裡應外合」的武裝叛國行為。因此，為了維護國家來之不易的統一，就必須蕩平新舊軍閥，也就是陳獨秀所指的「軍閥殘餘的殘餘」，及其為私欲而發動的大小十數次武裝叛亂；就必須征剿中共在蘇共直接命令和指揮下的武裝叛國。非如此，北伐的成果就會得而復失，初步統一了的中華民國就會重新陷入分裂。所以，在本階段的後期，如果說剛剛獲得了初步和平統一的中華民國首先要解決的，就是「蕩平叛亂、維護統一」的話，那麼，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和執政的中國國民黨，確實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艱難地、卻又是勝利地在完成著這個艱巨的任務，從而使整個國家一步一步地走向了和平建國的新階段。雖然這個新階段自始自終都處於軍閥武裝叛亂、中共武裝叛國和蘇俄陰謀顛覆、日本公然侵略的交相煎迫之下，但是，這個被內憂外患交相煎迫的歷史時期，之所以被稱為「十年黃金時代」，是因為：

第一，在政治上，他是中國國民黨遵循孫先生的遺教，

實行訓政和準備憲政的時期。雖然這個名之為「訓政」的時期，在當時即被某些人指罵為專制獨裁，但是，不僅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他都與袁世凱復辟帝制，北洋軍閥的混戰，特別是中共在延安和在 1949 年之後的中國大陸，所強制推行的貨真價實的「專制復辟統治」，有著根本的區別。因為，從理論上來說，一是孫中山的訓政思想體系並不是形成於辛亥之前，而是完善在辛亥之後，是因為形形色色的專制勢力一再地企圖顛覆共和、復辟專制的教訓，才得來的一個科學總結。二是訓政的內容，一為建立一個有權威的革命政黨和革命政府，以保衛和鞏固共和的新秩序；二為立即推動與實現以縣為基礎的地方自治，以養成人民的權力與義務，就是「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大民權；三為訓政不僅有時間上的明確規定，而且除掉不允許另立政黨以干擾國民黨在規定時期內的一黨領政以外，人民的基本民權均予以基本的保障；四為訓政的思想，說到底，就是要建立一個「新權威」統治，以造就一個「威權民主時期」。他的目的，是捍衛共和、走向民主憲政，而不是為了推倒共和、復辟專制制度。這才是新權威的應有意義，也是威權民主時期的政治本質。

顯然，我們只有明白了孫中山先生訓政理論的意義，我們才能客觀地認識和公正地評價國民黨和蔣介石在 30 年代所推行的訓政，以及他所創造的建國成就。

這個成就，表現在經濟上，便是「以建設民生為首要」，

並且為了建設民生，而堅持保護私有制度，肯定自由經濟和發展市場經濟，制定了一系列發展經濟和保護國貨的經濟政策。從而將由晚清改革開放所遺留下來的，和在民國初年曾獲得了巨大發展的民族自由經濟，推向了一個輝煌的發展階段，並產生了傲人的成就。為此，一位大陸歷史學家，才會在大陸出版的《南京國民政府的建立》一書中說道：「1928年至1931年世界經濟蕭條時間，中國新設立的工礦企業就有六百六十家，資本總額達二億五千二百四十五萬圓，其發展速度超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業發展的『黃金時代』」。其實，只要翻開30年代上海的經濟發展史，只要從「反面」去讀一讀共產作家茅盾所寫的長篇小說《子夜》，只要願意去調查一下30年代中國各階層知識份子和一般人民收入的狀況，只要我們願意瞭解一下那個時代的中國留學生們為何人人都願意學成回國的「國內原因」，我們就會立即發現，30年代的中國民族資本家們，曾擁有過一個怎樣志得意滿的「黃金歲月」，中華民國的民生狀況又是怎樣迅速地在進步和發展著啊！他豈是1949年以後的大陸人民所敢於想像的。更何況，若沒有30年代這一點經濟發展的成就，中華民國根本就不可能有力量去堅持那一場曠日持久的抗日戰爭！

這個成就，表現在新聞輿論上，則只能成為當代中國大陸人民的一個夢幻而已。正處在歷史反思中的中國大陸歷史學者們，在經過「不敢假設和小心求證」之後，只能在他們

的著述中痛苦地指出，至 1937 年 3 月止，中華民國各種民辦報紙已有 1,518 種，公、私營電臺 78 家，公私營通訊社 520 家，其中絕大多數為私營。著名的通訊社如《國聞通訊社》、《申時通訊社》；著名的報紙如《申報》、《大公報》、《國聞日報》；著名的出版社如《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等均為私營。知識份子們可以天天寫詩作文，罵著給了他們思想和創作自由的國民黨和蔣介石，共產派的革命家們可以公然地成立自己的文化社團，甚至是政治組織，以圍攻甚至圍剿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國民黨的《中央日報》雖然可以義正辭嚴地批駁共產主義這個「洪水猛獸」，但在他的副刊上，卻能刊載共產派詩人們謳歌無產階級的領袖史達林的詩篇……上述歷史的真實在 1949 直至今日的中國大陸，難道是我們能夠想像的嗎？

至於 30 年代在思想文化上的成就，就更是人盡皆知的了。誠如我在《誰是新中國》一書中所寫出的那樣：彼時，中國現代文學在走過了他的先河期——「文學革命」期之後，開始走上了他的成熟期和高峰期。一方面各種流派、各種社團、各類刊物雜然紛呈、一片繁榮景象；另一方面成熟的作家和作品至今仍然標傲在一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就前者而言，現實主義派，現代主義派，「革命文學」派，國防文學、民族主義文學和第三種人文學，均各守陣地，互相論爭，不亦樂乎；就後者而論，則魯迅、郁達夫、徐志摩、巴金、老舍、曹愚，以及後起的沈從文、錢鐘書、張愛玲等一批文學鉅子，

亦因他們的作品已富有傳世價值，而成為現代作家的楷模和典範。尤其是長篇小說和話劇的創作，不但走向了成熟，而且催生了一批名著。《家春秋》、《雷雨》、《駱駝祥子》等均已經獲得了永久的魅力。連正在蘇俄命令和指揮下實行武裝叛國、一心要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的中共，也能夠在上海成立配有共產黨黨組書記的左翼文化人聯盟，即「左聯」，並且囂張在整個文壇之上……。看一看「人間四月天」這一部已經閹割了詩人徐志摩靈魂的電視劇吧，看一看 30 年代中國文化人的自由生活和為所欲為吧，我們就能夠瞭解到，30 年代中國的知識份子們，該是怎樣地自由和自在。他們何曾有一丁點害怕被打成右派甚至反革命分子？何曾有一丁點擔心慘遭批鬥和迫害？若以此來對照中共專政的 50 年間，成千上萬文化人無端遭受瘋狂打擊和迫害的慘痛事實；以及前 30 年無文學可言、後 20 年的文學仍要遭受中共的打擊和收買，因而遠未能解放到晚清文學水準的現狀；特別是至今仍絕不允許民間成立任何一家文學團體、出版任何一份文學刊物，有則逮捕、「法辦」的遭遇；就只能使人更加感慨萬千了！

留學生朋友們，這就是中國國民黨 30 年代的「訓政」，為我們所記錄下來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成就；這就是在「國民黨和蔣介石反動統治」下，中國人民所擁有過的種種民權和自由。1931 年 12 月 5 日，中華民國的最高領袖蔣介石先生曾走出南京國民政府的大門，親自與已經砸爛了《中央日報》、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並包圍了國民政府的中共學生運

動代表平等對話的歷史鏡頭，一旦從塵封的歷史裡面被重新尋找出來，當代的中國青年學生們，面對這樣一張照片，我們還能夠昧著理性，跟著那個 1949 年的勝利者，去千喊萬罵地去指斥 30 年代的國民黨是「反動派」，去批判 30 年代的國民黨訓政時期是一個「反動統治」時期，去責罵訓政領袖蔣介石先生乃是一個反動透頂的「獨裁者」嗎？更何況，直到中共將他的「學生運動」變成了毛澤東所說的「推翻國民黨政權的第二條戰線」時，甚至稱他推翻中華民國的「功勞僅次於人民解放軍」時，這個「反動派」、「獨裁者」、和「反動統治時期」，都沒有用機關槍和坦克車來殘酷地鎮壓過他們。

走過了「十年黃金時代」的中華民國，此後若不再遭遇一場曠日持久的外戰，更沒有遭遇一場更加殘酷的內戰，那麼，用一位美國著名教授費正清先生臨死前因幡然大悟才講出來的話來說，就是：「如果沒有日本帝國的侵略，中國國民黨是能夠將中國帶向現代化的道路上去的。」雖然費正清先生一輩子嫌國民黨，愛共產黨，並在重慶做過中共的統戰物件，是美國許多錯誤對華政策的理論「依據」。

四、抗戰是誰打的？是誰領導打的？

中華民國歷史的第二大歷史階段，是自 1937 年至 1949 年。他的前期自 1937 至 1945，後期自 1945 至 1949。

我們先看他的前期，即中華民國偉大的衛國戰爭時期。

顯然，我今天沒有充分的時間來敘述中華民國長達八年的艱苦抗戰，更不能說盡中華民國成千上萬的抗日英雄是怎樣地戰死在抗日戰場上的，我甚至都不可能將中華民國政府軍——不含中共軍隊的所謂國民黨軍隊，長期血戰倭寇的一樁樁、一件件英雄功績，作一個較為具體的介紹。但是，只因為中國大陸知識界、思想界、歷史學界和廣大民間，將中國國民黨的抗戰當成一篇篇大無畏英雄史詩的日子，早已來臨；成千上萬種不得不包裝起來，甚至成千上萬種已經敢於剝掉包裝的抗戰反思著作，包括大量的抗戰紀實著作，已經在我們祖國大陸的街頭巷尾，成為人民最為青睞的書籍和雜誌；因此，我在此僅想就國民黨和國民政府，還有蔣介石先生，在八年抗戰中所決策的大戰略，所作出的大犧牲，所做出的大貢獻，所造成的巨大影響，分別作一個簡單的介紹和取證，以使朋友們從中窺見一點抗戰的歷史真相。

第一，蔣介石早在 1932 年、即「九一八」事變後一年，便萌生了「修好西南、以為將來的抗戰做大後方」的持久戰思想。1935 年，蔣又宣誓似地說：「只要我們能夠堅守住雲、貴、川三個省，哪怕是丟失了關內的 15 個省，我們都一定能夠打敗日本侵略者。」此後，當全面抗戰爆發時，他終於決策了「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持久戰大戰略，一方面命令津浦、平漢和平綏三線的我軍對日軍進行節節抵抗，而且誘敵造成上海「決戰」的態勢，從而迅速地粉碎了日本「三月亡華」的狂夢。而這個狂夢，就建立在日寇企圖「由北向南分線切

割我後方戰場，根絕我建立西南大後方，並要將我軍由西向東趕到大海裡面去」的陰謀戰略上面。然而，由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所決策的這個大戰略，以及組成這個大戰略的每一場血肉橫飛的大會戰，上千場血流成河的大型戰鬥，除掉由蔣先生及其軍隊赴湯蹈火以外，不說中共不抗日，就是中共抗日，也不是他當時僅有的二萬陝北「紅軍」所敢想像、所能完成的。

第二，縱觀八年抗戰，國民黨軍隊到底付出了多大的犧牲，反思中的中國大陸民間歷史學界，對此在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小心的求證之後，終於得出了這樣一些足資證明的資料：除掉東北人民自組抗日聯軍抗日，和蔣介石領導與決策的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1933年長城抗戰即榆關、熱河、長城三大戰役以外，自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的八年間，國民黨軍隊曾發動大型會戰22次，大型戰鬥1,117次，小型戰鬥28,900餘次。陸軍陣亡、負傷、失蹤達3,211,419人，空軍陣亡4,321人，毀機2468架。海軍艦艇幾乎打光。其中壯烈犧牲在戰場上的國民黨將軍就有二百位之多，為1986年，大陸河南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抗日戰場上的國民黨將軍》一書所承認的，就有85位。自1929年至1933年，從中央軍校畢業的大約二萬五千名青年軍官中，就有一萬名壯烈犧牲在全面抗戰爆發的前四個月。在歷次大型會戰和戰鬥中，國民黨官兵像山海關保衛戰那樣，整連、整團、甚至整師地為國捐軀者，屢見不鮮。歷史的事實尤如大陸學者所指出的

那樣：「蔣介石不但自始至終地堅持抗戰，而且自始至終地頑強地領導著抗戰。」他總是親臨前線英勇沉毅，最後撤退以身效行，甚至數次險被敵人所害的事蹟，實在已經使今日中國大陸人民感慨萬端。1991年由北京團結出版社所出版的《蔣介石傳》，以及大陸出版的各種《蔣介石傳記》，特別是1993年由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國民黨——1937》一書，早已對他作為一個民族英雄和抗戰領袖的偉大精神和英勇行為予以了大膽的和直接的歌頌。

第三，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抗戰的成就是什麼？他的成就，一是保存了我們偉大民族的血脈，使得在歷史上曾三次遭遇外族入侵的中華民族，雖然宋亡於元，明亡於清，但是，中華民國卻沒有亡於日本！這實在是比天還要大的功勞。二是因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貢獻，不僅在戰爭中廢除了百年來壓在中華民族頭上的所有「不平等條約」，而且在戰爭中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五大領袖國之一，聯合國三大宣言起草國之一，和聯合國四大創始會員國之一。使得近代以來備受欺凌和侵略的中華民族，獲得了從來不曾有過的世界地位。1943年2月4日，重慶人民為廢除所有不平等條約而狂歡的情景，實在是催人淚下。而孫中山先生就曾將「廢除不平等條約」當作中國國民革命成功的第一個標幟。中國大陸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華民國政府抗戰反思巨著——《國民政府陪都重慶史》一書，不僅將當時的情景作了極其動人的描述，而且將人民在狂歡中所高唱的歌曲重新發

表如下：

五十年革命流血，
五年半作戰犧牲，
掙斷了枷鎖，
喚回了漢魂，
埋葬了沉重的歷史，
展開了民族的新生，
正義已獲得申張，
神州已重睹光明……

第四，中華民國偉大衛國戰爭的影響是什麼？其一，他告訴了全世界，中華民國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中堅力量和領導力量，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作出了直接的和關鍵性的貢獻。美國總統羅斯福就曾在他的演說中這樣說道：「假如沒有中國，假如中國被打敗了……那將有多少師團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而調往其他方面來作戰？他們可以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並且可以一直衝向中東，和德國配合起來，舉行一個規模進攻，把俄國完全隔離起來，合併埃及，斬斷通往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線，那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途就不堪設想了……。」

美國著名教授易勞逸先生則在他《毀滅的種子》一書中，為國民黨軍隊的英勇抗戰說出了這樣的公道話：「為國民黨

軍隊說一句公道話，他與一個在組織、訓練、裝備上占絕對優勢的敵軍的戰鬥中，整整堅持了八年，與法國相比，法國對德國的抵抗僅僅六個星期便崩潰了；和英國相比，英國則從美國獲得了大量的物資支援。所以，國民黨軍隊的抵抗，乃是一個決心和自立的奇跡。他積極地戰鬥在上海、南京、華北和華中平原，徹底地挫敗了日本人對速決勝利的期望，自己也遭受了可怕的損失。然後，他們從沿海地區撤退，遠離交通網絡所能達到的地區，轉向了消耗戰的戰略，從而使日軍陷於中國遼闊的國土而不能自拔。這一頑強抵抗，對於反軸心國的整個盟軍的努力，作出了巨大貢獻。他在亞洲大陸上拖住了大約一百萬日軍，否則這些日軍便會用於太平洋地區對於西方盟國越島部隊的戰鬥。如果歷史在 1945 年之後對國民黨人仁慈一些，如果沒有內戰，如果戰後年代國民黨能夠成功地在大陸建設一個穩定的國家，現在的歷史學家們將會把國民黨人對日本侵略的抵抗，作為一篇大無畏的英雄史詩來敘述。然而，由於戰後的垮臺，國民黨軍隊在戰爭中的積極貢獻，便不可避免地被他的失敗掩去了光彩……。」

然而，易勞逸先生沒有想到的是，雖然全世界勢利的歷史學家們都可以因為「牆倒而眾人推」，而將中國國民黨人血寫的抗戰歷史掩埋罄盡，但是，處在痛苦反思中的中國大陸人民和人民自己的歷史學家們，卻終於開始將中國國民黨人抗戰的事實，當成了一篇篇輝煌的「史詩」，來加以敘述和歌頌了。此其一。

其二，更為重要的是，他告訴了中華民族的子孫後代，告訴了我們一個「人民有權利知道的歷史真相」。這個真相就是「抗戰是國民黨蔣介石領導打的，抗戰是國民黨軍隊灑夠了自己的熱血才打贏的，抗戰是除掉中共以外全體中國軍民艱苦奮戰、流血犧牲，才迎來了它最後的勝利，才使我們沒有亡國亡族。」然而，令人痛心的卻是：曾堅持長期英勇抗戰的國民黨官兵們，雖然戰死者已矣，其中的倖存者和負傷者，其中絕大多數竟於1949年之後，成了中共統治下的「歷史反革命分子」。他們或被處以極刑，或被判刑、關押、勞改、勞教，或被管押、即在家鄉被監督勞動，不僅失去了人身的全部自由，而且蔭及子孫，「永世不得翻身」。在「打內戰的共產黨是革命的，打外戰的國民黨卻是反革命」這樣一個史無前例的黑暗時代，他們的萬古奇冤是無處可以申訴的。

其三，尤其重要的是，正是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的抗戰，才向我們提出了「權力的歷史合法性」這樣一個重大問題。因為，如果一個堅定地領導了衛國戰爭、頑強地堅持了對日抗戰、直至完全戰勝了外國侵略的政權和政黨，都不具有權力的合法性，那麼，誰還能擁有對這個民族和國家的合法性權力呢？如果這樣一個為國家、為民族、為人民作出了如此巨大犧牲的政權和政黨，在剛剛贏得了那一場關乎民族存亡的反侵略戰爭之後，就立即遭遇了一定要被打倒、被推翻的命運，並且要打倒和推翻他的，又是一個絕不抗戰、甚至賣國通敵的政黨和軍隊，而且這個政黨非但奪取了權力，

甚至攫取了權力的「合法性」，如此，歷史的公道何在？更何況這個劫奪了權力和「權力合法性」的政黨，又在此後 50 年的統治中，將我們的民族和國家推向了史無前例的殘暴統治之中，為他所迫害至死的中國人民居然是被日本侵略者殺害的四倍以上。朋友們，這個令人觸目驚心的歷史事實，是不是早就應該提醒我們注意：在現當代中國，誰才真正具有「權力的合法性」呢？

五、南京國民政府非因腐敗而失敗

不幸的是，剛剛贏得了一場偉大民族戰爭勝利的中華民國，及其執政黨中國國民黨，轉眼就迎來了一場更加血腥、更加殘酷的內戰——這就是中華民國的第二大歷史階段：1945 至 1949 年的內戰時期。顯然，這是中華民國最為悲慘的一個歷史時期，因為他在這一場內戰中遭遇了慘敗；這又是後來的蔣介石和中國國民黨萬口莫辯的時期，因為「牆倒眾人推」的人間邏輯，又使得人人都只想在失敗者那裡尋找他們活該失敗的原因。因為諸如「成者王、敗者寇」和「勝利者才是正確的」這樣一些「名論名言」，已經左右了幾千年的人心。猶如史達林後來在莫斯科對劉少奇表揚中共時所說的那樣：「你們是勝利者，你們就是正確的。」

然而，「勝利者不一定就是正確的」。成功者未必是「王」，失敗者未必就是「寇」。就算成功者是「王」，也不見得就是一個好「王」，也完全可能是一個壞「王」，或

是一個真正的暴君。就像三個匪徒劫持了一架飛機，我們能說，成功的劫匪便一定是正確的，而被劫持的數百位乘客就一定是錯誤的嗎？再如，一個文弱書生被幾個小流氓在大街上打翻在地，不只滿臉是血，而且遍體是傷，還被踏上了幾隻腳，於是我們便一定要認為，只有那幾個勝利了的小流氓才是正確的，而那個書生便一定是錯誤的嗎？我們就不說列寧、史達林直至所有共產國家的大大小小的專制君主們了，他們又有哪一位不是用陰謀和殺戮來為自己鋪平權力道路的呢？他們又有哪一位不是錯誤的、甚至是極端罪惡的呢？

因此，如果我們願意從最基本的歷史事實出發，來重新研究和評判一下 1945 至 1949 年的中華民國，我們立即就會發現，中華民國恰恰是一個正確的失敗者，而不是一個活該失敗的不正確者。這是因為：

第一，誠如我在上面所說的那樣，1945 年的中華民國南京政府是一個擁有合法權力的政權。

第二，1945 年至 1949 年的中華民國及其政權，又是一個剛剛贏得了外戰、就立即開始迅速推進民主憲政的國家和政權。歷史的事實是：抗戰期間，國民黨和國民政府不僅在實際上已經開放了黨禁，結束了訓政，而且已經數度徵求國民的意見，修改了 1935 年草擬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並為了在戰後迅速推行憲政，在戰爭期間發展民主政治，竟在戰爭狀態下相繼成立了國民參政會、憲政期成會和憲政協進會等志在推展民主憲政的機構。歷史的事實是，抗戰尚未結束，

國民政府就已經宣布要在戰後一年召開「制憲國民大會」，抗戰剛剛勝利，國民政府就立即邀請已經發動了內戰的中共，進行了「雙十會談」，簽訂了「雙十協定」，召開了真正的「政協會議」，通過了民主建國的各項決議。一年後，又踐諾召開了「制憲國民大會」。並為了能夠邀請中共參加會議，三次推延會期。特別是通過了一部真正民主的《中華民國憲法》。這部憲法，尤將「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各黨派平等合法化和各級考試和監察官員必須超越各黨派」的條文，正式地寫進了這部憲法，從而將自《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誕生以來，歷經 30 餘年坎坷歷程才終於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真正具有了根本的民主性質。誠如胡適之先生所言：「這是一部比美國憲法還要民主的憲法」。雖然，戰後迅速推進的民主憲政進程，又被迅速地毀滅在中共所一心要點燃的戰火之中，但是，1945 至 1949 年的中華民國，正因為是一個曾奮力抗戰拯救民族的國家，還因為他是一個在戰後立即開始推進民主憲政的國家，所以，他才是一個正確的失敗者，而不是一個活該失敗的不正確者。此其一。

其二，雖然中華民國不是一個活該失敗的正確者，但他還是遭遇了淒慘的失敗。那麼，失敗的原因究竟是什麼呢？

我以為，中華民國在內戰中失敗的原因有這樣根本的四條：第一是日本帝國的長期、並且是瘋狂的侵略。這一場戰爭，雖然打贏了，但是，他不僅將中華民國的國底打空了，而且將中華民國打得遍體是傷，滿身是血，也就是說，打贏

了戰爭的中華民國，自己實際上也已經打垮了。特別是由於中共在抗戰時期執行了不抗日的陰謀擴張策略，勝利了的中華民國已經不再是戰前那個已經獲得了基本統一的國家。戰後的中華民國，已經是支離破碎、肢體不全，國家和政權早已出現了分裂的悲劇局面。何況，戰爭不論是對於戰勝國，還是對於戰敗國，都只能造成「創傷」，而不能造成「創強」。就像大清朝攝政王多爾袞對降清的明朝大臣們所說的那樣：「大清絕不是得自於大明，而是得自於闖賊」。因此，我們也可以說：「共產黨的天下絕不是得自於國民黨，而是得自於日本的侵華戰爭。」因為，最有力的證詞，莫過於毛澤東曾感激涕零地對他的日本客人佐佐木更三所說的話了。他說：「應該給你們發一個大大的獎章，因為沒有你們，就沒有我們！」至於周恩來所言：「如果沒有日本的侵略，中國的革命至少要推遲 50 年才能成功。」他所說的革命，自然是他們的共產革命；而他所說的 50 年後，則已經是他們的工人階級祖國——蘇聯崩潰的時候了，更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血腥鐵幕已經被徹底揭穿的時候了。如是，中國的共產革命，還有成功的那一天嗎？

中華民國在內戰中失敗的第二個原因是「蘇聯長達 28 年的蓄意顛覆」。這是胡適之先生的話。這句話道出了一個真理，就是我們的祖國不僅有一個惡鄰日本曾公然地侵略了我們，而且他還有另一個惡鄰蘇俄，他不僅公然地侵略過我們，而且在長達 28 年的時間裡面，命令並直接指揮中國共產黨武

裝顛覆中華民國，不達目的絕不甘休。我將在講演的後一部分，詳細地說明這個至關重要的問題。

中華民國在內戰中失敗的第三個原因，則是自辛亥之後直至 1949 年，因外患連連，內亂頻仍，造成土地和農民問題長期未能解決，從而為中共在西方共產主義革命這個誘人的旗號下，發動一場傳統型的現代農民造反，造就了相當的社會基礎。因為早在 1926 年 1 月，史達林就在他給中共的指示信中說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就是農民革命，中國共產黨成就的大小，就要看中共能夠掌握多大的農民武裝力量。」而毛澤東在抗戰期間就更是一再地告訴他的黨人說：「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就是農民革命，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戰爭就是農民戰爭。」

中華民國在內戰中失敗的第四個原因則是，中華民國雖曾獲得過名義上和形式上的統一，或者說是初步的統一，卻沒有完全獲得實質上和根本上的統一。或者說，北伐勝利之後開始逐步走向統一的中華民國，雖然逐一地戰勝了殘餘軍閥的武裝叛亂和中共的武裝叛國，但是，正是後來那一場曠日持久的衛國戰爭，竟使他的統一進程遭到了夭折。在中國大陸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國民黨起義將領》一書中，所記述的 19 位著名的國民黨叛將，就有 16 人出身於朝附夕叛的前清地方軍閥，而非真正的國民革命軍；其中有一人出身黃埔，但卻是長期埋伏在黃埔和國民革命軍中的中共地下黨，他就是策動川軍叛亂的郭汝槐；另一人則是北伐時期曾與中

共「暗合」的左派軍人程潛。

我承認，中華民國在內戰中的失敗，當然還有更多的原因可以追尋，特別是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所曾有過的嚴重錯失。但是，反思 1945 和 1949 年的內戰，上述四條，應是他失敗的根本原因。

其三，我知道，當我敘述了中華民國在內戰中失敗的主要原因，卻未提及國民黨的腐敗，一定會令人感到，講演者有袒護國民黨之嫌。因為，在 1949 年之後，幾乎全世界的歷史學家都因「牆倒眾人推」這一句老話，而指責「腐敗才是國民黨失敗的主要原因」，甚至是唯一的原因。至於勝利者中共，就更是要以腐敗和反動，來給國民黨的失敗定罪了。雖然，1945 至 1949 年的國民黨確曾腐敗過，甚至在走向戰敗的過程中，迅疾地變成了一個腐敗的政權，但是，我仍然要堅持的是，國民黨卻不是因為腐敗而失敗。我的理由如下：

第一，就像革命一詞，不能概括所有的革命一樣；腐敗一詞，也不能包攬所有的腐敗。我姑且不說，今日中共的腐敗早已越過了當年國民黨腐敗的百倍、千倍和萬倍，我單單要問的是，為什麼連中共都承認，從 1945 年抗戰勝利、內戰開始之間才迅速腐敗起來的國民黨，奈何只腐敗了短短的二、三年，就失敗了？相反，當今那個早已經偷偷腐敗了幾十年的中共上層統治集團，和現今也已經公然和瘋狂地腐敗了至少 20 年的中共層層統治集團，卻為什麼至今不敗？甚至還要被海外的某些華裔學者捧上了天呢？甚至說中共永遠也不會

垮臺呢？其根本原因，就是國民黨政權是被共產黨已經足足準備了八年的內戰打垮的，就不說蘇聯的蓄意顛覆和全力支持，美國的缺少同情和斷絕援助了。所以，只要設想一下，如果在今日的中國大陸，已經有一支旨在打天下的造反大軍，正在為奪權而席捲萬里關山，只怕中共及其政權早已成為「史話」了。據此，我才敢說，腐敗不是中華民國南京政權在內戰中失敗的必然原因、根本原因和唯一原因。

第二，同為腐敗，中共是制度性腐敗，而國民黨及其政權在戰後和內戰中才迅速發展起來的腐敗，卻為戰爭本身所造成。因為，抗戰的軍費，至 1944 年，就已經高達百分之八十以上，就經濟而言，這個國家就像是滅亡了一樣。由此而形成的，戰時經濟的高集中，特別是通貨的急劇膨脹，又造成了物價的飛漲，中產階級的消亡，和人民生活的愈加艱難，也因而才造成了「軍人如不吃空軍餉，須有超人的克制；文官如不貪污，則需要相當的人格」這樣一種極其不利於國家的局面。然而，這絕不是中華民國在戰後所獨有的腐敗現象。可以說，戰後所有曾參戰的國家，不論是打人的，還是被人打的，幾乎都出現了因通貨膨脹而出現的不同程度的腐敗現象。然而，只因為別的國家都沒有立即迎來內戰的爆發，所以由戰爭而引發的腐敗，才會因經濟的復甦和戰爭創傷的修復，而走上了正常的道路。然而，外仗剛結束的中華民國，卻在剛剛勝利的那一天夜晚，就迎來了一場更加殘酷的內戰。中華民國依靠自己推進民主憲政和發展自由經濟來修補戰爭

創傷、消弭通貨膨脹和根治腐敗的願望，亦隨著這場內戰的瘋狂爆發和痛苦發展，而成為泡影。

第三，古往今來，一個政權的腐敗，固有其不同的原因，但是，一個正在戰爭中、特別是在內戰中走向失敗的政權，腐敗則無疑是他「忠實的伴侶」。這個伴侶，還會因為失敗的加速，而加速他的腐敗，加速他腐敗的程度和廣度，從而使人心更加地絕望，社會更加地混亂。今日中共那些僅僅還處在「擔心亡黨亡國」的大小官僚們，在 1989 年後就紛紛斂財留後路，送子女出國，轉移錢財到海外，和在國內及時行樂的種種行徑，尚且已經造成了腐敗的瘋狂加劇，那麼，1945 至 1949 年正在內戰中迅速走向失敗的中國國民黨及其政權，所出現的腐敗加劇的現象，難道不正是由那一場內戰本身所造成的嗎？

第四，誠如一位中國大陸留學生在網上撰文所言，近幾十年來，共產黨有的是時間吃喝嫖賭搞腐敗，國民黨則根本沒有時間遊山玩水搞腐敗。不說自 1927 至 1949，前後 22 年，外患內憂交相煎迫，甚至無一年、一月沒有槍聲。單單只說 1945 至 1949 年的內戰期間，只因為外仗剛結，內戰已起，前方的戰場上正打得血肉模糊，而後方又到處是一片被中共挑動起來的「混亂和暴亂」。彼時，國民黨的黨政軍大小官僚們，其中的很大部分，倉皇維持尚嫌無力，又怎有大量的精力去腐敗他一番又一番呢？這位大陸留學生的高論，是否也可以作為國民黨非因腐敗而失敗的一條理由呢？

當然，我們絕不可以為一個腐敗的國家、政權和政黨辯護。因為，由任何原因而引起的腐敗，都是人民所不能允許的。但是，在探討中華民國於內戰中失敗的原因時，我們卻應該據實而論。這樣，才能使我們真正能夠認識到中華民國在內戰中失敗的根由。而這個根由，就是曾贏得了進步，並曾戰勝了侵略的中華民國大陸政權，是被日本帝國、前蘇俄共產帝國和中國共產黨聯合起來共同打敗的，與當年只存在了八個月的「俄羅斯共和國」一樣，根本就得不到西方的任何支持和幫助。這才是歷史的真相所在。也才是歷史的應有回答。

六、從「反共反獨」走向「抗共求獨」與「和共求獨」

中華民國終於痛苦地迎來了他的第三大歷史階段，即從1949年至2000年3月國民黨在大選中失去政權。

這個歷史階段，長達50年。如果一言以蔽之，這50年便是「堅守中華民國、持續恢復訓政，致力民生發展，實現還政於民」的50年。如果分期論之，他的前期為1949至1988年，是為「兩蔣時代」，即堅持「反共復國」和「反獨護國」的時代；他的後期，即1988至2000年，則為「放棄」反共復國和反獨護國、而從「抗共求獨」走向「和共求獨」的時期。

首先，就他的前期而論，國民黨政權雖然在敗退臺灣初期，曾處於「風雨飄搖、一夕數驚」的動盪局面，後來又遭

遇過被迫退出聯合國等中共和國際勢力的沉重打壓，但是，國民黨臺北政權卻能夠在軍事、政治、經濟、教育和思想文化等各個方面，堅守原則，銳意革新，所以，不但戰勝了重重困難，而且將一個臺灣島建設成了中國第一個民主繁榮的地區，更為後來全面推進民主進程奠定了強固的基石。他的基本作為是：

第一，在軍事上保衛了中華民國的臺灣。1949年10月下旬，當中共發動了企圖解放臺灣的金門古寧頭戰役，其命運，竟是二萬登島部隊全軍覆滅，從而為中華民國軍民捍衛臺灣政權建立了很大的信心。1951年，當中共高喊著「紅旗插上大陳島」時，大陳島上的14,000名中華民國國民，早已全部志願地撤退到了臺灣。同年，韓戰的爆發，又使得中華民國臺北政權獲得了「喘息」。至1956年9月最後一次海戰之後，臺灣已經基本上消除了中共來自海上的威脅。1958年中共炮擊金門，企圖將金門夷為平地，可是，其間的八二三空戰，中共百架飛機非但不能殲滅中華民國32架飛機中的任何一架，卻被中華民國空軍殲滅了近20架飛機，其後金門大炮對福建沿海、特別是廈門的還擊，又使得中共再不敢逞兇。從此，中共的空軍也不再敢飛越臺灣海峽的中線，中共的大炮亦從此而悄無聲息了。

中華民國的國民革命軍在海峽天空和海上的勝利，奠定了臺灣軍事力量的優勢，空喊了數十年「一定要解放臺灣」的中共，如今只能用「文攻武嚇」和統戰手段，至多也就是

放幾枚空彈頭，來對付臺灣新一代不識中共「陰陽兩謀」的民主政治家或民主政客們。更何況，中共面對大陸日益動盪的社會局面，和人民反抗的日漸劇烈，其「穩定壓倒一切」的方針，又決定了他所面臨的，竟是對臺灣「死都不敢打，要死了才有可能打，打了就死」的宿命呢？

第二，在政治上，兩蔣時代，一是在臺灣堅守了中華民國的國統和法統。誠如我在《誰是新中國》這本書裡面所說的那樣：「臺灣之所以能夠走上其後這樣一個民主和繁榮的境界，首先是因為退守臺灣的中華民國政權能夠承繼並堅守中華民國的國統與法統，才為臺灣後來的歷史性進步與繁榮奠定了必須的政治基礎。因為，承認不承認中華民國的嶄新國統，繼承不繼承中華民國的共和法統，將決定臺北政權的根本性質，決定他是否劃開了自己與兩千餘年君主專制國統和中共北京專制復辟政權的根本政治界限」。

二是堅持在已經建立的憲政體制之下，並在非常的和極其艱難的國際國內狀態之下，「持續恢復訓政」，以保衛中華民國，堅持反共復國的方向。所謂持續恢復訓政，就是將30年代在大陸未能完成的訓政建設，在臺灣將他推行完成。具體地說，首先就是要堅持一個有權威的國民政府，不容許任何勢力、特別是共產黨勢力和當時的社會主義臺獨勢力來顛覆，以堅守中華民國在臺灣的合法國家地位。其次，則是立即推行縣自治，再從扶持最基本的民權做起。1950年，剛剛敗退到臺灣的國民黨政權，就已經開始了縣市長選舉的做

法。對大陸來說，即便是推遲到了 50 年後的今天，由人民來直接選舉縣市長，也只能是大陸人民的一個痛苦的幻夢罷了。設想一下，如果退守臺灣的蔣介石先生和國民黨臺北政權，不能這樣地堅守臺灣，那麼，結果無非只有兩個：一個是被中共武力解放；一個則是被社會主義臺獨在中共的配合下所顛覆。而不論是那一個結果，臺灣人民都只能肝腦塗地，呼天搶地而不靈了。因為，被中共武力解放的結果，中共大陸已經提供了千千萬萬血腥的證明；因為，被社會主義臺獨顛覆的後果，則是在亞洲又出現了一個社會主義的「臺灣共產國」，則越南、柬埔寨和北朝鮮人民的悲劇，就是臺灣人民的悲劇。而這個悲劇，又全是用無辜人民的鮮血來塗就的。當今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先生，在去年年初「挺扁」時，就曾聲稱：「我們這些早期的臺獨人士，都是社會主義者。我們與共產黨最接近。」此話，實在是將兩蔣時代臺獨的社會主義性質說得再清楚不過了。而所謂的社會主義臺獨，用我們大陸的語言來說，不過是中共在臺灣的「紅周邊」罷了，其目的，就是要說明中共推翻國民黨臺北政權和消滅中華民國。

三是中華民國臺北政權堅持了以「民生發展為首要」的 30 年代訓政方針。不僅保護私有制度，保護中華民國固有的自由經濟制度，堅持發展市場經濟，以改造日偽留下來的公營企業，而且抓住了有利的世界經濟發展機遇和國際經濟的發展空間，至 7、80 年代間，已經初步達到世界已開發國家

的水準，開始為世界許多國家和地區的人民、特別是後來的大陸人民所羨慕不已。在這裡，必須提到的是，中華民國臺北政權根據 1930 年頒布的「土地改革綱領」，在臺灣實行了「和平土改」，以「不殺一人、不毀一家」的歷史性成就，不僅為臺灣後來的經濟發展奠定了極其重要的基礎，而且更為臺灣的政治穩定奠定了社會的基礎。他與中共「殺人土改」的結果相比，就只能令大陸農民有「天堂地獄」之慨。

四是中華民國臺北政權在 1949 年後的特殊艱難歷史條件下，應該說，除掉反對煽情共產主義的思想文化，防止中共「解放」和臺獨顛覆，也就是為了臺灣島的安全，才在少數領域進行一定範圍和一定程度的限制以外，處於非常時期的臺灣人民，不僅擁有居住、教育、遷徙和出國留學、移民的相當自由，而且擁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很大自由。誠如一位大陸學者所指出的那樣，國民黨政權在臺灣給予黨外政治空間的第二個體現，就是允許非黨報刊的存在。「50 年代初，臺灣當局雖然制定了《戒嚴期間新聞雜誌圖書管理辦法》，但實際上黨外報刊雜誌仍然存在。《自由中國》、《文星雜誌》、《大學雜誌》及《臺灣政論》等刊物的思想筆觸，都完全獨立於國民黨之外。其中最老的《自由中國》於 1949 年 11 月創刊，一向對國民黨政權的獨裁、腐敗發出尖銳的批評，甚至敢於反對蔣介石連任總統，對這一切，國民黨政權都予以容忍……」至今仍然在海外報刊上吵吵嚷嚷的《自由中國》雜誌事件，雖然意在聳動海外聽聞，但是，

該雜誌連續 27 期地罵了蔣介石和國民黨，一再地反對蔣介石連任總統，卻也只是在第 27 次大罵之後，才被停刊處理，這即便是在今天的中國大陸，都是人民和文化人所不敢想像的事情。70 年代中期之後，在臺灣，查禁報刊的尺度更有相當的放鬆。一般批評國民黨政權和其官員的文章常見於報端。這樣就給黨外反對勢力的存在、彙聚、集結提供了更大的空間。1979 年 5 月，行政院新聞局解除了《停止雜誌登記》的禁令。僅一個月後，《美麗島》、《80 年代》等雜誌即行出版，在臺灣社會掀起了更大的波濤。辦民間報刊，參加地方選舉已經成為黨外反對勢力匯集力量，培養儲蓄人才，擴大其能量和影響面的犀利武器。1987 年國民黨政權取消「戒嚴令」，徹底開放了黨禁、報禁，歷史終於翻開了新的篇章。

至於後來臺灣民營報刊之多，私營出版事業之隆盛，民間報業鉅子之舉世聞名，就更為幅員遼闊的中國大陸，人才濟濟的中國大陸，民怨沸騰的中國大陸，所絕不能夠相比的了。50 年代，一個年輕的出家女子，竟能在花蓮籌辦「慈濟功德會」，並廣收門人，興旺時，人數竟達上百萬之多，收入竟達數億萬之巨，這在絕對不容許人民有任何結社自由和信仰自由的中共大陸，無疑只能造成千千萬萬人人頭落地的悲慘結局。今日中共對大陸法輪功的鎮壓便是明證。

至於在教育上，國民黨臺北政權不僅繼承了中華民國歷來重視教育的傳統，在艱苦的 50 年代，就已經開始了九年制義務教育，從而造就了今日臺灣在教育水準上的高標準現象，

為民主政治、特別是為自由經濟的發展打下了難以言喻的良好基礎。

朋友們，正是兩蔣在臺灣所做的事情，所作的貢獻，才構成了兩蔣時代的巨大特徵。這個特徵就是：堅守中華民國，堅持反共反獨，堅決為中國建設一個實行三民主義的模範省，並基本得以成功。至於兩蔣之後的所謂李登輝時代，我就不想多說了。因為這位在下臺後已經公然表示「親日本、恨中國、厭惡中國國民黨」的中華民國總統和中國國民黨主席，雖然承繼了兩蔣留給他的寶貴政治經濟文化遺產，但是，他不僅製造了臺灣部分人民在國家認同上的混亂，而且揉碎了中國大陸人民對臺灣、和對中國國民黨的一個歷史之夢。一言以蔽之，也就是李登輝不僅拋棄了堅守中華民國的國統和法統的正確方向，而且把兩蔣的反共反獨正確路線變成了「抗共求獨」直至「和共求獨」的倒退路線和分裂路線。這非但違背了臺灣人民的根本安全需要，更違背了中國大陸人民和海內外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利益。李登輝的作為早已是海內外有目共睹的事實，更為已經下臺的李登輝先生所一再地公開承認。而今日臺灣在政治上的所有亂象，就都是因為國家認同出了問題。而這個大問題的出現，非但是李登輝的歷史「功勞」，更為未來臺灣人民的悲劇命運埋下了歷史的伏筆。至於兩蔣之後臺灣全面民主進程的成就和經濟繁榮的現實，究竟應該功歸何人，我想，臺灣有義士，自能說明白。也就用不著我來多說了。

七、共產革命不可能創建一個新中國

各位華僑和留學生朋友們：

在我已經敘述了中華民國的基本歷程之後，初步地論證了孫中山先生所創建的中華民國，確實是一個新中國，並且是一個歷盡了種種磨難的新中國之後，我現在來論證中華人民共和國到底是不是一個真正的新中國，論證究竟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還是像 90 年代大陸民間所唱的，竟是「有了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為此，我們首先要搞清楚的，就是中國共產革命有沒有可能創建一個新中國。

第一，中國共產革命的原因不簡單。因為他是一場由蘇俄向中國輸入、並在中國發動的「革命」。是因為列寧和史達林有一條發動共產主義革命的「東方路線」，或曰「東方戰略」。歷史的事實是：

1913 年，列寧就提出了「到歐洲去的捷徑是經過北京和加爾各答」。大家都知道，莫斯科就在歐洲，可是列寧要想發動歐洲的共產革命，卻要經過北京和加爾各答，並且還說這是發動共產革命的「捷徑」。由此可見，列寧在歐洲的困境和他對亞洲的用心。

1918 年，由於列寧在俄國實現了他發動共產革命的夢想，所以，史達林便迫不及待地發表了「勿忘東方」的文章，號召要發動東方的共產革命。

1919 年，因列寧迫不及待地要發動歐洲共產革命，便拋

棄了他企圖迂迴北京和加爾各答的「捷徑」，一邊建立第三共產國際，一邊發動了德國和匈牙利的共產革命，竟在別人的國家裡篡立了「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和「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就像他後來在中國江西瑞金篡立屬於蘇俄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一樣。只因瞬間敗亡，列寧只好放棄了他立即和直接進攻歐洲的共產革命計畫。

1920年4月前後，列寧已經數度派人到中國來作調查和研究，甚至數次派人求見孫中山，要求孫中山將國民黨改名為共產黨，將中國的國民革命立即轉變為俄式的共產革命，卻一再地遭遇了孫先生的拒絕。於是列寧便派遣共產國際遠東局負責人維津斯基來中國，以聯繫中國的共產主義者，並建立了中國共產黨。所以，中共歷史教科書才會為維津斯基的中國之行「謙虛」地說道：「維津斯基先後在北京、上海會見了李大釗陳獨秀等人，討論了建立中國共產黨的問題。此後，共產黨的組織便在各地出現」。中共教科書似乎將維津斯基於1920年8月就已經在上海建立了中共及其臨時中央的事情，「忘記」說了。

1921年7月，蘇共「委託」共產國際派代表馬林和國際赤色工會代表尼可爾斯基，來中國主持並操辦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馬林不僅留在中國領導並主持了中共的日常工作，而且命令中共黨員接受蘇聯的津貼。陳獨秀就曾明言，中共的經費幾乎全是蘇共提供的。中共受蘇共的命令和指揮已不待言。

1922年9月，中共在召開「二大」時已經發表宣言說：「完全承認第三國際的參加條件21條，中國共產黨為國際共產黨的一個支部。」

1928年，蘇共出錢、出力為中共在莫斯科召開了第六次代表大會。在這次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黨章上，已經明明白白地規定說：「中共為共產國際之一部分，命名為中國共產黨，為共產國際支部。」也就是說，中國共產黨這個名稱，是由蘇共操縱的第三國際為他起的。

上述事實，不僅證明了中共建黨的由來和本相，就是「蘇共建立了中共」；而且證明了，「中國共產革命，實為蘇俄在中國所發動」這樣一個不爭的歷史事實。

當然，中國共產革命的發生，還有他的兩個次要的內因：

一個，就是中國的國民革命，雖然頗以歐洲民主革命和美國獨立革命為榜樣，但是，中國國民革命卻曾飽受「歐風吹之和美雨淋之」的痛苦。此話怎說？說白了，就是對內民主、對外強權的歐美民主列強，就不說那些專制的強國了，他們不但不支援中國的國民革命，相反，辛亥之前，他們曾幫助滿清王朝撲殺孫中山的革命；辛亥之後，他們又一再地支援中國的專制復辟勢力。在袁世凱、張勳和大大小小軍閥的背後，可以說無不有一家或數家列強在為他們撐腰。1912年辛亥革命爆發時，沙俄駐華公使廓索維茨就對四國銀行團美國代表司戴德夫人說：「我們唯一的意見，就是要使得中國永遠衰弱不振，並始終反對中國能夠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政

府。」這實在是表達了所有列強的心願。就像今日那些只看見中國市場的東西方強國，甚至包括某些臺灣同胞，為了能夠在中國更好和更方便地賺錢，也都是一心希望中共的腐敗專制統治同樣能夠「綿綿無絕期」一樣。這實在是一種頗令人感到悲哀的歷史和現實。

1923 年底，英美德日義葡等國家，就曾聯合起來派軍艦向孫中山廣東革命政府示威，反對中國的革命政府截收廣東海關的關稅。所以，我們中國人，特別是一些激烈的知識份子，才會對西方感到絕望，甚至因此而對西方的民主革命和獨立革命產生了不良的感覺，孫中山也才會宣稱：「我們已經不指望西方，我們將聯合俄國」。因為，西方一再地拒絕了孫中山，而蘇俄卻一再地派人來找孫中山。孫中山先生被「聯俄容共」的歷史性失誤，就是因此而來。

另一個，則正是上述原因，才迫使中國傳統知識份子們的「桃花源夢」，與早在晚清和民初就已經被送到中國來的馬克思主義一拍即合了（馬克思主義可不是「一聲炮響送來的」啊！）也就是說，那些剛剛脫掉了長衫，換上了西裝，剪掉了辮子，梳出了「洋妝」的近代中國先進知識份子，特別是對西方的任何科學還真假莫辨的小知識份子們，卻輕而易舉地就拋開了對科學和民主的艱難追求，並立即轉而追求西方的共產主義革命，也就是被馬克思用近代科學「包裝」過的西方大同思想與大同革命了。

這就是我要說的一外一內兩個次要原因。

第二、正因為中國共產革命是蘇俄在中國發動的，所以，他的革命理論也就一定是一家純粹外來的理論，說「全盤西化」也行。這個理論，不言而喻，就是馬克思主義。然而，什麼才是馬克思主義，特別是「什麼才是馬克思主義的要害」呢？他的要害，一是要在政治上推翻剛剛在西歐建立起來的民主制度，以在無產階級革命的名義下重建專制制度；二是要在經濟上推翻剛剛在西歐發展起來的私有制自由經濟，以建立社會主義的公有制經濟；三是要在手段上，不僅將傳統的暴力革命方式上升到「科學與理論」的高度，而且將傳統暴力革命與他的階級鬥爭理論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結而合之，從而形成了一個以「階級鬥爭、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為核心的、極端的暴力共產革命理論。必須指出的是，這個理論並非僅僅因為他鼓吹暴力，而使人感到可怕；他的可怕之處，是因為他鼓吹的暴力，是與拚命製造階級鬥爭和一定要實行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相始終。也就是說，共產革命的鼓吹者和實行者們，不僅要依據這個理論來奪取政權，而且要依據這個理論來維護政權。這才是共產主義者們提倡暴力革命的「新意」，也是他們這些暴力革命者與眾不同的地方。當然，這也就是我在《誰是新中國》一書的導論裡面，絕不孤立地批判馬克思的暴力革命，卻一定要針對「階級鬥爭、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這樣一個理論體系來進行批判和否定的原因所在。去年，法國一位學者所撰寫的《共產主義黑皮書》，就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將全世界一億二千萬

無辜人民迫害至死的空前罪行，予以了證據確鑿的指證。其中，為中國共產革命所迫害至死的無辜中國人民，就達六千五百萬之巨。這還是最保守的估計。所以，這絕不是一種普通的暴力行為所可能製造的罪惡。而唯有這個以「階級鬥爭、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為完整理論基礎的共產革命，才有可能製造出這樣一個空前的「反民族罪行」和「反人類罪行」。甚至是空前絕後的恐怖主義罪行。

第三，正如大家都知道的那樣，俄國共產革命的對象，非但不是沙皇及其君主制度，而是剛剛推翻了沙皇和君主制度、並創建了「俄羅斯共和國」的二月民主革命，及其所建立的二月民主政府。如出一轍的是，中國共產革命的對象，恰恰也不是滿清王朝和君主帝制，而是剛剛推翻了滿清王朝、結束了帝制、創建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的中華民國。並且，這個亞洲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其時正處在遭遇形形色色專制復辟勢力連續、並且是瘋狂的反撲之中。中國共產革命不過是在所有這些旨在反撲和顛覆這個嶄新民主共和國的復辟勢力中，增添了一個「以革命為名義」的專制反撲勢力罷了。

第四，一個人盡皆知的事實就是：中國共產革命的理論目標，就是要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讓每一個中國人都能夠生活在一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共產主義天堂」裡面。同樣人人皆知的卻是：中國的共產革命，於實際上，不過是在「實現共產主義」的名義之下，建立了一個「以馬列毛思

想為絕對統治，以全面復辟專制制度為唯一目標，以『教政合一』為最高統治形式的，一黨永久極權專制統治」。我們的先賢，著名的梁啟超先生，在 1924 年就已經說過：「無產階級專政也是專政，凡是專政都不是什麼好東西，更不是什麼新東西。」何況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罪惡歷史已經證明，他更是有權階級和有錢階級對於全體人民的史無前例的殘酷專政呢。

朋友們，如果中國共產革命的原因、理論、物件和目標確如上述一樣，那麼，中國的共產革命，還有可能建立一個與數千年專制中國所完全不同的、真正民主共和的「新中國」嗎？

八、蘇俄是怎樣誘發中國共產革命的？

我現在來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由來和發展，看一看由中國共產革命所建立起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究竟像不像一個新中國。為此，我也將中國共產革命、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程，分為三大歷史階段。第一大階段，即從中共 1920 年 8 月建黨到 1927 年被清除出國民革命陣營。第二大階段，即從 1927 到 1949。第三個大階段，從 1949 年直到現在。

先說第一大歷史階段。本階段也分為前後兩期：他的前期自 1920 至 1927，主要是中共在蘇聯命令下參加、誘逼、直到公然背叛中國國民革命的時期；他的後期從 1927 至 1937，是中共在蘇聯命令和直接指揮下，武裝顛覆中華民國的叛亂

和叛國時期。

我首先要說明的是，蘇聯在中國發動共產革命之時，正是中國處於辛亥之後國民革命和形形色色專制勢力反復較量的歷史時期。志在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張勳復辟滿清、和北洋政府製造混戰混亂的民主力量，特別是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黨，已經歷經了二次革命、護國運動和第一次護法運動，正處在艱難的第二次護法運動之中。其次，蘇聯在此時命令剛剛由他製造的國際共產黨中國支部，即中國共產黨，以黨員個人身份參加國民黨，參加國民革命，他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以「混淆兩種不同性質的革命為手段，通過製造中國國民革命的混亂，借中國國民革命以發動中國的共產革命」。因為，在中國，問世不久的中國共產黨，要想在蘇聯的領導之下發動中國的共產革命，還缺少足夠的影響和力量來與國民黨和國民革命抗衡。相反，只有借助國民革命才能發動共產革命。這是蘇俄的認識和策略，是蘇聯共產黨曾在本國使用過的老手段，也是列寧、史達林之所以要策劃支援孫中山國民革命陰謀的要害所在。所謂沒有「白吃的午餐」罷了。中共成功以後，曾一再得意地說過：那時候，我們對國民黨搞的就是「挖心戰術」。這句話，倒是真正戳破了所謂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天機」。在明白了上述兩個基本的背景之後，我們就能對中共在本階段參加國民黨、參加國民革命的目的和手段有了明辨的歷史基礎。

蘇聯命令中共參加國民黨和國民革命以發動中國共產革

命的第一個手段，就是參加國民黨以分裂國民黨。在此，我可以用一些簡潔的事實來證明他：

首先，國民黨一大之前，蘇聯顧問鮑羅廷就已經對廖仲愷說：「國民黨裡面有左右派之分」。國民黨一大之後，中共的創建者維津斯基又更加明確地對共產黨說：「共產黨人要在國民黨裡面支持左派，打擊右派。」

其次，1924年5月，中共中央擴大會議已經宣稱：「所謂國民黨左右派之爭，其實是我們和國民黨右派之爭。所以假使我們現在因為鞏固和擴大國民黨起見，而取調和兩派的政策，那就是一種錯誤。」要是把這句話反過來說就是：「如果我們調和了國民黨兩派，鞏固和擴大了國民黨，我們就犯了錯誤。」中共參加國民黨的用心豈非昭然若揭。從此，不親俄不親共的國民黨就成了「右派」，甚至被罵成是「反革命派」了。

再就是，1926年元月國民黨「二大」前，中共已經決定：「要在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團結國民黨左派，孤立國民黨中派，打擊國民黨右派。」還決定要「在國民黨代表大會代表的總數中，我們共產黨身份的國民黨員要占三分之二以上。」事實確如中共所願。中共現代史教科書就指出，在國民黨的「二大」上，共產黨身份的代表確已占了三分之二以上。而在國民黨人自己的大會上，由共產黨身份的代表提案，使得國民黨元老謝持和鄒魯被開除黨籍，元老中的另一些人林森、居正、沈炫廬、葉楚傖等12人被警告，國民黨的

中堅人物戴季陶等人被斥以訓令，國民黨的骨幹力量在大會中紛紛落選……。由此看來，蘇聯命令中共參加國民黨以分裂國民黨的目的幾乎超額達成。

蘇聯命令中共參加國民黨和國民革命以發動中國共產革命的第二個手段，就是指使中共在國民黨中發展共產黨，竊奪國民革命領導權，以實現在中國發動共產革命的目的。雖然《孫文越飛宣言》曾明確宣稱：「共產組織和共產制度不得移植於中國之內」，但是，1923年共青團「二大」宣言卻稱：「應努力協助共產黨，擴大國民黨中的共產黨於全中國」。所以，國民黨「一大」之後，中共就立即開始了在國民黨內組織秘密黨團，發展共產黨組織。

此後，在國民黨「二大」上得逞的中國共產黨，終於造成共產黨身份的國民黨員和國民黨左派，在各項選舉結果中占有了絕對優勢：在國民黨中央各部，毛澤東代汪精衛任宣傳部長，共產黨人馮菊坡代胡漢民任中央工人部長，國民黨極左派彭澤民任海外部長，國民黨中央秘書處由共產黨人譚平山和林祖涵掌控，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由譚平山擔任，其部員共29人，共產黨竟然占了26人。國民革命軍六個軍的政治部主任，只有第四軍政治部主任不是共產黨，其餘全部由共產黨擔任。所以中共的現代史教科書才宣稱：「各地的國民黨組織通過重新登記改造，幾乎為共產黨所主持」。其間，中共還在黃埔軍校建立了地下組織「青年軍人聯合會」，以宣傳共產主義，反對三民主義，意圖擴張自己在國民革命

軍中的勢力。

對此，另一個有力的證明是：李大釗在國民黨「一大」上曾宣稱：「共產黨人參加國民黨，是要服從國民黨主義，遵守國民黨的綱領和紀律，共同進行中國的國民革命」；但是，半年之後，李大釗竟在莫斯科共產國際代表大會上作報告說：「共產黨人參加國民黨，就是為了改變他的主義和綱領，將在中國信仰三民主義、崇拜國民黨的民眾拉過來，以進行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也就是要「移植共產組織、共產制度於中國」。公然違背孫中山和越飛的《上海宣言》。證明這個宣言原本就是蘇共對孫中山先生所玩弄的陰謀手段。

蘇聯命令中共參加國民黨和國民革命的第三個手段就是反對北伐、利用北伐、破壞北伐、背叛北伐，直至公開地叛變國民革命。

一是反對北伐。1926年元月，當蔣介石提出「北伐打倒北方軍閥的時機已經到來」時，蘇聯顧問一致反對，並在廣州城到處張貼反對北伐的標語，宣揚北伐必敗，第一次公開攻擊蔣介石是「新軍閥」。

而當北伐已經勝利出師、攻占湖南之後，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嚮導》卻發表文章說：「革命的北伐尚未成熟，現在的實際問題，不是北伐，乃是怎樣防禦。」所以，李宗仁才在他的回憶錄裡面明確指責說：「中共反對北伐」。當然，中共反對北伐的理由，是因為擔心「得不著湖北，反失去了

廣東」。因為中共在廣東的存在，是依賴於國民黨和國民革命的存在。如果國民黨抽身北伐，則共產黨就會在廣東立不住腳，所謂共產革命，也就要偃旗息鼓了。

二是利用北伐。早在 1926 年 2 月，中共就曾在北京召開特別會議，為對付蔣介石提出北伐的問題，提出了一個「二月政綱」。決定如果阻止不了國民黨的北伐，就要以「解決農民問題」為幌子，利用北伐發動農民共產運動。1926 年 9 月，在北伐勝利進軍中，蘇聯顧問鮑羅廷進一步根據史達林「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是農民問題」的指示，在北伐軍的勝利後方，提出了「一切權力歸農會」的口號，發動農民起來建立農民政權，蓄意推翻因北伐勝利進軍才剛剛建立起來的各地國民政府。一時間，中共到處製造暴亂和混亂，湖南、湖北的農民運動和工人運動，更是鬧得人心惶惶。當時，馮玉祥就曾明白地指責中共發動工農運動，就是「陽冒國民革命之名，陰布全國恐懼之毒」。

三是破壞北伐。1926 年底，當北伐軍已經占領武漢，正要準備沿江東下，以解決東南軍閥孫傳芳時，蔣介石提議，為適應國民革命發展的需要，廣東革命政府和國民黨中央應該遷至武漢為好。然而，蘇聯顧問和鮑羅廷卻反對遷都，進而挑起「遷都之爭」。鮑的表面理由是：「黨的力量在前，革命的力量在後」。鮑的真正理由則是怕中共「得不著湖北，反失去了廣東」。因害怕阻擋不住，便又立即為中共決策：一、「迎汪速回，以與蔣分權」。目的是在製造汪、蔣的矛

盾，以牽制蔣的北伐。二、盡力發展湖北的革命力量。無非是要在湖北做好發動共產革命的準備以後，再遷都。這也才是湖北的工人運動竟成為「紅色恐怖」的真正原因。三、確定唐生智在政府中的地位。就是要繼續膨脹舊軍閥唐生智已經在膨脹的野心，以牽制甚至取代蔣介石。四、鞏固中共在廣東省政府的政權。就是要從根本上解決「得不著湖北、反失了廣東」的危機，把後路留好。四個月後，當兩湖工農運動已經為共產黨提供了發動共產革命的基礎時，鮑羅廷同意遷都了，並說：「現在，我們自信已經能夠在武漢建立我們自己的中央了。」自然，這個「自己的中央」，既包括了共產黨的中央，更包括了那個必須由他們來控制的國民黨中央，還有就是必須由他們控制的廣東國民政府，即遷都後的武漢國民政府，也就是後來汪精衛自己承認的「武漢俄國政府」。

四是發動政變以阻斷和破壞蔣介石繼續北伐。1927年3月，蘇聯顧問鮑羅廷在武漢擅自成立了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國民政府的所謂「聯席會議」，並且在國民黨當時的主要領袖蔣介石不在的情形下，召開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反撲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已經通過的「整理黨務案」，非法地解除了蔣介石在國民黨和國民革命軍中的最高職務。為奪回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權力，已經辭去國民黨中央重要職務的共產黨人，紛紛還職，以重新控制國民黨。

1927年3月24日，在北伐軍剛剛攻占南京之後，國民革命軍第二軍和第六軍中共產黨身份的政治部主任李富春等，

又指使共產黨身份的士兵發動南京事變，劫殺外國人，企圖挑起列強反對中國的北伐。只因為英國首相張伯倫在英國下院作證時，曾明確地說：「南京事件的策劃者，顯然是意要在我們與蔣介石的北伐為難」，所以，蘇聯和中共企圖挑起國際事端以阻止蔣介石北伐的陰謀才會落空。

1927年3月至4月，蘇聯和中共為了趕在北伐軍攻占上海之前占領上海，建立所謂巴黎公社式的無產階級政權，竟在北伐軍已經包圍了上海、盤踞上海的直魯軍閥已經答應投降的狀況下，連續發動三次上海暴動，並建立了上海「市民政府」。中共領袖吳玉章則公開指示：「誰要是反對上海無產階級政權，誰就是反革命，就應該槍斃」。此後，在北伐軍終於占領上海，並且建立了國民政府之後，中共又在上海建立了工人武裝糾察隊，甚至大量吸收被遣散的軍閥部隊，準備再度發動起義，推翻上海國民政府。只是因為他們計畫的「四一二」武裝暴動被國民革命軍鎮壓了下去，於是，在中共的歷史上，就反而將「四一二」說成了蔣介石的「反革命政變」。也就是說，將鎮壓了他們暴動的北伐軍及上海國民革命新政權說成了反革命。我很想問一問朋友們，在北伐打倒軍閥的時代，究竟誰才是反革命？究竟誰才是革命的？既然全國人民都在期盼著國民革命軍能夠早一日完成北伐，打倒軍閥，解放全中國，那麼，唯有軍閥才是反革命，唯有北伐軍、和因北伐勝利進軍才建立起來的國民革命政權才是革命的。因此，不打軍閥，卻要阻擋和破壞北伐，甚至一心

要推翻國民革命新政權的蘇共和中共，難道不是反革命，倒反而成了革命的了嗎？所以，倘若真地要說「四一二」是反革命政變，那麼，這個「反革命政變」的真正製造者，就是蘇共和中共。這才是歷史的本相。

五是公開背叛北伐，叛變國民革命。因為中共反對不成，才要利用；利用不成，才要破壞；如果連破壞也不成了，當然也只有背叛。更何況，此刻，史達林已經給中共發來了「五月訓令」，已經公然命令中共要武裝起來，實行暴動，乾脆推翻中國的國民革命新政權了。1927年4月，共產國際顧問、印度人羅易提出了「南伐」，意在打回廣東去，保住共產革命的根據地；中共領袖周恩來則主張東伐，以推翻剛剛建立的國民革命南京政權；軍閥唐生智在鮑羅廷的挑撥和利用下，已經沿江而下，用叛軍來壓迫剛剛重建的南京國民政府。然而，武漢的汪精衛，在他看到了史達林的「五月訓令」之後，因對中共就要發動的武裝暴動，感到「大懼」，所以，連這位自認只是「武漢俄國政府」名義上首腦的國民黨左派領袖，也決心要「分共驅俄」了。誠如汪精衛自己所說：「已經到了要爭船的時候了，已經到了要爭舵把的時候了，要將國民革命帶向共產主義那條路上去的人，不能不將國民黨變成共產黨，否則只有消滅國民黨之一法。」被中共從歐洲迎回來「與蔣分權」的汪精衛，終於說了實話，並且說對了。

1927年7月，史達林又派來了一個蘇聯顧問羅明拉茲，以直接領導、組織和指揮中共公開地發動武裝暴動，不僅要

公然地背叛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而且要公開地要發動中國共產革命，以志在顛覆中國國民革命的成果。中共就是在這位新蘇俄顧問的領導下，才迅疾地打響了「八一」南昌叛變的第一槍。中國共產革命因此而進入了他的另一個更加兇殘的階段。

九、蘇俄指揮中共武裝顛覆中華民國

中共在蘇俄的命令和指使下，參加國民黨和國民革命，企圖把中國國民革命誘逼成為中國共產革命的陰謀，隨著他們反對、利用、破壞和公開背叛北伐，直至公然叛變國民革命的逐一暴露和一再失敗，而終於被蔣介石為代表的中國國民黨人清除出了國民黨和國民革命陣營。因為，不如此，反對軍閥復辟混戰的偉大國民革命目標就不可能完成；不如此，國民革命就只能功虧一簣，半途而廢；不如此，非但北方軍閥打不到，人民的願望不能達到，北方的大軍閥甚至要與蘇俄和南方殘餘軍閥勢力裡應外合，進行「南伐」，以對中國國民革命進行反攻倒算。1927年直魯軍閥張宗昌等竟然打過長江，險些占領了中華民國首都南京的險象，實在已經將這個危險表現得明明白白。

然而，蘇聯既沒有從他在中國的失敗中汲取教訓，中共則更是要在蘇俄對中華民國的新一輪顛覆中，為糟蹋自己的民族和國家而「爭取立功」。1927年夏天，史達林不僅派羅明拉茲來中國領導並指揮已經遭遇失敗的共產革命，並且帶來

了蘇俄交給中共的「新三大任務」。這三大任務就是要在北伐即將成功，國民革命即將勝利，中華民國即將獲得初步統一之前夕，煽動工農運動，發動武裝暴動，篡立俄屬蘇維埃政權。直至要在北伐已經成功，國民革命已經勝利，中華民國已經獲得了初步和平統一之時，趁「九一八」日本侵略中國，而迅速篡立背叛祖國、認宗蘇俄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今天，我不講中共是怎樣在蘇俄顧問和蘇聯駐中華民國使領館的直接策劃、指揮和配合下，於1927年下半年在南中國發動「南昌暴動」、「秋收暴動」和「廣州暴動」的。今天，我甚至不講羅明拉茲又是怎樣在1927年11月中共上海臨時中央擴大會議上，向中共布置「如何在中國南方農村進行大面積的燒殺、綁架和強迫農民參加暴動」的任務的。一位叫做貝聿的中國大陸學者，在他題名為《中國左禍》的書裡，已經詳細地將上述罪行敘述得明明白白。我今天只想講兩個問題，一是在中東路戰爭爆發、蘇聯大規模侵略我國東北的時候，中共是怎樣執行史達林「武裝保衛蘇聯」的命令的。因為這實在是一個志在與蘇聯侵華戰爭「裡應外合」的徹底賣國行為。二是在「九一八」事變之後，中共又是怎樣立即接受蘇聯和共產國際的命令，不僅趁機發動武裝暴動和暴亂，而且乾脆篡立認俄為祖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因為這是中共出賣祖國、分裂國家、製造兩個中國的明確歷史罪證，他甚至成了日本和溥儀在中國東北篡立偽滿洲國、即「第三個中國」的序曲和樣板。

首先我們講中共的「武裝保衛蘇聯」。

歷史的事實是：1929年5月27日，東北地方政府查明蘇聯駐哈爾濱領事館竟是蘇聯指揮中共叛亂的巢穴，遂逮捕了正在這個巢穴裡面開會的39名中共黨員，並根據中華民國政府要逐步在中國境內收回中國主權的決定，根據1919、1920年蘇聯政府為欺騙曾公開發表的「放棄一切與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和「放棄沙皇俄國在中國所有特權」的聲明，宣布武力接管中國境內的「中東鐵路管理權」。這自然是一件維護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的大事情。

1929年8月，蘇聯非但不承認自己以前的宣言和聲明，而且宣布與中國斷交，並借此對中華民國發動了大規模的侵略戰爭。曾充當廣州革命政府軍事顧問的加侖將軍，遂率領八萬軍隊迅速地侵佔了我國東北東、西兩邊的重要門戶。蘇聯的海空軍也協同作戰，進犯我國的領海和領空。

於是，早在1928年就命令各國共產黨要保衛蘇聯的史達林，又在1929年9月26日，給中共發來了命令，稱：「誰忠誠地、真正地、堅定地、並且是毫無保留地武裝起來保衛蘇聯，誰才是革命者，才是國際主義者」。史達林這個對中共的命令，至今仍明明白白地收集在中國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史達林全集第十卷裡面。

1929年10月26日，唯恐中共不接受史達林「武裝保衛蘇聯」命令的共產國際，又頻繁地發來電報指示，要求中共堅決執行「武裝保衛蘇聯」的策略，並且明確指出：「武裝

保衛蘇聯就是要在全國發動武裝暴動」。

1929年11月，當時的中共最高負責人李立三即在中共江蘇省「二大」上宣布：「中央提出的『武裝保衛蘇聯』，即將是全國的武裝暴動。」

1929年12月8日，中共中央發表了第六十號通告，他的標題就是「執行武裝保衛蘇聯的實際策略就是全國的武裝暴動」。這就是李立三所謂極左路線和盲動主義的由來。然而，中共黨史專家卻對此明白說道：「共產國際命令中共發動武裝暴動的一系列指示，就是要適應蘇聯對中國中東路戰爭的需要」。請參見中國大陸出版的《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以及《王明傳》這兩本書。

中共立即接受、決策並在全國範圍內執行了「武裝保衛蘇聯」的方針。1929年的那一場遍及南中國城鄉的武裝暴動，就因此而爆發，並由此而構成了一連串武裝叛國的罪行。

1930年1月，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馬基亞爾，終於高興地在莫斯科《真理報》發表了「無產階級在遠東的勝利」這篇文章，宣稱：「把中東路衝突的順利解決看成是結尾，看成是終場，那將是極大的錯誤。這一衝突不是戲的結尾，而是一場戲的序幕」。蘇俄的得意之心和狼子野心實在是溢於言表。

確實，這不是一幕戲的終場，而是他的序幕。因為，中共另一場更大的、並且同樣是在「武裝保衛蘇聯」方針下所實行的武裝叛亂，終於隨著「九一八」一聲槍響，而再一次

爆發在國難當頭的中國大地之上。

1931年9月20日，即「九一八」事變後兩天，共產國際立即在莫斯科召開了第十一次全委會會議，通過了「關於當前中國共產黨的緊急任務案」。這個「緊急任務案」，就是為免除日本法西斯化德國法西斯對蘇聯的東西兩邊威脅，甚至是「夾擊」，要在國難當頭的中國，命令中共從此高喊「抗日」的口號，繼續執行「武裝保衛蘇聯」的方針，立即發動全國城鄉的武裝暴動，包括發動工人罷工和學生示威遊行。當晚，中共中央在接到共產國際的電報指示之後，就立即通過了「關於執行共產國際緊急任務案的緊急任務案」，並宣稱：「九一八」之後，中國政治形勢中心的中心，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決死鬥爭。」並宣稱，要利用「九一八」事件，「迅速奪取一省、數省勝利和實行武裝暴動的總計畫」。顯然，這時的中共，還沒有真正領會蘇聯為自保而要中共在中國大鬧抗日的「底牌」，或許這張底牌，在第三共產國際那裡，似乎還不夠清晰，因為史達林還沒有將他心裡的話真正講出來。

1931年11月7日，即蘇俄的國慶日，中共終於在蘇俄和共產國際的旨意之下，在中國江西瑞金篡立了認俄為祖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他的中央政府秘書長鄧小平不僅在宣言中繼續提出了「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而且進一步要求發動全國暴動和擴大中共的「蘇維埃共和國」，甚至為了分裂和瓦解中華民國，而公然在他的所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

法》第十四條裡，號召中國境內的各少數民族都起來實行民族自決並成立自己的獨立國家。正處在國難當頭的中華民國，不僅遭遇了由蘇俄和中共又一次發動起來的大規模武裝叛亂，而且又一次遭遇了國家分裂的痛苦，直至造成「兩個中國」的出現。這，即使是在軍閥混戰割據的年頭，都是從來沒有出現過的國家分裂現象。因為，即便是旨在復辟混亂的大小軍閥們，都從來沒有任何人要在一個外國的指使下，公然地反對祖國，肆意地分裂祖國，特別是製造「兩個中國」。中共實在是製造「國家分裂」的始作俑者。

然而，在史達林的眼裡，這幕戲終於唱到了他們所需要的「高潮」。1931年11月9日，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米夫立即在莫斯科《真理報》發表文章，不勝欣喜地說：「中國正在召開蘇維埃代表大會，他已經顯示了一個革命的中國的存在。」這個時候的史達林，實在是需要一個真正的「奴才中國」了！

1932年初，當中國人民的「一二八」淞滬抗戰正打得血肉橫飛之時，當全國人民都沉浸在失土受辱的悲痛和抗日救國的豪情之中時，當時的中共領袖王明則在蘇俄和共產國際的授意之下，連續寫了若干篇文章，一再的宣稱：「今天中國面臨的是兩國之爭，即新生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與腐朽的中華民國的鬥爭」，「兩國之爭，決定著中國目前的全部政治生活」，「兩國政權的尖銳對立，是目前中國全部政治生活的核心。」請大家查閱中國大陸出版的《王明傳》一書。

就這樣，一場場更大規模的武裝叛亂，又在中國南方的貧困鄉村被中共發動起來了；一次次以「抗日」為旗號的工人罷工、學生罷課，直至遊行、示威、動亂和暴亂，遂在中共的種種陰謀策劃下，此起彼伏在中國的各個大中城市裡面。國難當頭的中國，再一次遭遇了外患和內憂的可怕煎熬。

我們有許多朋友，都很不明白，中共何以能夠在北伐成功、中華民國已經初步獲得統一的歷史條件下，發動武裝叛亂和叛國，甚至能夠篡立一個「認宗蘇聯的國中之國」，之所以如此，就是因為他利用了三個機會，一個就是 1929 年至 1930 年的新、舊軍閥叛亂，毛澤東所謂「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這篇文章便參透了他的玄機。一個就是中東路戰爭和史達林交給中共「武裝保衛蘇聯」的命令。再就是「九一八」事變的爆發。由此可見，正是外患內憂，才為中共的武裝造反帶來了天賜良機。自 1931 年「九一八」事變到 1934 年 10 月 21 日中共中央紅軍逃出江西瑞金，直至 1936 年 12 月西安事變發生，其間整整五年，日後曾一再吹噓自己領導了抗日的中共，何曾派過一兵一卒赴東北抗日，何曾派過一卒一兵赴上海抗戰，他們的所有作為，竟是不斷利用祖國遭遇侵略的大好時機，在蘇俄的直接命令和指揮下，號召共產革命，發動武裝叛國，製造國家分裂，篡立國中之國，使得原來就陷於災難的祖國，更加地陷入了苦難的深淵。更何況中共的武裝造反，與歷史上所有的武裝造反所絕然不同的是，他是在一個外國的直接命令和指揮下，對自己國家的顛

覆和對自己民族的叛賣。

此後，雖然中共的武裝叛亂和叛國，在國民革命軍的迭次圍剿下，基本失敗，但是，他卻在另一個歷史機遇之下，死灰復燃。而這個機會，不僅是由日本全面侵華戰爭所造成，而且，他的先機，更是為中共策劃的「西安事變」所製造，從而促使了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的提前爆發。而中共卻迎來了藉口抗日以圖存和擴張的最好歷史機遇。

十、中共對外高喊抗日，對內決策「日蔣火拚」

我在前面已經說過，自 1937 年至 1949 年，便是中國共產革命的第二大階段。這個階段的前期是 1937 至 1945，即所謂抗戰階段。後期是自 1945 至 1949，是中共發動內戰以奪取大陸政權的階段。

今天，我在講中共的這個階段之前，想先引用一段歌謠，來作為我這段講演的開篇。這段歌謠就是：

高喊抗日，卻不抗戰；
只有敵後，沒有前方。
遊而不擊，保存實力；
專打友軍，一心擴張。
抗日統戰，欺騙良善；
再次挖心，分裂友黨。
長期埋伏，等待時機；

隱蔽精幹，尋機策反。
整風內鬥，消除異己；
大種鴉片，準備內戰。
賣國通敵，不擇手段；
日寇投降，大打出山。

這是如今流傳在中國大陸民間的一首「歌頌中共抗日」的歌謠，自然是大陸民間對當年那一場關係到我們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日戰爭進行沉痛反思的一個結果。現在，我要講的，就是自稱曾領導全國人民取得了抗日戰爭偉大勝利的中國共產黨，究竟是怎樣領導和進行抗日的。

大家都知道，在中共於1949年以後編寫的歷史教科書裡，從來就說「國民黨不抗戰」，而抗戰則是「由共產黨領導八路軍、新四軍打的」。在中共自編自唱的歌曲裡，也都大言不慚地寫著「他（共產黨）領導了抗戰八年多」這樣的歌詞，並且強迫人民個個都要唱。直到80年代中後期，人民的歷史反思已經開始，甚至已經迅速地揭穿了中共抗日的謊言時，中共才迫於人民的覺醒，更為了實行對臺灣的新一輪統戰需要，開始羞羞答答地承認「抗戰是共產黨和國民黨共同領導打的」。因為，抗戰還是不抗戰，實在是牽涉到了「愛國還是賣國」這樣一個大是非，因而也就牽涉到了一個政權的「歷史合法性」問題。但是，正是在這樣一個嚴峻的大是大非問題上，大陸廣大民間的抗日戰爭史研究學者們，才鏗而不捨

地、並且是層層深入地堅持著歷史的反思，探索著抗戰的真相。而這個真相，就是「中共對外高喊抗日，對內決策日蔣火拚」，公開打著抗日的旗號，圖存擴張，準備內戰，直至不擇手段。

第一，中共假抗戰、真擴張的第一個大手段，就是「對外高喊抗日，對內決策日蔣火拚」。眾所周知的是，中共於1937年2月，就已經向國民政府提出了四項保證：一是承認三民主義為今日中國所必需；二是取消推翻國民黨政權、沒收地主土地和赤化政策；三是取消蘇維埃政府，實現全國政權的統一；四是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接受最高統帥部的指揮。1937年「七七」蘆溝橋事變爆發後一個星期，中共就在延安發表了「國共合作共同抗日宣言」，同時重申對國民政府的「四項保證」，高喊「擁護蔣介石委員長抗戰到底」，保證「最高軍事當局指揮到那裡，我們就打到那裡」。

然而，不過半個月後，中共中央就對內發出了「關於對南方游擊區的秘密指示」。這個指示，35條，三千餘字，居然無一條要他的軍隊抗日，居然無一言要他的軍隊服從國民政府的指揮抗日。通篇都是如何利用抗戰的形勢，借抗日之名，以恢復中共的地下組織，以建立中共的地上組織，以擴張中共在社會各個階層的勢力。並指示，如果中共的軍隊遭遇到小股的敵偽軍隊，並且日軍一定要打他們時，他們也只能因不得不打而打一下，主要是打偽軍，而且打了就跑。事後卻要大張旗鼓地宣傳我軍的抗日，批判其他軍隊的不抗日。

這個由毛澤東手寫的秘密指示，至今仍收在《毛澤東選集》的第三卷裡，可謂罪證昭彰。

一個月後，當日軍已經進攻山西，山西軍民的抗戰已經打得極其悲壯之時，毛澤東一再地不准八路軍上前線的手段，已經玩不下去了。於是，1937年8月20日到25日，中共召開了洛川會議。這個會議，對外發表了「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將中共決心抗日的大話講得無比堅決。但是，在這個會議上，由於毛澤東警告中共及其軍隊「不要充當抗日的英雄」，說「日本的飛機大炮要比蔣介石對我們的傷害大得多」；由於當時的總書記張聞天要求中共全黨全軍學習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曾被列寧使用過的「使自己國家失敗的策略」；所以，中共遂在這個會議上，不僅決策了「日蔣火拚」的抗戰總策略，以使日蔣兩敗俱傷，以便於中共日後奪取政權；而且決策了「到敵人後方去」的抗日總方針，以在敵後廣闊的土地上，在日寇占領不到的國土上，以抗日的名義招兵買馬，建立的，卻是中共的「革命」根據地，從而使原有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抗日的名號之下，獲得了「隱性」的存在。有一位留學生朋友就曾經問過我：「中共抗日的前線在哪裡？」還說：「兩軍對壘，總有個前線吧？」這個問題問得好，因為他把中共「沒有抗日前線」的事實給揭穿了。眾所周知的是，中共所謂的抗日軍政大學的校歌，就是「到敵人後方去」。因為毛澤東交給他們的「中心任務」，就是「到敵人後方去搶地盤，搞擴張，鬧革命和篡立分裂政權」，

而不是抗日。此其一。

其二，中共假抗日、真擴張的第二大手段，就是由毛澤東為中共決策了「八路軍的中心工作，不是上前線抗日，而是做群眾工作」。所以，洛川會議後，毛澤東就將八路軍的三大主力，分別派到了敵後；洛川會議後僅 20 餘天，毛澤東就能一天五次發電報給林彪等人，不准他們參加平型關戰鬥。所以，林彪才在國民黨軍隊已經基本殲滅了日寇阪垣師團的二萬軍隊之後，懷著「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心態，偷襲了一支日軍的供給部隊，於是，平型關戰鬥便在中共教科書上，變成是中共八路軍打的了。所以，當彭德懷懷著一個軍人起碼的榮譽心，在 1939 年下半年，屢屢派出小股部隊，扒鐵路、炸碉堡、甚至襲擊小股日偽軍時，毛澤東對外雖然大肆宣傳彭大將軍打了一個了不得的「百團大戰」，對內則不僅指責彭德懷暴露了中共軍隊已有的實力，而且，幾十年後，彭德懷終於在文革中被毛澤東整斃，他的一條致命的罪行，就是他沒有服從黨中央和毛主席「不許他抗日」的命令。

這就是迄今為止，中共所大吹特吹的兩場「抗日大戰」，請問在座的留學生朋友們，在八年抗戰中，你們還知道中共打了什麼樣的大戰呢？如果有，我想，早就全世界人人皆知了。中共的抗日電影「平原游擊隊」裡面，就有一句臺詞，叫做「鬼子來掃蕩了，八路軍進山了」。因為，為了保存實力，八路軍是不會留在山外打鬼子的。大家都知道，中共有所謂搶奪蘆定橋的十八勇士，但是請問這十八勇士的大部分倖存

者，在抗戰時期對日寇「勇敢」過沒有？又搶奪過日寇的幾座橋樑？中共在所謂的解放戰爭中，有著名的英雄董存瑞；在所謂的抗美援朝期間，有著名的英雄黃繼光和邱少雲；但是中共為什麼在八年抗戰期間，竟然拿不出一個英雄來呢？甚至連一個英雄也沒有製造出來呢？難道只有一個電影上的「小兵張嘎」嗎？難道只有電影上那五個在與小股日寇的遭遇戰中，不得不跳崖的「狼崖山五壯士」嗎？中共在抗戰前受俄命進行武裝叛亂的時候，有那麼多大大小小的名將，請問他們又有誰曾像那兩百位國民黨的將軍那樣，壯烈地戰死在抗日的疆場上呢？在中國大陸，如今已經被發掘出來的史料，已經一再地證明，劉志丹「東征搶糧」死於背後一槍，關向應病死在延安醫院，新四軍將領高敬亭堅決要求抗日而被中共自己槍斃，而被中共吹成「戰死抗日疆場」的彭雪楓，則是於 1944 年春天在河南「打頑」，就是打國民黨的抗日部隊，於「勝利結束清掃戰場」時，被一顆流彈打死的，應該是「死得活該」！八路軍副總參謀長左權，據中共說是遭遇日機轟炸重傷不治而死在醫院——然而，他卻並不是在與敵寇的鏖戰中壯烈犧牲，而是因為他被打成了「託派」，在黨內「生不如死」而「英勇求死」，而且，直到 1982 年，才在他的遺孀一再請求下，中共才給他平反，摘掉了本來當年的「欲加之罪」。如果左權當真是在一場對日軍的戰鬥之「壯烈犧牲」，是那就不知道中共曾發動過一場怎樣偉大的抗日大戰役了。因為，如果連八路軍的副總參謀長都戰死在抗日前線，這場戰役之大，自然不難想

像，更不難想像中共要將他吹到什麼地步，拍出多少部巨片來進行宣傳了。在今日的中國大陸，凡是拍的抗日大戰，都是國民黨打的，有的拍好了，還不給放映。凡是拍的大規模內戰，主角就一定是共產黨。有權、有錢、有的是御用文藝家的中共，為何在漫漫 50 餘年間，就拍不出一部八路軍、新四軍大戰日寇的史詩巨片來呢？怎麼永遠只能拍出些「地道戰」、「地雷戰」、「小兵張嘎」和「平原游擊隊」這樣一些可笑的「抗日巨片」呢？因為，說到底，不抗戰的共產黨，是不可能編造出真正的和偉大的抗日史詩來的。

第二，中共「假抗日、真擴張」的第二個手段，就是利用國難為他們所創造的條件，由毛澤東在發動共產革命的旗號下，製造了一整套「不抗日、卻要發動農民造反奪取政權的革命論理」。堅持不抗日，因而就沒有抗日前線可上。而那個從來就沒有上過抗日前線的毛澤東，卻在他延安的窯洞裡，根據史達林於 1926 年就給予中共的指示——「中國革命的性質，就是農民戰爭。中國共產黨成功的大小，就是要看他能夠掌握多少農民的武裝力量」，製造了一整套農民造反、農民革命和農民戰爭的理論，從而為中共制定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就是農民革命，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戰爭就是農民戰爭」這樣一個基本原則。顯而易見的是，這個基本原則，是毛澤東用來「革命」的，而不是用來「抗日」的。這就為他將馬克思奪權造反的「普遍真理」與中國共產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找到了一條可行的，並且是「乘國難之

機以造反奪權的道路」。要知道，這個理論，可是毛澤東在中國人民長期浴血抗戰的歲月裡面研究成功的。此其一。

其二，毛澤東不僅在抗戰中創造性地總結了農民造反的理論，而且在抗戰中理論聯繫實際地製造了一整套農民戰爭的理論。具體地說，就是「打內戰需要用運動仗，打外仗卻只能打游擊戰」的理論。毛澤東在他的著作中，就不止一次地對他的黨人和軍隊說：「過去，我們在革命戰爭中打的就是運動戰，因為那是革命的需要」；「將來，我們打蔣介石，也要用運動仗，因為只有運動仗才是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但是，在今天的抗日戰爭中，我們不能打運動戰，只能打游擊戰。雖然，這是一種退步。」毛澤東一語道破了他的心機。這個心機就是「決定戰爭勝負的運動仗只能在打內戰的時候才能用」。然而，即便是打游擊戰，毛澤東也只准許他的軍隊「游而不擊」，或「游而擊友」。大家不妨讀一讀毛澤東「抗日戰爭的策略問題」這篇「光輝著作」，在這篇文章裡面，毛澤東實在已經把「雖打游擊戰而不打日本」的策略，和游擊戰對於中共「為準備內戰養兵、練兵、直至奪取政權的十八條好處」，論說得淋漓盡致。

其三，在抗戰期間，毛澤東不僅制定了一整套農民革命和農民戰爭的理論，以為將來打天下作好了理論準備，而且為了「賊喊捉賊」，還製造了一整套所謂「打頑」的革命理論。這個理論，就是將連毛澤東也承認的，正在堅持領導著抗日的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打成了國民黨頑固派，並且策劃了一

整套如何打頑固派的辦法，以便一邊襲擊抗日軍隊，一邊搶奪和擴張地盤，一邊還要堵住別人揭發他們假抗戰的嘴巴——因為「只要你揭露我們不抗戰，你就是打擊進步力量」，就是在「掀起反共高潮」。大家都知道「皖南事變」，但是，大家可留心過，在《毛選》裡面，有一篇著名的指示信，正是在這封發給中共東南局的指示信裡面，毛澤東居然直接了當地教唆新四軍「應該如何同最高統帥部對著幹」，應該如何打擊正在抗戰的「國民黨頑固派」。不瞭解這一點，就不可能瞭解皖南事變的政治背景和歷史真相，也就不可能瞭解新四軍在抗戰期間所犯下的種種罪行，以及這些罪行的真正來由。60年代末，我的一些中學同窗被毛澤東下放到安徽涇縣茂林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當地的農民就曾神秘地告訴他們說：「皖南事變，哪是國民黨打的共產黨，是共產黨把國民黨打火了，國民黨才揍他的。」兩年前，我在某地參加一個學術研討會，會中有兩位被迫流放到了海外的原中共高官，他們都是新四軍出身，便在一起大談新四軍在抗戰期間「七戰七捷」的光榮歷史，可是當我忍不住問他們：「新四軍七戰七捷究竟打的是誰？」時，他們立刻都不吭聲了。因為，新四軍的「七戰七捷」，打的都是國民黨的抗日軍隊，而且是血戰臺兒莊的主力部隊——「國民革命軍韓德勤部」。由中共御用文人炮製的「東進序曲」這齣話劇，就是中共對自己「專打友軍不打日寇」的充分自我揭露。

中國人民抗戰期間，正是因為毛澤東為中共制定了一整

套不抗日、假抗日、真擴張的賣國路線，毛澤東的中共，才有可能將原來「顯性」的中共「蘇維埃共和國」，暗渡陳倉地變成了「隱性」的中共「蘇維埃共和國」，即中共的敵後根據地。不僅繼續地在製造著兩個中國，而且在敵後建立了越來越大的分裂政權。等到中華民國偉大的衛國戰爭終於贏得了最後的勝利時，中國已經不再是一國，而是「兩國」了。難怪「皖南事變」之後，著名的民辦報紙《大公報》曾感慨地說道：「八路軍新四軍成為華北、華中兩支獨立的軍隊，配著他們的邊區政府、抗幣、共產黨旗、國際歌……成為一個獨立的體系。若干友邦人士從重慶飛向延安，乃有一個中國還是兩個中國之感」。而史達林在抗戰之前交給中共的，「號召工農運動，發動武裝暴動和建立俄式蘇維埃政權」的三大歷史任務，中共竟然在中國人民的艱苦抗戰歲月裡，幾乎將他完成了。

第三，中共用以「假抗日、真擴張」的第三個手段，就是大喊「持久戰」，堅持「持久戰」。毛澤東還專門寫了一篇名為《論持久戰》的光輝著作。這在中國大陸不僅人人皆知，而且中共還把中國人民之所以能夠贏得抗戰勝利的所有歷史功績，都歸功於毛澤東的這篇「偉大著作」了。但是，毛澤東的「持久戰」是什麼時候出籠的？毛澤東的「持久戰」的要害，究竟是要抗日，還是要在中國人民的艱苦抗戰歲月裡準備內戰？毛澤東和他的中共在中國人民長達八年的持久抗日戰爭中，究竟又是怎樣地堅持了他們的「持久戰」的？

其一，毛澤東的「持久戰」出籠時，已經是1938年5月。其時，這個非但由蔣介石早在1932年就已經提出，1935年就已經開始部署，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就已經由中華民國最高國防會議決策和實行的「持久戰」大戰略，早已破滅了日本「三月亡華」的狂夢，而且，彼時，除中共以外的中國所有抗日軍隊，已經在幾十場空前的搏鬥中，就要將驕悍的日本軍隊拖死在中國遼闊的國土上了。毛澤東此時此刻提出的「持久戰」，即便是他真的要「持久抗戰」，那也只能是「後話」。

其二，毛澤東「持久戰」的要害卻不是要持久地打日本，而是要「持久地假抗戰、持久的真擴張和持久地鬧革命」，以「準備內戰」。誠如毛澤東自己在他的「光輝著作」中所說的那樣，還有就是像中共黨史學家們所一語道破的那樣，毛式的「持久戰」，就是要在「一場民族戰爭的條件下，號召人民起來革命以奪取政權的最好道路」。這才是毛澤東「持久戰」「不打自招」的要害和真諦。正因為如此，他才不是中國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持久戰，而是毛澤東和他的中共利用國難準備造反奪權的持久戰。為此，當時尚有良知的中共領袖王明、博古等人，就拒絕在武漢的中共報紙《新華日報》上刊載這篇文章，理由就是他們認為毛澤東要「消極抗戰，積極奪權」，雖然他們更是在遵循史達林要他們「武裝抗日以保衛蘇聯」的指示，他們才會這樣做。

其三，毛澤東和他的中共又是怎樣地堅持了這個具有中

共特色的「持久戰」的呢？

一是堅持整風內鬥。1939 年以後，因中共已經自稱在敵後擁有 50 萬大軍，而這些大軍都已經絕對聽從毛澤東的命令，非但遊而不擊，而且為擴充和搶奪地盤，專打正在抗日的友軍。所以，毛澤東終於有本錢來進行黨內整風了。這個整風，整整持續了四年半的時間。在這一場對內整風整人的「持久戰」當中，毛澤東終於將反對他消極抗戰、並積極準備內戰的王明派人馬置於死地了；以毛澤東為首的農村小知識份子出身的中共領袖集團，亦終於控制了整個中國共產黨。在這一場整風整人的「持久戰」中，毛澤東和中共更是將既允許他們在國統區辦報、辦刊、宣傳共產主義，又允許他們在國統區大搞「地下」埋伏和大搞「地上」統戰的國民黨，當成了「第五縱隊」，也就是「死敵」，而將許多以為中共抗戰而投奔中共的優秀青年，屈打成招為國民黨特務，甚至連十幾歲的小孩子也不放過。一時間，竟將整個延安和其他中共的根據地，變成了人間地獄。大陸作家貝聿先生，許多大陸民間學者，包括那些曾經歷了延安整風、而今已經覺醒的中共老幹部，都已經在他們的反思著作中，將那一場可怕的「內鬥、內訌」，進行了觸目驚心的記述。在整風中被打倒的中共領袖王明，在他後來所寫的《中共五十年》這本書裡面，更是將延安整風說成了後來中共發動文革的序幕。然而，問題還不在延安整風的時間漫長，不在又有多少中共黨人和無辜民眾遭遇了殺身之禍和蒙冤受屈，真正的問題是

在於，為什麼毛澤東和中共，竟然能夠在全中國人民浴血抗戰的八年中，拿出整整四年半的時間來大搞內鬥內訌？這只能進一步證明，中共的「持久戰」與中國人民的長期抗戰沒有任何關係，證明中共根本就沒有堅持過對日持久抗戰。並且，如果我們再來假設一下，倘若彼時的國民黨也在重慶和大後方，與共產黨一樣地大搞了長達四年半清除共產黨和大肆製造冤假錯案的大整風，那麼，中國的抗戰還能繼續下去嗎？中國人民的抗戰還能有勝利的那一天嗎？要知道，共產黨安插在重慶、大後方、甚至是國軍中的形形色色特工，特別是包括那些文化特務，該有多少？

二是堅持大種鴉片。在中國大陸，有一首歌曲，唱的是「花籃裡花兒香」。他曲調優美，富有民歌風采，歌唱的又是中共八路軍在陝北進行大生產的「革命浪漫」故事，又由一位女歌唱家把他唱得動人心魄。所以，他就成了中共用來進行「革命傳統教育」的拿手戲，弄得大陸人人會唱。但是，處於反思中的大陸人民，卻萬萬沒有想到，從那花籃裡面飄出來的香味竟然是鴉片的香味。原來，中共八路軍的大生產不是種的糧食，不是種的棉花，而是種的鴉片。而這個被毛澤東稱為「革命的鴉片」，中共中央政治局不僅專門設立了他的生產委員會，由中共領袖任弼時擔任主任，而且這些革命的鴉片還要被賣到「國統區」，和日本人販賣的鴉片一起去毒害我們的同胞。並且，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鄧發的話來說，就是「過去，我們一大車一大車的糧食拉出去，換

回來的只有一小袋錢。現在，我們把一小袋一小袋的鴉片運到國統區，換回來的，竟是一大袋一大袋的光洋。我們用這些錢來買槍買炮買子彈，揍國民黨！」鄧發的這些話，是當著毛澤東的面，對第三國際代表、莫斯科塔斯社駐延安記者富拉基米洛夫說的，然後，便被記錄在富拉基米洛夫所寫的《延安日記》之中。這本書的中譯本曾於 80 年代初被內部出版，但是，由於他揭露了中共在抗戰中不抗日的種種事實，實在是太讓要搞「改革開放」的鄧小平丟臉，所以，中共又把他給禁了。朋友們，這就是毛澤東發動大生產以長期生產革命鴉片的故事，這個故事，應能將中共在抗戰中不擇手段地準備內戰的形象，記述得夠生動、夠真切的了。

三是「通敵賣國」。由於中國人民真正的持久戰，是一場極其漫長和艱苦的戰爭；還由於毛澤東在這場漫長的國難之中，只圖擴張，絕不抗日，而蔣介石和國民黨又要堅持抗戰到底，絕不妥協；加上抗戰爆發之時，毛澤東的中共就已經決策了要使「日蔣火拚」的抗日方針，甚至要和日寇談判，並與汪偽勾結，以討論如何夾擊抗日的國民黨蔣介石。所以，一心只想準備內戰、奪權打天下的毛澤東，才會在中國人民極其艱難的抗戰後期，開始積極地與日本侵略軍、甚至與南京汪偽政權聯繫，直至訂立條約，要和日本人一起來「堅決膺懲蔣政權，不達目的絕不甘休」——這句話可是當時日本陸軍省發給他侵華軍隊的命令。所以，80 年代初，當江蘇省新華出版社出版的《南京日誌》這一本書，突然揭露了新四

軍與日本侵華總司令部暗中聯繫，秘密談判，甚至互有約定，一致對付正在抗戰的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時候；當處在反思中的大陸歷史學界，又在反思中發現中共竟與汪精衛漢奸政府締約，以共同對付國民黨和蔣介石時；當共產國際駐延安代表富拉基米洛夫，又在他《延安日記》這本書裡面，徹底地揭露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澤東本人，是如何派新四軍具體擔負與日寇、汪偽的聯繫的時候；立刻引起了國內史學界的大嘩。至此，人們才知道，著名的共產黨人潘漢年和楊帆，這兩位在解放後被毛澤東以「莫須有」的罪名逮捕下獄的中共大幹部，原來就是那兩個在日本侵華軍總司令部和汪偽政權那裡極有地位的中共特派員，也是真正的漢奸。至於他們坐中共之獄數十年，不過是毛澤東要「關人封口」罷了。近年來，關於中共在抗戰後期如何通敵賣國的事實，已經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國內的歷史反思著述之中，雖然，這些著述一旦被發現，就會遭遇被禁的命運。但是，「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人民不僅有知道歷史真相的權力，而且誠如一位大陸作家所言，人民更有糾正虛假歷史的權力。

朋友們，除掉我們剛才所列舉的事實，已經足以證明中共假抗日和不抗日以外，另外，只要我們願意再一次「學習」一下毛澤東的「光輝著作」，我們就會很容易地發現，《毛選》第四卷和《毛選》第三卷的巨大差別何在。因為，《毛選》第四卷證明了一個事實，那就是在嗣後的國共內戰中，幾乎沒有一場大、中型戰役不是毛親自指揮打的，或者是毛參與

指揮打的，那裡面，一篇篇的作戰指示和作戰命令，實在是浸透了毛澤東打內戰的狠勁——所謂「必須要以三倍、四倍、五倍甚至是六倍的兵力，以全部、徹底、乾淨地消滅國民黨軍隊」的話，可以說是隨處可見。但是，在《毛選》第三卷裡，也就是所謂「抗日」卷裡面，洋洋 30 萬言，居然沒有一個命令，沒有一條指示，是要他的黨人和軍隊打日本的；有的只是不准打日本，或者乾脆是如何「打頑」，就是打正在抗戰的國民黨軍隊的命令；就更沒有說過：「要以三倍、四倍、五倍甚至六倍的兵力來全部、乾淨、徹底地消滅日寇」了。毛澤東和中共的愛與憎該是多麼的鮮明。

中共黨史學家們曾對中共在抗日時期的表現，作過這樣一個十分科學的總結。他們說，中共正是在八年抗戰中，「才為解放戰爭的勝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也就是說，正是八年抗戰，才為毛澤東發動內戰奪權打天下贏得了充分準備的時間，積蓄了足夠打內戰的力量。這才是中共抗日的真相，也才是中共不抗日的本相所在。難怪處於歷史反思中的中國大陸民間，終於不無悲憤地傳開了那一首「歌頌中共抗日」的歌謠了。我現在就把這首歌謠再背誦一遍：

高喊抗日，卻不抗戰；
只有敵後，沒有前方。
遊而不擊，保存實力；
專打友軍，一心擴張。

抗日統戰，欺騙良善；
再次挖心，分裂友黨。
長期埋伏，等待時機；
隱蔽精幹，尋機策反。
整風內鬥，消除異己；
大種鴉片，準備內戰。
賣國通敵，不擇手段；
日寇投降，大打出山。

我想說明的是，在這首歌謠中：「長期埋伏，等待時機；隱蔽精幹，尋機策反」這些歌詞，實際上都是毛澤東在中國人民抗戰時期對中共重慶地下工作指示中的原話，至今都在《毛選》第三卷裡面明明白白地紀錄著。

留學生朋友們，人民難道真的會被永遠地欺騙下去嗎？

十一、中共是怎樣發動內戰、打敗國民黨的？

中共革命第二大階段的後期，就是眾所周知的國共內戰。在中國大陸所有的現代史教科書裡面，都明明白白白地寫著，是蔣介石和「國民黨反動派」發動了內戰，是中共「要和平、反內戰」，是中共為了解放全中國人民才「被迫」打的內戰，又因為中共們是要「解放全人類」的，所以他又將這一場內戰稱之為「人民解放戰爭」。由於這一連串自相矛盾的的彌天大謊，是中共用建國初期的大規模屠殺，其後不曾間斷的

殘酷政治鎮壓，和他在新聞、出版、輿論乃至思想上的「鐵血專制」，強行「澆鑄」出來的；再加上毛澤東和中共在絕不准許任何人講真話的前提之下，只允許他們自己「年年講、月月講和天天講」；因而這個彌天大謊也就由於「戈培爾效應」，而變成了史實，更變成「真理」了。

然而，這卻是對歷史的一個徹頭徹尾的「栽贓」。

那麼，歷史的事實是什麼呢？歷史的事實就是，一個在本國人民長達 14 年的艱苦抗戰之中，非但不抗戰，還要用盡心思「發展」他那個無所不為的黨及其軍隊，其根本的目的，就是要在外戰結束之後，用他在利用長期民族戰爭中所積累下來的「本錢」，打江山和搶天下。否則，他便失去了「寧做民族罪人」而「擁軍不打日寇」的理由；否則，中共的史學家們也就不會說，正是八年抗戰，實際是「八年不抗戰」，才為中共「解放戰爭的勝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否則，也就不會出現，戰後不論「國民黨反動派」如何期求在戰爭的廢墟上恢復和重建家國，特別是如何期求並推行民主憲政的建設，中共都要全心全意地將他們毀滅在內戰的戰火之中——這樣一個「歷史的真實」了。

雖然中共奪權成功，國民黨在內戰中遭遇慘敗，雙方都有著數不盡的原因和條件；雖然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在內戰中失敗的原因，反過來也就是共產黨打敗他們的原因（請參見講演錄上篇）；但是，共產黨之所以能夠打贏內戰、打敗國民黨，確實還存在著如下幾個極為重要的具體因素：

第一、「八年不抗戰」為中共撈足了打內戰的本錢

歷史的事實是：在軍事上，中共從不足二萬人馬發展成了擁有 120 萬正規軍隊和 200 萬民兵的農民造反力量。這已經是辛亥之後任何一家曾割地為王和持槍反叛的大軍閥，所不能相比的了。

在經濟上，中共既無對國家的責任，又因不打日本而沒有戰爭費用的巨大負擔；既能不斷要求擴編軍隊而獲得國民政府所給予的軍費，又能自己開展「大生產運動」即大種鴉片、大賣鴉片，以買槍、買炮準備內戰；既不需要維持和發展戰時的國家經濟，卻能依靠劫奪地主的土地、財產和強迫農民交物納糧，而獲得相當可觀的收入。這些當然都成了中共打贏內戰的資本。

在政治上，在「蔣管區」有輿論自由，而在「毛管區」卻絕不容許有任何言論自由的前提下，中共不僅騙取了包括美國在內的不明真相者的同情，而且他的在野黨地位，和他有槍、有地盤、有實力、更有「共產主義美好理想」作為欺騙的旗號，又使得許多不明真相者和深懷野心者，與他相互勾連，狼狽為奸，並利用他來要脅政府和反對政府，就是恃共產黨以要脅國民黨。再加上國民黨在明處，共產黨在暗處，所以國民黨有錯，豈但舉國皆知，而且舉國能反；相反，若是共產黨有錯，卻是舉國無知，當然也就不可能反了。蘇聯紅軍在中國東北不知蹂躪了我們多少同胞女子，由於中共不給講，便無人知道，更無人敢反；但是，由中共蓄意製造出

來的，美軍「強暴」中國女學生沈崇案，卻能夠把全國鬧得天翻地覆。在國民黨統治區是基本民主的和開放的，共產黨統治區卻是絕對專制的和完全封閉的這樣兩個極不相同的政治狀況下，中共的輿論欺騙實在是欺騙了成千上萬的中國人民和無數的國際人士，尤其是影響了美國對內戰中中華民國的政策。這就為中共發動內戰打敗國民黨提供了先天的極大優勢。

在統治區域上，1944年，毛澤東就已經在他「為人民服務」這篇文章裡面說道：「今天我們已經領導著九千一百萬人口的根據地了」。相對於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發動前，中共只在陝北領導著不足三縣之地的情形來說，他的「戰爭創強」倒確實是「成果輝煌」。而中共自1937年劫奪和發展起來的「抗日根據地」，撇開他的兩個合法的陝甘寧邊區和晉察冀邊區政府不說，他還在全國「發展」了16個活動基地，其中五個有各級政府，八個設立了行政委員會，三個為軍事區域，其勢力範圍也早已超過了辛亥以後任何一家大軍閥。再說他掛的是「鐮刀斧頭旗」，唱的是「國際歌」，所以，他已經完全是一個「國中之國」。因此，戰後中共不但有條件發動內戰，而且完全有可能打贏內戰。

第二、中共借搶奪受降權立即發動了內戰

首先，毫無疑問的是，唯有中華民國政府才有「對日受降權」和「對日受降的指揮權」。因為：一是中華民國是全

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二是中華民國政府領導並堅持了全中國人民的長期抗戰。三是 1937 年全面抗戰開始後，中共就已經宣布他的政權是中華民國中央政府管轄下的「地方政府」，並為中華民國政府所接受。其軍隊亦為國民革命軍之一部，番號為「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和「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因此，中共只能擁有在中華民國政府及其國家軍事委員會領導與指揮下的對日受降權，卻絕不應該擁有非中華民國政府及其軍事委員會領導和指揮下的對日受降權。就不說中共在八年全面抗戰中堅持「日蔣火拚」的賣國主義路線，堅持假抗戰和真擴張的陰謀策略，早已使他們在道義上和在實際上，喪盡了對日受降的權利。

然而，中共及其「養在深山、長在敵後」的百萬農民造反大軍，卻將「對日受降」看作他們走出深山、開始打江山和奪取政權的「非常歷史機遇」。八年來，他們寧願不抗日、假抗日、陰謀擴張直至陰謀賣國，也就是在等待著這一天的到來。8 月 9 日夜，當延安意外獲悉日本投降和蘇俄對日宣戰的消息後，毛澤東在延安立即向中共軍隊發出了對日本占領軍「實行廣泛進軍」的命令。這個自八年抗戰開始以來，由毛澤東對自己軍隊發出的第一個「抗日」命令，其用心，乃是命令他的軍隊「擴大中共的解放區」。8 月 10 日夜至 8 月 11 日下午的 18 小時內，毛澤東又向他的軍隊連續發出了七道命令，其目的竟是「立即發動 20 萬大軍以奪取中原」。毛澤東甚至一再命令各地中共軍隊，要強行對日受降，強行阻

撓政府軍受降，強行「占據及破壞全國各地交通要道」，強行「收繳日軍武裝」，並「將反抗中共受降的中國人當漢奸處分」，同時以「中國解放區抗日軍總司令」的名義，擅自指定受降地點，命令日軍司令岡村甯次「只能向中共軍隊投降」。

八年來養在深山、長在敵後、養精蓄銳、旨在打內戰奪江山的中共軍隊，就像猛虎出山般地開始了對受降權的瘋狂爭奪。中共終於開始「全面抗日」了，毛澤東也終於下命令要「全面抗戰」了：

8月12日，中共軍隊在華北用「運動仗」包圍了三萬不願意向他們投降的日軍，打了一場從未有過的「抗日大戰」。

9月12日，中共竟用「運動戰」圍殲抗日名將馬占山由綏遠開赴察哈爾受降的「東北挺進軍」三千餘人。

10月17日，中共又開始調動軍隊對歸綏的傅作義部展開包圍，獲得了八年抗戰以來「專打友軍」的又一個輝煌「革命戰果」……內戰已經為中共明目張膽地發動起來了。

8月28日，當毛澤東在蔣介石的三請四邀、特別是在史達林的壓力之下，不得不去重慶和談時，他臨行時給已經搶奪了59個城市及廣大地區的中共軍隊留下的，竟仍然是「今後一時期內仍應繼續攻勢」的大打內戰的命令。

毛澤東在重慶「談判」的40天內，中共軍隊不僅又搶占了300座縣城，而且為破壞政府軍北上受降，還成立了「交通控制隊」。他們切斷鐵路幹線，搶奪交通要道，奪取「府

城縣城小市鎮」。他們剪電線，扒鐵路，中斷平漢、津浦、膠濟鐵路近 20 次。他們還在河南決黃河，在江蘇、山東決運河，在河北決永定河、子牙河，同時破壞工廠和礦山。僅就這些中共的所為而言，1945 至 1949 的中國內戰，究竟是誰發動的，還有必要一辯嗎？

第三、中共在蘇軍的陰謀配合下迅速搶占東北

眾所周知的是，不論是從大清朝亡明的歷史教訓而言，還是就日本侵華的現實教訓而論，白山黑水、沃野千里的東三省，都是侵略者和造反者的必爭之地和必儲之地。1945 年 6 月 10 日，一心要打江山的毛澤東，就曾在中共「七大」上建議將東北籍的同志選入中央委員會，理由就是「從我們黨、從中國革命的最近和將來的前途看，如果我們把現在的一切根據地都丟了，只要我們有了東北，那麼，中國革命就有了鞏固的基礎。」他要打內戰和奪江山的用心昭然若揭。

我們再來看以下的事實：

1945 年 8 月 10 日，在毛澤東以延安總部名義發出第二、三、六號命令時，就已經以「為配合蘇軍進入中國境內作戰和準備接受滿州敵偽軍投降」的名義，命令原東北呂正操部、原東北軍張學詩部、原東北軍萬毅部、駐河北、熱河、遼寧邊境的李運昌部、賀龍所部、聶榮臻所部、現駐華北的朝鮮義勇隊司令武亭所部等，「立即統帥所部隨同八路軍和原東北軍各部向東北進軍」。

1945年8月26日，毛澤東在不得不赴重慶談判前夕，決定立即「派千餘幹部由林楓率領去東北」，並擬定了「幹部先行，軍隊後行，以建立熱河根據地為軍隊大舉進入東北作準備」的策略。隨後，中共中央又命令李運昌部以配合蘇軍作戰為名，相機進入東北，然後命令冀、熱、遼軍區16軍分區司令員曾克林配合蘇軍進攻山海關。更於8月26日命令山東軍區派出一個營的部隊，由呂其恩、鄒大鵬率領乘船從煙臺渡海，以試探武裝搶占東北的可能性。

1945年8月29日中共軍隊呂其恩和鄒大鵬部於遼東半島的莊河上岸，占領莊河縣城，並向大連進發。中共冀東李運昌、曾克林部又在蘇軍默許下，於9月3日乘火車出關東進，於9月4日進入錦州，6日進入瀋陽。蘇軍遠東司令部為正式與中共「通氣」，於9月14日派出烏茲別克上校，並由中共冀、熱、遼軍區第16軍分區司令曾克林陪同飛赴延安。

1945年9月14日晚至15日上午，劉少奇與代表蘇軍元帥馬林若夫斯基的烏茲別克上校會談。烏茲別克上校公然違背美、蘇、中三國的協定，同意將山海關至錦州一線交給中共軍隊。劉少奇為抓住這一「千秋一遇」的歷史機遇，立刻派遣彭真、伍修權等與烏茲別克上校同機飛往東北。

1945年9月19日，中共中央遂將「要以20萬大軍借受降而爭奪中原」的計畫，立刻轉變成為「向北發展和向南防禦以全力搶占東北」的計畫，並決定將長江以南的部隊撤往江北，將江北的部隊撤向山東，將山東、蘇北的部隊主力和

晉、察、冀部隊一部立即派進東北。這才是毛澤東願意在「雙十協定」裡寫上「中共同意撤出南方八個解放區」的「底牌」。中共十幾萬主力部隊與兩萬多幹部，又立即改稱為「東北人民自治軍」，他們扔槍械，穿便衣，走小路，水陸兼途，馬步兼程地開始了強占東北的急行軍。至 1945 年 11 月底，中共軍隊已有 11 萬多人搶進了東北。先後搶進東北的中共中央委員，包括候補委員就有 20 餘人。林彪被任命為東北地區的最高軍事指揮員。

1945 年 10 月上旬，當中華民國政府按照中蘇雙方的協議，決定派出政府官員進駐東北時，10 月 4 日，中共東北當局曾密電中共中央稱，蘇軍向他們表示「已下最後決心，此間家務全部交我」，即把蘇軍在東北繳獲的所有日軍裝備全部交給中共。至 11 月下旬，中共出關軍隊已經從蘇軍占領的原日軍倉庫中，取出了十萬枝槍和三百門大炮。至此，中共終於因蘇聯對中華民國政府的背信棄義，而搶進了東北，並且立即得到了大批的軍火物資。

1946 年 6 月，已經搶進東北的中共軍隊又改名為「東北民主聯軍」，總兵力已達 27 萬多人。他們在蘇聯的支持下，不但接受了大量的現代軍事裝備，而且收編了 30 萬原漢奸軍隊，留下了八千侵華日軍，以補充他們這支旨在中國打天下的隊伍。這對於提高中共農民造反軍隊的現代化水準和現代化作戰能力，均起到了巨大作用。

上述事實確已證明，內戰早已開場，大戰更無可避免。

在對日抗戰中養精蓄銳八年的中共賣國軍隊，終於懷著他們早已鐵定的打天下決心，在蘇俄的陰謀支持下，搶奪了祖國的東北「寶地」。如果開一句歷史的玩笑，就是：一場由史達林改寫的，「由蘇軍引共軍入關」，再「出關」奪取中華民國江山的新編歷史劇，就要在萬里狼煙中上演了。

第四、中共一再破壞中華民國憲政建設， 為打贏內戰廓清道路

大家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對人類的破壞是空前的。雖然我們是一個大國，而未陷入「覆巢之下無完卵」的境地，但是，日本長達十四年的侵略，尤其是八年全面侵華戰爭所帶來的極大破壞，亦同樣使他滿臉是淚，渾身是血，遍體鱗傷。此時此刻，任何一個愛國者，愛民者，或曰任何一個有著起碼的良知者，都不會、也不願意在這一場人類浩劫剛剛結束之時，為了一己的私欲而立即開啟一場內戰，使得正在痛定思痛的人民又陷入痛上加痛的更加悲慘境地。

我在前面已經說過，當政的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本人，由於在抗戰期間就開始了對戰後民主憲政的準備，並公告要在戰後一年召開「制憲國民大會」，因此，如無其他特殊的原因，戰後中華民國的民主憲政建設非但應該能夠順利進行，而且中華民國民主憲政建設的成功，即軍政、訓政的結束，和還政於民的實現，也就完全是可能的。

當然，不可否認的是，由於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

和蔣介石先生本人，對中共持續八年假抗日、真擴張的賣國行徑瞭若指掌，又對中共在日本宣布投降之夜起，就立即發動了內戰的行徑歷歷在目，因此，倘使說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本人竟絲毫沒有一舉解決中共叛逆的願望，非但不符合事實，而且也不盡乎情理。國民黨政府在不得不打的情勢之下，也只好打打談談，甚至在忍無可忍之時，亦想一舉殲滅中共以「絕我民族大患」的事實，恰是這種心態的說明。但是，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本人，基於國家人民最基本的福祉，為了避免內戰和利於戰後恢復，曾對中共一再地作出了讓步。他們主動地和一再地邀請中共和談、協商，主動地和一再地籲請國際社會調停和幫助，甚至數度對中共虛位以待，直至做出種種過份的退讓，無非是希望中共能夠罷兵休戰，以共同參預戰後的中國民主憲政建設。

然而，中華民國政府對中共借爭奪受降權而發動內戰、搶占東北的一再容忍，中華民國政府為邀請和等待中共參與國家憲政建設所做出的種種讓步，非但只能使已經發動了內戰、並已經搶占了東北的中共胃口大開，而且，更為這一夥20餘年來一直夢想要顛覆中華民國的「馬列子孫」，一次又一次地送上了天賜良機，直至造成了戰爭利於他們時，他們就公然撕毀協定，大打出手；戰爭形勢一旦不利於他們時，他們就虛與委蛇，高喊「和談」，以積蓄力量，伺機反撲。從而一再地造成了他們在內戰中的優勢，為他們終於打贏這

場內戰，贏得了時間和機遇。

也許有人會說，中共也曾在抗戰勝利後高喊過「和平民主新階段」的口號；也許還有人會說，中共曾經反對過內戰，要求過和平，甚至於有過要求建立「聯合政府」的願望和設想。或許，這都是「事實」。但是，真正的事實是，他們不過是中共所慣用的「革命的兩手策略」罷了。因為，中共如果是真心要和平、反內戰，是真心要在中國實現民主的話，那他就不會反對和破壞戰後中華民國民主憲政的建設，而且只會積極投身這一建設，更不會將中華民國於戰後所一再推進的憲政建設，當成他們數度發動和擴大內戰的「戰機」。

那麼，中共究竟使用了哪些手段，來破壞戰後中華民國憲政建設的呢？

1、中共破壞雙十會談和雙十協定

首先，雙十會談的起因來自國民政府和蔣介石本人。蔣曾於 1945 年 8 月 14 日一日之內，就連續向毛澤東發出了三次和談的邀請。二是蔣介石因毛澤東「顧慮安全問題」，而親自敦請美國大使赫爾利親赴延安陪同毛澤東同機往返重慶和延安。三是史達林亦因蔣介石的請求，而於 8 月 20 日致電毛澤東，要他赴重慶談判。然而，如我前面所說，毛在臨赴重慶前向其黨人發出的指示，便是「繼續發動攻勢」，毛更在和談結束剛剛回到延安時，又馬上向他的軍隊發出了「立即向蔣管區發動進攻」的命令。毛澤東何有絲毫「談和」的誠意？還是他自己說得好：「這一次我們去得好，擊破了國

民黨說共產黨不要和平、不要團結的謠言。」這才是毛的真心話，因為他要欺騙國人的目的達到了。

2、中共破壞政治協商會議

政治協商會議前後，正值中共搶占東北和必須鞏固東北之時。

1945年12月28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對東北局的指示信。該信指示說：「我黨現時在東北的根本任務，是建立根據地，是在東滿、北滿、西滿建立鞏固的軍事政治的根據地……在1946年內，必須完成初步的可靠的創建工作。否則，我們就有可能站不住腳。」由是可知，彼時彼刻，中共參加政協會議是假，而建立鞏固的東北軍事政治根據地才是真。

所以，政治協商會議尚未結束，中共為了建立和鞏固他的東北軍事根據地，已於1946年1月26日單方面提出了四條要求。其中關鍵的兩條，一是要求政府承認並整編剛剛偽裝搶占東北的十數萬中共軍隊、即改名換姓的「東北民主聯軍」。二是要求政府承認剛剛由他們搶占東北才建立的中共根據地「自治政府」為合法的地方政府，以公然反對和要脅政治協商會議。因要求未能得逞，中共立即大打出手，於3月中旬陷四平、下長春，並奪取了哈爾濱和齊齊哈爾。因此，半個多世紀以來，唯一的一場真正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遂只能以中共在東北所發動的大規模內戰，來作為他痛苦的歸結。

3、中共破壞「制憲國民大會」

雖然中共在雙十會談和政治協商會議之後，均按照他的「既定方針」，照打不誤，但是，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本人還是對中共採取了一條「和平未到最後絕望時期，仍不放棄和平」的「抗日式」決策，所以，按照政協會議的決議，仍然堅持邀請中共參加 1946 年 5 月 5 日召開的「制憲國民代表大會」。但因此時，中共在東北的內戰正打得「順手」，所以，他便要求於國民大會召開前就按照他的意願先改組政府，後召開「國大」，國民政府只好將制憲國民大會延期半年。之後，當蔣介石於 1946 年 8 月 14 日抗戰勝利周年紀念日發表文告，提出六項主張，表示願意先改組政府、再召開國大時，中共又提出必須在 40 名政府委員中，由中共占十席，民盟占四席，然後再將一名無黨無派者的席位撥給中共推薦，以求穩獲三分之一票以奪取否決權，藉以阻礙制憲國民大會的召開。同時，中共還在張家口集結重兵，明確表示對蔣介石所提出的「政治問題採取政治解決辦法」不屑一顧，企圖將東北的內戰烽火燒向華北，以威脅召開在即的制憲國民大會。

由於國民政府沒有接受中共的無理要求，政府軍又在張家口挫敗了中共的軍事攻勢，中共才在戰況不利的情形下，提出了參加制憲國民大會的名單，以行緩兵之計。但是，當政府為召開國民大會而單方面宣布張家口停戰十日，中共於張家口的不利戰況已得以解除時，中共又為奪取否決權而重

提「非在政府委員中占 14 名不可」，並要求政府軍於關內恢復 1 月 14 日（第一次停戰令生效之日）以前的位置，同時要求馬歇爾轉告美國政府，不要支持中華民國政府並從中國撤兵。因為美國調停雖然大大地幫助過中共發動內戰，但此刻已經成為他進一步發動內戰的絆腳石。

最後，當為中共延期半年的制憲國民代表大會已達開會期限，中華民國政府為促使中共四百名代表參加會議，不僅於 11 月 8 日再次頒布全國性的停戰命令，而且再次將會議延後三天，專門以待中共。然而，直至三天後會議已經開幕，中共非但仍然不參加會議，並且於 11 月 11 日以延安總部名義正式發表聲明，要求「立即解散正在召開的制憲國民大會」，甚至宣布要籌開「解放區人民代表大會」。12 月 16 日，中共在南京的發言人已經宣稱：「我軍已於各地先發制人，並準備奮鬥到底！」這與列寧在 1917 年阻撓、破壞和毀滅俄國 2 月民主政府召開「立憲」大會的全部惡劣行徑，完全如出一轍。

我顯然應該補充說明的是，1946 年 11 月在制憲國民大會上三讀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乃是集 34 年（1912 至 1946）的艱難奮鬥才獲得的巨大民主成果，並成為現代中國民主憲政建設的歷史性豐碑。這一部在 50 多年前就已經明確地寫入了「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各黨派平等合法和各級監察、考試委員必須超越黨派」等條文的真正民主憲法，雖然中共曾派人參加修改和制定，但他卻在最後一次與中華

民國政府進行虛假的停戰談判、即中共渡江前的談判時，毛澤東提出的第一個談判條件，就是「必須廢除《中華民國憲法》」。如果套用中共開山人物李大釗的話來說，就是「專制與民主不並存」吧。

第五、中共打贏內戰、打敗國民黨的五個關鍵手段

第一個手段就是「假談真打」和「利用美國又反對美國」

所謂「假談真打」，我就不多說了。而所謂利用美國又反對美國，我想補充的是，由於美國對中共非但不瞭解，甚至曾浪漫地認為，國民黨才是專制的，共產黨才是民主的，所以，在中共已經迫不及待地發動了內戰時，他竟一再地包庇中共，為難中華民國政府。所以，這一時期的中共，是要利用美帝國主義的，並因此而占了不少的便宜。後來，當美國已經明瞭中共才是真打和狠打，甚至要求中共停戰，並要追查中共劫殺軍調小組兩名成員一案時，中共便立即策劃利用所謂民族情緒，不擇手段地發動了一場反美運動。

1946年7月24日，中共第54軍53團曹志福部在河北香河縣安平鎮召開「反美運動大會」，高呼反對與打倒美帝國主義的口號，要求馬歇爾滾回美國去。7月29日，中共曹志福部又襲擊路過安平的美國海軍陸戰隊30餘人，當場打死美軍三人，傷12人。事後共軍再次襲擊塘沽附近美軍軍火庫，美軍死五人，傷16人。這就是中共一手策劃的「安平事件」。

1946年10月24日晚，中共竟派其地下黨員、職業學生

沈崇勾引一美軍士兵於北平跑馬場野合，並由事先埋伏的中共地下人員「當場捉姦」，在全中國製造了一場人盡皆知的「美國士兵強姦中國女學生案」，「激發」了民眾強烈的反美情緒，更為中共發動一場反對美國「支持反動政府打內戰」的反美運動，製造了有利的輿論條件。與此同時，中共卻絕不會為無數遭受了蘇軍姦淫的東北女同胞發起一場「反蘇運動」，因為蘇軍支持並幫助中共打內戰，顛覆中華民國。雖然中共職業學生沈崇在用自己的貞操為中共欺騙天下之後，所得到的獎賞竟然只是中共無情的「遺棄」。今日已經在美國定居的沈崇女士，對自己的年輕時候的「上當受騙」，已然是「痛徹心脾」。因為她在文革開始被紅衛兵揪鬥時，就已經說明了自己是執行黨的任務，並且美軍並沒有強姦她。

第二個手段就是在「毛管區」發動軍民打內戰，卻在蔣管區發動人民和策動學潮「反內戰」，以開闢中共打內戰的「第二條戰線」。請大家看下面的事實：

1945年年底，就在中共需要時間以建立和鞏固他的東北根據地時，中共發動了昆明學生運動，他的口號就是「反內戰與要和平」。而1946年的「一二一」學生反內戰運動，就是這場運動的高潮。用中共黨史專家們的話來說，則是：「一二一運動，就是為開闢這條戰線而吹響的第一聲號角和點燃的第一堆烈火。」

1946年6月23日，當中共在內戰中戰況不利時，中共又策動和組織了上海「各界人民團體」聯合赴南京請願，「要

求和平、反對內戰和要求民主、反對獨裁」。這個運動的總指揮，就是中共上海局的負責人和後來的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張執一。

1946 年底到 1947 年初，中共蓄意策劃沈崇事件就是為了發動一場以「抗議美軍暴行運動」為藉口的「反美運動」。用中共黨史學家們的話來說，這場運動在「性質、規模、影響和作用方面與歷次學生運動相比，不僅有了提高」，而且他的作用，「在反美、反蔣鬥爭中，僅次於人民解放軍」。

1947 年春天，當內戰處於膠著狀態時，中共又一手策劃和領導了名為「紅五月」的學生運動，喊出了「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的口號。用中共黨史學家的話來說，就是：1947 年的「五二零」學生運動，又把「經濟鬥爭、生活鬥爭上升到了政治鬥爭，規模也從小型的分散的鬥爭集中為全國性的反美、反蔣的鬥爭」，從而被中共稱為「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第二條戰線的新起點」。

1947 年 5 月 23 日，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央關於蔣管區的鬥爭方針的指示電」已經指示說：「使一切群眾鬥爭都為著開闢蔣管區的第二戰場，把人民的愛國和平民主運動大大地向前推進。」

1947 年 5 月 30 日，毛澤東更在題為「蔣介石政府已處在全民的包圍中」的文章中稱：「中國境內已有了兩條戰線。蔣介石進犯軍和人民解放軍的戰爭，這是第一條戰線。現在又出現了第二條戰線，這就是偉大的正義的學生運動和蔣介

石反動政府之間的鬥爭……學生運動是整個人民運動的一部分。學生運動的高漲不可避免地促進整個人民運動的高漲。」對此，《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 1120 頁的注釋，則這樣地評述道：「從 1946 年 12 月起，隨著人民解放戰爭的發展，國民黨統治區廣大學生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的民主愛國運動，有了新的高漲，逐步形成為反對蔣介石反動統治的第二條戰線。」

於是，中共黨史專家便對中共發動內戰的「第二條戰線」的作用，興奮地評價說：「一是從政治上打敗了蔣介石。二是從軍事上間接配合了第一條戰線作戰。三是從組織上為革命和建設準備了大批骨幹。四是配合解放軍接管城市、迎了解放。五是直接配合了三大戰役的軍事鬥爭。」

事實證明，由毛澤東和中共編劇導演，和由單純的青年學生們上演的「第二條戰線」，就是這樣地為中共發動內戰和打內戰，打江山和坐江山，立下了如此的汗馬功勞。1989 年當中共用坦克車和機關槍在北京屠城之後，一位北京大學畢業的老教授曾痛苦地對他的後人說：「當年，我們這些北大的學生天天三菜一湯吃得飽飽的，可是吃飽了便跟著地下黨上街去『反饑餓、反內戰和反迫害』，國民黨也不曾開槍打我們。今天想起來，實在是令我無地自容。」

中共打贏內戰、打敗國民黨的**第三個手段**，就是毛澤東使用了絕不用來打日本的「運動仗」，甚至「人海戰術」。

1946 年 7 月 20 日，毛澤東向他的軍隊指示說：「戰勝蔣

介石的方法，一般的是運動戰。」與他在八年抗戰中堅決不准許他的軍隊打運動戰，只許他的軍隊打游擊戰，實際是「遊而不擊」，可謂「大異其趣」。

1946年9月16日，毛澤東又對他的軍隊進一步指示說：「我軍必須集中絕對優勢的兵力，即集中六倍、或五倍、或四倍於敵的兵力，至少也要由三倍於敵的兵力，於適當時機，首先包圍殲滅敵軍的一個旅（或一個團）。」然而，在八年抗戰中，毛澤東從來就沒有命令他的軍隊主動地集中優勢兵力殲滅過日寇的一個排，更不用說是一個團、一個旅。查遍《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就是「抗戰卷」，非但查不到這樣的一句話，而且查不到他任何一個命令八路軍和新四軍打日本的命令。但在《毛選》第四卷，卻幾乎全是命令他的軍隊狠打內戰，和必須全部殲滅國民黨軍隊的命令。

1946年10月1日，毛更進一步地指示說：「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是過去三個月殲敵25個旅所採用的唯一正確的作戰方法。我們集中的兵力，必須六倍、五倍、四倍、至少三倍於敵，方能有效地殲敵。不論在戰略上，戰術上，都是如此。不論是高級指揮員，或中下級指揮員，都須學會此種作戰方法。」然而，在八年抗戰中，毛澤東雖曾親自指示他的軍隊要練習打運動仗，卻絕對不准許他的八路軍和新四軍用運動仗來抗日殺敵。因為，那是專為打國民黨搶天下準備的。

我想說明的是，毛澤東所謂的「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

滅敵人」的運動仗戰略戰術，說穿了便是人海戰術。也就是殘酷的「人肉戰略和人肉戰術」。比如淮海戰役以政府軍死一人、中共軍死五人為中共所贏得的勝利，就是中共「人肉戰略和人肉戰術」的勝利。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內作家所撰寫的《雪白血紅》一書，就是對中共運用這種慘無人道的「人肉戰術」的揭露。中共為了徹底殲滅長春守城敵軍，與為了逼迫敵軍投降而不惜餓死十數萬長春人民，並且連逃出城來的老百姓也要將之堵回去「餓死」的「戰略和戰術」，和中共在內戰期間用槍口逼迫地主、富農及其子女打衝鋒，甚至逼迫地主、富農家的婦女裸體打頭陣的「戰略和戰術」（講演者註：此時近年已被證實。當時的一位國民黨軍官，在大陸將這張照片保存了 60 多年，在臨死前交給了他的兒子，目前已經廣為傳播在網路世界），雖然為他自己的後輩軍人所不齒，但是，中共卻正是依靠這樣的「戰略和戰術」，才打贏了那一場內戰。在中國大陸，隨著歷史反思的日漸深入，不論中共採取怎樣的禁錮，上述驚心動魄的史料都正在利用各種方法和管道重見天日。

然而，中共使用人肉戰略和人肉戰術，則人命何來？我要告訴大家的是：從農村而來。由於中共一手高舉著西方的共產主義思想，一手又採取了「實行分田分地」的欺騙策略，因而才獲得了窮苦農民、特別是農村中流氓無產者的支持。這樣，毛澤東旨在打天下的農民戰爭，便獲得了他所需要的廣大兵源。

1946年5月4日，毛澤東就在他的「五四指示」裡面指示說：「三個月的經驗證明……凡深入和徹底地解決了土地問題的地方，農民即和我黨我軍站在一道反對蔣軍進攻，凡執行得不堅決……，農民即站在觀望地位。各地必須在今後幾個月內，不論戰爭如何忙，都要堅決地領導農民解決土地問題。」

1947年7月20日，毛澤東又明確指示說：「在一切土地問題已經解決的地方，除少數反動分子外，應對整個地主階級取緩和態度。……藉以減少敵對分子。」毛澤東就是這樣地既解決了打內戰的兵源問題，又解決了地主富農對中共發動內戰「必然要進行破壞」的問題。中共意在打江山的這一場現代農民戰爭，也就勝券在握了。然而，參加了和支持了中共發動內戰的中國農民，他們究竟得到了什麼呢？那些因中共要打內戰才「欣遇」過中共「緩和態度」的地主富農們，命運又將如何呢？前者以他們成為共產農奴和被餓死數千萬人命的歷史命運，作了最為痛切的回答；後者則以轉瞬之間便被殺害了二百餘萬的歷史慘劇，為毛澤東和中共在中國大陸全面復辟和建立專制極權統治，而成為最早的一批慘死者和犧牲品。

這就是歷史的慘痛回答。

中共打贏內戰的**第四個手段**就是不惜出賣祖國權益以爭取「俄援」。

我要告訴大家的是，中共打內戰的本錢，一是靠八年不

抗戰所積累，二就是靠出賣祖國的權益向我國的世仇大敵蘇俄所換取。

1947年5月20日，中共代表林彪、高崗、彭真、謝覺哉、李富春和蘇聯代表米高揚、康斯諾夫、高爾金、哈爾更、巴布諾夫曾就軍事援助中共一事，於哈爾濱簽訂了《哈爾濱協定》。

「協定」一是中共承諾蘇聯對我國東北陸路和空中交通享有特殊權益。二是中共應對蘇聯提供有關中華民國政府和美軍在中國行動之情報。三是中共應以東北物產包括棉花、大豆及其他戰略物資，除去本地所需用者外，全部供應蘇聯。中共允諾中國遼寧、安東等省特別規定區域，劃歸北韓軍隊駐紮，並在將來適當時期併入朝鮮。

1948年12月，中共又在莫斯科與蘇聯簽訂了《莫斯科協定》。該「協定」的主要條款，一是蘇聯有優先開採中國境內礦產的權力。二是蘇聯有權在中國東北和新疆駐紮軍隊。三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中國軍隊應依靠蘇聯軍隊作戰。四是蘇聯可將遠東情報局設於中國。五是如果歐洲爆發包括蘇聯在內的戰爭，中共應派遣遠征軍十萬人及勞工二百萬人支援蘇聯參戰。

中共因此而獲得了二次大戰中美國援助蘇聯的、價值34億美元的武器，獲得了飛機、大炮、坦克，裝備了11個現代化的師，訓練了30萬原漢奸軍隊，甚至使得部分蘇聯紅軍成為中共人民解放戰爭的「指揮官」，直至成為中共解放軍的空軍和坦克兵。

所以，中共絕不是以「小米加步槍」便打敗了國民黨，而是以現代化的軍事力量，並在共產主義革命的旗號下和蘇聯的支持下打贏了那一場內戰。

第五個手段，中共靠的是 20 餘年實行「挖心戰術」所獲得的重大成就，才打敗了國民黨。

中共建黨後曾四度打入中國國民黨和中華民國政府。兩度公開兩度隱蔽。第一度是在蘇俄命令和指使下直接加入中國國民黨，公開參加廣州國民政府，竊據了國民黨和廣東革命政府許多高級職位，把持了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大部分各級地方組織。

第二度是在國民黨清黨和蘇俄在中國直接領導的共產革命失敗後，中共曾利用一度打入國民黨所留下的關係和影響，打進甚至掌握了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一些要害部門，尤其是特工部門，不僅為共產黨屢建奇勳，諸如策劃西安事變等等，更為後來深深地埋藏下了一批「有用之才」。

第三度是在抗戰時期，中共重新開始合法地進入各級國民政府和國民黨軍隊，布下了重重關係，用毛澤東對重慶地下工作的指示來說，就是「隱蔽精幹和長期埋伏」。中共本期對國民黨的挖心極為重要，猶如第一期一樣，是在合法的幌子下，更在中共因不抗戰而能夠長期全力以赴的情形下進行的，所以才為後來中共發動內戰和打贏這一場內戰，在國民黨和國民政府中布下了「天羅地網」，暗結了一條「看不見的戰線」。大家都知道，中共有一部電影的名字就叫做「看

不見的戰線」。

第四度是在中共所謂的「解放戰爭」時期。由於中共於前三度已經在敵人內部建立了一條極其深入的「看不見的戰線」，這一條戰線，既能直達蔣介石身邊，如擔任國防部作戰次長、掌握了國民政府調動軍隊大權的中共地下黨劉斐中將。所以，當國軍連自己還不知道要被調動時，延安就已經得到了情報，並據此而擬好了「必勝」的作戰計畫。所以，「解放」後，毛澤東才會表揚劉斐是解放戰爭的真正功臣。又如胡宗南的機要秘書和親信隨從熊向輝，因能將胡宗南大軍決策進攻延安的計畫，準確地通報周恩來和中共中央，所以，胡宗南打進延安時，所得到的才是一座空城。為此，周恩來曾經欣然地說道：「蔣介石的作戰命令還沒有下達到軍長，毛主席就已經看到了」。長期擔任中共中央保密局長的楊尚昆，在1989年9月14日《人民日報》上發表題為「紀念李克農誕生90周年」的文章時，曾坦白地承認：「為配合解放戰爭在全國的順利，我情工人員深入到國民黨的機密決策指揮層內，及時準確地供給了黨中央和軍委及各地區戰略性及動向性的重要軍事情報，為黨中央和毛主席研究戰局，制定解放戰爭的戰略方針提供了重要的依據。使我軍在解放戰爭中對敵人的主要情況瞭若指掌，始終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

這一條「看不見的戰線」，如我剛才所說，因他早在抗戰時期，甚至更早，就已經被不抗戰而有充分時間從事「挖心」的中共將他布置妥貼，所以，當中華民國政府在內戰中

一旦陷於窘境時，國民革命軍中形形色色的原地方軍事勢力，也就是哪些曾朝附夕叛的地方軍閥們，就叛變的叛變，反戈的反戈，「起義」的「起義」，逃跑的逃跑。看上去都是臨極而生變，實際上早已暗通款曲，只等時機罷了。中國大陸出版的《國民黨起義將領》一書，就把中共如何長期勾結這些殘餘封建勢力的行經描寫得栩栩如生。

當然，中共打贏內戰和打贏國民黨，還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有的，屬於國民黨和國民政府自身的一些原因，我已經在前面講過了；有的，則為毛澤東和中共打內戰的智慧和才幹所決定，對此，中共及其御用的歷史學家們，甚至是御用的文人們，也都是肯定的肯定，歌頌的歌頌，早已是不亦樂乎，自然也就用不著我來湊熱鬧；有的，自然是來自人民和中國知識份子自身的原因，我在《誰是新中國》一書中，也已經作了詳細的論述。這裡，也就不再多說了。但我只想再多說一句的就是：各位華僑和留學生朋友們，雖然中共就是這樣地打贏了內戰，打贏了國民黨；但打贏了國民黨和內戰的中共，又給我們的民族、國家和人民帶來了一個怎樣的命運呢？這，雖然也無需我再講下去，但，卻又最應該是由我們所有中國人都應該來加以沉痛反思和深刻認識的了。

謝謝！

第二篇

驅除馬列，恢復中華 民族的民族精神

2001 年始講於美國紐約、芝加哥、舊金山等地僑學界，
2003 年講演錄發表於美國《黃花崗雜誌》總第 3/4/5 期，
2005 年依次講演於英國倫敦大學政經學院、牛津大學和劍
橋大學。2006 年答問於德國柏林工業大學。

前言

各位華僑，各位朋友：

我為什麼首先要說「不是中華要驅除馬列，而是馬列禍害了中華」呢？

這是因為，我們的中華，向來就是一個禮儀之邦，向來就是一個雍容大度的民族。數千年來，我們非但對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不採取抵制、排斥、消滅的態度，而且，總是虛心接納，認真研究；甚至融匯發展，相得益彰；從而才愈來愈形成了我們自己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世界最古老的四大文明古國，於今只剩下中華這一國與世長存；斷流了七百餘年的印巴佛教，就是在中國因「漢傳」才得到了再生、發展和回流；至於顛覆了宋、明兩朝的蒙人和滿人，不僅為中華文明所征服，而且為中華文化所同化，就是因為中華民族具有這種「德性」所致。

風水輪流轉。到了滿清末年，我們的民族和國家落後了，我們一些有眼光的知識分子，非但主動地開始接納外來的文化和文明，而且刻苦地學習起近代西方進步的文化和文明來了。晚清時代的「西學東漸」，各種西學在中國的迅速傳播和發展，說到底，莫不是因為我們具有著這樣博大的民族胸懷所致。但也正是在西學東漸的風潮中，西方的馬克思主義，才被挾裹在「西學」之中，「東漸」到了我們中國。那個時候我們雖然還沒有能力辨識他在西學中的地位和性質，更不

可能辨識他「不過是對西方民主進步潮流的一個反動」——也就是說：「他雖然打著悲天憫人的共產主義旗號，鼓吹的卻是一種主張專制倒退的復辟思潮」^{註1}。

但是，中華沒有驅除他，卻在「歡迎」他，傳播他和研究他。

大家都知道毛澤東有一句名言，叫做「10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事實上，毛澤東的這一句話，與他的許多話一樣，不過都是一個個天大的謊言罷了。因為馬克思主義絕不是蘇俄的所謂革命送來的，而是早就送來了。我在《誰是新中國》這本書裡，就把這個事實挑明了：

一是早在1903年，滿清還遠沒有垮臺的時候，日本人福井準造的《近代社會主義》一書，就已經由中國人趙必正先生翻譯成漢文，在中國出版了，他是隨著西學東漸而進入中國的首批馬克思主義讀物之一。1906年，中國同盟會的機關刊物《民報》第二號；1908年，中國《天義報》第16號和19號，就已經翻譯和介紹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也就是說，連腐敗專制的滿清王朝，都沒有驅除馬克思主義，還允許他「東漸」來到了中國。

二是辛亥之後，由於國民革命的成功和中華民國的建立，中國的大地上，更是出現了思想解放和輿論自由的空前局面，各種學術政治觀點，不但可以自由併存，而且可以自由競爭。那個時候，不僅馬克思主義得到了更大的傳播，具有鮮明共產主義色彩的「中華民國工黨」和「中國社會黨」，也已經

應運而生。胡漢民、戴季陶等人還成立了「社會主義研究會」，開始介紹和研究馬克思主義；梁啟超的「共學社」已經開始出版《馬克思主義研究叢書》，如：《資本論解說》、《唯物史觀解說》和《馬克思派的社會主義》等等。1919年出版的《新青年》雜誌，也已經出版了「馬克思主義」專號……。也就是說，在中華民國建立之後，即使新中國正處在民主革命和種種專制復辟勢力的反復和艱難較量之中，即便是中國正處在袁世凱和北洋軍閥的倒退統治之下，中華也沒有驅除馬列，而是允許他在中國傳播，甚至是結社，就不說1920年8月，蘇俄就已經派人到中國來創建了「認馬列為祖宗、認蘇俄為祖國」的共產國際中國支部——中國共產黨了！

三是1927年之後，即便是按照中共顛倒歷史的說法，中國已經處在「國民黨反動派」的反動統治之下了，但是，在蘇聯大舉侵略中國，甚至正在指揮中共武裝暴動，旨在顛覆中華民國之時^{註2}，當政的「國民黨反動派」，也只是對「拿槍造反」、並且志在遵俄命「武裝保衛蘇聯」的中國共產黨，進行了完全正確的征討，卻對中共及其文化人大肆宣揚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不但沒有採取嚴厲禁止的態度，還本著輿論自由和文化自由的基本精神，予以了相當的新聞出版自由。那個時候，豈只是宣傳無產階級革命、號召要「殺光國民黨」的小說，都能夠出版「出名」^{註3}，甚至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著作，包括前蘇聯一些闡述馬克思主義的主要著作，

以及馬克思主義的所謂文藝理論著作，都在 1928 年至 1932 年間，幾乎得以全部翻譯出版。也就是說，被中共指罵為反動派的國民黨，也沒有「驅除馬列」，雖然「馬列已經開始在可怕地禍害著我們的中華」了！

四是在中國人民長時期的艱苦抗戰中，為了團結抗戰，中華民國政府又對那個慣用「陰陽兩謀」的共產黨，採取了「團結」的方針。因此，「國民黨反動派」不僅不再征討使他腹背受敵的武裝共產黨，而且允許他在大後方辦報、辦刊、辦出版；演戲、演劇、拍電影。就是打著宣傳抗日的旗號，大肆地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宣傳共產革命，從而使得不抗日的共產黨，和「只有後方、沒有前方」的中共軍隊，有了整整八年的時間，在全中國範圍內宣傳馬克思主義，發展、集結部署共產革命「地上和地下」的力量，積極準備內戰打天下。換言之，即便是在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鍵歲月，在中華民國政府領導人民進行長期的艱苦抗戰之中，中華也沒有驅除過馬列。雖然他終於「遺禍無窮」。

至於 1949 年之後，中國大陸人民，不論是心甘情願者，還是被迫無奈者，就更不可能敢於驅除馬列了，換句話說，則是只能坐待馬列來「收拾、禍害甚至是屠殺」他們了！

朋友們，上述這些無可辯駁的歷史事實，都只能說明，我們中華，從來就是「量大的君子」，「不毒的丈夫」。從來就是以善意待客，以寬容待人，以能夠包容一切的胸襟，來對待人類各種不同的文化和文明。哪怕是對那些有害的文

明和文化，我們都能夠以「仁」為懷，亦以雍容大度為姿態，接納、鑑別，絕不輕易「驅除」，更不會以「殺伐」相待。這就是我們中華數千年的文明。又有誰能說，我們中華如此文明的文明，竟是一種不好的文明呢？

但是，儘管中華有如此地見識、文明和胸懷，馬列又是怎樣對待我們中華的呢？

一、不是中華要驅除馬列，而是馬列禍害了中華

1. 馬列僭奪了我們中華民族的族權

所謂族權，也就是一個民族的「傳承權」和「發展權」。我先說傳承權。

一個民族之所以被稱為民族而傳承，除掉人種、血統、地域、語言等等自然的因素之外，最重要的，就是這個民族的文化，和由這個文化所凝聚而成的「民族性」。中華民族在自己數千年的歷史中，不論進退或勝敗，天下大亂還是天下大治，哪怕是兩度被亡了國，都沒有遭遇過民族覆滅的命運，相反，民族反而得到了發展，民族性反而更鮮明、更豐富，就是因為連我們的敵人也承認了我們民族的好文化。因為我們先進的民族文化，或者更準確地說，我們民族文化中的先進成份，美好成份，既同化了我們的敵族，也吸收了我們敵族可取的文化。直到將我們的敵族鎔進了中華民族這個大家庭裡面。所以，中華民族的傳承權不但沒有被僭奪，相反，中華民族的發展權甚至得到了更大的歷史空間。

但是，在中國的「馬列子孫」們奪取了大陸的政權之後，他們竟然立即僭奪了中華民族的傳承權。

他們是怎樣僭奪的呢？

一是以「反對封建文化」為藉口，全盤否定已經存在和發展了數千年的中華文化，甚至以造反、抄家和「破四舊」為號召，瘋狂毀滅我們的文化古籍，將我們歷經數千年建設和流傳下來的種種好文化破壞殆盡。直至任何一家宗教和宗教的文化，包括建築文化，都不能倖免。在中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中，全國的八千八百餘所宗教設施均被共產黨的紅衛兵砸毀。毛澤東的那一句名言：「秦始皇算什麼？我們一次就殺了四萬六千！」實在將他對我們民族文化史無前例的「焚和坑」，總結得再生動不過了。

二是以反對資產階級的思想和文化為藉口，將民國以來中國人民早已擁有的思想權、信仰權、輿論權和出版權剝奪殆盡，徹底廢除了古今中外任何一家宗教和思想在中國的自由存在，更不用侈談什麼自由競爭了。從而將那個外來的「馬列邪教」獨尊為「對中國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也就是所謂「國教」。並從此「獨尊馬列，殺盡百家」，非但連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早就被他們斥為「過時」，而且凡是與三民主義有關的，不是鬥，就是抓；不是打，就是殺。過來人都知道，凡父母年輕時為抗戰報國而參加過「三民主義青年團」的，豈但他們的父母沒有了好下場，就連他們自己也不要想過好日子。中華民族（大陸）終於為馬列邪教所

殘酷一統。

三是以馬列邪惡的「暴力革命、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這個「理論鏈條」為依據，連續地發動形形色色的政治運動，實行瘋狂屠殺和強迫改造。目的和手段呢？就是既要毀滅中華文化「源遠流深」的下層社會基礎，也就是要在「鎮反、肅反」等各種連續的政治鎮壓中，以鎮壓「反動的道會門」為名義，全面取締城鄉一向自由存在的民間宗社團體，殘酷夾殺民族文化在民間的形形色色傳人；又要持續地和大面積地迫害知識分子，包括對民族和國家有著重要貢獻的著名知識分子和文化人，並強迫他們進行永無休止的思想改造和勞動改造，包括那些在 1949 年以前，曾幫助他們「搶天下」的著名「自由派」知識分子們。必要時，甚至不惜策動單一的「批判電影武訓傳」、「鎮壓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直至誘發全面的「反右派鬥爭」，以明火執仗地鎮壓和迫害知識分子文化人。不僅從此消滅了中華文化的下層社會基礎，而且從此窒息了代表了中華文化傳承和發展成就的文化人群體，使他們從此成為一群不敢思想、不會思想的「腦死知識分子」，甚至成了專制復辟時代知識界和文化界的「木乃伊」。中華民族民族文化的傳承權利，終於為馬列所徹底僭奪。

四是就像任何一個好人家，都會有垃圾，也都要倒垃圾，家族歷史越是綿長的，一旦清掃起來，垃圾就越多。同樣的是，任何一個民族的思想文化裡面，也就一定會存在著不好的思想文化成份，也就是落後的部份，糟粕的部份，何況一

個綿延了數千年之久的古老民族。但是，中共雖對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好思想、好文化，進行了真正史無前例地「既焚又坑」，並且讓秦始皇也「望共興嘆」，但是，他卻對我們民族文化中不好的成份，糟粕的部份，專制落後的部份，非但不檢不棄，而且「欣賞備至」，甚至要「戮力發展」——也就是要用馬列的思想，將他們理論化和現代化，說白了，就是**馬列化**，就是要將他們「建設」成為馬列文化的一個部份。而其中最為中國馬列子孫們所相中的，一個就是被中國數千年正宗思想所一再批判過的，「流民造反思想和流民造反文化」。特別是他們在經過毛澤東的「創造性發展」之後，也就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列思想文化了。這就是毛澤東的那一句名言——「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真正由來。另一個，就是由中國八百年封建專制制度，特別是兩千年君主專制制度，所長期積累起來的專制統治的**權術**，說是純專制統治的哲學也行。正是這個與近代民主政治和自由思想相去甚遠的專制權術文化，也為中國的頭號馬列子孫毛澤東進行了「創造性的運用和發展」，並為馬列王朝層層級級的大小馬列子孫所「心領神會」，甚至使得中國大陸的一般知識份子和民眾，都能夠深諳其中的奧妙，從而使專制的權術鬥爭，豈但是在理論上，特別是在實踐上，均被他和那個馬列王朝發展到了極致，也就是「出神入化」的境地。半個世紀以來，在這個以外來馬列極權統治為中心的中國洋教王朝裡面，他的每一級「封建政權」和

每一個「封建單位」，所無時無刻不在表演著的，豐富而又精彩的權術鬥爭，實在要讓我們未來的歷史學家和歷史劇作者們「欣喜若狂」。再就是，中國極少數帝王所「興」過的「文字獄」，竟然也為本性就是要消滅人類一切進步思想的馬列所「情有獨鍾」。就像我在《誰是新中國》一書中所說的那樣，在從來沒有實行過宗教專制統治的中國歷史上，也就是在從來沒有實行過「教政合一」式專制統治的中國專制歷史上，實際上，「文字獄」只是很少出現過的一些「個案」，並且範圍小，時間短。有的，只是為偶然出現的民族原因所導致，所謂由「清風不識字，何事亂翻書」所引發的清代「文字獄」，便是如此。但是，中國的馬列子孫們，卻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指導下，將他發展成了馬列專制極權統治下，「大規模的、一再發動的和無限血腥的」文化鎮壓運動和民族鎮壓運動——說白了，便是他要借機利用馬列這個洋教和邪教，來鎮壓我們的民族思想和民族文化。為此而家破人亡者，何止是千千萬萬！至於中國的梁武帝，因篤信佛教，而能夠與不信佛教者開臺辯論，並且就是辯輸了，也不關人、殺人，像這種優秀的思想文化行為，馬列倒是「不肖一顧」的了！所以，由中國的馬列子孫們專門揀拾我們民族文化中的落後成份，而製造出來的種種「先進馬列文化」，他們就不僅是一種文化上的倒退，而且具有相當的欺騙性。如今常常要津津樂道我們民族文化「孽根性」的所謂文化精英們，由於他們只知馬列文化，根本不知我們自己的民族文化，所以，他

們才要將馬列文化之罪，硬說成是我們的民族文化之罪；更要將馬列文化的孽根性，說成是中華文化的孽根性！這不過是一種「對馬列有情、對祖宗無知」的顛倒而已。

五是馬列子孫利用獨霸的國家權力，以歐洲中世紀教權統治者建立宗教經院哲學為模式，自上而下、全方位地建立了馬列經院哲學，在政治、經濟、思想和文化等一切方面，創立了形形色色的馬列研究機構，或掛鉤式的馬列指導機制，以將一切社會科學，甚至自然科學，都系統地納入馬列邪教的「指導」之下，更將一批又一批復辟時代的知識分子，一個個地都扭變成了只會呼喊馬列口號的「惡教徒」，和只會在馬列指導下「做學問」的「馬教知識僧侶」，甚至是「根本沒有知識」的馬教僧侶——以一邊熬受非人的人間痛苦，一邊卻要千方百計、甚至是口不應心地證明「馬氏惡教天堂」的虛幻存在。今天，我們只需翻閱數十年間任何一本由馬列王朝所出版的思想文化著述，甚至是在所謂改革開放之後才出版的思想文化書籍，讀一讀那一句又一句、一篇又一篇和一本又一本必須「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才能寫作出版的政治、歷史、經濟和文化著作，除掉只能令人作嘔之外，我們還能企圖在他們裡面得到什麼呢？

但是，正因為如此——獨尊馬教，才變成了全方位的馬教統治；罷黜百家，才名副其實地變成了殺盡百家。中華民族民族文化的傳承權，豈止被褫奪一盡；中華民族的民族性，也已經迅速地為馬列子孫的「奴才性」和馬列文化的「劣根

性」所玷污糟蹋。

1949 年之後，似乎沒有經過太長的歲月，中華主流文化「以仁為本」的文化精髓，竟全然變成了馬列的「以鬥為綱」。豈止要公然宣布「以階級鬥爭為綱」，並且還必須「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說白了，就是要「年年鬥、月月鬥、天天鬥」。直到他們鬥得「其樂無窮」，鬥得黎民百姓「其苦無限」，鬥得遍中國大陸「天昏地暗，血流成河」，直至鬥死了數千萬人民，竟然仍不甘心，還要號召「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便是發動文革，就是還要「繼續鬥下去」，即便是鬥到了馬列子孫鄧小平和江澤民的手裡，也還是要「變著法兒」繼續往下鬥……。

於是，中華以「中庸為道」的理想行為方式，竟徹底改變成了馬列永遠要「實行專政」的極端專制行徑。歷史的事實是，中國的馬列子孫們，不僅要用暴力專政的極端方式，來無休止地對付他們已經十分可憐的「敵人」和完全無辜的民眾，而且要用無休止的暴力專政的極端方式，來對付自己惡教的「袍哥」^{註 4}們。他們從對高崗、饒漱石專政，直到對馬列王朝的主席劉少奇專政，直至在「文革」中，把他自己那些邪教徒們，鬥得哭的哭，叫的叫，想活的不得好活，要死的不得好死……。

於是，中華以「兼收並蓄」為模式的思想文化發展，竟變成了外來馬教只允許「獨姓單傳」的思想文化專制。1949 年之後的中國大陸知識分子，包括邪教王朝的所有臣民，不

僅被逼迫得「言必稱馬列，書必證馬列」，而且被逼迫得「事必奉馬列」，連和尚也必須學馬列，非馬列惡教的「大袍哥」——共產黨員趙樸初，便無人可以擔當中國佛教協會的主席……。而傳統中國知識分子向來具有的「著書立說」之權，如前所述，除掉只允許「在馬列主義指導之下」以外，一概取消取締，稍有離經叛道，或只是被懷疑為離經叛道，便動輒被批判鬥爭。中華自古以來就是「儒不獨，三教併」的思想宗教自由，也就是「儒、釋、道」均可以同存同興的自由，竟從此變成只能夠「為馬教殺人的專政」。多少無辜的中華兒女，就是在馬列子孫們所謂「反對馬克思主義、反對列寧主義、反對史達林主義、反對毛澤東思想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名之下，被惡教主和惡教徒們瘋狂殺害……甚至就連「拍馬屁」，都會因拍得大小惡教教主們不夠舒服，而被整治得家破人亡。著名的馬教教徒，中共中央黨校校長楊獻珍，和一大批著名馬列教徒的悲慘下場，便是明證。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中華民族的思想文化和宗教信仰，實在是遭遇到了「滅絕性」的瘋狂鎮壓……從此，中華文化的優秀傳承和傳承優秀的中華文化，似乎只能在那個小小的臺灣島上和漫漫海外，為炎黃子孫們所傳承、所維護了。

於是，中華以「王道樂土」為追求的大同思想，居然就為馬列「血腥霸道的共產主義」所玷污、所取代。否則，我們就不可能明白，為什麼深講孝悌之道的中國，竟然會在馬列邪教統治的「專制復辟時代」，時時處處地都會出現「妻

子揭發丈夫、兒女鬥爭父母」這樣大規模「不孝不倫」的社會現象？為什麼「禮、義、仁、智、信」這五種為人的美德，在中國數千年的民間，男女老幼皆可以耳熟能詳，但到了馬列復辟統治的時代，幾代大小中國知識分子，雖然橫豎不知，卻又要將他們當作封建文化而大批特批？至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等中華文化的優秀內容，所體現的做人、治學和深懷理想的精神，就更是在馬列惡教「大亂中華」的復辟歲月裡，既為中華的馬列子孫們棄之如敝屣，又為無數的中華兒女所不知和不解，甚至還要反對和批判。

而中華以「制民之產」^{註5}為代表的，有助於保護「私有制」和促進私有經濟發展的民族文化，又為馬列所謂的「公有制」文化所強行取代。從而不僅將中華民族數千年合法存在的私有財產制度破壞殆盡，而且對「有恆產者有恆心」的私有文化觀念進行了「連根拔」式的徹底破壞。所以，毛澤東時代，全體中國大陸人民才不得不將自己的「人身」依附於中共一黨，人人成了「共奴」；鄧小平之後，中共又在「權力為他們所私有、財產更要為他們所私有」的所謂改革開放中，將整個中國大陸惡變成了一派「黨治、黨有、黨享、黨貪」的亡國景象……。

孫中山先生曾直率地告誡說：「要想消滅一個民族，必然首先要消滅這個民族的思想文化」。如此看來，馬列豈只是僭奪了中華民族的民族文化，而且是一心為了亡我中華

啊！因為滅絕了中華民族的民族文化，我們中華民族，豈不是只成了一具被人奪走了魂靈的「行屍走肉」了嗎？

然而，馬列又豈止是「僭奪了中華民族民族文化的傳承權，而且僭奪了中華民族「民族生活方式」的傳承權。說得再具體一點，就是中華民族數千年相對自由的生活方式，和民國元年之後 38 年間相當自由的生活方式，可以說是「全部無法傳承下來」了。

具體地說，一是中國農民數千年「日出而作、日入而歇、帝力於我奈何」的自由生活方式，被馬列在經濟上的公有制，實際上的「黨有制」所徹底消滅。如前所述，中國的數億農民，從此成了「共產農奴」。也就是「30 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的農家樂，從此竟在中國成了歷史的絕響。

二是大家知道，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個體戶，就允許做生意，特別是小生意。說得「專業」一點，就是：自秦以前，中國就有了自由的個體商人，和存在了數千年的市場經濟初級形式——商品交換。到了中古，尤其是近代——宋、元、明、清時期自由經濟發展的萌芽，晚清改革開放所奠定的市場經濟的基礎，特別是民國創建之後迅速建立起來的自由經濟體制，竟然就因為中共要用馬列所謂的「公有」經濟理論治國，而被破壞殆盡。所謂「小生產是資本主義汪洋大海」的馬列教條，所謂要「割掉資本主義尾巴」的種種倒行逆施，連一個老婆婆賣幾個雞蛋也要被鬥爭、被批判是在「走資本主義道路」，實在將中國人民推進了幾千年所未遇的痛苦生

存狀態之中。

三是自秦以後，中國就開始廢除「封建貴族政治」，逐漸確立了「君主平民政治」，並通過「毫無出身限制」的科舉考試，以選拔人才，為政府「吐故納新」。中國古代歷史上，曾出過多少貧苦人家出身的「好宰相」！到了民國時代，根本不看出身的平等的公務員考試制度，也已經在30年代之初，就得到了立法和推行。更早一些，連辛亥之後軍閥混戰的歲月，北洋政府都要敞開「官門」，絕對不查出身地考試選拔他們的「官員」。歷朝歷代的「反動統治階級」們，至少沒有剝奪普通民眾讀書、考官和做官、做事的權力。但到了馬教專制復辟時代，馬列子孫們卻依據馬列極其反動的「階級論」，和由階級與階級鬥爭所必然會演化而來的「血統論」，以及他們的「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將中華民族上述進步的，或含有進步內容的政治生活方式，廢除殆盡，而代之以「唯成份論」和所謂的「重在政治表現論」。中共的土貴族子弟們，甚至能夠一邊揮舞著浸血的皮鞭，一邊將「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革命歌曲」唱徹雲霄，從而將眾多所謂「出身不好者」，和所謂的五類分子們參與政治生活的應有權利，參與其他種種社會生活的應有權利，甚至僅僅是謀生的起碼權利，幾乎都剝奪得一乾二淨。

四是如前所述，中國知識分子數千年來所擁有的，相當自由的思想表達權、文化著述權和人身自由權，特別是他們

對歷代統治者所擁有的「不合作權」，「反改造權」，以及「自我標價權」——也就是「歸隱山林」以求曲線做官的「權力」，統統剝奪一盡。以致在廣袤的中國大地上，已經真正地出現了「普天之下、莫非黨土；率土之濱，莫非黨奴」這樣一個「全方位專制復辟的現代極權氣概」。

我顯然應該說清楚的是；直到不得不與晚清一樣，為「自救」而推行「改革開放」，就是推行「洋務運動」之時，中共才在「馬學為體、中學為用」的前提下，也就是在「以馬教極權統治為體、而不是以中華專制統治為體」的前提下，仍然為保護這家「洋教專制復辟統治」，而將我們在晚清和民國早已存在和發展過的一切，開始了遠沒有「到位」，也沒有可能「到位」的恢復。他在改革開放中——所「改」的，不過是馬列統治的枝葉，而不是馬列專制的朝綱；所「放」的，不過是近半個世紀以來，被馬列強行禁錮、橫加破壞的「中華民族的民族生活方式與民族發展內容」罷了。這就是我所說的「馬學為體、中學為用」的意思所在。雖然，他那個以馬為體的改革開放，卻正在將整個中國社會推向真正史無前例的腐敗和腐爛之中，中華民族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生活方式，也正在遭遇著馬列又一輪惡毒的精神污染和毀滅性的破壞。

如果說中華民族的傳承權遭遇了馬列無情的僭奪，那麼，中華民族的發展權，也就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更加可怕的僭奪了。而這種可怕的僭奪，一個就是僭奪了中華民族在近現代推動民主變革和捍衛民主變革成果的權利，另一個則是

僭奪了中華民族在近現代借鑑和學習西方進步思想和文化的權利。

大家都知道，中華民族從近代開始，由於漫長的君主專制制度，已經走向了他的消亡期；腐朽的滿清王朝，也已經面臨著他的覆亡；近代西方的政治文明、經濟進步和自由文化，不僅給已經落後了的中國，帶來了新鮮的歷史進步氣息，和「非變法不能強國」的迫切感；而且，世界列強的欺侮和凌辱，也已經威脅到了中華民族的存亡和興廢。因此，「歐風美雨」才會吸引了中國的先進人士，「變革圖強」也才會成為愛國志士的一心追求。如果說晚清政權的改革開放，既因此而催生；孫中山的國民革命，更因此而發動；那麼，由滿清改革開放所帶來的經濟結果——近代自由經濟在中國的產生；和由孫中山的革命所帶來的政治成果——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的創建；便是中華民族為保存自身的生存權和發展權，而獲得的重大歷史進步。

雖然這個進步因外族的顛覆和入侵，而步履艱難；更因專制勢力反撲的必然性，而一再地出現過進程中的混亂，但是，新中國——中華民國，還是對外戰勝了侵略，對內戰勝了袁世凱的公然復辟帝制，張勳的公然復辟滿清，和北洋軍閥「假共和之名義以行專制之實」，從而在政治、經濟、思想和文化等各個方面獲得了巨大的發展。然而，中華民族的這個發展，卻因為遭遇了那一場「革命名義」下的共產專制復辟，幾乎前功盡棄。從此，中華民族的中國，竟然為中國

馬列子孫所竊奪，中國的民主進步更為中共的全方位專制復辟所阻斷，中國人民歷經了近百年的艱難奮鬥才看到的光明和希望，只因為「錯把復辟當成了革命」，而將自身民族的發展權，葬送在馬列和馬列子孫的手中。之後，就像我在「假如孫中山活在今天」這篇文章中所說的那樣，中國的馬列子孫們，竟是「以奪命來奪志」的方法，又將半個世紀以來，中國人民捍衛自己民族和國家追求進步發展的權利，淹沒在一片又一片的血泊之中。

然而，奪取了權利、實現了全面專制復辟的中國馬列子孫們，由於他們將馬列邪教——這個在近代西方「反對自由進步、鼓吹專制倒退」的所謂革命哲學，頂禮膜拜為中華的絕對統治思想，甚至以長時期的「閉關鎖國」為手段，來斷絕所有中國人對近現代西方的瞭解，因而，又將中華民族借鑑和學習近現代西方真正進步文明的權利，僭奪殆盡。這就使得身處復辟時代的中國大陸人民，在漫長的黑暗歲月裡面，只知馬列洋教，而不知究竟什麼才是真正的西方進步思想了。這就不僅造成了人民重新覺醒的推遲，而且造成了民族重新發展的艱難。

中共在為自救而推行改革開放之後，固然因為門窗不得不開，而使得復辟時代的人民，如晚清一樣，突然感受到了當代真正西方文明的刺激，也使他們感受到了大大落後於世界的真正恐慌。但也正因為中共立國的思想基礎就是馬列，所以，本身就是「全盤西化之怪胎」的中共，就還是要不斷

地反「西化」，就是反對真正的西方文明，反對西方進步思想文化的「污染」，直到只准許「掛狗頭，賣羊肉」，而絕不准許「掛羊頭，賣羊肉」；明明是要「維持一個由馬列共產黨統治的中國」，卻非要聲稱，要建設一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是的，在馬列子孫們心裡，說到底，中國不過是一個「特色」而已，他們所要的，還是「馬列的社會主義」，還是馬列！此一言實在是道破了馬列子孫們的「天機」！因為，哪怕他說的是「有馬列特色」或「有社會主義特色」的中國，那也畢竟是先要中國，然後再要「馬列特色」或再要「社會主義」，也就不算是「本末倒置」了！當然，中共的一廂情願，最後也只能是「流水落花春去也」，但是，在當代這個迅疾發展的世界之上，馬列對中華民族學習西方真正現代文明、特別是進步思想文化權利的僭奪，實在將中華民族太長地推陷在他那個全方位專制復辟的死港之中。

2. 馬列篡奪了我們中華中國的國權

剛才，我已經講了馬列是如何僭奪了我們的族權的，我現在要接著講的是：馬列篡奪了我們中華中國的國權。

為什麼說馬列篡奪了中華中國的國權？而且，什麼才是中華中國、和中華中國的國權呢？

明白地說，所謂中華中國，就是中華民族的中國，或者說是「中華民族的民族國家」。而中華民族建立自己漢民族

國家或多民族國家的權利，就是中華中國的**國權**。可以說，自有中國以來，一直到滿清、民國，他們都是中國，並且都是中華民族的中國。因為他們不僅「形是中國」，而且「神是中國」，也就是說，不論中國在形體上、規模上、民族的多寡和民族的銖合上，有過怎樣的變化，只因這個中國的立國思想是中華民族的，這個中國的建國文化是中華民族的，這個中國所要傳承、發展和捍衛的，全是中華民族的，即便是要學習借鑑別人，也一定要將他熔化成中華民族自己的，那他必定無疑就是中華民族的中國了。這也是滅了南宋的元朝，竟然成了中華民族的一個朝代^{註6}；滅了明朝的滿清，就更是中華民族之一個朝代的原因。因為他們都接受了中華民族的民族文化，並被中華民族所吸收、所同化。慈禧太后張口便是「中華」，而從來就沒有自稱過「滿華」。如我在文章中所說的那樣：「她那一句『量中華之物力，結與族之歡心』的話，雖然浸透了她無可奈何的賣國情緒，但是在她的深心之中，早就將滿族當成了中華民族的一部分了……」。孫中山先生提出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雖然是要借民族革命為一助，但是，他還是對「驅除韃虜」作出過極為明確的解釋——這個解釋就是，他要驅除的，不是滿人和滿族，而是滿族貴族的君主專制統治。並且他還更明確地說過：「即便是漢人做君主，也要革命。」因為，他所從事的革命，就是「政治革命」，而「要其一貫之精神，就是自由、平等、博愛」。

但是，中國的馬列子孫們，不論他們在打江山之前，還是在占江山之後，他們所要建立的，所要維護的，都不是中華的中國，不是中華民族的中國。為什麼？

這是因為：

首先，馬列篡奪了中華民族獨立建國的權利。因為不論他們是處在「革命造反」時代，還是已經處在「奪權掌權」之後，他們都是在「思想上認馬為祖，關係上以俄為宗，行為上，則是以分裂、出賣、搞亂和禍害中華民族，推翻和消滅中華中國為目標」。特別是他們為了定馬列為「獨尊」，更為了將馬列邪教來作為統治中華民族的思想，而敢於連續地「為這家洋教屠殺中華兒女」的殘酷統治行徑，實實在在地證明了：他們雖然也是「黑髮黃皮」，但卻是地地道道的「馬列子孫」，是道地的洋教徒和邪教徒。所以，由這群背宗忘祖的馬列子孫、邪教徒所建立的中國，就只能是一個馬列的中國，一個由外來邪教統治的中國。而這個馬列中國，既曾是國際共產主義邪教教廷的一個宗屬國，又是我們那個世仇大敵——新沙皇俄國的附庸國。如此，我們指斥馬列篡奪了中華民族在現代獨立建國的權力，也就言之不過。

其次，馬列篡奪了我們民主建國的權力。因為眾所周知的是，中國在辛亥之前，民主憲政和君主立憲的追求者們，都已經在謀求「君主王冠下的憲政」了。辛亥之後，中華民國的創建，就將建成一個民主憲政的國家，當成了中國人民的根本追求目標。連袁世凱在掌權之初所制定的「中華民國

憲法」，都明確地指出過：「中華民國為永遠統一之民主國家。」並且稱此條原則，「永遠不得予以修正。」雖然他說的並不算話。

然而，馬列又是怎樣地篡奪了我們民主建國的權力的呢？

我認為，馬列是以在中國製造「四大歷史混亂」的方式，來篡奪中華民族民主建國的權力的。

一是製造了中國國民革命的混亂。因為，正是這個馬列，和由這個馬列在中國煽起的共產主義革命，也就是毛澤東所謂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不僅在理論上將孫中山先生發動和堅持的中國國民革命，指斥為「舊民主主義革命」，而亟欲取代之；而且，更因他指罵孫中山的革命是軟弱的資產階級革命，而一定要推翻之。因此，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後，當中國國民革命正在擔負著反對形形色色專制復辟的重大歷史使命之時，由蘇俄建立的第三共產國際教廷所命令、所指揮的中國共產革命，也就是中共的武裝造反暴動，他們不是受俄命，陰謀加入中國的國民革命，而製造兩種不同性質革命的混亂；就是公然背叛國民革命，立即反撲國民革命，而造成了「兩個革命」的混戰。從而將辛亥之後志在捍衛新中國——中華民國，和志在推進中國民主憲政的中國國民革命，反而給推到了一個「被革命」的荒唐地位之上。中國的國民革命因此而遭遇了巨大阻礙，中國的民主憲政建設亦因此遭遇到了被阻斷的不幸命運。

二是製造了中國國家分裂的混亂。我們不能想像的是，一

個正在被分裂的國家，竟可以自由自在地建設著他們的民主憲政；我們更不能想像的是，一個正在外敵的命令之下，企圖以分裂祖國為手段，來顛覆自己國家的武裝造反黨，卻是一個正在為自己國家建設民主憲政的黨。如果我所說的上面這兩條理由能夠成立，那麼，我們只需要稍稍地檢索一下中共在蘇聯命令下，持續武裝顛覆中華民國的歷史，我們就能夠證明，正是中共，才製造了國家分裂的混亂，從而成為破壞中華民族一心進行民主建國時代的「家賊」。並且這個「家賊」還在數十年間，不僅**裡通外國**，而且始終為外賊所命，更為外賊所用。如我在《誰是新中國》這本書中所揭穿了的那樣，1929年，他在前蘇聯大舉武裝侵略我們的祖國時，就曾受史達林之命，以「武裝保衛蘇聯」為口號，在全中國發動武裝暴動，以「裡應外合」。1931年，當「九一八」事變發生，全中國都在沸騰著抗日禦侮的愛國情緒時，這群馬列子孫，又在史達林的命令之下，篡立了認俄為父的「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甚至在他的「憲法」裡，公然地號召要分裂祖國，不僅為日本在中國東北篡立「偽滿洲國」作了榜樣，而且，從此將中國分裂至今。至於中共與臺灣分裂勢力親密的歷史關係，至於中共在當今海外與臺獨勢力相反相成的一唱一和，及其在客觀上的相互依存和互相利用，真不知已經在海內外製造了多少要求臺獨的分離主義者，和多少正在「假愛國、真擁共」的「和平統一論者」了！

三是製造了中華民族偉大衛國戰爭的混亂。因為，自

1931年「九一八」日本發動局部侵華戰爭始，中共在其後整整四年的時間裡面，非但無一言一行以抗戰，相反，卻是利用中國遭遇侵略的大好時機，在新沙皇史達林的三項命令下，發動農民暴動，實行武裝割據，在中國篡立俄國人所需要的所謂「蘇維埃政權」，直至乾脆建立了第二國中國——認俄為宗的「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率先分裂了中國。這就不僅將正在被迫抗戰和積極準備抗戰的中華民國政府，逼迫到了腹背受敵、外患加內憂的痛苦境地，而且使得國民政府不得不在實際上進行兩面作戰，既削弱了自身的對外抵抗力量，又增強了外敵的侵略野心。這是其一。

其二，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雖然堅持抗戰的中華民國政府，竟能夠在戰火之下，勉力推行民主憲政的建設，可以說是舉世無雙。但是，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馬列子孫們，卻又認定：中國人民長期的反侵略戰爭，不過是他們「要在長期民族革命戰爭的歷史條件下，發動革命以奪取政權」的大好歷史機遇，從而決策了日蔣火併的「偉大抗日策略」，走「專打友軍，不打日軍；專圖擴張，不圖抗日」的所謂抗日路線，直到乾脆「要與日寇夾擊正在堅持抗日的國民黨軍隊」^{註7}。並且，誰要是揭穿了他們「假抗日、真擴張」的行徑，他們馬上就大打出手，利用國民政府給了他們的新聞、出版自由，利用國際間對他們不抗日真相的難以瞭解，高喊「要擊退反共高潮」，「要打倒國民黨頑固派」，「要對外宣傳我們共產黨才是抗日的，國民黨才是不抗日的」。這不

僅使得正在艱苦領導抗戰的國民黨及其政府，打他不是，不打他又不是，只能「徒喚奈何」！而且，中國人民的長期艱苦抗戰，就因為有了這一群馬列子孫的破壞搗亂，因為有了這一群馬列子孫的賣國擴張，便在他極為艱苦血腥的抗戰歲月，將一個本已在全民族一致對外的偉大衛國戰爭中，團結奮發起來的中國，活生生地又被他們分裂成了「兩國」。就像當年左傾的民辦報紙《大公報》所說的那樣：「不少友邦人士到了延安，看著到處飄揚著的鐮刀斧頭旗，聽著共產黨的國際歌，真不知道，眼前到底是一個中國、還是兩個中國了……。」

這夥馬列子孫所製造的我們偉大衛國戰爭的混亂，豈只是「痛苦」二字便可以包括得了的，由這一混亂所造成的禍患，竟然直到今天，都還在禍害著我們的中華。

四是製造了「錯把復辟當革命」的混亂。眾所周知的是，馬克思主義是被他的徒子徒孫們稱做「革命的哲學」的，而這一家所謂的革命哲學，他的鋒芒所向，竟全都是那些剛剛推翻了專制、和剛剛開始建設民主共和的新國家和新政權。在西歐，他的革命對象，就是高舉英、法民主革命的旗幟，正在擺脫封建壓迫、追求政治民主和經濟自由的新國家和新政權。只因為西歐自由民主力量的日漸勝利，才使他在整個西方徹底敗下陣來，並永無翻身之日了。

但是，馬克思主義的「被迫東渡」，卻使他在農奴制解體不久的專制俄國，將其旨在復辟倒退的革命目標，指向了

剛剛推翻了沙皇專制統治所創建的「俄羅斯共和國」。從而「在革命的名義之下」（列寧名言），徹底地、全面地復辟了專制制度，並將俄國的專制統治推向了馬教專制復辟統治的極端。而由俄國共產專制復辟政權直接向中國輸入的馬教革命，自他誕生的那一刻起，就毫不猶豫地將他的革命矛頭，指向了剛剛推翻了滿清王朝、結束了二千年帝制的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並且在俄國新沙皇史達林的直接命令和指揮下，非推倒這個民主共和的新中國——中華民國，便絕不罷休。

然而，一是他在革命風起雲湧的時代裡，因高喊革命，而混淆了視聽，模糊了真假革命的界限，製造了**不同性質革命的混亂**；二是他在民主革命和專制復辟必有的較量歷程中，既以革命的名義來發動專制復辟，又以革命的熾情來推動專制倒退，從而製造了革命與復辟在口號、形式和手段上的糊塗不清；三是他既然能夠利用「俄國農民身上的共產主義本能」，實現了俄國民主革命後的倒退和復辟，那他就完全可能在以農民為主體的中國，並在中國歷代農民造反起義都是意在「建立新王朝、復辟舊制度」的歷史經驗中，將馬克思主義這個旨在鼓吹復辟倒退的「普遍真理」，與中國歷代農民造反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以發動農民造反打江山的陳舊歷史方式，在辛亥之後的中國，更在中華民國反對形形色色專制復辟勢力一再反撲的艱難民主進程中，來發動他們旨在「利用新名號和復辟舊制度」的革命了。這既是史達

林早在 1926 年就教導中共說：「中國共產黨革命的成功，就看他掌握農民武裝的多少」的由來；更是毛澤東在中國人民艱苦抗戰的歲月中，曾一再地要教導他的黨人和軍隊說：「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就是農民革命，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戰爭就是農民戰爭」的原因。

若再加上中國知識分子傳統的儒家大同思想，既被馬克思霸道血腥的共產主義所侵染，所玷污；辛亥革命之後的外患無止和內亂無休；和國際戰爭所帶來的非常歷史條件；於是，一場「錯把復辟當革命」的歷史性混亂，也就敷演出一場太大的歷史荒誕劇。在這齣歷史荒誕劇裡，真正的民主革命，竟然變成了「反動的革命」；復辟的專制勢力，倒成了必須謳歌的「民主對象」；真正的民主共和國，非但被顛覆、被推翻；虛假的人民共和國，卻在「中國人民從此『跪』下去了」的尖利嘶叫聲中，成立了馬列的專制王朝，而非中華的民主中國；而那個復辟了封建統治和專制統治的北京洋教政權領袖，非但無需加冕，便成了中國歷史上所有帝王都自嘆不如的「超級帝王」，他甚至能夠史無前例地昂然挺立在象徵著中國數千年封建和帝制的天安門城樓上，逼迫全中國都要對他「山呼萬歲萬歲萬萬歲」^{註 8}。……辛亥革命 38 年之後，終於得逞的全面專制復辟，甚至是全面的封建復辟，終於用無數人民的鮮血，凝結並照耀出了一片「復辟的輝煌景象」。……而中華民族在近現代獨立建國，特別是民主建國的國權，就是這樣地被馬列及其在中國的子孫們篡奪罄盡！

然而，馬列豈止是篡奪了我們獨立建國和民主建國的權利，而且破壞了我們恢復民族自治的權利，阻擋了我們反對專制一統、追求民主統一的權利。這自然也是馬列對我們國權的篡奪。但這一部份的內容我將在「新十六字綱領」的第四講——「愛我中華，追求民主中國的自由統一」裡面，再作系統的解說。

3. 馬列全面徹底地剝奪了中國大陸人民的民權

朋友們，如果說馬列只是僭奪了我們中華民族的族權和國權，這還遠遠不夠。因為，馬列還殘酷地、徹底地和長時期的地剝奪了我們中國人民的民權。

如我前面所講，他們一是以進行思想迫害的方式，剝奪了中國人民的思想權，甚至是思考權。也就是說，馬列子孫們用他們已經奪取的統治權利，規定了中國人民只能信仰馬列惡教，並且一定要「言必稱馬列，書必證馬列，事必奉馬列」。而本民族和全世界的其他任何思想宗教和文化，均被列在被否定、被批判和被掃蕩之列。一旦稍有異議，或者僅僅是被懷疑「有異議」，便因「反對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之思想罪，而列為反革命罪，並且是重罪，甚至是極刑之罪。這自然是中世紀歐洲宗教思想統治的翻版，是中世紀教政合一統治的復辟，更是對前蘇聯「現代教政合一專制統治模式」的全面照搬。在毛澤東時代，為「三反」罪而被虐殺的，真不知有幾萬幾百萬之多。所以，人民因長

期失去了思想的權利，而終於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在毛澤東之後，直至今天，被中共指責為心懷異端邪說，而身陷囹圄或被迫逃亡者，亦不知還有幾千幾萬。因此，在回首自身民族思想和追尋我們民族自身發展新思想的道路上，仍然是荊棘叢生，仍然是苦恨綿綿。

二是以殘酷的政治迫害的方式，剝奪了中國人民的政治權。1949 年之後，馬列既剝奪了我們人民參與感興趣政治的權利，又剝奪了我們人民對不感興趣的政治的不參與權。也就是說，只有一種政治權利，即由馬列所操盤的專制政治，他需要你參與，你就必須參與，他若不許你參與，則你便不能參與。除此以外，任何政治及其形式，任何人都不准感興趣，就不說是參與了。反革命罪，對一切企圖從事非馬列政治的人都是適用的重罪，甚至是死罪。至於他又用馬列的階級鬥爭、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要害政治理論，將無數與政治有關的，或與政治無關的人民，豈止是逼迫得走投無路，甚至是打進了 19 層地獄，連同祖宗三代都不能翻身。即便是到了為自救而改革開放的年頭，中國的馬列子孫們，在 21 世紀的今天，所敢於賜予人民的政治權利，倘若一定要拿來和我們祖宗的時代相比較，也是根本不能相比。就不說，1946 年，在中華民國國民大會上「三讀」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其白紙黑字寫著的：「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各黨派平等合法（化），和各級考試、監察官員必須超黨派（化）」的「四化」，對今日的北京洋教政權來說，竟只能

叫他心驚肉跳。他豈止是不敢幹，甚至連想也不願想。至於「選舉」一詞在馬列邪教政權那裡，所富有的「公然欺騙和存心玩弄」的馬教特色，雖然能叫海外幾個「中共」不要的「體制內」和不明真相者沾沾自喜，但在中國大陸人民的心中，也只能贏來「滿嘴嘲笑和無窮苦恨」罷了。馬列在中國以殘酷迫害為手段，來剝奪人民所有政治權利的超歷史罪行，無疑將永遠地被保留在足令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永世蒙羞的痛苦歷史上。

三是採取殘酷經濟迫害的方式，剝奪了中國人民的經濟權，也就是民生的權利。因為，馬列的專制復辟統治，之所以不同於其他專制統治的地方，就是，他還是一家全方位的專制統治。也就是說，**全部國計民生，都在他的一統之下**。特別是馬列用「革命暴力」、「革命專政」和連續發動**政治運動**的方式，鏟除經濟私有制，逼行經濟「公有制」——就是在中共「政治私有制」的前提下，強迫實行「全方位的專制計劃經濟」，實在將城鄉所有的人民，包括大小知識分子的活路，完全控制在他們一黨的手中，使得人人皆為「邪教惡政之奴」。在毛澤東時代，中國馬列王朝光是餓死黎民百姓就達四千萬之多。人民生活的窮苦和悲慘，就不用細說了。林彪在「五七一工程紀要」裡面所講的，所謂「國富民窮」的話，實際上不過是「國空民窮」而已。相反的是，在任何一个馬教國家，由馬列惡教所屬行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恰恰又是一批又一批惡教掌權者們完美無缺的「私有制」。

這個層層權力集團「予取予求皆自得」的腐爛生活方式，特別是毛澤東的荒淫無恥生活，亦早已為他提供了鐵證。即便是毛死之後，中共惡教政權雖為自救而要推行改革開放，但他們只改經濟、不改政治的結果，就仍然使他在馬列教權統治的這張底牌上，將經濟改革推向了仍然要由惡教專制權力操控發展的邪路：因為要讓一些人先富起來的結果，就是讓當朝掌權的馬列子孫們，立即暴發式的、並且是瘋狂地富裕了起來；要讓沿海一帶先富起來的結果，卻是製造了廣大內地民眾的持續貧窮和無限怨恨，從而為「亂世」的到來，積累了無窮的**惡性造反力量**；要學滿清西太后和俄國斯托雷平式的「一手厲行政治鎮壓、一手放縱經濟改革」的結果，就是官場腐敗和社會腐爛的迅速擴張，直至將世道人心推向了幾要永劫不復的境地……。中國大陸無數民謠裡面所唱的，實在都是這家洋教政權在覆亡前的絕唱；中共官員們個個都要瘋狂貪汙「留後路、謀出國」的「崩潰前大逃亡」景象，確實已經能夠證明這家洋教朝廷的「來日無多」了……。

四是採取文化迫害的手段，無情地剝奪了中國人民的文化權。就像我在前面所講的那樣，他們首先是剝奪了我們中華民族傳承自身民族文化的權利，同時又剝奪了我們中華民族在求發展的歷程中，要求借鑑和學習西方現代進步文化的權利。然而，這還不夠，由於他們既擔心「本民族的封建文化和外來的資產階級文化」，終究會戰勝他們的馬列文化；又擔心本土所謂「小生產的汪洋大海」所必然要創造的資本

主義文化，最終會淹沒他們的惡教文化；所以，他們就在「獨尊惡教、殺盡百家」的前提下，利用他們已經奪取的全部國家權力，來強行地培植馬列惡教文化。非但將「歌頌惡教思想」，強行規定為一切文化藝術所必須表現的內容，而且為惡教製造出一套又一套的「文藝理論」，用來限制文化發展，特別是指導文藝創作。最典型的，就是由中共按照馬列思想，規定創作主題，劃定創作內容，制定創作方法，配合政治運動。逼迫文藝家們寫他們所需要的，卻是讀者不需要的；強迫文藝家們寫假的和不熟悉的，卻不准他們寫真的和自己所熟悉的。根據列寧所制定的「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這樣一個專制文藝模式，在將全中國的出版事業都迅速一統到中共的絕對統治之下以後，甚至在「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的「最高指示」下，他們豈但剝奪了人民的全部出版權利，而且動輒批判文藝作品，鬥爭文藝家，不斷地在文學藝術界發動連續的和神經質的政治整肅運動，把一批又一批的文藝家鬥得七顛八倒，死去活來。於是，製造文字獄成了家常便飯，害死文藝家成了理所當然，利用文藝界發起政治鬥爭尤為駕輕就熟。只需瞭解一下中共文壇皇帝周揚臨死前的懺悔，聽一聽他那一句「魯迅若是活到今，天安門前等殺頭」的無限感慨，便可以因其一言而瞭然於胸了。如此，一大批在1949年以前就曾創造出傳世之作的大文藝家，從此心神枯竭，只能靠講假話、寫假作品來遮擋政治風雨，以求活命——茅盾、曹禺、巴金等等，個個如此；而一批又一批在1949年以

後才成名成家的文藝家，就更只能先做成「專說假話並善於欺騙」的當世壞人，才有可能成為馬列王朝的文藝大師。這就是在毛澤東時代，既產生不了真作品、又產生不了真作家的原由；又是中共改革開放之後，既不可能產生真正大作品和大作家的原因；更是馬列王朝 50 餘年，豈止是文化文學成就絕然不能與民元之後 38 年稍稍一比的歷史來由，又是在「中共洋務運動時代」，竟然產生不了「滿清洋務運動時代」那些真正敢於揭露官場社會腐敗之真作品和好作品的歷史由來。

五是以「非道德」進行道德迫害，剝奪了中國人民的道德權。而所謂道德權，就是講道德和守道德的權利，就是中國人民信守基本民族道德和普遍做人道德的權利。但是，自從馬列惡教入侵中國、占領中國之後，馬列子孫們就強行地用階級觀和鬥爭觀，壓迫和取代了我們固有的道德觀，更用常規的學馬列、用馬列、特別是頻繁的政治運動，不僅將中華民族的民族道德，和標識了近現代文明發展的人文道德破壞殆盡，而且使用無處不在的專制權利，將其不講道德的馬列惡教，及其獨家的階級文化、鬥爭文化和專政文化，一步一步地灌輸進了中華一代又一代的人心。什麼「什麼藤子結什麼瓜，什麼階級說什麼話」；什麼「老子革命兒造反，老子反動兒混蛋」，什麼「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其樂無窮」，什麼「愛不愛，階級分；親不親，線上分」……實在是將幾代中華兒女，變成了不得不「嗜鬥如命」的馬列子孫，人人嗜鬥的「政治動物」。王若望先生那一句「我們人人心

裡都有一個小毛澤東」的名言，確實將一個被馬列惡教施行過「血腥洗禮」的古老文明民族，變成了宵小遍地，賊鼠滿屋的「鬥爭天地」；連大學、研究院和作家協會也處處可見嗜鬥如命的「流氓無產者」。毛澤東那一句「向來被認為是流氓、地痞和惡棍者，才是最堅定、最徹底和最勇敢的革命」的馬列流氓革命哲學，居然就在他親自移植中國的馬列王朝裡，成了馬列革命的道德經典。否則，我們便不能理解，「以鬥為綱」竟然就能在毛澤東統治的近 30 年間，使無數的家庭變成了父子妻兒進行階級鬥爭的戰場；否則，我們也就不能理解，在中國大陸每一個有著黨委書記的單位裡面，為何直到今日，都還在「年年鬥、月月鬥和天天鬥」；否則，我們同樣不能理解，為何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所帶來的，竟然不是「衣食足而禮儀興」，而是「道德的全面淪喪和社會的極端腐敗」？猶如國人所痛言的——「道德底線的全面崩潰」？有人總愛將這一切歸結為中華民族的劣根性，和我們民族文化的劣根性所致，就像大陸歷史電視劇在表現宮廷鬥爭時的那些「無比精彩情節」，不過是將馬列王朝的無休止惡鬥及其惡鬥的「殘酷技巧」，強加給了我們的中華古人罷了。其實，我們的祖宗實在是沒有這麼壞！其實，這一切都實實在在地由馬列邪教的劣根性和馬列文化的劣根性所造成，所光大！我們的先人和祖先，何曾發明過這樣一些「以鬥為命」的極端、而又無時無處不在的殘酷文化啊！我們的核心文化，就是一個「仁」字啊！

朋友們，正是因為馬列將我們中國人民的思想權、政治權、經濟權、文化權和道德權剝奪殆盡，所以，豈但民國創建之後 38 年間，大陸人民所曾享有的思想、信仰、文化、新聞、出版的自由，被全部剝奪，而且，民國之前數千年間，我們歷朝歷代人民，特別是歷朝歷代知識份子所曾享有的，相當自由的思想權、信仰權、文化權，亦同樣被剝奪殆盡。不必從現代的民主思想出發，退一萬步說，就是從中國上古時代就有的，意在維護君權的民本思想來說，中華古人提倡的是「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但馬列子孫們做的，卻是「馬為貴，中華次之，民為賤」，甚至是「洋教貴，中華為賤，民可殺」——只因馬列及其子孫在中國的反動，確實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所以中國人民所遭遇的，就實在是萬古一劫了！

但是，中華民族、中國人民所遭遇的這個「萬古一劫」，究竟使我們的民族，我們的國家，和我們的人民，遭遇了那些最為可怕的危害呢？因為，我們也只有將馬列對中華所造成的最可怕的危害，有了真正明確深刻的認識，才能使當代中國曾為馬列所毒害、毒化的最廣大人民，特別是知識分子們，對「不是中華要驅除馬列，而是馬列禍害了中華」這個鐵一般的事實，產生最為痛切的認同，更因為「冤有頭、債有主」，才能對馬列真正地同仇敵愾起來，才能夠凝聚起「非驅除他不可」的民族決心和民族氣概。

二、中華民族民族精神喪失的四個表現

中華民族、中國人民所遭遇的這個「萬古一劫」，究竟使我們的民族，我們的國家，和我們的人民，遭遇了那些最為可怕的危害呢？因為，我們也只有對馬列為中華所造成的最可怕的危害，有了真正明確深刻的認識，才能使當代中國曾為馬列所毒害、毒化的最廣大人民，特別是知識分子們，對「不是中華要驅除馬列，而是馬列禍害了中華」這個鐵一般的事實，產生最為痛切的認同，更因為「冤有頭、債有主」，才能對馬列真正地同仇敵愾起來，才能夠凝聚起「非驅除他不可」的民族決心和民族氣概。

如果對我在前面所講的作一個簡單的總結，那麼，這第一個可怕的危害，就是造成了對辛亥革命的真正反動和全面反動，造成了已經在「走向共和」的真正新中國——中華民國，遭遇了持久的、全方位的專制復辟和封建復辟，甚至遭遇的是——對中世紀歐洲宗教專制極權統治的全面復辟和「創造性復辟」。

這第二個可怕的危害，就是造成了我們這個歷史悠久的文明文化之邦，既被殘酷地阻斷了對自己民族文化的傳承，又被強行地阻隔在精神和物質早已飛躍進步的世界之外。說到底，就是共產黨用馬列文化取代了中華文化；用馬列專政幾乎坑滅了中華的優秀文化，甚至用馬列的思想「創造性」地將中華落後文化，發展到了壞的極端。

這第三個可怕的危害，就是造成了晚清腐爛局面的全面重現和極端發展，造成了革命的極可能爆發，和惡性造反局面的完全可能出現。使我們的祖國大陸完全可能出現「天下大亂，人民遭殃」的極其恐怖局面。

這第四個可怕的危害，就是中共一手造成了現代中國長期分裂的痛苦現狀，而當代中共對少數民族的強暴統治，兩手統治，和當代中國社會已經處於革命前夜的實際狀況，又為中國更大的分裂，製造了可怕的「機遇」和「前景」。

這第五個最為可怕的危害，就是在馬列對我們中華民族、中華中國、和中國人民的所有僭奪、篡奪和迫害中，所造成的，最集中、也是最具深度的禍害，也是我今天要特別強調的和詳加說明的，就是中共長期的思想政治摧殘，造成了中華民族民族精神的可怕喪失。因為這個可怕的喪失，實在與中華民族的命運和上述四個可怕問題的解決休戚相關。這才是我暫且不談上面四個危害，而單單要講這第五個最可怕危害的原因。

1. 民族意識的喪失

首先，如我前面所說，由於馬列僭奪了中華民族的族權，特別是民族傳承的權利，所以，1949年以後的幾代中國大陸人，也就對自己到底是「何族」之人，豈但是變得不清不楚起來，而且由於「言必稱馬列、書必證馬列和事必奉馬列」，而使得舉國上下都變成了馬列黨族，而非中華民族了！

比如，過去我們中國人，在講到自己的族譜之時，總喜歡說三皇五帝、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直到孫中山和蔣介石，但自從中國出了一個馬列子孫毛澤東，自吹是「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之後，我們中國人，在講到自己的族譜之時，就非但不再提自己的老祖宗，竟反而口口聲聲地說起什麼「馬恩列斯毛」、甚至是「馬恩列斯毛鄧江湖」來了，並且，歲歲年年——牆上掛的，書中印的，嘴裡喊的，便都是那幾個「碧眼黃鬚的馬恩列斯」，而且，稍有不恭，則不是批判鬥爭，就是勞改槍斃，絲毫含糊不得。更有甚者，自從中國的馬列子孫毛澤東說了一句他「死了便要去向馬克思報到」的話，於是乎，幾代中國人個個都說起「死了要去向馬克思報到」的話來。從此之後，中國人便不再有人說要向「孔子、孟子、秦始皇、漢武帝，特別是孫中山先生去報到了」！也就是說，那個不要祖國、祖國也不要他的馬克思，雖然連死了，也不能「屍歸故土」，卻成了我泱泱五千年華廈民族的祖宗，並且我們人人死了，都要向他去報到！這些話，認真說起來，既會令人吃驚，也會令人發笑。然而，一驚一笑之餘，當真就不能痛感到中華民族民族意識的喪失之哀嗎？

因為——中華民族儼然成了馬列一黨之族，中華兒女竟然只能去做馬列黨族的子孫了！

正因為如此，即便是到了 1989 年「六四」中共大屠殺前後，才會不論是在反對官倒、腐敗的遊行隊伍裡，還是在抗議中共天安門大屠殺的憤怒洪流中，伴隨著人們撕肝裂肺呼

喊的，竟然是共產黨專門用來號召共產革命和消滅中華民族、顛覆中華中國的「國際歌」。那一句「英特勒雄耐爾一定要實現」的嘶叫，實在將這一場中國人民要求中共北京洋教專制復辟政權實行民主改良的運動，變得不倫不類。

如今，由於中共的胡總書記又在會見古巴的馬列子孫卡斯特羅之時，說他一定會「將社會主義堅持到底」，所以，今天的中國馬列黨族，還是會「馬恩列斯毛鄧江胡」的繼續傳承下去。僅此可見，今日華夏，究竟是「中華後裔」，還是「馬列遺後」，難道還有什麼看不明白的嗎？

歷史和現實都曾痛切地告訴過我們：元人滅宋，便不給漢人知道唐、宋；清人滅明，便不許漢人知道宋、明；50年來，只因馬列及其子孫當道，我們豈但已經不知中華民族何族，甚至連自己的祖宗是誰，祖宗的牌位應該放在哪裡，祖宗的思想、文化和傳統是什麼，我們不僅不知道，而且連想都不會去想一想了！如此看來，我們的中華民族是不是已經像是滅亡了一樣呢？

特別是1989年之後，在中共的陰陽兩謀之下，中共在大陸的御用文人，混跡海外的中共民運特務，「中國不要、卻偏要中共」的「中共民運人士」，和少數豈止是不解歷史、甚至是缺少起碼中國歷史文化教養的狂妄之徒，在他們明地、暗地製造的一波又一波的「倒孫」惡浪中，連孫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勝利之後曾去朝拜南京明孝陵的事，也成了他們攻擊的藉口。我們姑且不說孫先生此舉確有告知祖宗「漢民族

業已光復」的意義，和他因坦誠而別懷的心緒^{註9}；姑且不說孫先生緊接著就提出了「各民族一律平等的」的民族大綱，以期能夠建立一個對外對內都能夠名副其實的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單就孫先生祭拜的祖宗，既不是美利堅的華盛頓，也不是不列顛的維多利亞女皇，當然更不可能是馬克思、恩格斯或新沙皇俄國的首任教主列寧，而只是我們中華民族地地道道的祖先——這樣一個事實而言，這個在少年時代就曾漂洋過海去西方求學的民主革命家，他起碼還不是一個「背祖忘宗之人」吧！他起碼還自認是中華民族的一個後代子孫吧！然而，當中共已經有能力奪取整個中國大陸的江山，已經有能力建政、「建國」，已經有能力將國號從他的「工人階級祖國」——蘇維埃俄國欽定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改成蘇聯社會帝國主義「衛星國」的統一國號模式——「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時，劉少奇在建國前夕，毛澤東在建國之後，急急忙忙趕著要去恭恭敬敬朝拜的又是誰呢？當然不是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更不是孫中山先生，乃是那個與我中華有著世仇大恨的俄國兩代新沙皇、馬列黨族的兩代新族主和馬列惡教的兩代新教主——死了的列寧和活著的史達林！

應該說，我們幾代生活在中共這個外來惡教政權殘暴統治下的中國人，由於無可奈何的膽怯、恐懼、麻木和無知，已經使我們連喪失了起碼的「民族意識」都不自知。但是，一個真實、有趣而又令人為之一震的故事，卻使得本講演人曾為之一驚，甚至成了我這部講稿的真正由來。那就是僑居

紐約的一位華僑、也是一位著名報人李勇先生的故事。幾年前，當他隨團訪問大陸，並被中共浙江省領導人宴請時，只因一位省委書記的秘書在向他敬酒時曾對他說：「你就是李勇先生，久仰久仰，我讀過你在海外發表的文章……。不過，有些反華的文章還是不要再寫為好，我們都是中華兒女嘛……。」

誰知道這位李先生倒真是一個橫豎不怕、敢愛敢恨的中華兒女。當時，他竟然攆下酒杯，對著這位中共的秘書大聲喝道：「誰反華了？你才反華！告訴你，我才是中華兒女，你才是馬列子孫！反華的是你，不是我！是你們占了我們的中國，殺了我們的父母兄弟，我們這些真正的炎黃子孫才被迫逃到了海外……。」言罷，差一點當眾便把馬列子孫用來「統戰」他這位海外著名中華兒女的酒桌掀了一個底朝天。

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又是一個令人震驚、發人深省的故事。李先生不過是道出了海外千千萬萬真正華僑、而非「共僑」的心聲。這個故事，對於 50 餘年來在馬列統治下的中華後人來說，是不是有點震聾發聵呢？當代中華民族民族意識的喪失，是不是造成我們民族精神喪失的第一個原由呢？

其次，我要說的是，正是我們喪失了起碼的民族意識，所以，我們才會在對國家的認同上，發生一個巨大的「誤區」。這個誤區，說白了，就是「中華不知亡國恨，歲歲猶頌馬列恩」。

因為，就像幾代中國人曾經「錯把復辟當革命」一樣，

同樣是這幾代中國人，只因為民族意識的喪失，外來馬列邪教的強行教化，中共的謊言建國和殘暴治國，才終於造成了我們對真正中華民族的中國——中華民國的極度仇視，以至我們個個都把這個中華民國罵成了「舊中國」，罵成了「壞中國」，將這個中華民族的中國看成了自己的「敵國」，還要跟著共產黨高唱什麼「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卻忘記了：「有了共產黨，才沒有新中國」，和「有了共產黨，才沒有了中華民族自己的中國——中華民國」這樣一個真理！甚至還要跟著共產黨，對馬列和馬列的子孫們山呼萬歲，卻將自己的真正敵國，一個根本就不是中華民族之中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以馬恩列斯毛鄧江胡為其族譜的假「共和國」，假中國，當成了自己的祖國，直到被那個洋教和惡教在中國的子孫們糟蹋得夠了，仍然不能自省！甚至能比「五胡亂華」歲月那些「漢兒傍得胡兒睡，便以胡兒傲漢兒」的漢奸們猶過之而無不及，竟然是「漢兒學得馬教惡，便依馬教殺漢兒」了！

雖然，到了 80 年代中期，一是因為反思的必然，二是因為偶然的機緣，使得中國大陸知識界終於開始了對中華民國歷史和歷程的反思，而且成果昭彰，對人民的歷史性覺醒即革命性覺醒，功莫大焉。但是，在海外，由於一些所謂的人士們對於中國大陸人民的痛苦歷史反思毫不知情，也不想知情；由於一些人本來就是馬列的直系子孫或「另冊子孫」，屬於「馬列和共產黨不要的，而非不要馬列和共產黨」的；

更由於一些號稱搞民主的人，對自己故國的現代歷史非但絲毫不知，而且腦袋裡面裝滿了的，又全是馬列的邪惡思想和中共藉以編造歷史的謊言和假話，所以，雖然歷經了將近 20 年反思現代史的大陸人民，正在對自己被馬列欺騙和被中共摧殘的慘痛歷史，痛定思痛，正在思考著如何才能「驅除馬列、恢復中華，匡正歷史，重建民國」，但是，在海外的某些人士們，雖然仍在領著那個「不認、不要中國的中華民國」的津貼，卻依然要將作為中華民族和中國歷史之一部份，並且是最為輝煌痛苦之一部份的中華民國及其歷史，視為寇仇。這種令人痛心的政治現象，說到底，還是民族意識的喪失所招致。而也正是民族意識的可悲喪失，才為這些反民族的所謂人士們，帶來了民主追求的巨大混亂，和民主道路的巨大偏差，從而也就帶來了他們必然的失敗現狀。

再就是好幾代中國人，既然不知道中共強迫他們高喊萬歲的「新中國」，非但不是中華民族的中國，而且是馬列子孫的中國；不知道中共強迫他們否定、批判、打倒的「舊中國」——中華民國，才是中華民族自己的中國，自己的真正新中國——所以，我們才會認賊作父，認馬列為祖宗，認中國的馬列子孫——中共，為當代中國的「萬歲萬萬歲」，直至造成了 50 年來，我們中國人「不分敵我」和「難分敵我」這一令人痛心狀態的出現。同時也造成中國境內的所有非漢民族，只因為他們受夠了中共專制統治的欺辱和鎮壓，才會忘記了他們和漢族人民乃有著一個共同的敵人——馬列——這樣一

個應該「同仇共憤」的事實。某些民族，非但沒有意識到自己和漢族人民一樣，同樣是遭遇了馬列的殘酷文化侵略和馬列子孫的種種殘酷迫害，卻將漢族，甚至是整個中國，當成了自己的民族之敵，雖然富有著鮮明的自我民族意識，卻同樣是喪失了中華民族的整體民族意識，更不知道這一整體民族意識的喪失，對於他們自己和對於整個中華民族的悲劇意義究竟有多大。從而不僅造成了中國境內一些非漢民族對中國的仇視，直至造成了他們對中華民族的反叛——中國和中華民族將要遭遇分離的危險，亦因此而橫亙在我們的前面。

至於當代臺灣獨立的傾向，其歷史的原因，就是中華民族的中國——中華民國的大陸政權，曾被中國的馬列子孫所顛覆，兩岸分裂分治。其當前的原因，雖然存在著不堪中共要「專制一統」這樣一個政治緣由；其性質，卻是政治分裂，而非民族分離。他不僅為中共所一手製造，也為李登輝及其之後一些偏激的認識和行為所造成。

2. 民族自尊的喪盡

顯而易見的是，民族意識的喪失，自然就會帶來民族自尊的喪失，甚至是民族自尊的喪盡。

民族自尊喪失的第一個特徵，就是我們這幾代人中，該有多少人，早已在共產黨的刺刀之下，被迫成為馬列思想和馬列文化統治的奴才，甚至早就成了自覺的馬列思想文化奴才。君不見，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共的各級馬列「神學院」

——就是黨校，和中國所有大學的馬列「神學系」——就是政教系，以及從小學、中學到大學各個專業的學生們，包括研究生們，由淺至深的馬列課，便是他們永遠逃脫不掉的必修課程。高考場上，擺在每一個高中畢業生面前的那一份政治考卷，這張命題虛假、充滿謊言、無聊透頂、卻又至為重要的考卷，曾在漫長的歲月裡，不僅消耗了多少青年學生的精力，而且決定了一個青年畢生的前途和命運。正因為如此，我們幾代中國人，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受到了馬列思想的薰陶和訓練，實際上則是被強行灌輸。再加上自 1949 年以來，內戰的勝利者又一再地強調要在各行各業和所有方面都要「政治掛帥」，而「政治掛帥」的第一要義，就是要強迫所有的人都要刻苦學習「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馬克思主義」，狠批自己的非無產階級思想，揭發別人甚至是父母的反動思想，並要據此而與一切反動的階級劃清界限，包括自己的親人在內……。

於是，馬列的階級、鬥爭、專政和「要與傳統文化做最徹底決裂」的種種思想理論，也就自然而然地滲透在我們所有中國人的神經與靈魂之中。1949 年以後的大陸人民，特別是大大小小的知識分子們，他們在毛澤東血腥統治的時代，甚至直到今天，都會有樣學樣地學著共產黨說「死了要向馬克思去報到」，都會心甘情願地將馬列的種種教條當成自己在生活和工作上的指導思想，都會自覺自願地在生活和工作之中將馬列的思想和理論當成鬥爭的武器，既用來在政治運動中

進攻別人，又用來在政治運動中保護自己——馬列作為一門政治宗教，早已將中國人的思想靈魂俘虜罄盡，尤其是將中國人網羅在「鬥爭和專政」的羅網裡，被迫跟著共產黨「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與自己可憐的民族鬥，人民的苦難幾乎沒有盡頭。

在文革前十七年那個真正反動、黑暗和血腥的歲月裡，千千萬萬「階級敵人」在馬列的口號聲中，被無辜屠殺和監禁；萬萬千千的知識分子在馬列的「頌經」聲中，被強迫洗腦而成了「馬列主義的知識分子」；數億農民因為要被迫走馬列的社會主義道路，只好將剛剛分到手的土地全部奉還給了共產黨做了「黨產」，等待著他們的則是餓殍遍野的社會主義的新農村^{註10}；而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學生，卻在敢於舉起屠刀、大膽斬殺階級敵人的小說、電影和戲劇中，被培養成了篤信「革命就是殺人」的馬列真理，為他們在來日的文化大革命中，從「舉起筆，做刀槍」，到「舉刀槍，敢殺人」，留下了歷史的張本。

在中共十年瘋狂內訌——所謂的文化大革命中，背誦馬列的語錄與背誦毛澤東語錄同樣重要，用馬列的思想和理論來引導「革命的大批判，大鬥爭，大破壞，甚至是大屠殺」，俱成為響噹噹的「革命造反理由和革命造反現實」。無數的中國知識分子和普通人民，不是在馬列語錄震耳慾裂的嘶喊聲中，就是在毛澤東尖銳呼嘯的語錄歌聲中，被批判，被鬥爭，被嚴刑拷打，被殘酷殺害。由馬列主義教導出來的，渾

身充滿著「階級專政」神經的紅衛兵和造反派們，特別是共產黨的「紅二代」們，就正是在人民用鮮血凝結起來的「血色浪漫」裡，練就了一身鬥爭和專政、陰謀與狠毒的本領，準備著來日接班革命，繼續做一個真正的馬列子孫，做一個勇敢「捍衛馬列祖宗和保衛共產專政」的「好男兒」……。

即便是到了改革開放，也就是中共推行「專制改良」的時代，凡是思想政治文化略有開放之時，便有馬列思想和理論的干擾反對；即便是出現了一些想掙脫馬列框框條條的共產黨人，真正想重新振興中華；就一定會有「左王馬棍」跳將出來，要求將振興中華重新納入「馬列的思想政治軌道」。1989年的屠戮京城，說到底，中共用的還是馬列的屠刀在繼續對中華兒女實行著血腥的民族鎮壓……。

中國大陸的人民，正是在中共的馬列專政之下，在中共發動的一次又一次政治運動中，將馬列的思想理論，化成了自己的血和肉，終於任由馬列盤踞在自身的靈魂之中。已死的，雖然隨著自己的馬列靈魂走進了棺材，至死也沒有覺醒到自己原來竟是一個馬列子孫，而不是中華兒女。未死的，當共產黨為自救而推行的「洋務運動」，不僅將經濟搞活了，也把人心搞活了，甚至已經將偌大一個中國大陸搞得人人都要「向錢看」之後，仍然還是有許多人，非但不能逃脫馬列思想和行為的羈絆，甚至還在自覺地運用著馬列的思想、立場和觀點來認識中國的現狀和前途。直至今天，社會科學界的學者們還是要在自己的著述中，講演講話和表態中，有

意無意，甚至是虛假地聲稱自己還是在遵照著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觀點或立場。一些知識分子，雖然因為歷史真相的被揭露，已經否定了史達林；還因為前蘇聯及其共產黨政權的崩潰，而不得不否定了列寧；但是，他們卻不願意否定馬克思主義，甚至認為馬克思主義還是好的，或馬克思主義裡面有好的思想內容，只是給中國的馬教和尚們，將馬克思主義的「經」給「念歪」了。海內外有一些民運人士，甚至用馬列的思想理論，去反對共產黨，來和自己陣營中的歧見者論戰，自稱自己就是一個堅定的馬列主義者，誰要是在他的面前說了反對馬克思主義的話，他就會與你紅臉。在海外某黨成立的大會上，就有朋友捧出一大疊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來證明自己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來指斥對方根本就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國內幾位老知識分子寫信給我，對於我的思想和著述表示了完全的肯定，但他們還是悲哀地告訴我，他們這一輩子都不能像我這樣，徹底地否定馬克思主義，因為否定了馬克思主義，就等於否定了自己的一生，他們話中所深含著的淒涼，曾令我感到十分地痛心……。

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為馬列的思想、理論、觀點、文化、立場和原則，也就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切「歪理邪說」，早已盤踞在我們中國人的靈魂裡面，浸透在我們的思想活動之中。一句話，非下死勁切割，非下決心清洗，非下大功夫學習自身的優秀傳統文化和西方近現代的政治文明，就同樣只能帶著馬克思主義的破碎花崗岩腦袋去見馬克思了。這絕不是一

個人的悲劇，而是我們整個民族的悲劇，是由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史達林主義所武裝起來的那個外來政黨——中國的共產黨，為我們的民族所造下的深重罪孽。

今天，當歷史已經走向了 21 世紀，當我們的人民已經在馬列主義之幽靈的纏繞下，就要真正地和完全地掙脫馬列、覺醒起來的時候，共產黨，這個已經貪汙成性、腐爛頭頂的黨，這個早已經享受夠了「資產階級、封建階級和帝王將相」們的奢華生活，這個早已和正在將自己的父母子女以及太多搜刮來的金銀財寶，轉移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去的時候，他們在國內，居然還在用人民的血汗，加強著「馬克思主義的基礎理論建設工程」^{註 11}；還在下著一道又一道的指令，命令他們的層層馬列子孫集團，要敢於迎戰和鎮壓一切正在反對馬克思主義的當今「異見」人士們，要將他們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資產階級精神污染」，甚至是反對「民主憲政」的馬列「黨性原則」，頑固堅持到底。

半個多世紀來，正是自覺的馬列子孫——出賣了我們民族的中國共產黨，才一再地用刺刀和鮮血強化著他們必定破產的馬教思想統治，將那個被迫東渡的「幽靈」強行塞進了我們中國人的靈肉深處^{註 12}。而被迫的馬列子孫——我們千千萬萬的普通中國人，卻在長期被馬列思想窒息的痛苦歲月裡，被迫丟棄了中華民族的優秀道統思想，中華民國的艱難民主追求，非但成為共產專制的痛苦奴隸，而且成了馬列思想的自覺囚犯，並因此而喪盡了自己的民族自尊。因為我們雖然

總是自稱「擁有著五千年的文化文明」，卻偏要聽憑共產黨從德國找來一個反動的大鬍子——馬克思，從俄國找來一個血腥的小鬍子——列寧，來做我們中國人的祖宗；甚至找來前蘇聯那個殺人魔王——史達林，公開稱他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父親^{註 13}。50 多年來，中華兒女們，竟然聽憑中國的共產黨「獨尊馬列，殺盡百家」，並且甘守思想奴隸之份，拒絕回歸中華之魂，在馬列長達百年的思想文化侵略和思想文化專制之下，雖然看上去沒有亡國，卻在實際上已經亡魂亡族，這不是民族自尊喪盡，又是什麼呢？當這一頁令我們整個民族痛感羞恥的血腥歷史終於翻了過去之後，我們中華民族的後世子孫又將如何看待我們，記錄我們呢？

民族自尊喪失的第二個特徵，就是 50 年來，在中共製造的一次又一次腥風血雨之後，即便尚有少數心繫中華的兒孫們，並不害怕中共「以奪命來奪志」，但在馬列的強勢思想文化侵略和專政之下，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地都成了馬列主義者，有的甚至成了「堅強的」馬克思主義者。所以，在馬列精神鴉片的作用下，既能夠積極地批判中華優秀文化，明確地否定「西方資產階級文明」；又能夠積極參與中共的「批判、鬥爭、鎮壓、造反、抄家、破四舊、批林批孔」之種種「革命行動」，以助共為虐。但是，由於正派的做人本能，傳統的文化本能，和對進步追求的為人本能，一旦使我們對中共的種種倒行逆施心存疑惑，甚至是心存反感，直至因覺醒而要大膽地向中共這個殘暴的專制政權挑戰之時，由於我們早

已失去了對馬列罪惡實行批判否定的思想文化能力，也就是手中缺少批判否定馬列之堅實有力的思想武器，心中缺少應有的傳統文化根基和進步文明素養，我們便只能夠在馬列惡教的「十八般武器」中，去尋找敵人的槍炮來與自己的敵人作戰。也就是說，有了批判的勇氣，卻沒有批判的武器。然而，這個敵人卻是在理論上和行為上擁有著「全副馬列武裝」的中國共產黨。特別是馬列惡教的解釋權力，唯有掌權的這一家才能擁有，而絕不容許任何人擁有。所以，挑戰者自然不是敵手，甚至只能敗下陣來。就是我常說的「打著紅旗反紅旗，必被紅旗所打倒」。1949年以來，一些要用所謂的「真正馬列」，來反毛、反林、反江青「四人幫」的英雄們，他們的「成仁取義」，雖然具有極為動人的悲劇美，但是只需要掌權的馬列子孫們定他一個「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反革命罪，他們就只能夠痛苦地、甚至是英勇地在馬列子孫的槍聲中，去結束他們那「既作為馬列子孫、又作為反抗英雄」悲劇人生。然而，這正是失去了民族自尊的結果，同時也是失去了民族思想武器和世界文明武裝的英雄們的必然下場。這與歐洲中世紀那些既要反對教權統治、又要維護共同宗教教義的亡命教士們，又有什麼兩樣呢？

至於當今中國極少數心心念念仍然要追求那個「真正馬列天堂」的人士們，他們作為一家外來宗教——實際是惡教的篤信者，其執著的追求精神固然可嘉，但是，作為一個中國人，作為一個「黑髮黃皮」的中華後人，卻敢於置這一家

外來惡教對自己民族製造的滔天罪行而不顧，置這一家外來惡教對自己國家製造的淋漓鮮血而不問，我們怕也只能夠送他一個「馬列子孫」的雅號，並為他敢於「魂絕中華」而傷心難已了！

民族自尊喪失的第三個特徵，就是在中共的改革開放時期，一批既心存改革的理想、又心繫中共「紅地毯」的所謂精英知識份子們，他們在思想上和文化上，曾被迫做過馬列之奴；在短暫的思想解放的號角聲中，他們又曾懷抱過追求真正思想解放的理想。但只因中共只號召思想解放，卻不允許明辨是非；只允許解放到「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就是「馬列思想」的體系裡面去，卻不容許解放到自由民族的追求上面去，目的只是為了拯救和鞏固他們的專制權力；只因為伴隨著中共所謂思想解放之誘導的，竟然是被人民立即抓住了歷史的契機，便要實現解放自身的真正歷史要求，就是要從馬列惡教的殘酷思想禁錮中解放出去，說白了，就是要從思想解放走向民族、民權和民生的真正解放和徹底解放。於是，那一批在 80 年代因身懷改革的理想而走進了中共，或者是已經走上了中共紅地毯的所謂知識精英們，也就帶著他們被誘「偏」的理想，和他們身上還殘存著的馬列思想殘餘，及其對馬列、甚至是共產黨的「感情」殘餘，一邊雖要充當中共專制改良的思想文化先鋒，一邊卻又立即做起了阻擋人民要求真正思想文化解放的攔路石。所以，他們才會選擇了第三條道路，就是「幫助共產黨改革」的道路。他們甚

至陶然自得地認為，這「既符合中共的口味，又符合人民的利益」。所謂「魚與熊掌」，他們皆能夠「兼得」。

而也正是這條道路，使他們當中的很多人，迅速墮落成了中共專制統治集團的層層掌權人和腐敗者，和中共僅僅是要推行專制改良的思想文化先鋒；卻也使得他們當中的另外一些人，成了「不敢正面進取、只敢繞道而行」的「偏鋒」。這後一批人，雖有變革之心，卻無變革之膽。他們不敢批判和否定馬列惡教，卻在共產黨已經將我們的祖宗和祖宗的文化，批判、推倒、掃光、殺盡幾乎數十年之後，又繼承了「黨的事業」和「馬家招式」，專門對我們的中華民族和我們的民族文化，進行了又一次的徹底批判，甚至是全面栽贓，直至乾脆將馬列的一切罪惡，共產黨的所有暴行，都說成是「中華民族的民族性所使然」，都說成為「中華文化的劣根性所決定」，從而將我們的全部民族性和所有民族文化都列在必須重新打倒、掃蕩之列。毛澤東時代那種「言必稱馬列、書必證馬列、事必奉馬列」的種種肉麻景象，和「罵盡中華祖宗、燒盡中華四舊」之種種欺祖滅宗的行為，我們就不用去說他了。但是，今天，我們只需再讀一讀 80 年代以來某些「思想文化精英」一心要「歸向鳳池誇」的煌煌大作，就只能讓人感到作為一個中華兒女和作為一個中國人的羞恥。因為，他們非但不將造成當代中國落後和愚昧的痛苦現實，歸咎於馬列及其子孫的種種倒行逆施，歸咎於馬列邪教的劣根性和馬列子孫的奴才性，卻始終在洋洋灑灑地罵著中國、罵著祖

宗、罵著中華民族及其民族文化的劣根性，直至罵盡了中華的天、地、山川、河流、歷史和人民，卻絕不去罵那個毀壞了中華大好河山、踐踏了中華優秀文化、毒害了中華純樸民性的馬列，及其在中國的殘暴子孫們。

中共改革開放時期的某些「思想文化精英們」，為中共批准的某些「思想文化精英們」，也就是要在中共改革開放時期「混名混利」的某些「思想文化精英們」，就是這樣地在思想文化上，將自己應有的民族自尊毀滅殆盡，更積極地使用對自己民族和自己民族文化的栽贓和陷害，一方面為中共提供了逃脫種種罪行的當然藉口，一方面則在思想解放的歧途上，對新一代中華兒女進行了錯誤、甚至是罪惡的「啟蒙」。其流風遺毒，伴隨著中共對他們的「既捧又打、先捧後打，和變著法兒又捧又打又勾」，而效應廣被。

也正是他們，才將「辱罵中華民族劣根性和中華文化劣根性」的「族罵和國罵」，帶到了海外，帶到了海外民主運動的陣營之中，甚至造成了一個「隱性中共民運陣營」的出現，直至在一個很長的時間裡，成為 1989 年之後海外民運的「主流」。於是，一場批判否定中華民族和我們民族文化的共產文化改良運動，竟然就在思想無限自由的海外世界，「舊帽翻新」式地變成了「反對革命、乞求改良，鼓吹分裂、漫罵統一」的「嶄新」思想文化武器，從而在中國人民再一次追求民族解放、民權解放和民生解放的萬難道路上，自亂了神志，自毀了陣腳，銳減了戰友，增強了敵營，直至在海外

造成了一派否定中華民族、卻不否定共產黨；否定民族文化、卻不否定馬列邪教；敢於大罵中華奴性；卻不敢批評馬列奴才的「奇異民主運動景象」。這種種景象，自然會使我們每一個真正愛中華、愛中國、愛我們優秀中華文化的華人，只能「他哀而復自哀」而已了……。

誠如我在《誰是新中國》一書中所說的那樣，雖然說到底，這不過是一種「助共改良」、而不是「為民變革」的思想和文化，說了「保共改良」，也絲毫不能為過，但卻將中華民族民族自尊的長期喪失，推向了就要徹底喪盡的可怕境地……。

至於今天那一塊已經掛遍了中華大地的「無字招牌」，那讀來讀去便都是「洋人與狗，可以入內」的八個大字，又該將我們中華民族的自尊心糟蹋到了何等令人心酸的境地。就不說那些拚命要做「世界公民」，卻絕不要做「中國國民」的某些「愛國」者們——他們今天正在和馬列邪教政權勾勾搭搭、眉來眼去的「動人情景」了。而那些常常要被某些人掛在嘴巴上的「大中華、大中國、五千年文明歷史、21世紀是中國的人的世紀」等等，無非是他們在「心靈空虛時」和「中共需要時」，才會表現出來的一番「虛驕」和「虛假」罷了。

3. 民族信心的破滅

民族信心破滅的第一個標誌，就是中共用「奪命以奪志」

為手段，消磨了我們中華兒女理應推翻中共馬列王朝的血性和志氣。因為，50 餘年來，中共在使用「奪命以奪志」的決心上，實在是從來也沒有動搖過。雖然時弱時強。但是，任何時期，只要誰敢於真正向他的馬列王朝挑戰，只要誰真正敢於向他們這些馬列子孫挑戰，甚至只要被他懷疑是在向他挑戰，哪怕是在向他表忠心、卻又被他懷疑，他都會使出「奪命以奪志」的絕招，毫不含糊，也絕不手軟。毛澤東時代的血腥統治就不去說了。1989 年春夏之交，中共在北京屠城和在全國進行殘酷鎮壓的「血染風采」，就曾又一次地證明了，「不開槍就不是共產黨」，甚至是「不用機關槍掃射、坦克車輾壓無辜學生和民眾，就不是共產黨」^{註 14} 這樣一個馬列王朝的鐵血真理。至於 90 年代後期開始的，中共對所有異見者的折磨和鎮壓，包括他對法輪功學員的殘忍迫害，也無非證明了中共還是中共，和中共為維護這家外來惡教專制復辟政權，將仍然要對中華兒女施行以「奪命來奪志」的本相。

然而，正是毛澤東及其中共對中華兒女的「長期宗教屠殺和長期民族鎮壓」，和毛澤東之後中共殺人本性雖有收斂，卻無根本改變，才造成了包括我們自己在內的無數中華兒女，因長期面對中共專制殘暴統治的淫威，而喪失了我們民族血統中敢於反抗的血性和志氣。

我在 1980 年曾發表過一篇小說《他就是軟了點兒》^{註 15}，雖然當時有許多讀者曾誇獎我寫出了當代中國人就是「軟了點兒」的悲慘人生，但是，中共文壇的領導們，也只是因為

「軟了點兒」，而不得不一邊打壓這篇小說和我那些更「離譜」的創作，一邊又要安慰我、鼓勵我多寫點「社會主義的光明面」；特別是我自己差一點點就因此而「軟了下去」的危險，則使我更深地明白了，「在馬列王朝統治之下的中國人」，之所以都「軟了點兒」的根由何在。

然而，我在這裡猶如骨鯁在喉而不得不說的是，如果誰非要將當代中華兒女這種「軟了點兒」的變態、變形人格，說成是中華民族的民族性，並由我們民族文化的劣根性所造成，那麼，我們就無論如何都不能解釋中國數千年歷史上無數的「陳勝、吳廣現象」了；甚至我們只需將民國時代那些不論是拿槍的，還是拿筆的，他們動輒就敢發動武裝叛亂，天天都敢橫罵、直罵和「曲罵」那個「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歷史事實，拿來作一個簡單的對比，我們同樣就會發現，他們是否也太「硬了點兒」呢？所以，當代中華兒女們的「軟了點兒」，也就實在是由馬列王朝的血腥統治、形形色色馬列子孫的奴才性、和馬列文化的劣根性所造成！

但是，正是這種「軟了點兒」，和一再地「軟了下去」，才在中共已經長達 50 餘年的統治下，使我們中華兒女的血性被消磨得幾乎「蕩然無存」。其後，中共雖在他 80 年代的第一度專制改良中，誘惑了、又收買了相當數量早已經不得不「軟了點兒」的知識份子，欺騙了和誘惑了一些同樣是不得不「軟了點兒」的群眾，卻更在 90 年代，如西太后和俄國宰相斯托雷平那樣，在不得不推行第二度專制改良以救命的歲

月裡，在一手抓緊政治鎮壓、一手放縱經濟改革的年頭，又使用一切「向錢看」的手段，進一步迅速地腐化了他們自己的層層知識官僚，中國的上層知識份子，以及相當數量的、特別是為專制權力所壓迫的生意人和普通人。誠如我在前面所說，在中國大陸的中上層社會，造成了一派「衣食足而禮儀崩」的社會腐爛景象。單就這一景象而言，即便要用中國歷史上因「五胡亂華」所造成的，東晉南北朝時期的政治腐敗和士人腐化相比，也都是小巫見大巫。然而，正是這種由中共所一手製造的腐爛景象，才又在極大的程度上和相當的範圍內，消泯了我們中華兒女的血性和志氣，特別是消泯了當代「士人」、也就是當代眾多知識份子、主要是上層知識份子的志氣和血性，使得中國人民對於「民族解放、民權解放和民生解放」的迫切追求，遭遇到了新的痛苦和艱難。

民族信心破滅的第二個標誌，就是中共以「奪知來奪志」，從而造成當代的中華兒女們在重建中華的道路上，迷失了方向。因為，中共不僅以馬列惡教治國，而且以流氓暴力治國，特別是他長期以來「以無知來治國」和「以謊言來治國」的愚民國策，特別是他對中華數千年文明文化的殘暴摧殘和滅絕性摧殘，實已造成了當代絕大多數中華兒女對自己民族歷史和民族文化的矇然無知。

因此，由於不瞭解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明歷史，究竟文明在何處，才造成了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無所由來。由於不瞭解辛亥革命前後近代中國的真實歷史，甚至為中共所精

心編制的虛假歷史深深地欺騙了長達半個世紀，所以，才會不懂得辛亥革命在中國數千年歷史上的輝煌意義，更不懂得辛亥之後中國人民在內憂外患之中，曾為捍衛共和、抵禦外侮，而進行過怎樣不屈不撓的殊死奮鬥。而由上述兩種無知所造成的，對自己民族和國家的無愛、無情、輕蔑、甚至是辱罵，直至毫無信心，豈但早已是另類馬列子孫們的專利，甚至早已經因馬列在思想和文化上的奴化教育，而使得一些所謂的發憤追求者，也將自己的民族和國家當成了自己的「敵國和敵族」了！

我不得不指出的是，某些從大陸逃往海外以志在追求中國民主的人士們，他們不論是在思想理論上，還是在實際行為上，所已經一再表現出來的，對中華民族及其民族文化的「毫無情意和極端蔑視」；所一再表現出來的，對馬列及其種種邪說異端的「戀情和深情」；所一再表現出來的，仍然要用馬列的思想和方法來反對中共、追求民主的種種奇形怪象；所一再表現出來的，非民族和非傳統的種種思想行為；所一再表現出來的，「只知馬列、不知孫文」，甚至是「只認馬列、不認孫文」之種種繼續要「背祖忘宗」的言行；特別是他們一定要將孫先生直到今天都仍然極富生命力的「三民主義的革命民主建國思想」，說成是「過時了」——這就不僅與 20 年代的中共唱出了同一首濫調，而且連今天因窮途末路，表面上還要拿孫文來騙取歷史正統性和歷史合法性的中共都不如了……。

就不說某些一涉及到孫文和「三民主義」，就反感，就厭煩，就不屑一顧；一提起馬列來，就會宏論不絕、雄辯滔滔的「海外民運奇觀」了。甚至是一些正在尋找希望的勇士們，少數十分正派的人士們，只因為他們對自己民族的歷史和文化所知甚少，只因為他們在思想內容、思維方式等各個方面，都已經與馬列難分難解，所以，他們才會在缺少民族自信的徬徨心態之中，依然要在馬列或馬教落難子孫們的思想裡面，去尋找當代中國民主運動的出口、道路和方向。

這些現象，一方面雖然證明馬列主義的幽靈，依然徘徊在數十年來中國人民民主追求的營壘之中，證明少數民主追求人士還沒有從共產黨的思想、感情和立場的羅網裡面掙扎出來，脫胎換骨；另一方面，則更加表明了，中華民族的某些後人們，非但「不識」孫中山優秀民主傳統的本相，而且「不認」孫中山優秀民主傳統的「心態」。這個心態說白了，無非就是「即便孫中山是正確的，我們也還是要在、和只願意在馬列或其他洋人的思想裡面，去尋找指導中國民主運動的思想和理論」。而這個心態之所以形成的根由，就是因馬列造成了我們民族自信心的可怕喪失、甚至喪盡。

著名的歷史學前輩大師錢穆先生說得好：「欲其國民對其國家有深厚之愛情，必先使其國民對國家已往歷史有深厚的認識。欲其國民對國家當前有真實的改進，必先使其國民對已往歷史有真實之瞭解。」而上述種種因為民族自信喪失、甚至喪盡，才造成的種種「民主運動景象」，實際上都是因

為對自己的民族國家毫無真實的瞭解，才對自己的民族和國家失去了真正的愛情所致。

而民族信心破滅的第三個標誌，就是中共以「奪路來奪志」，從而又一次摧殺了我們民族自信心。

然而，怎麼才叫做「奪路」呢？我先說一個我自己的故事。

1986 年的 11 月 11 日，也就是中共改革開放期間第一次學潮將起的時候，我曾在武漢大學作了一次很大規模的講演。在這個講演結束後，有很多學生都向我提了問題，而且問題都集中在所謂的改革開放上，幾乎與我講的「中國新文學的大趨勢」這個主題無甚相關。其中有一個學生竟然問我說：「你認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最大難題是什麼？」

我當時不假思索地就回答他說：「最大的問題，就是由倡導改革的黨，在改革的大道中間，壘起了一座不容我們逾越的堡壘。」

我回答之後，有一刻，我眼前那個能夠容納上千人的禮堂，居然靜寂得連一丁點聲音也沒有。但是，沒有過一會兒，就像是有人發號施令了似的，竟突然爆發出了持續的、猶如暴風急雨般的掌聲。我甚至看見那些站滿了窗臺的年輕學生，一個個使勁鼓掌的激動模樣。我知道，他們聽懂了我的話。那一刻，我忽然又為自己的大膽，擔起心來了……。

而今，已經 17 個年頭過去了。回頭一看，實在不能不說我當年的「妄論」不對。因為我當年的妄論，今天回想起來，確實是說明了一個道理——這個道理就是，正是因為中共這

個所謂的改革者，要用奪路來奪志的辦法，將一塊專制頑石橫攔在人民追求真正民主變革的大道上，所以，才會造成某些也想變革的知識份子，「只敢歧途求取，不敢正路進攻」，從而造成了方向和道路的必然錯誤，甚至是種種歧途的出現。其主要者有三：

歧途之一，就是面對著中共絕不容許將思想文化的解放，解放到對馬列甚至是毛澤東思想實行批判和否定的「正途」上去，而只想「解放到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裡面去」，同時還要堅持馬克思主義，也就是「掛羊頭」以維護其統治的思想理論基礎——馬列主義，「賣狗肉」以推行他發展「專制改良性的權貴資本主義」——以圖改革經濟，於是，我們的一些知識份子，便只敢在側面公開批判和否定中華民族的民族思想文化，卻絕不敢在正面批判和否定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從而將一場必須推倒馬列專制復辟統治的歷史性變革，又錯誤地引導向對於自己民族思想文化的再一次批判和否定之中去了。這就不僅在實際上為中共消解了罪行，為中共利用這個歧途來繼續詆毀我們的民族，愚昧我們的人民，帶來了「人賜良機」，而且也在實際上為中共專制復辟統治的所謂「合法性」，製造了歷史的、民族的、甚至是文化的藉口。此後，諸如「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有什麼樣的文化就有什麼樣的政治」，「中華文化就是吃人的文化」，「中華民族的歷史就是吃人的歷史」，「中國人啊，你什麼時候才能不愚昧」，特別是中華民族的「民族劣根性」

和「文化劣根性」這些「理論」的提出，甚至是甚囂塵上，竟導致在文學上也誘發了要尋找和表現中華民族之「劣根」的文學。一時間，表現中華民族歷史性落後、無知和愚昧的荒唐文學，竟成為一種時髦的文學潮流。這一切對於進一步維繫中共的統治，進一步打擊中華民族的民族自信心，和壓迫人民要求真正思想文化解放的急切願望，直至誤導新一代涉世不深的青年，實是起到了令人痛心的作用。

歧途之二，一是製造了一個叫做「不可取代性」的理論。因為中共在政治經濟上只允許施行「專制改良」，也就是意在維護專制統治的改良，而不是民主改良，就是絕不想改到民主制度和真正自由的軌道上去。於是，一批絕然不敢正取者便告訴國人，「共產黨是不可取代」的。也就是說，在今天的中國，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一個可以代替共產黨的政治力量，來取代共產黨的統治地位。因此，他們才認為，唯有幫助共產黨改革，推動共產黨的改革，中國才有希望。

二是進一步提出了「共產黨是打不倒的」理論，甚至當一些人士因被共產黨趕到海外而要自己組黨搞民主運動之時，他們居然也在自己的「民主追求」裡，喊出了「共產黨是打不倒的」和「要幫助共產黨健康力量」的口號，從而表明了他們追求民主的本相。

三是在還沒有人提出革命的口號和理論時，他們就迫不及待地提出要「否定革命」，直至在海內外煽起了一股又一股否定革命，特別是要否定孫文革命和辛亥革命的惡流，理

由自然很「悲天憫人」——因為「革命」只會造成天下大亂和人民遭殃……。

顯而易見的是，他們的第一種謬論，是建立在中共和他們對中華民族及其民族歷史的徹底否定上的。因為他們既然已經徹底地否定了中華民族的五千年文明歷史，所以，他們才敢於嘎然一剪，就剪掉了我們的 4950 年的悠久歷史——在他們的眼裡，豈但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而且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舊中華」了！不僅如此，為了證明「共產黨是不可取代」的，他們還巴望將中華民族的未來，規定在只有共產黨當家才能存在下去——這樣一種荒誕不經的歷史預言之中。似乎沒有了共產黨，沒有了馬列的中國，中華就會亡族，中國就會亡國。卻忘記了：正是因為來了馬列、有了共產黨，中華民族才已經亡了族，中華中國才被亡了國（大陸），中國人民才遭遇了 4950 餘年都不曾遭遇過的痛苦和災難！那位「成就巨大、人格渺小」的科學家楊振寧先生^{註 16}，他的父親楊武之，就曾痛恨不已地說過：「盤古開天闢地以來，未見有如此手段治民的，禁掉所有的書，只許讀他一人的書，真比秦始皇（焚書）高明一百倍，更狠毒一百倍。」^{註 17}

他們的第二種謬論，無非是要告訴別人，共產黨有的是力量，特別是鎮壓的力量，因此，想挑戰共產黨，無異於是想用雞蛋來砸石頭。所以，對一個根本就打不倒的黨，還是識相一點，乾脆不打的好。而中華的江山，只能共產黨坐；

中國的改革，也只能共產黨來領導。他們當然忘記了，這個地球沒有任何黨、沒有任何人都會照樣轉的真理。更忘記了我們的民族和國家，雖然遭遇了馬列之難和中共之災，但是，我們的民族斷不會因此而滅亡，我們的民族也斷不會因此而無路可走了！並且，只要下決心解決了馬列惡教和共產黨的問題，只要下決心推倒了這個萬惡的共產專制復辟制度，我們就一定會有真正的和光明的正途可走！至於說到共產黨裡面，有、還是沒有健康力量，我們只能說，一切志在寧願放棄專制權力也要推倒共產專制制度的中共黨內力量，自然可以稱做是健康力量；相反，一切不願放棄權力、甚至只想幫助中共「保命」而推行專制改良者，一切只是根據中共黨內鬥爭需要而利用改革名號者，他們豈但根本就不是什麼健康力量，甚至不過是中共專制統治力量的一個部分罷了。雖然「這一部分」，共產黨倒是想要就要，想不要就不要，根本就不管他們是否還在想著、戀著共產黨，哪怕他們是在天涯海角……。

他們的第三種謬論，無非是藉否定革命，而要否定一切革命；藉反對革命，而反對「反共產黨的革命」，藉反對孫文革命和辛亥革命，而要拚命反對這個真正的「民族革命、民權革命和民生革命」的再一次爆發。因為共產黨推行專制改良的中國，真是跟慈禧太后推行專制改良時代的中國太像了！雖然就官場的貪腐黑暗而言，就鎮壓的殘酷程度而言，西太后只能自嘆不如。特別是，在今天的中國，除掉不爆發

革命，只要爆發革命，就一定是人民起來革共產制度的命，所謂「變革天命」。所以，他們才會拚命地反對革命，才會把民主革命描繪得比共產革命還要恐怖可怕，才會假裝是為了國家和人民的安寧與發展，來反對民主革命，似乎是一副「菩薩心腸」……，卻無論如何也包藏不住他們意在「保共改良」的用心和真情。

歧途之三，不敢正面否定中共的假民族主義，只敢從側面藉反對民族主義來反對中共，竟然將中共的假民族主義，批成了「真民族主義」，從而為中共幫了一個「大忙」，更為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幫了一個大大的「倒忙」。

這種危險狀況的出現，第一是證明了他們對中國的這一部現代歷史完全沒有瞭解，或者說，他們早已將中共這個勝利者精心編造的歷史，當成了真實的和真正的歷史了。這當然怪不得他們。但是，我們卻要敦促中國的歷史學者們，務要記住胡耀邦先生的名言——「要是讓人民知道了我們共產黨的歷史，人民就要起來推翻我們了」，以在你們已有的歷史反思的成就上，繼續地和迅速地作出貢獻，以使得歷史的大是大非能夠更多更快地得以澄清。而只要使我們的國人，我們的青年，特別是有志於中國民主事業的中華兒女，明辨了這個是非，認清了中共這個「共產國際中國支部」曾徹底出賣民族國家的歷史罪惡，認清了中共這個馬列子孫集團曾瘋狂「屠殺中華兒女、滅絕中華文化」的歷史罪行，就會因為「是非昭彰」，而從根本上戳穿他今日一心想操之在手的

「民族主義大旗」。雖然，揮舞這面大旗，如今竟然是他唯一能夠在國內矇騙國人，在海外誘騙華僑，對臺灣則可與分離勢力們一唱一和的唯一看家本領了。再就是，這雖然是中共最後一張有用的「王牌」，但因為他只是一張「假牌」，所以，我們才必須將他揭穿，使他不能繼續行騙。而戳穿這張「假牌」的結果，就是我們真正民族精神的恢復，和對民族主義正確認識的復歸。當然，之所以會出現對中共今日鼓吹民族主義「信假為真」這樣一種現象，說到底，還是因為我們民族意識、民族自尊和民族信心已經喪失所致。

第二、則是他們在將中共的假民族主義錯誤地認作了「真民族主義」之後，便要以批判民族主義作為手段，企圖以批倒民族主義來對付中共，甚至一邊拿辛亥之後各省宣布獨立，從而造成滿清王朝的崩潰為例；一邊又將辛亥之後革命與復辟較量階段，大小軍閥們曾張揚過所謂「聯省自治」為名；竟希望以民族分離和國家分裂的形式，來瓦解或推翻中共。殊不知，就前者而言，辛亥之後，各省宣布的是獨立，而不是分裂，只是要從滿清王朝中央政權裡面獨立出來，而不是要從中國裡面分裂出去，更不是從此不認中國，不要中國。這實在與今日海外那些要支持藏獨、臺獨人士們的背景和目的，完全不同。就後者而論，所謂聯省自治，誠如我在《誰是新中國》一書中所說，那無非是在大軍閥要用「武力統一中國」的情勢之下，小軍閥們要以「聯省自治」來「自保」而已。自治，不過是他們在口號上要「借乎潮流」罷了。這

才是 20 年代各地軍閥們提倡「聯省自治」的真正「名實」關係。然而，他卻被一些不解歷史的「精英」們，拿來作為攻擊孫中山先生、甚至是鼓吹中國應該分裂的「法寶」了。

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必須從對「真假民族主義」的辨識中，認清楚一個重要的問題，這就是在當前，「絕不能中共喊什麼、幹什麼，我們就反對什麼」。無數的歷史教訓告訴我們，中共是一個「假話說遍，謊言說盡，陰陽兩謀用精」的惡黨，如果今天我們竟仍然要根據中共的假話、謊言和行徑來一味地「反其道而行之」，還是要「遵照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教導」，「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我們將大錯特錯。今天，之所以會出現「中共要紀念辛亥革命，有人就要反對辛亥革命」；「中共要紀念孫中山，有人就要否定孫中山」這樣一些十分混亂的現象，其一部份根由，都出在這裡。因為，只要我們不能、或沒有能力辨識當今中共種種言行的真正用心，我們就不能一味地「反其道而行之」，這樣做我們就會上了他的「大當」！比如說，如果我們不能識別他要將自己打扮成「孫中山傳人」和「辛亥革命繼承者」的真正用心，不過是他要在共產革命及其政權的合法性已經崩解之時，企圖騙取歷史的合法性，於是，我們竟然因為「中共現在要肯定孫中山和辛亥革命了，我們就要否定孫中山和辛亥革命」，那豈非是大錯特錯？最近，中共先是在《走向共和》這一部電視劇中刪掉了孫中山有關「什麼才叫做真正共和」的講演，後來則

乾脆禁播《走向共和》，也就實在將他對孫中山究竟是敬、還是怕，是真想傳承、還是假想傳承的心態，表露無遺。至於他今天要高舉那一面虛假的民族主義大旗，並且將他玩得煞是好看，亦不過是要內騙國人以鼓吹所謂民族情緒，外騙臺灣海外以繼續搞他的統戰罷了。

我想指出的是，正是這些戀共、保共的言論和理論，也正是上述種種對歷史的不解，甚至是善良的糊塗，才在當今中共推行專制改良的中國，起到了再一次消磨我們民族信心的很壞作用，甚至對中華民族民族自信的復甦，進行了又一次的扭曲和破壞。特別是在一個號稱是「改革開放」的時代，將本應該是「正取」的歷史方式，活生生地又誘導向了各種各樣的「歧取」之中，從而予共產黨以喘息，予人民以迷惘，推遲了真正變革的到來，延緩了對於「和平革命」甚至是「武裝革命」的積極準備，直至將一個早已經應該到來的民主變革時代，變成了中共層層統治集團發展瘋狂腐敗和中國大陸普通民眾遭遇更加痛苦的歲月^{註18}……。

然而，使中共真正感到可悲的是：中共層層級級的官員們，之所以必須瘋狂腐敗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們比誰都更加徹底地看清了馬列王朝必然滅亡和就要滅亡的傷心景象；使我們感到十分悲哀的卻是：當代中國大陸人民雖然巴不得中共早一天垮掉、卻又害怕天下大亂的原因，就是因為對中華民族自己還能不能「從頭收拾舊山河」，喪失了自信心；至於中共黨內的所謂「改革派」們，中共的上層知識分子，和

中共遊走海內外的「自由派知識份子們」，他們雖然明知中共要垮，卻又時時要為中共出謀劃策，總希望中共還能藉改革以救命，所謂時時處處，想的做的，都是如何「歧求」而非「正取」，就是因為他們早已「自信」全無，只能將自身的名利榮辱，甚至是國家的興亡，繫於中共一身罷了。

朋友們，「民族自信」的破滅，所給我們帶來的，也只能是上述這一番令人傷感甚至憤怒的「末路」景象。

4. 民族意志的沉淪

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如果當代的中華兒女已經喪失了自身的民族意識，已經喪失了自身的民族自尊，已經喪盡了自身的民族自信，那麼，我們就自然就會喪失由這一切所形成的「民族意志」。

然而，我們中華民族存在過自身的民族意志嗎？

答曰：當然。因為，倘使我們中華民族從來就不存在民族意志，那我今天要說的，豈不是成了「空穴來風」？

那麼，什麼是民族意志？

一言以蔽之，就是由民族歷史和民族文化所凝聚而成的，自我保護心志和自我進取心志。

為什麼要說「心志」？因為，有心才能有意；有志方能有績。有意、有志，方能有志者事竟成。孔子說「詩言志」。為什麼呢？因為他認為「詩可以興、可以群、可以觀，可以怨」。就是說，學詩，可以幫助我們生發覺悟，可以幫助我

們合乎人情，可以幫助我們觀察社會，可以幫助我們瞭解百姓的疾苦和要求。而這一切，都是在幫助我們做一個可以「代民立言」的有志之人。這樣說，我們才能理解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上，學詩、寫詩的人為什麼如此之多了！中國的「詩文化」為什麼又是那樣地豐富和瑰麗了！中華民族民族意志的形成，該是有著怎樣久遠的歷史和怎樣深遂的文化淵源了！

可見我們的古人，對於心志的理解，是多麼地透徹和高遠。而心志作為中華民族民族意志產生的民族基礎，又該有著怎樣悠久的歷史了！否則，我們就很難明白：華山之下、夏水之旁的一個小部落，何以就能形成一個包攬中原的東方大國？何以便能夠逐漸地形成這樣一個磨難重重、卻又生生不已的偉大民族？何以於耶穌降生 480 年之前，孔子就已經編成了《春秋》？耶穌誕生前 100 年，司馬遷也已經寫成了《史記》？只因為我們的中華民族，在脫離了茹毛飲血之後，走向了文明發展之始，就開始有了心志，所以，我們的民族，才成了一個「有志者事竟成」的民族，才不會害怕「惡流橫空，千流倒轉」，而終能引項向前。

但是，什麼才是中華民族的民族意志呢？

根據上面所說，我們中華民族的民族意志，同樣是「一在自我保護，二在自我進取」。所謂自我保護，則表現為志在民族傳承上面；所謂自我進取，則表現在為志在民族發展上面。因為，有了傳承與發展，就不會夭折和滅亡；不會停滯或倒退。而我們中國人的一句老話，所謂「學如逆水行舟，

不進則退」，便是一句十分形象的說明。

今天，在海內外，一些有意和無心要徹底否定中華民族及其文化的所謂「人士人物」們，大概對我說的這幾句「褒獎自己民族的話」，又要「大不以為然」了。但是，事實勝於雄辯。

我們先說中華民族志在傳承的事實。

第一是在國事上

首先，中華民族不論今日怎樣挨罵，中華民族至今均不曾滅亡，這是一個事實。否則，當今的一些人士人物們，在馬列子孫將中華民族已經「殺夠了、罵夠了」之後，也就不會再「接著罵和接著殺」了，因為「挨罵挨殺的對象」，就像世界上許多同樣富有文化的古老民族一樣，已經死了。

其次，就中華民族的上古時期、也就是中華民族的「大民族形成期」而論，只因周平王是在其舅申侯勾引外敵犬戎謀殺了其父周幽王之後，才繼位為王，被眾諸侯視為篡位，所以，雖平王東遷，各諸侯國，特別是東部以魯國為首的大國，均不對他行「天子」之禮。因此，周平王號令不行。而號令不行的結果，一是因上行下效而帶來了各諸侯國內部的篡奪和亂權：自魯恆公弑兄，魯隱公自立，其後 19 年，列國國內篡權謀亂，竟成風氣。二是因列國內亂，才造成了各諸侯國之間發動征討和兼併的機遇。春秋初期，雖曾擁有 130 多個諸侯國家，卻因此月消年滅，最後只剩下了 12、13 個大國，就是魯、衛、齊、楚、宋、鄭、秦、陳、蔡、曹、燕、

吳等。上面兩種狀況的形成，對周建號以來華夏民族的發展所造成的最大危害，就是引發了遊牧部落——戎、狄、蠻、夷的乘勢侵擾。在那個時候，這些雖然雜處在華夏民族地區的遊牧部落，非但文化落後，而且崇尚武力。其中尤以北戎和自稱蠻族的南方楚國最富有，最有武力征服的力量，和最有武力兼併的野心。當此之時，正處在自亂和內亂之中的東周列國，倘使不能聯手以抗強敵，則華夏民族的存亡，特別是後來中華民族的形成，便會成為一個大大的問號。但是，華夏民族卻能夠於此時，也就是在周王室號令不行的歲月裏，因齊恆、晉文的霸業已成，而能內聯諸侯，外抗戎蠻，不單以護疆保族為心志，更能以教化蠻戎為進取。其間，諸侯霸主晉國在武力上對群戎南侵的戰勝，和華夏文化對南蠻楚國的同化（我在後面要說到），非但未使華夏淪喪消亡，卻反而使得華夏民族，因歷經春秋「抗戎化蠻」之變，而擴大了疆土，傳播了文化，更使得華夏民族為形成一個有規模的諸夏民族，華夏諸國為催生一個多民族的統一中國，擴張了疆土，傳播了文明。他「雖非主觀之想，卻成為客觀之變」。為其後大中國的統一、特別是大中華民族的形成，奠定了歷史的趨勢。千餘年之後，雖然族大國大的中華民族之中國，因東漢末年的長期混亂，三國鼎立的短暫形成，西晉一朝的政治腐敗，又一次招致了已經雜居在北中國的「五胡之亂」，不單造成了十六國相捲相生、相侵相克的國家混亂局面，而且造成了四百年之久的民族文化亂局，特別是為外來宗教文

化製造了「乘隙而入」的歷史機遇，但是，蓋因中華民族的民族之根已經穩固，中華民族之民族文化的枝葉早已茂盛，所以，隨著隋唐的統一，中華民族的中國，還是迎來了他的又一個大中華和大中國時代。歷史就是如此地證明了上古與中古時代，中華民族生成發展的「顛撲不滅」之勢。

再就是，自中古以來，中華民族又在自己的歷史上遭遇了三次外族和外國的入侵，並且當真兩次都亡了國。一是宋亡於蒙，雖然他在歐亞諸國當中為蒙古人所最難征服者，抗爭時間也最長；二是明亡於滿，雖然他亡國的真正原因，誠如滿清攝政王多爾袞所言，乃是「大清的江山並非得自大明，而是得自闖賊」。所以，漢人的江山便兩度為兩個外來的遊牧尚武民族所一統，這似乎是該罵的了。但是，惟其有著自我傳承的心志，而且擁有著足以保證傳承的優秀文化和文明，所以，大宋、大明的國雖然是亡了，中華民族豈但沒有亡，而且將亡我者同化掉了：蒙古成了中國的一個部分，蒙族也進入了中華民族的大家庭；滿人則全然為中華文化所同化。所以，我們的中華民族，我們的中國，國家居然越來越大，文化更是越來越豐富了！如果這還不能說明中華民族意在民族傳承的心志，不能說明這個心志的堅強、堅韌、及其所富有的偉大包容之心，就不知道世界上還有那一個民族比我們求傳承的心志更強、更烈了！

特別是中華民族所遭遇的第三次入侵，就是日本帝國的長期侵略和瘋狂侵略。面對這場侵略，前半期足足有四年半，

我們雖然只能孤軍抵抗，但是，面對旨在亡我中華的頑敵，中華民族意在傳承的意志豈但不滅，而且堅韌不拔。民族大義之下，那些在抗戰前和局部抗戰期間，都曾想作「壁上觀」的絕大多數軍閥殘餘們，這些在辛亥之後一直以持槍稱亂為能耐的殘餘軍事割據勢力，竟全部能夠在大敵當前、民族存亡之秋，一致團結抗戰，奮勇殺敵在前。一時間，中華民族，中國境內，除掉那夥「口喊心非」的馬列子孫們以外，可以說，無不達成了空前的民族團結，打出了史所未有的民族威風。否則，直至珍珠港事變前的整整四年半孤軍抗戰，非但無法堅持下來；就是珍珠港事變之後的三年半苦鑒苦戰，怕也是無法打得下去的。與「一個在組織、裝備和訓練上幾乎比我們要先進一個世紀」的狂敵的抵抗中，中華民國不僅沒有亡國，中華民族更沒有亡族。用美國史學家易勞逸先生的話來說就是：「要不是中華民國政府，在後來的內戰中被中國的馬列子孫打敗，從而掩蓋了他領導全民族抗戰的豐功偉績，那麼，全世界的歷史學家們都會將他領導的偉大衛國、衛族戰爭，當作一篇篇大無畏的英雄史詩來大書特書……」。所以，如果有誰還要說我們中華民族沒有意在傳承的偉大心志，我們就無論如何也解釋不了中華民族「有生無死、即死即生」的悠久歷史是怎樣形成的了！

第二是在文化上

由於企圖亡我之敵，縱使有武力亡我國家，卻沒有「文力」來亡我文化，所以，他們才會最終地敗下陣去。更因為

我們在文化上反敗為勝，而使得我們的民族不會滅亡，也不可能滅亡。因為，說到底，文化——民族的文化，才是一個民族的底氣和底力所在，才是一個民族賴以凝聚、存在和發展的「功底」。

然而，我們中華民族的民族文化又是怎樣形成的呢？或者說，我們中華民族文化形成的源頭在哪裏？他，又是依賴著一種怎樣的環境而形成的呢？因為，沒有形成，何來發展？而文化、特別是一種好文化的形成和發展，非依賴於「自由」不可。一個思想從來沒有獲得過自由的民族，要想創造燦爛的文化，實際上絕無可能。歐洲漫長的中世紀幾乎毀滅了自己相對自由的上古文明，就是這個原因。

但是，中華民族在其「大民族」形成之前，就已經開始了自己民族文化的逐漸形成。而他所依賴的便是一個相當自由的政治環境和思想環境。這個環境，就是西周一朝，特別是東周的春秋時代，以及其後的戰國時期。如果說，西周的建立，為華夏民族的形成和華夏文化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礎，那麼，春秋時期，則將西周一朝所形成的封建貴族文化，也就是史家們所說的「王官文化」，發展到了「極優美、極高尚與極細膩」的高度。特別是其後的戰國時代，更有所謂「遊士」，也就是一批有著政治抱負的平民知識份子的崛起，將貴族的「王官之學」，推向了平民的「百家之學」，進入了「百家爭鳴」的自由階段。而也正是從春秋末年到戰國時期，原來世襲的封侯建國，已逐漸地為新興的統治者或

瓜分、或取代、或霸持，從此，封建政治的嚴格等級非但已經被衝破，學術的貴族藩籬也已經被沖決，儒學的創始者孔子，便因時代賦予了他身懷抱負的自由，研究政治的自由，創始學識的自由，記史訂史的自由，講學傳學的自由，和「敬鬼神而不事鬼神」的自由，因而，才使他成為我們民族的「真自由派」、而非「假自由派」的開山學祖，和我們民族主流文化的奠基之人。比他稍後的歐洲先哲蘇格拉底，卻因為「窺探天上和地下的事物，把壞的說成是好的，並且以這一切去教導別人」，而被法官用一杯毒藥處死^{註 19}。

孔子稍後的墨子，雖曾師法孔子的儒學，卻又因他要做下層民眾的思想代表，他的反儒的思想學術，竟非但為時代所容，而且為後世所傳，甚至得以學術大宗的歷史地位，且與孔子並列為「前二子」。孔、墨「二子」之後，雖因戰國的紛亂和各國政治的自由，使得「遊士派」的知識份子們，或仕，或不仕，或倡苦行，或倡為我，或願為人養，或不欲為養，但他們都為戰國的「後三子」——也就是既有聯繫、又有對立的後三派學宗——老子、荀子和韓非子之各家學派的形成，提供了一個過渡階段。華夏民族因此而不僅形成了自身的文化體系，而且形成了自身的文化規模；不僅提高了民族文化的境界，而且結出了民族文化的碩果。可以說，秦前三代的華夏文化，終於為秦以後的中華文化，奠了根基。如同古代希臘羅馬文化，也就是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的哲學，足足影響了整個西方歷史直至今天一樣。此後

的二千餘年，無論中華民族是盛還是衰，國家是興還是亡，這個被後人稱做中華文化的我們的民族文化，均未因「時難年荒而煙滅」，亦未因「國運昌盛而虛化」，而是以他的深沉、遒勁、堅韌和綿密，非但能夠救我民族於沉溺之命，而且能夠救我中國於患難之時。也就是說，蓋因前秦三代萌發、造就、奠基了我們中華民族的民族文化，所以，中華民族才有了傳承和發展的文化力量與文化功底，才有可能歷經數千年，雖顛僕不止，卻生生不已……。

那麼，中華民族的民族文化又是怎樣傳承下來的呢？

先秦的貴族文化和貴族文化向民間文化的轉擅，特別是春秋戰國時代，我們民族文化的自由化和多樣化的形成，我就不再說了。我想說的是，在秦以後的中國歷史上，特別是在那些朝代更替之時，我們的民族文化，又是怎樣地克服了千難萬阻，而獲得了傳承的。

我要舉的第一個例子：就是秦始皇「焚書坑儒」。這是個中國歷史上人人皆知的壞事。因為秦始皇得罪的是文人，所以，他已經被罵了兩千多年，甚至直到今天，那些仍然不敢大罵毛澤東、不敢真罵共產黨的知識份子，特別是那些在共產黨統治下既「有名」、又有「自由」的「自由派」們，也仍然在用秦始皇當作他們的「出氣筒子」。就像你只要大罵西方的馬列洋教，他馬上就要罵中國的儒家文化一樣；只要你罵毛澤東，他馬上就要罵秦始皇。其實，正如楊振寧的父親楊武之教授所「罵」的那樣：「毛澤東實在比秦始皇壞

了一百倍！」^{註 20}

秦始皇確實是該罵的，但是，他該罵的地方，和他那個過於短暫的「二世王朝」，卻對中國和中華民族的文明歷史影響不大——因為，既然已經給人罵了兩千年，也就是給人「否定」了兩千年了！說明後人從來就是不認同他的，甚至只將他當成了一面「反面的鏡子」。儘管如此，倘若我們將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及其原因，以及他的具體做法，做一個簡單的說明，那麼，一些偏要用罵秦始皇來代替罵毛澤東的人，便站不住腳。因為，秦始皇焚書坑儒，起於「議政衝突」，起於以淳于越為代表的博士們「稱說詩書，引據古典，主復封建，李斯極斥之，遂牽連而請焚書」。並且這是在秦統一中國八年之後。也就是說，是因為被滅亡的六國舊貴族知識份子，也是為秦王朝所厚待的上層知識份子——博士官們，要「廢除進步的郡縣平民政治以復辟落後的分封式貴族政治」，才引發了這一悲慘的歷史事件。這是與毛澤東開朝即始便「大殺天下」所絕不可以相比的。而焚燒典籍其主要者，是「六國史記」，即「非秦記皆燒之」；其次才是「詩書古文」；其所坑者也有限制，即：「敢偶語詩書者棄市」，「百家語」不在其內；而「令下 30 日不燒者，黥為城旦」，卻未枉殺；其宗旨，則是「重禁議政，輕禁挾書」，所以，他坑的便是八年來歲歲月月都在逼迫他要復辟封建的 460 個為他所厚待的舊貴族文人。這與二千年之後自登基始便要年年殺、月月殺、天天殺，甚至要一次又一次地「引蛇出洞」，一次

又一次地要發動政治運動，以進行大規模、和史無前例之「焚和殺」的共產黨、毛澤東相比，實在是天差地別！也許，這就是秦王朝雖焚書，但「史官、博士官卻未廢，真實的著述既未中斷，漢初群臣也多有學問」的原因。當然，這又是毛家洋教王朝的一代又一代知識份子們所不能想像、所更不能相比的了！更是那些至今還在「以大罵秦始皇來維護毛澤東」的「自由派」知識份子們，所永遠也站不住腳的地方。

我之所以將焚書坑儒的事情說了這許多，目的，不是要辨識這一歷史事件，更不是要和直到今天還在對中共「小罵大幫忙」的「精英」們辯論，是因為我們只有明白了這個基本的歷史事實，我們才能對中華民族在他文化傳承中所遭遇的第一個「鬼門關」，和秦以後的中國知識份子又是怎樣才解決了秦後我們民族文化傳承的問題，作一個必要的鋪墊。因為，毫無疑義的是，正是秦始皇的焚書，才為大漢一朝「存亡續絕」我優秀的民族文化，留下了一個及其重要的歷史使命。

所以，秦後漢初，中國知識份子們所幹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通過口傳耳記，將秦以前的文化典籍，予以恢復。這就是漢代「今文今學」的誕生。其後，由於不斷地發現了秦前的文化典籍，於是，對秦前文化典籍的辨偽和註釋，便又誕生了漢代中期之後的「古文今學」。而也正是「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的相繼產生，才將許多被秦焚滅的中華文化遺產，從死中救活了過來。然而，豈但是救活，更就此又推進了民族文化的發展——董仲舒成了一位有見識有發展的大

儒，司馬遷則成了舉世罕有的史家……，中華民族的民族文化因此而得以傳承，中國先秦的進步文化典籍也因此而得以保存、傳揚和發展。

我要舉的第二個例子是：兩晉南北朝和五胡亂華時期，一方面是政治的腐敗，一方面是因民族混戰所造成的混亂，這樣，不僅胡人落後的文化曾伴隨著他們的淫亂氣質和嗜殺作風，入侵了我們的社會文化生活，而且，乘虛而入的外來宗教——佛教，也就在五胡亂華的漫長亂世之間，擴張在我們的中華，其影響之速和播流之廣，迄今尚無一家宗教能夠與他相比。雖然，他始終只是一個劇烈影響著我們民族文化的巨大旁支，卻從未成為主流，但是，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和滲透，卻是無論如何也不能輕看的。特別是他和傳統道家思想對兩晉南北朝士人風氣和性格的影響，就更是不能輕視。因為中華文化和文明那種向上的、富有創造精神的元氣，就曾在政治黑暗、佛老暢行之間，幾乎奄奄一息。但是，歷經了幾乎四百年的亂世之後，一旦隋唐統一，社會重入安定發展之時，由三百年混亂時代所帶來的，對於我們民族文化的干擾和破壞，非但只需要一句「前無古人」的響亮詩句，就能夠號召起一家「古文運動」，使詩人們擦亮了眼睛，使得南北朝的浮靡文風迅速地得以扭轉，更在文壇上起到了革面洗心式的作用。特別是唐代中期之後佛教「禪宗」的出現，就不僅是用我們自身的民族文化，對傳入中國的佛教進行了一次磨洗，而且將西來的佛教經典，進行了一次向我們民族

文化和我們民族之主流文化——「儒學」的轉型，從而使播流中華的佛教因擁懷「儒心」，而成為與中華文明相銖相透的真正中國式佛教。唐後，兩宋則乾脆在承襲唐一代古文運動和「禪宗變佛」的基礎之上，不僅否定了魏晉，而且要否定兩漢，直接把民族文化的宗源定盤在秦以前的三代之間，以重歸孔孟為號召，將代表了中華民族主流文化的儒學，信仰化、理想化、道德化和泛政治化了。於是，中華民族以宋明新儒家理學為宗旨的民族文化，便在遙遙七百年間，得到了又一次重要的傳承。

此後，元人滅宋，雖不知中華文化之貴重，卻以他們淺薄的理解，將中華文化的內容當成了政權賴以統治的工具，將漢民族文化中的政治文化，簡單地理解為「漢法」，並要「以漢法來治漢」，一方面踐踏士人的精神和品質，一方面卻又開啟了以宋註《四書》為經典的科舉考試之途，並流傳明、清兩朝。雖然對中華文化迄無建樹，卻既沒有坑，也沒有焚。經典子集，照樣在民間流傳，更在民間作為漢人的精神支柱，而得到了處處留心 and 時時在意的保存和保護。其後，明雖亡於清，但有清一朝，由於滿族統治者，一方面要全面繼承漢文化，一方面又要「留頭不留髮」的凌辱漢人，於是，知識份子中的有心志者，則為衛護和傳承漢學，也就是我們的民族文化，而鄙棄科舉，自沉於對自身民族文化的疏通和考據之中，從而將滿清一朝竟做成了整理「族故」而有大成就的朝代。

至於辛亥前後由「西學東漸」而產生的，對於我們民族的自我輕易否定，甚至是自我侮辱，卻又因為 20 世紀 30 年代的「自由中國」出現了一批對東西學皆有專長的優秀中國知識份子，他們便以既要保存我們的優秀民族文化，又要消化吸收進步的西方近代文明為宗旨，意在融合和貫通東西文化，不僅傳承民族文化有功，而且借鑑西方文明有績，做出了不小的成就。要不是事後國難年年，國亂當頭，馬列洋教因一戰而屈我民族文化、滅我民族文化長達 50 餘年之久，我們今日又何需再來重新認識自身的民族文化，並為了傳承他、發展他而痛心疾首，而大聲疾呼，甚至還要面對所謂「自由派精英們的虎視眈眈」呢？

現在，我再來講中華民族志在發展的事實。

第一還是先說國事上的發展

我要說的第一件事，就是自東周春秋戰國到秦始皇統一中國這段歷史時期，應該說是我們族史和國史上的一個極重要發展時期。因為，這個發展的動力，一是來自人民怨戰，潮流趨統。而「書同文、車同軌」等等的大進步，又對整個中國的發展有利，而非有害。二是由於戰國時期平民學術思想的迅速發展和興盛，和平民得以干預各國貴族政治的實際經驗和貢獻，才造就了為秦所頒定的：「廢封建貴族政治和置郡縣平民政治」——這樣一個在整個專制制度範圍內之「相對先進政治制度」的出現。雖然他在戰國時期就已經在楚、晉等國局部地實行過。此後 1400 年，直到明太祖廢宰相始，其

間歷朝歷代王室和政府的關係，雖然沒有上升到「君主有憲」的高度，但王室和政府的相互制約，卻使得歷代王室難以像明清兩代的皇帝所稱：「祖宗家法，乾綱獨斷」。而漢初雖然不得已而仍有「封侯建國」之舉措，但是，他只是一種局部的和暫時的倒退。因為，漢高祖雖有封建，卻不廢郡縣。此後，歷經文、宣兩帝而直至漢武帝，封建和反封建的鬥爭就一直沒有停歇過。但在歷經了 90 年「反封建和要封建」的反復較量之後，漢武帝終於以頒布「推恩令」^{註 21} 為手段，而最終地廢除了「封建」。自此，封侯建國，才成了中國的歷史，而由郡縣制所標舉的平民政治，亦終於得以穩固和發展。

我要說的第二件事，就是現在常有「精英」們說，自秦以降二千年，可以一言以蔽之，就是封建專制獨裁。但是，如果滿腦袋「洋教」的「精英」們當真也能夠虛心地瞭解一點自己祖宗的歷史和文化，就會發現，中國在政治制度上從「封建」而走向「郡縣」，固如我在前面所說，已經是一大進步；而自漢始，由皇室、外戚和軍人所組成的政府，卻能夠漸漸地變化發展成了士人，也就是由平民知識精英所組成的政府，這自然又是一個大大的進步。其後，士人政府在頻繁的朝代更替、特別是魏晉亂世之間，因形成了等級門閥制度，而至於妒才嫉能，造成平民士源的枯竭，直至必然走向腐敗和腐朽。但也正因其腐敗和腐朽的出現，直至禍國，才因隋唐的統一，而由門閥士人的專政，迅速轉變成了科舉競選。於是，一批又一批民間知識精英，便通過科舉競選，

於反掌之間，就能夠躋身朝堂。唐宋以降，該有多少好宰相出自「寒門」、甚至是「貧下中農」之家……。生活在馬列王朝的中共精英們，其實只要稍稍瞭解秦以下二千年間中國君主王朝一再進步發展的政治歷史，大約在你們不敢「小罵」共產黨的專政獨裁之時，也就不會「大罵」死去祖宗們獨裁專制的「劣根性」了。

我要說的第三件事，就是辛亥革命對我們民族的偉大發展意義。而之所以稱他為偉大發展，就是因為他愛民族，敬民權，猶惜乎民生。而且，他「愛民族」，非只愛漢家一族，而是愛我中華所有的民族。孫中山提出「驅滿」，只是要驅除滿族貴族的專制統治，而非在驅除滿族一族；辛亥革命後孫中山立即提出了「各民族一律平等和自由統一」的思想，就更是說明他的民族主義，乃是全中華民族的民族主義。而「敬民權」，自然又是他要從我們老祖宗提出的「民為邦本」出發，再將其「維護君權」的本相，引導向真正地維護民權和提倡民主；而猶惜乎民生，就更是將全體國民的民生都包容在他的民生理論之中，而絕不為某一個階級去謀生活的幸福，這就使他與任何一個被階級化了、被社會集團化了的偏激經濟追求，也就是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思想，劃開了一個鮮明的界限，從而消彌了人為地「製造等級社會」、甚至是「製造階級鬥爭」的可能。

朋友們，這個革命，這個革命的宗旨，這個革命的歷史性追求，和這個革命「作為一場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驚人革命」

註²²，他對於前朝統治集團和統治基礎的「善待」，對於我們這個老大的民族來說，難道不是發展，竟然還是倒退嗎？難道不是應該，而是不該嗎？辛亥之後，在中國所發生的形形色色的混亂，說到底，無非是進步力量和種種旨在倒退力量之間的衝突和較量罷了。中國人有一句古話，叫做「一口吃不成一個胖子」，辛亥革命作為現代中國巨大發展的一個開始，作為中國「走向共和」的開端，他之必然要遭遇形形色色反動勢力、甚至是「革命名義下之專制勢力」的反撲和倒算，就歷史發展的客觀狀態而言，也就實在是正常不過的事情。而我們今天之所以要重新認清他志在推動中國歷史發展的本質，就是為了捍衛他的成果，並為了繼續發展他的成果而努力。

這雖然又為中共一朝的精英們所反對，所痛罵，卻無疑為中華民族志在發展的心志所肯定。

第二再說文化上的發展

在舉例說明民族文化發展的幾個簡單事實之前，我以為有必要先對我們民族文化的發展做出這樣一個評價。

首先，在我們數千年文化文明的歷史上，中華民族形成並發展了一個在全世界都能夠堪稱是「最為文明開化」的「神教文化」。這是我今天要講的重點。

其次，就是在我們數千年的文化文明歷史上，形成了一個開明通達的儒家主流文化。或者說，蓋因這個儒家文化又形成和發展了「以仁義為核心的政治文化，以操守為標準的君子文化，和以自由為追求的人道文化」，所以，在各種文

化均能共存共興的中華民族的民族文化發展歷史上，儒家文化才成了我們民族文化的主流，或曰主流的民族文化。

再者，就是從我們民族的文化文明發展脈絡上來看，除掉當今的馬列洋教復辟王朝以外，我們民族數千年的文化發展，一直都在享受著相當的和相對的自由政治環境，一直都在表現著相當的和相對的自由發展趨勢，從而文學成果輝煌。

第一，我要先說我們中華兒女理當引以為驕傲的、「最為文明開化」的「神教文化」，及其形成和發展。

應該說，我們的中國，從上古時代起，就已經形成了一個十分健康和相當文明的「神教文化」，或曰「神教觀念」。這一神教文化或曰觀念，不僅成為中華民族數千年神教文化的主流，而且成為中華民族在他數千年的文明歷史上，直至1949年之前，無論興衰存亡，都從未採用過「教政合一」這樣一種極端反動體制的根本文化原由。

為什麼？因為自上古時代開始，我們的古人就只信天上的上帝，卻不祀奉天上的上帝。而「上帝就是上天」，所謂「天、帝、神」合一。而他們的統治者，就是上天的兒子，也就是「天子」。西周以下，所謂「天子祭天，諸侯祭土」，所謂「民匱於祀，而不知其福」，就是說祭天是天子的事情，而人民雖享受著上帝所賜予的福運，卻無需去祭祀祂，因為有天子作代表了。如此，既然天子已經成為上天與人民溝通的「媒介」，人間社會也就「無需任何的專門神教人員和專門的神教組織來代表天，來幫助上帝和人民進行溝通」。換

言之，就是專門為「上則加冕皇冠、下則教化靈魂」的專職教會和教士，便沒有了存在的需要。因而「教政合一」的政治體制，也就失去了他建立的宗教基礎和社會基礎。如此一來，我們古人眼裏的「天下」，便是由「上帝、天子和人民」來共同組成的；而宗教，不過是天子對上帝的一種「祭禮」，沒有那麼重要。這是其一。

其二，春秋末至戰國初，隨著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術的誕生，成形和發展，又正確地傳承了和大大地發展了我們古人的神教文化，從而根據實際的人間生活，逐步地和開明地調整了「上帝、天子和人民」之間的關係。如果說孔子因認識到「天道遠，人道邇」，而更加重視生命、人生、國家和社會，那麼，他進一步說出的「敬鬼神而遠之」和「祭神如神在」之類的話，則說明他對現實人生的思考，已經更加地占據了他的視野和胸懷。而由鄭子產轉述的《泰誓》裡的話——「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則將上帝和人民的關係進一步地拉近了，「合一」了。所以，孟子才會說出「民貴君輕」的話，甚至更進一步地說出了「保民而王，莫之能禦……推此心足以保天下」的話來。如此，「上帝、天子和人民」的關係，便被逐步地予以了調整。而調整後的關係則是：上帝既要聽人民的聲音，上帝還要考察他的兒子——天子，是否能夠「保民而王」，如果不能，他就會發出革命的號召或命令，也就是「變革天命」，亦所謂「皇天上帝，改元闕子」了！

到了漢代，由儒家學術所提出的「天人合一」理論，「五德終始」理論，已經認為上帝會用「災異示驚」、直到要用「變革天命」來更替不能「保民而王」的天子和朝代。東漢光武帝開元的帝號取名為「更始」，便是由此而來。他不僅對「要遞萬世而為君」的家族永久獨裁思想予以了否定，在理論上建立了「為保民而能夠、甚至是必須改朝換代」的合理性；而且，由於改朝換代的命令乃是「天命」，其過程才是合理的、自然的和必然的，所謂「天命難違」。因此，在中國，宗教便不是這一變革天命的動力和權力所在，這就使得可以乘變亂而發展的宗教，卻不能於變亂之中獲取正宗的權力，因而，也就沒有可能成就「教政合一」的宗教專制統治。這與西洋因宗教左右政治，由宗教來左右變革，甚至形成千年「教政合一」或「教政聯合」之極端反動的歷史相比，中華民族之神教文化，及其發展的進步性，就更顯得開明開化了。

其三，由於中國古代的主流文化，逐漸地朝著「視上帝於無形」和「上天更愛人民」這樣一些思想和要求發展，所以，從總體而言，我們的古人也就愈加地「重人道而輕神道」。而「重人道卻輕神道」的結果，則是「重學術而輕宗教」。春秋以下，因重學術，而重師道；因輕宗教，而輕教道；即便是懷有一定的儒家理想，卻又要廣布神仙迷信的漢代陰陽家們，就算他們自己已經「得道成仙」，卻也樂意被人尊稱為「天師」，一般的傳教者，卻只能被稱為「方士」或「道士」。所以，中國才會有所謂「師道尊嚴」的傳統，而無「教

道尊嚴」的傳承。因而，在中國，宗教要想爬上比「師道」還要尊嚴的地位，甚至要爬到「天子」的頭上，以教權代替王權，更由教權來加冕王權，從而形成「教政合一」的極端專制體制，也就更加沒有了可能。何況，在古代中國，不論是儒家，是陰陽家，還是後來的佛家，蓋因中國人重學術而輕宗教，即便是宗教，也常為知識份子當作學術而予以研究，因此，各派學術乃至宗教，都很難成為一個嚴密的人間組織，只可能成為一種鬆散的社會集團。一旦命逢亂世，即便有人要利用宗教思想來建立嚴密的「宗教組織」，以實行政治造反，則只要「天命已改」，這一類旨在造反的嚴密宗教組織，也就如鳥獸散了，即使餘波流連，而漣漪終會消失。所以，一些企圖「政教合一」的民間造反勢力，雖能於亂世之間得以短暫的存在，甚至是迅速的發展，卻既不能維持長久，更不能成為正統，只是造成了一度的紛亂而已，對於撼動舊王朝雖然有利，對於建設新天下卻枉然無功。就不要說是在當代了。

其四，中國的神教文化起源於上古，初成於春秋末季，在戰國時期基本上已經「成形」，也就是已經形成了他自己的傳統特徵。如果我在前面已經敘述了這一傳統神教文化特徵的形成，那麼，必須進一步說明的是，正是在春秋戰國，中國文化、包括神教文化的形成期和成熟期，恰恰又是中國歷史上思想文化發展最為自由的歷史時期。因為，那時中國尚未統一，各諸侯國尚處在客觀上「謀統」的自由發展時期。

以諸夏文化為主體的華夏民族文化，尚處在自身的發展成形期，和對雜處的犬、戎、蠻、夷等遊牧部族予以文化浸潤的時期。所以，政治的自由和社會的自由，就必然地帶來了思想文化的自由發展。而這個自由發展，既有力地形成了後來中華民族之主流文化——儒家文化，又相應地形成了反儒的墨家文化。如果說，儒墨兩家文化為中華民族的正統文化（注意，這裡是說民族、而非某個王朝的正統文化）立了根基，墨家文化的出現，則為儒家文化的反對派文化留下了「合法存在」的地盤。而孔、墨「前二子」之後，戰國時期「後三子」——老子、荀子和韓非子的出現，就更為「中華民族各派民族文化的自由生存發展權」，奠定了傳統的基石。這就是秦漢以下，不論何種思想文化流派曾遭遇過何等坑焚的命運，曾得到過何等至尊的地位，這個地位也不能叫他的天子和政府來為他而「殺盡百家」，卻仍然要予其他文化流派以合法存在。如果說秦始皇「焚書坑儒」，雖因恐懼六國舊貴族要求復辟封建制，害怕人民造反，沒有、也不可能「殺盡百家」（因他只禁百家之書，卻不殺「藏、讀百家」之人），卻使得要想「萬世而立」的秦王朝「二世而亡」，那麼，漢武帝時期的獨尊儒術，也只是「獨尊儒家學術和治儒的學者」而已，更不是要將儒家學術和儒家學者捧到政府和皇帝老子的頭頂上，由他們來加冕，亦由他們來「霸政、霸權、霸思想、甚至是霸文化」！否則，我們就不能理解，正是在漢武帝獨尊儒術的同時和之後，陰陽五行學說，神仙道家迷信，不僅

誘惑了晚年的武帝本人，而且，正是在兩漢，才獲得了長足的發展，才走上了發展的歧途呢？所以，即便是漢武帝要獨尊儒術，也不過是「視儒術為可以安邦治國的主流學問」而已。因此，將君主制度、平民政府定了型的大一統漢家朝廷，也就不可能推行「教政合一」這一足以窒息一切生機的極端專制統治了。不論是上層社會，還是下層人民，特別是各種層次的知識份子，還是都能夠傳承和享受著中國人所早已享有的思想自由和文化自由……。

其五，兩漢以後，雖然中國亂紛紛了四百年，西傳東來的佛教，乘機擴張，上與名士清談相接，下與神仙方術相近，可是，在南方，即便有三位皇帝曾「為佛捨身」，梁武帝一人就曾三次「入寺為奴」，然而，這位篤信佛教的皇帝卻從未將實際政治和政務，與「信佛、揚佛」混為一談，甚至能夠開臺打擂，與反對佛教的學人辯論，就是辯論輸了，也不抓人殺人！這該是具有著怎樣寬闊的思想文化胸懷！

但是，幾乎與中國的魏晉時代同時，即在紀元後 412 — 444 年，在歐洲羅馬帝國，「亞歷山大利亞的一位大主教聖賽瑞利，是一位人神一體論的擁護者，也是一個狂熱分子，他曾利用身為大主教的職位，幾次煽起對猶太人的集團屠殺，加害於住在亞歷山大利亞城中大片猶太僑民區中的居民。而他的名聲竟主要是藉著施加私刑於一位傑出的貴婦人希帕莎而獲得。在這個愚頑的時代裏，希帕莎熱心地依附於新柏拉圖哲學，並以她的才智從事於數學研究。但是，有一天，她

卻被從二輪車上拖將下來，剝光了衣服，拉進教堂，遭到讀經者彼德和一群野蠻、殘忍的狂信分子的無情殺害。他們用尖銳的蠟殼把她的肉一片片地從骨骼上剝掉，然後把她尚在顫動的四肢投進了熊熊的烈火……。」歐洲中世紀宗教專制統治的殘酷，在此可見一斑；至於歐洲中世紀末的科學家布魯托和伽利略在宗教裁判所所遭遇的殘酷命運，就更不必說了……。這不僅為中國古代開明開化的神教文化所不能想像，而且是直至 1949 年前的數千年中國都不可能發生的宗教慘案……。

中華民族科學的神教文化，不僅在迷佛的梁武帝心中，影響深重，而使他難越雷池一步，更不曾想要「以教代政」，而且南朝的士人，亦不過是將佛教納為「清談」，重在「義理」之辯，而非關政治之實。在北方，石勒、石虎兄弟，雖因宣稱「朕生自邊陲，君臨諸夏，以佛是戎神，正所應奉」，卻也沒有走向「以佛代政」或「佛政合一」。到了北魏武帝和北周武帝，他們的兩度「毀佛」，雖因佛、道衝突而起，卻意在抑制佛門的「肆意倡狂」，卻也沒有將道家推崇到必須「以道治國」和「道政合一」的地步。道教還是道教而已。北魏武帝的重臣，倡導反佛者崔浩的被誅殺；北周武帝時，大臣衛元嵩上書要武帝「宗周卻佛」（指中國上古周王朝），要「以城皇為首塔，即周主為如來」，他的目的，也不過是要抑制佛教對當下社會的不良影響。彼時，出身於五胡的北周武帝，之所以會贊同他的建言，甚至會說出「佛生西域，

朕非五胡，心無敬事，既非正教，所以廢之」的話，只能說，他在文化上已經為中華文化所同化了。所以，他的毀佛法，才是抑制佛教，而非「與道教的合一」。

佛教信仰因亂世而入中華，亦因中華亂世而大獲傳播，進而發展、坐大，直至成為「有教義、有地盤、有財產、有僧眾的民間『教政合一』式封建勢力」，但是，從南北朝而至隋唐，中華民族從揚佛而終於走向了「平佛」，即從對佛教的誇張、厚待、甚至放縱，走向了終於能夠以平常心待之，直至將他匯入中華的主流文化——儒學，從而形成了中國式的佛教文化，不僅證明了中華文化的消化能力，而且證明了中華文化的教化力量。唐代中期佛教「禪宗」的出現，就是佛教儒化、即中國化的一個結果。此後，不論宋、元、明、清視佛教是尊還是賤，佛教終不過是宗教自由之中國的一家宗教而已。

可以說，直至 20 世紀，在馬列夾帶著歐洲千年宗教專制統治的鬼影，浸透著蘇俄現代「教政合一」極權統治的鮮血，入侵中國，對我們民族施行了瘋狂的文化侵略、無恥的武裝顛覆、和殘忍的宗教屠殺，實行了「五千年中國從未有過的教政合一之極端專制統治」，則中華民族便能自始自終地向這個偌大的地球宣稱：吾國自古以來何有宗教戰爭？更哪有千千萬萬、成代成批的思想罪犯可言？！

第二，我在前面說過，在中華民族數千年的文化文明歷史上，形成了一個開明通達的儒家文化，他既是「以仁義為

核心的政治文化」，又是「以操守為標準的君子文化」，還是以「以自由為追求的人道文化」，所以，不論他自身有著怎樣的缺陷，對民族歷史的發展有過何種負面的影響，他還是以自己「王道文化」而非「霸道文化」的優秀文明素質，自始至終地占據了中華民族的正統文化地位和主流文化地位，豈但影響了我們民族過去幾千年的歷史，而且勢將以他的「開明、通達、知新和通變」，來影響我們民族未來發展的歷史。特別是當前，在中華民族必須於思想、文化、政治等一切方面，亟需下決心「驅除馬列、還我中華」的關鍵時期，他就顯得尤其地重要了。而馬列和中國的馬列子孫對他的既燒且焚，既批又殺，和中華民族半個世紀以來之整個文化道德的日漸「趨下」，甚至是日漸「崩潰」，恰恰從反面告訴了我們，今天，重新宏揚我們民族的主流文化對於我們民族傳承和發展的重要性，和對於我們必須「推倒馬克思像下的中國」，必須重建我們「中華民族自己的中國」的尤其重要性。

顯然，我不可能在這裏就儒家文化來作專論，這是我要寫的另一本書。但是，我卻可以在這裏，對以王道文化為「品流」的我們儒家文化，對於中華民族民族性格形成的影響，作幾個簡單的和事實性的說明。

一個事實是，我曾在前面說過，在春秋的內亂和兼併時期，齊恆、晉文曾藉霸業之成，而北抗群戎，南抗蠻楚。其時，對於華夏民族與列國而言，最大的危險卻來自南邊的楚國。因為，當時的楚國地廣勢強，又富蠻夷之性，他曾宣言說：「我

蠻夷也。今諸侯皆為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也就是想乘亂侵略中國了。但是，南蠻楚國雖因乘機征伐，而滅掉了漢陽一帶華夏姬姓諸侯國眾多，但是，他卻在對北方華夏民族征討釁亂的過程中，受到了華夏民族文化的深沉影響，竟然漸漸地變「嗜侵略」而為「愛和平」，變「亂中國」而為「入中國」了！也就是說，由一個驕悍的蠻夷而逐漸覺醒，並逐漸「善變」為一個「要知華夏文明、欲加華夏之盟」的「盟國」了；或者說，蠻楚終於為華夏文明所同化。據歷史記載，後來，楚莊王雖曾攻打過陳國，卻因申叔時諫言，便恢復了陳國；雖攻打過鄭國，卻又能夠在打贏之後自行退兵而不占領；於楚晉邲一戰中，他曾將宋團團圍住，只因為有人告知宋國國內已經是一片「易子而食，折骸而焚」的苦況，楚王居然能夠以華夏文化之「不忍人」之心，退兵而返。由此可知，此時的南蠻楚國已經發生了變化，以致莽莽楚天，終於變成了我華夏民族的美麗南國……。

如果說蠻楚吸收華夏文化的時期，還是我們民族「王道文化」的形成期，是儒家文化賴以形成的雛形期，儒家文化也正是從這裏才吸收了自己民族文化的營養，那麼，春秋末期，隨之而形成的儒家文化，就不僅在事實上，而且在理論上，將我們的王道文化儒學化了，從此，儒學成了中華王道文化的核心部份，中華王道文化也以「儒學為體」了。所以，在春秋列國內亂、戰國各國紛爭的時代氣氛之下，孔子便說：「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隨後，孟子則說：「取之

而燕民悅則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到了漢代，賈捐之則在勸進皇帝的「罷棄珠崖書」中稱：「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強治也。」至此，中華文化重教化而非重殺戮的主流文化——儒學，已經在國家、民族、政治等各個方面，處於明顯的主流地位。

另一個事實則是，時至漢武帝前後，通常都是在吃了匈奴的敗仗、或遭遇到匈奴的威脅之後，才會用「和親的辦法來安撫匈奴，解決邊患」；但到了我們的盛唐時代，唐太宗卻是在打敗了土番的侵略之後，仍然要派公主去「和親」。如果說這種處理民族問題的政治行為，已經表現出「孔子曰仁、孟子取義」的儒家文化內涵，鮮明地突顯了我們民族文化的文明水準，那麼，諸葛亮「七擒孟獲」的故事，就更早體現了儒教文化以「仁義」為標幟的特質，彰明了依照儒家文化處理民族問題的文明方式。這個方式，還是「重教化」，而非「重殺戮」。就是將我們只願以「文德昭之」的漢民族文明文化，具體地演化為處理民族問題的「文明原則」。這個文明原則，應該說一直表現在我們民族自身追求發展的道路上。也許，我們並沒有完全做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但是，中華民族在其漫長的歷史上，主要不是靠「武打」，而是靠「教化」而得到的「廣土眾民」這樣一個事實；中華民族在其悠久的民族歷史上，主要是建武裝以自衛，卻很少以發動侵略來施行擴張的歷史行為；無不在在都表現了我們的文明成熟之早，和民族文化的成熟之深。當然，這個

「深」字與儒學的關係，明眼者自然「一見便知」。這方面的例子太多，我就不一一列舉了。

第三，我已在前面指出，除掉當今的馬列洋教復辟王朝以外，我們民族數千年的文化發展，一直都在享受著相當的和相對的自由政治環境，一直都在表現著相當的和相對的自由發展趨勢，從而文化成果輝煌。對此，我只想用中國數千年的文學發展的輪廓和本相，來作一個簡單的說明。

我原來是一個搞文學的，既從事文學創作，又作文學研究，雖然水準不能說高，但也不能說完全不通。但是，我年輕時代閱讀的第一部文學史，卻是高爾基的「俄國文學史」。因為，共產黨「以俄為父」，我們也就在任何方面必須「以俄為師」和「以俄為學」了，甚至和現在那些高唱「俄羅斯是優秀民族」、「中華民族是劣等民族」的共產式「精英」們一樣，以為俄國文學真是了不得，實在能夠作我們中國文學的楷模和典範。但是，待我稍長，並且在閱讀了大量的中國古典文學作品和論著之後，我的看法開始發生了變化。因為無論就文學史的源遠流長而論，還是從文學作品的深刻雋永而言，哪怕就是將被人吹上了天的貴族托爾斯泰，拿來跟我們的落難作家曹雪芹比上一比，托氏也不能與曹氏一比，或者說得謙虛一點，頂多也只是「風采各異」罷了。再後來，當我不僅僅了一點真文學，而且懂了一點真歷史，直至多少懂了一點我們民族的文化歷史之後，我才能夠對中國文學「為何能夠源遠流長，為何能夠成就輝煌，為何能夠深刻雋永」

這樣一些文學的大是大非問題，有了自己的一點見解。

什麼樣的見解呢？

第一，中國文學的發展，從來就有一個自由的文化環境作他的歷史和社會基礎，特別是如前所說，由於在中華民族數千年的形成和發展歷史上，直至 1949 年為止，從來就沒有出現過一個「政教合一」的反動專制統治，哪怕是局部的和短暫的時期都沒有。因此，必須以思想自由為前提的文學創作自由，也就因為深享自由而獲得了自己創造的自由天地。這既是歐洲千年教政合一統治幾乎完全窒息了文學生命的原因，更是中國文學史之所以輝煌無比的根本緣由所在。是中國文學無論世道是盛是衰，文學家們都能夠「一唱三嘆」，或快其胸臆、或流連自傷的原因。即便是魏晉時代，司馬氏要假「名教」以攬權，阮藉、嵇康卻也能以老莊的「自然」相對抗。彼時，雖然崇尚清談的南北朝，其文學「理過其辭，淡乎寡味」，但是，陶淵明則能以「一枝獨秀」而唱出了山光水色間的「雅好慷慨」，雖無建安文學的氣魄，卻有的人生自然的品級。就不說魏晉一代雖然「艷曲生於南朝，胡音生於北俗」，於北朝的「天蒼蒼、野茫茫」和南朝的「浮艷輕靡號宮體」之間，竟然是橫空一鳴地誕生了劉勰的「文心雕龍」——這樣一部曠世的文藝美學巨著，他那「明道、宗經、徵聖」的吶喊，豈但是對於魏晉一代文學發展的批評和臧否，而且為後來者的「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也就是號召中國文學回歸「思無邪」、「怨

而不怒」和「好色而不淫」的正途，廓清了理論的通途。

第二、中國文學的數千年發展，雖因沒有教政合一的殘酷壓迫和痛苦桎梏，而獲得了極大的創造自由，從而成果輝煌，但是，卻也因為中華文化的主流，乃是深藏著要對國家、民族和社會持高度負責任感的「儒家」思想，因此，文學的教化作用，雖然不為政權所要求、所強迫，卻成為文學家們自己所自覺擔任起來的職責。並且，他們也像儒家通人一樣，懷著「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人生修養，既在個人的文學創作活動中，懷擁著經世致用的抱負；又在個人的文學創作活動中，詠嘆著自己對社會人生的認知和感慨……。所以，孔子早已指出：「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魏文帝也才會說出：「文章者，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祿止乎其身，未若文章之無窮。」意思便是在告訴我們「文學與經國之志」的關係。而這個關係，便是「文學的社會功用」，便是「文學的教化作用」，便是「文學雖然是自由的文化事業」，卻也與社會政治文明的關係甚大。

第三，雖然儒家文化要求文學應重視自己的社會功用和教化作用，然而，縱觀中國數千年的文學發展，不論是哪一朝和哪一代，也不論是任何一個文學家或文學理論家，都沒有像歐洲千年宗教專制統治時期，文學必須成為和只能成為「宗教黑暗統治的頌歌」，也不像近代德國的文藝家席勒那樣，要求文學去做「時代的傳聲筒」，更沒有像沒有美學的

「馬克思主義美學」那樣，要求文學去「為無產階級的政治服務」。為什麼？就是因為中國的文學從詩經始，雖然「上有名教」，卻又「下有人生」，從而為「人的文學」和「文學的社會真實性」，留下了偌大的地盤，從而才能夠發展著、深藏著對於「真實人生」的表現和對於「美好人生」的追求。所以，即便是魏晉時代那些被指為「平典似道德論」的文學，即便是那個為改變風氣、而希望端正文學社會影響的「唐代古文運動」，哪怕是在理學過嚴的宋代——特別是當民族鬥爭已經帶來民族存亡和國家興亡的重大危機時，中國的文人們，雖然在自己的文學裏面強烈地表達了自己欲要經世致用的政治抱負和為國為民的人生理想，他們也同樣沒有將文學納入「為政治服務」的死胡同，從而為政治而消滅文學。

為什麼？就是因為中國的文學家們，「有條件」將真實，也就是「真實的思想、真實的生活和真實的文學表現」當成了自己的生命。所以，「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漢樂府，才會被後人稱做是「周以後的詩經」；哀歌「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杜甫，才為後人稱為「詩史」；岳飛的「滿江紅」雖然是一篇愛國愛族的壯麗篇章，但是人們在吟哦他的時候，誰都會從「壯士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的詩句中，感受到文學本身的巨大感染力量。所以，即便是中國的文學，從詩經的「怨而不怒」，終於發展到了紅樓夢的「怨而大怒」，但是，文學還是文學，他既不是政治的傳聲筒，更不是「任何一家政治和任何一項政策的螺絲釘或工具」。

宋以後的所謂文以載道，也主要是要求對於文學思想性的重視，而不是在強求對於政權的忠誠。否則，要是和 1949 年之後一樣，文學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必須為共產黨的政治運動服務，必須做無產階級革命機器上的螺絲釘，甚至只能做黨和政府的「馴服工具」，則金瓶梅、水滸傳、三國演義、紅樓夢，還有牡丹亭、桃花扇等等堪稱偉大的文學戲劇作品，也就不可能問世了。這，大概就是中國雖然為儒家正統文化影響了數千年，但是，一是儒家文化自身的文化特質、而非政治特質沒有規定文學的政治工具性，二是中國文學從他發軔之初就極其重視他自身表現的人生真實性和社會真實性，才為我們中國的文學留下了這樣一個「雖要為社會、卻更要為人生」這樣一個正確的方向。中國文學史的輝煌歷史，實非「偶然」二字可以解釋，更非所謂的「精英」們可以隨便否定。

第四、中國文學的自由，和中國文學發展的自由，還來自中國歷史上從來就是「多教並存」的好制度。對文學而言，這個好制度之所以為好，就是因為他不僅為文學的存在和發展，帶來了大好的思想自由環境，而且，為文學風格多樣化的形成和文學形式多樣化的形成，帶來了存在和發展的自由條件。因為文學的風格和形式，常常就是品嘗文學的創造性和文學的藝術性之高低的又一個重要標準。中國數千年的文學發展，就因有賴於這樣一個條件，中國的文學才能從詩歌、散文、傳奇、戲曲、戲劇直至小說，都能夠成就非凡；中國

數千年的文學發展，才會不論是命逢亂世，還是命遇治世，都有他可以發展的廣闊天空，或自由之一隅。所以，漢賦雖因大一統王朝的聲威而形成了自己鋪陳揚麗的誇張風格，漢代文學卻又因「緣事而發」而能夠產生盡情歌唱人民悲苦的樂府和古詩，從而為後世文學的發展，注入了「為世道和為人生」的活力。東漢末年直至三國之後魏晉南北朝，雖然「三曹七子」已去，「建安風力」殆盡，但是，回應司馬氏黑暗統治和南北朝之亂世的，既有「古曲橫吹」的北國胡音，也有「粉艷綺靡」的南朝「宮體」；雖有「巧而碎亂」的文人「小賦」，更有清靈俊秀的山水詩文，就不說那個已經「獨成蹊徑」、還要「上下而求索」的五柳先生陶淵明了。然而，正是這個亂紛紛的四百年，又為中國文學形式的多樣化形成，和中國文學之「北雄南麗」風格的融合，特別是儒、道、佛三家思想對後世文學風格的影響，提供了一個特殊的時代條件。其後，不論是重內容、重品位的建安風骨，還是重情采、重形式的南朝文風，或是重義理、重思辯的玄歌禪詩，甚至是仙風道骨式的道家風采，他們都在唐以後中國文學的輝煌發展中，為中國文學發展的高峰期，做好了有心無意的鋪墊——滿身仙氣的李白，骨沉氣鬱的杜甫，高雅恬適的王維，雄風四溢的王昌齡、高適……等等，等等，無不為一部中國文學史增添了色彩斑斕的風格。至於宋以下，就更是隨著文化的普及和文學的普及，而愈來愈出現了文學風格和文學形式的多樣化。從而，無文化的蒙人雖然亡了我大宋的江山，

卻產生了漢文學之戲曲藝術的高峰期；而同樣是少文化的滿人雖然滅了我們的大明，但有清一代，卻將漢文學在戲劇和小說的發展，推向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紅樓夢的出現，實在將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學成就，推向了近代世界文學發展的顛峰地位……其後，「辛亥革命一聲槍響」，終於為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帶來了新的思想、新的文化、新的語言、和新的社會生活基礎，短短的十數年，開山期現代文學在各個方面的非凡發展成就，足為後人景仰。要不是馬列洋教在蘇俄新沙皇帝國的槍炮聲中和俄羅斯文學的死亡聲中猖獗東來，才在中國的新文學陣營中製造出了那一個所謂的共產革命文學，以「文載共產革命之道」，復辟了已經為新文學所揚棄的落後「文以載道」思想，直至將文學當成了「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和螺絲釘」，從而在其後長達 50 餘年對文學的專政和專制中，造成了真文學的死亡，則中國新文學的興旺，又該當何論，也就不容一辯。

我似乎已經沒有必要再來講「中華民族民族精神喪失的第四個表現——民族意志的沉淪」了！因為，當我們在國事和文化上，瞭解了自己民族幾千年求傳承、求發展的「心志」之後，再來看一看我們那個還處在「洋教專制復辟政權」之極端反動統治下的中國，再來看一看這個在中華民族歷史上從來就沒有出現過，並且也沒有可能出現的殘暴「教政合一」政權，看一看 50 餘年來中華民族求傳承、求發展的心志已經被阻絕、毀滅到了一個令人怎樣傷心慘目的地步，從而

捫心自問：我們又是怎樣地在傳承著和發展著自己的民族及其民族文化的？和我們為自己民族及自身民族文化求傳承、求發展的「心志」究竟何在？面對這樣的詰問，我們是否只能滿面汗顏，滿心羞愧，直至對馬列及其在中國的子孫們，滿懷著「族恨與國仇」的巨大痛苦呢？

至於昨天那些自號是「改革派」的知識份子們，和今天又自號是「自由派」的知識份子們，他們直至今日都不敢徹底否定和大膽批判馬列和共產黨，甚至還在發了瘋似地繼續否定著和謾罵著自己民族和自己民族文化的行徑，特別是他們面對著中國民間反思現代史的巨大成就，面對著中國人民對孫中山民主革命和民主建國道路的重新推崇，面對著由真正的史詩「走向共和」、「孫中山」等歷史劇所大膽表現出來的，當代中國人民之「民族意志和民主意識」的轟然覺醒，居然還在變本加厲地對孫中山及其民族民主道路予以百般的詆毀和誣衊，就更只能說明，所謂民族意識的喪失，所謂民族自尊的喪盡，所謂民族信心的破滅，所謂民族意志的沉淪，總而言之，就是所謂「中華民族民族精神的喪失」，其最集中的表現，就是「集他們於一身」！因為，只有他們，才自號是當代中國的「精英」，即當代中國精神文化的代表，所謂「士大夫之恥是為國恥」是也！。儘管這些精英，都是一些彎下了腰桿子的「精英」；儘管這個「當代中國」，只是一個「馬克思像下的中國」而已。

註釋：

1、請參閱辛灝年著《誰是新中國》一書導論第二章：「論馬克思主義是鼓吹專制復辟的哲學」。

2、1929年，前蘇聯因食言其1919年公布的「要廢除沙俄與中國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在中國東北地方政府要收回「中東鐵路」的管理權時，竟然發動著名的「中東路戰爭」，公開以武力侵略中華民國，並同時由史達林親自命令中共在中國國內發起武裝暴動以「武裝保衛蘇聯」，以與蘇俄的對華侵略戰爭裡應外合。中國共產黨忠實地執行了史達林的命令。

3、參見本文作者的《所謂左聯五烈士》一文。

4、舊時西南各省稱幫會人物或組織為「袍哥」。

5、語出《孟子》，制訂與人民財產有關政策。

6、蒙古人因侵占了中國而在中國建立的元王朝，是蒙古帝國之四大汗國之一。而中國隨著宋朝的滅亡而亡了國。從這個角度來說，元朝便不是中國的一個朝代。本講演稿對這一歷史問題的敘述，是沿承了中國元後歷代史家的說法。講演人將會對這一問題做進一步的研究。

7、參見毛澤東秘書李銳新著《回憶廬山會議》。

8、《漢書》記漢武帝登嵩山，群臣三呼萬歲，稱山呼。

9、孫中山先生帶領南京政府的文武官員去朝拜明孝陵之日，正是臨時參議院召開會議通過孫中山辭職臨時大總統，袁世凱接任臨時大總統之時。是孫先生因擔心南京政府的文官武將要去臨時參議院表示反對，才有此舉。著名外交家王寵惠在他的回憶錄裡對此事有詳盡的敘述，並在敘述中表達了他對孫中山先生大海一樣之寬闊胸懷的衷心讚美之情。

10、中共強迫農民合作化以後，中國農村就已經出現了餓死人的現象。至1959~1962年間，中國餓死農民約4500萬人左右。請參閱已經出版的相關書籍等。

11、胡錦濤黨政時期，曾大力投資建立「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建設工程」，此後一直在加強這一「賣國賣族的建設工程」。為此，《黃花崗雜誌》曾發表文章「馬列子孫的返祖現象」，對此予以了嚴厲的批判。

12、馬克思曾在他和恩格斯合著的《共產黨宣言》中宣稱：「一個幽靈正在歐洲的大地上徘徊。」這個幽靈就是指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馬克思主義。

13、1953年史達林死時，中共曾尊稱史達林為他們的父親，中共御用文人郭沫若更在他的詩歌裡面熱稱「史達林是我們的父親」。

14、1989年5月30日，本講演者曾在給湖北電視臺主播石萍的復信中明確回答說：「不開槍，就不是共產黨。」

15、《延河》文學月刊，1980年10月號。

16、參見《黃花崗》雜誌第四期著名報人李勇先生文。

17、《世界日報》古今上下版，2003年7月11日。

18、該講演發表後的十餘年歷史，已經證明了講演者的預言完全沒有錯。

19、伯奈特：英文版《從泰勒斯到柏拉圖》，第180頁。

20、《世界日報》古今上下版，2003年7月11日。

21、就是強迫各封國層層分封，最後將各封國自然瓦解。

22、歷史劇《走向共和》臺詞。

第三篇

誰是「衛國戰爭」的 中流砥柱？

2005 年 8 月 13 日、14 日講於美國達拉斯和休士頓，由講演者本人根據講演現場錄音整理、補充、修訂成文，發表於黃花崗雜誌 2005 年第 3 期、總第 14 期。另外，本講演錄有些地方與《誰是新中國》講演錄的抗戰方面內容有雷同之處，但比後者要更加豐富。為了保持各篇講演的完整性，仍做保留，請讀者理解。

前言

各位父老同胞，各位中國留學生朋友們：

謝謝各位！謝謝舉辦了這次抗日戰爭勝利 60 週年紀念大會的朋友們！我們雖然遠離故土，但是，我們的心始終都是在和國人一起跳動著的：我們記住了自己民族的歷史光榮，同時也為這份光榮至今仍然被竊據而深感悲哀。而我們特別感到悲哀的是，今天，有一個黨，雖然他的先輩們曾為保衛我們的國家、民族和人民而流過無量的鮮血，堅持領導了那一場曠日持久的衛國戰爭，直至取得了最後的勝利，但是，這個黨的上層勢力，近 20 年來，不僅早已忘卻了這份光榮，而且還想要割斷、甚至要拋棄這一段歷史。今天，他又因為懼怕那一個惡黨，要甘心為他所統戰，竟然不論是在島內還是島外，豈但對紀念抗戰勝利悄然不語，甚至還要變相地對那個惡黨「積極配合」，將自身的歷史功績默默地相讓給那個惡黨……。而那一個惡黨，當年雖然不抗戰、假抗日，甚至通敵賣國，但 50 年多來，他非但持續地將那個始終堅持了抗戰和堅持領導了抗戰的黨，汙蔑成不抗戰的黨，而且持續地把自己打扮成了「領導全民族抗日直至走向最後勝利的英雄」。甚至直到今日，當全世界都在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60 週年之時，在中國大陸人民已經經過了 20 年之久的歷史反思，早已經對「究竟是誰抗日、誰不抗日」的抗戰歷史，有了相當明確的瞭解之後，這個已經日暮途窮的惡黨，居然還

要在全世界、特別是海外華人社會，到處藉紀念抗戰而搞統戰，甚至是熱火朝天地拉開了他「新一輪統戰的大戲」——繼續把自己打扮成「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說自己曾經「是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領導全民族走向了抗日勝利的偉大、光榮、正確的黨」，並因此而自說自話道：「所以，中國人民才選擇了中國共產黨！」

朋友們：請不要聽了我上面的開場白，就以為我是在幫某個黨講話，又在抨擊另一個黨。在紀念我們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 60 週年的日子裡，我首先想說明的是：如果我們當真想瞭解中國人民的抗日歷史，想知道「抗戰究竟是誰打的，是誰領導打的」，我們就必須首先解決一個立場的問題。這個立場，就是凡我華人，都要讓自己的雙腳站在國家、民族和人民的立場上，而不是站在任何一個黨派、任何一股政治力量和任何一個領袖及個人的立場上」。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公正地瞭解和辨析抗戰「究竟是誰打的，是誰領導打的」；中國人民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究竟是誰用鮮血寫就的和贏得的；又是誰，不僅不可能成為這一場民族戰爭的中流砥柱，甚至是中國人民持久抗戰的破壞者和出賣者，雖然他恰恰因此而贏得了後來「奪權打天下」的成功。

然而，光光是站在國家、民族和人民的立場上還不夠，我們還必須根據這個立場，確認一些共同的標準。因為，只有擁有了大家都樂於接受的共同標準，我們才可能對任何一個政黨、任何一股社會力量、甚至是任何一個人，特別是對

於他們自己所寫下來的歷史，進行公正的評判。而在這些標準當中，最緊要的，一個就是進步和倒退的標準，另一個就是愛國和賣國的標準。

誠如我在《誰是新中國》一書中所言：「因為中國自近代開始的，從專制向民主的艱難過渡，無疑為辛亥之後中國現代歷史的發展，帶來了一個是推動民主進步還是造成專制倒退的大問題；因為中國自近代以來屢遭外患的痛苦歷史，又帶來了一個是愛國還是賣國的大是非。換言之，即辛亥之後，凡是在民主與專制之艱難、複雜和長期的較量中，推進了民主歷程和民生發展的，就是進步的；凡是在國難當頭、民族危亡之際，能夠為祖國、為民族而勇於犧牲和委屈求全者，就都是愛國的。反之，則無疑是倒退的和賣國的。這顯然是一個公正的標準，一個客觀的標準，和一個大家都樂於接受的標準。找到了這個標準，才會找到檢驗中國現代歷史發展的試金石，才能對中國現代歷史上形形色色的黨派和個人、即一切社會力量，進行公正的研究、分析和判斷，才能撥開重重疊疊的歷史迷霧和形形色色的政治謊言，揭穿假相，辨別實情，回答種種的汙蔑和詰難……。」

今天，我就要守住這樣一個立場，遵循著這樣兩個標準，特別是愛國和賣國的標準，來說一說「中國人民反法西斯戰爭的歷史」；說一說「抗戰究竟是誰打的、是誰領導打的」？說一說「誰才可能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說一說「在中國人民長期的抗日戰爭之中，國民黨和共產黨都幹了些什

麼？他們又是怎麼幹的？」從而期望大家對我們都異常關心的這一段浸透著鮮血和謊言的歷史，有一個真實的瞭解，作一個知情的人。

一、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 就是我大中華民國的衛國戰爭

我為什麼要說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就是我大中華民國的衛國戰爭呢？

首先，我想說明的是，所謂「大中華民國」，就是指由孫文和辛亥革命所創建的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這個亞洲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在疆域上，不僅包括外蒙古在內、而且包括在 1945 年以後已經回到祖國懷抱的臺灣島在內。他不是「在臺灣」，更「不是臺灣」，絕不是中國國民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主席臺上所懸掛的那個小小的臺灣島；而是他不再懸掛的、巨大的和美麗的「海棠葉」，是真正的全中國，和真正合法的「全中華民國」。

其次，我想說明的是，今天，如果有人問在中共，現在你說的「一個中國」，究竟是哪一個中國？國號為何？中共當然會毫無疑問地回答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是他從來沒有改變、也不會放棄的說法。但是，我如果也想問一句，1949 年之前的「一個中國」，是哪一個中國呢？，我想，不論是當時執政的中國國民黨、還是當時的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會說，是「中華民國」，也就是我說的「大中華民國」。

我想，那個時候，大概沒有人會說一個中國不是中華民國。就連中國共產黨大概也不好意思說「一個中國」，竟然會是「九一八」之後，他們在蘇聯命令下為分裂中國而篡立的，位於中國江西省瑞金地區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吧？

再就是，孫文創建的大中華民國，不僅是合法的，而且是得到當時的國際社會所一致承認的，更是中國人民推翻滿清、結束帝制、實現過統一並正在艱難地「走向共和」的大中國。

如果我說的沒有錯，我想請問，既然世界各國人民反對東、西方法西斯侵略的戰爭，就是各國人民的衛國戰爭；亞洲各國人民反對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戰爭，就是亞洲各國人民的衛國戰爭；特別是中共在他的大中小學教科書裡，從來就興奮地將紅色法西斯——史達林反對黑色法西斯——希特勒侵略的戰爭，說成是「偉大的蘇聯衛國戰爭」，那麼，我們為什麼不能說我「大中華民國國民反對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戰爭」，就是我們「大中華民國的衛國戰爭」呢？何況，我剛才已經說了，那個時候，我們中國人，就只有一個中國，這個中國，就是我們的大中華民國。所以，我們說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是我大中華民國的衛國戰爭，就是理所當然的；更是中國人民那一場反法西斯侵略戰爭的本相和本質所在。

這才是歷史，更是歷史的真相，是任何人不能否認也否認不了的。

朋友們，明白了這個道理，才能對我們識別誰才可能是

我們偉大衛國戰爭的中流砥柱，誰根本不可能是我們偉大衛國戰爭的中流砥柱，帶來最為透徹的瞭解。才能對我們瞭解國民黨和共產黨究竟是誰領導了抗戰，誰堅持了抗戰，究竟誰的抗戰是血寫的事實，誰的「抗戰」是墨寫的謊言，帶來認識和辨識的歷史前提。

二、偉大衛國戰爭的中流砥柱， 只可能是國民黨、不可能是共產黨

1、從理論上來對比國民黨和共產黨

就國民黨而言，是他的前身中國革命同盟會推翻了滿清、結束了帝制、創建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大中華民國。所以，他上認中華民族及其歷代祖先，如孫文所言，自認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直至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一脈相承；下開中華民國的「走向共和」之路——對外衛國，反對東西方列強欺凌分裂共和的新中國；對內護國，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張勳復辟滿清和「北洋軍閥假共和之名義以行專制之實」。1927年之後，他不僅因領導北伐打倒了軍閥而重建了大中華民國的南京政府，而且執政於我大中華民國的南京國民政府……。所以，從理論上、也就是從道理上來說，當年的中國國民黨不可能不捍衛這個由他創建的、由他捍衛的和由他執政的大中華民國。孫文既然被國民黨和大中華民國的國民尊稱為「國父」，則國民黨又有何理由居然「不愛、不衛護這個國家」？

就共產黨而言，由於他是蘇共在 1920 年 8 月派人來中國所建立，他在 1921 年 7 月所召開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又是前蘇共派人來領導召開的，他的黨名又為蘇共所取——名叫「第三共產國際中國支部——被命名為中國共產黨」；特別是蘇共又交給了他「顛覆中華民國和消滅中國國民黨」的無產階級革命使命；而他又稱自己「沒有祖國」，他的「祖國是社會主義的蘇聯」，他的父親是史達林；他所要一脈相承的，是「馬恩列斯……」，——甚至至今仍然要「馬恩列斯毛鄧江胡溫……」，地傳承下去，要根據馬克思主義來徹底批判、否定、焚燒的中華民族的祖先、歷史和文化。所以，中國共產黨，這個上不願繼承中華、下則要推翻民國、只認蘇俄、不認中華——「非國家、無民族」（蔣介石語）的「外來政黨」，不論是在道理上，或是在感情上，都沒有可能把那一場中國人民反對法西斯侵略的戰爭，看成是我大中華民國的衛國戰爭、因而也就沒有可能會為了這一場偉大的衛國戰爭而「甘灑熱血為中華」了！

2、從力量上來對比國民黨和共產黨

就國民黨而言，第一，他是一個合法的執政黨；第二，他擁有一個合法的國民政府；第三，這個政府擁有 1040 萬平方公里的國土和四萬萬人民；第四，這個政府在 1937 年全面抗戰爆發之前，已經擁有 270 萬陸軍兵員，10 萬噸位的海軍艦艇和 600 架飛機的空軍；第五，這個政府還擁有一位傑出

的領袖蔣介石——他不僅參加過辛亥革命、親自帶領炸彈隊衝進巡撫衙門、光復過浙江省；而且參加過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張勳復辟滿清的共和奮鬥；特別是他曾親自領導北伐打倒軍閥，重建了大中華民國的南京政權，並正在內憂外患之中對外對內地保護著和建設著我大中華民國……。所以，從力量上來看，中國國民黨具有領導和堅持這一場偉大衛國戰爭的起碼力量和基礎。

就共產黨而言，在 1937 年全面抗戰暴發之前，第一，他是一個一直在接受外國命令、旨在顛覆中華民國的外來政黨；第二，他是一個叛亂失敗、剛剛逃亡到陝北落腳的殘餘軍事勢力；第三、他在陝北僅僅占有三縣之地；第四，他所擁有的中國紅軍（即蘇聯紅軍的中共支隊）其時只有二萬人馬，一萬三千桿槍枝，並正一再地向國民政府提出「四項保證」，公開要求歸順國民政府；第五，他所擁有的領袖毛澤東，則是一個馬列子孫，曾在北伐成功、中華民國重建之後領導了失敗的秋收暴動、受俄命為分裂中國、顛覆民國而篡立了偽「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並擔任了這個「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的主席……。所以，從力量上來說，要當時的毛澤東和他的中國共產黨來擔負起領導大中華民國衛國戰爭的重任，顯然是癡人說夢。因為單單只是 1937 年的「八一三」淞滬抗戰，日本即投入兵力 50 萬，大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即投入了 70 萬，如此一場空前規模的殘酷會戰，遠在數千里之外的中國共產黨能夠領導得了嗎？中共的那一萬三千桿槍能夠

抵抗得起來嗎？稍有常識的人，或頭腦稍稍正常的人，都不可能想像共產黨能夠領導並能夠打贏那一場空前的衛國戰爭。

三、國民黨抗戰是血寫的事實

1、是抵抗，不是不抵抗

在中國共產黨所編制的所有大、中、小學的教課書裡，都明白地指斥蔣介石國民黨「不抵抗」。這個謊言，因為有心人的造謠和傳播，似乎已經成為「鐵定的事實」了！然而，他卻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栽贓。中國大陸著名的《炎黃春秋》雜誌於2004年第1期發表了大陸歷史學者曾景忠教授的文章——「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詳細地敘述了一個歷史事實，這個歷史事實就是：「蔣介石從未對張學良下過不抵抗命令、而是張學良本人在九一八之際下達了這樣一個命令」。

這篇文章指出：早在兩蔣早已過世的1990年6月8日，張學良在接受日本NHK電視臺採訪時，就已經明確地說過：「九一八事變時，我認為日本利用軍事行動向我們挑釁，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這個事件能和平解決……。我對九一八事變判斷錯了。我不能把九一八事變中不抵抗的責任推卸給中央政府。」此其一。

其二，1991年5月28日，張學良在紐約曼哈頓中城貝公館接受紐約東北同鄉會會長徐松林偕老報人李勇等8人訪談提問時回答：「是我們東北軍自己選擇不抵抗的……，是我

下的命令，與蔣介石無關。」

其三，據為張學良所信任、替張氏口述歷史的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工作人員張宇之記載：「張氏曾自疚，告訴筆者：……外間傳說我有蔣（介石）先生不抵抗手諭在于鳳至手中，是扯淡。于鳳至不是那種人。」^{註 1}

其四，華人歷史學者唐德剛曾主動要為張學良錄載他的口述歷史。唐曾笑著對張感慨道：「我們聽了 50 多年了……，都說是蔣公打電報給你，說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民族國家於不顧。又說你拿著個皮包，把電報稿隨時放在身上。」張學良回答說：「瞎說，瞎說，沒有這事情。我這個人說話，咱得正經說話。這種事情我不能諉過於他人。這是事實，我要聲明的。最要緊的就是這一點。這個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個兒的事情，是我的責任。」

雖然，張學良在上述歷次談話中，都沒有說，當日軍進攻錦州時，雖然蔣委員長一再命令他堅決抵抗，他卻一槍未發地席捲著他的數十萬東北軍逃之夭夭的「故事」。

2、是安內攘外，不是只安內不攘外

在中國共產黨對蔣介石國民黨的深仇大恨之中，大概除掉 1927 年的「清黨」，就要算是 30 年代南京國民政府所決定的「安內攘外」政策了。但是，只要把上個世紀 30 年代中華民國南京政府在外患內憂交相進攻之下所決定的安內攘外國策，和當今中共在改革開放的一片大好形勢之下所堅守不

移的「穩定壓倒一切」的國策，進行一番對比，我們就自然能夠發現，蔣介石的「攘外安內政策」或曰「先安內後攘外」的政策是完全正確性。

因為，正是「軍閥殘餘之殘餘」（陳獨秀語）的武裝叛亂，才破壞了北伐成功、中華民國南京政府重建之後，整個國家的初步和平統一局面，也才給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註2}——實際上是蘇聯命令中共在中國發動武裝暴動、土地革命和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大好時機，甚至給了日本敢於侵略、占領我國東北的機遇和膽量。

也正是 1931 年九一八事變這一國難的發生，才又逼迫著正在南昌指揮剿匪的蔣介石，不得不停止對中共的第三次征剿，轉身回京處理日本侵略之事。其結果就是中共「歡呼第三次反圍剿的勝利」，就是中共竟然敢在國難當頭之下，並且在九一八事變僅僅發生兩個月之後，就聽從蘇聯的命令，為徹底推翻我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以分裂中國為手段，在江西瑞金篡立了「偽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

而也正是在 1933 年春，日軍為侵占我華北、企圖西進長城沿線攻城掠地之時，正在對江西中共紅軍實行第四次征剿的蔣介石，又只好罷兵北上，親自指揮了熱河、榆關、和長城三大戰役，艱難地保住了華北。可是，中共江西紅軍卻乘機在蘇聯的命令和指揮之下，發展到了 30 萬人，占領了 45 個縣城，用他們的話來說，就是終於將贛東到閩西的「白點」——即國民政府的統治區域，全部拔除，把他的蘇區——

也就是蘇聯在中國的武裝統治區域，從江西到福建連成了一線……。就不說其間由中共策劃的「閩變」和由其他分裂勢力所發動的「粵變」，又給國難當頭的中華民國帶來了怎樣的痛苦了！

正是鑑於種種腹背受敵、交相壓迫的情形，1932年6月，本著「為不使國家於憂患苦痛之中增分崩離析之懼」，為「不完成國家統一、乃不能攘外」這樣一個至理，也就是「家不和外人欺，家亂外人更欺」這樣一個人人皆能夠明瞭的道理，蔣介石才在廬山會議上頒布了「安內攘外」的國策，「冀消除我民族根本之大患」。就是必須消除「中共在前蘇聯直接命令和指揮下對中華民國的武裝叛亂和瘋狂顛覆這一背後威脅」。因為，不論是日本侵占了中國，還是蘇聯侵占了中國，對我們所有的中華兒女，都是同樣的痛苦，除掉甘當馬列子孫的中國人以外。

比較一下國民黨的「安內攘外」國策和共產黨的「穩定壓倒一切」國策吧！前者是為了「衛國攘外」而不得不求「內安」；後者，則是為了「維護專制」，而絕不容許50餘年來毫無民權的人民對現存的極端反動統治表現絲毫的不滿。而我「民族的大患」——赤禍，就是俄禍，倘若當真被當年國民政府「安內攘外」的政策所掃蕩乾淨了，又何來1949年之後中國大陸人民無邊的血腥和苦難。

所以說，蔣介石的「攘外安內」政策，不論是從當時看，還是從今日來看，都是正確的。因為，歷史的事實告訴了我們，

他，「不是只安內不攘外，而是既安內又攘外，安內更是為了攘外」。

3、是積極抗戰，不是消極抗戰

50 多年來，中國共產黨在不得不承認「國民黨也抗戰」的時候，他一定要一再地和不厭其煩地告訴我們，國民黨的抗戰「是消極抗戰，不是積極抗戰」。然而，這又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歷史性謊言」。

我首先想對中日軍力作一個對比。我在前面已經說過，有資料統計，1937 年七七事變之前，中國有陸軍 270 萬，海軍艦艇 10 萬噸位，空軍有飛機 600 架。日本呢？他擁有陸軍 448.1 萬，並且他的一個師的裝備相當於我們一個師的三倍。中國士兵三個人夥用一桿槍的情況比比皆是。日本的海軍艦艇噸位已達 190 萬噸，1933 年世界海軍會議時，美、英、日海軍噸位之比，就已經是 5:5:5 了。日本還擁有 2700 架飛機。軍力如此懸殊，就不說我們在國力上和政治上因外患內憂所帶來的落後、甚至是難以言狀的艱難了。

所以，針對這樣力量懸殊的實際狀況，我想告訴大家的是：

第一，不是不打，是要準備好了再打。九一八事變後不久蔣介石就說過：「不是不打，是要準備好了再打！」七七事變之際，他又說：「和平未到絕望時期，絕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我們希望和平而不

苟安，準備應戰而不求戰……。」在廬山講演中，他曾堅決地告訴全國人民：「如果戰端一開，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少，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之決心！」

蔣介石不但不是消極抗戰，而且從來就是積極地在準備抗戰。1932年蔣介石就已經告訴記者說：「萬一與日本發生全面戰爭，我們就把首都遷往四川，以應長期抗戰。」1935年蔣介石在另一次接受記者採訪時又說：「即使是我們中國關內的十五個省份都被日寇占領了，只要四川、雲南、貴州還在我們的手裡，我們就一定能夠戰勝日本侵略者。」正是為了在未來長期和全面的抗戰之中，使西南諸省能夠服從中央的全面和長期抗戰決策，1935年，蔣介石才「單騎走西南」，終於使西南三省與中央政府保持了統一，並保證中央的政令和軍令能夠順利地在西南三省被執行。他的預見和做法，確實對後來蔣介石、國民黨領導全民族的長期抗戰直至最後勝利起到了巨大的保證作用。1935年底，中國當時的最高領袖蔣介石還在北京蘆溝橋我方河坡之下，親自帶領一名工兵營長爬行一千米，並根據這一實地偵察而在我河坡高地上設計了「反斜面陣地」，對後來我軍在蘆溝橋對日軍作戰，起到了相當的作用。此其一。

其二，自九一八事變發生到1937年「七七」全面抗戰爆發，蔣介石、國民黨執政的南京國民政府，首先在德國購買了一億馬克的武器裝備，武裝了四十個師，並聘請德國軍事顧問訓練軍隊。原來打算武裝80個師的計劃，因日寇提前發

動了全面侵華戰爭而沒有來得及完成。其次，在蘆溝橋事變發生之前，南京政府就已經在山東、江蘇、安徽、浙江等省的五個戰區先後修建防禦工事約 4,900 座，被稱為中國的馬奇諾防線。同時為迎接未來的全面和長期抗戰，蔣介石特別號召推動了「新生活運動」，以求煥發我們的民族精神和改進我們的人文素質，以為未來的全面和長期抗戰做好精神、心理和人格的準備。日本官員阿部信行就曾一再地警告他的政府說：「絕不能小看中國政府現在正在做的三件大事：整頓財政，整頓軍備和新生活運動。特別是新生活運動，就是排日運動的結晶。」

其三，自 1927 年中華民國南京政府重建，1928 年東北易幟，中華民國獲得初步的統一，其後直至 1937 年「七七」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正是因為蔣介石和國民政府始終懷有對未來長期和全面抗戰的思想準備，才能在這個外患內憂的歲月裡，蕩平了殘餘軍閥多達十數次的大小軍事叛亂，發動了五次對「蘇俄在中國的國中之國——中共武裝叛國勢力的征剿」，一方面在政治上逐步地使國家走向了穩定，使得蔣介石及其南京政府愈來愈能夠成為中國政治的中心；一方面在經濟上獲得了迅速的發展，以每年百分之 12 至 18 的增長率，為未來那一場長期抗戰奠定了起碼的國力基礎……。因為，如果蔣介石和他的政府真的從來沒有積極地準備抗戰，那麼，後來也就不可能破滅日軍迅速滅亡中國的迷夢，而我們想要贏得衛國戰爭的勝利也就沒有可能了！

第二、不是不打，是該打的必打。我想，大家都知道第一次淞滬抗戰，也就是 1932 年的「一二八」淞滬抗戰。我想，大家也都「知道」，「一二八抗戰，不是蔣介石要打的，是蔣介石不給打，但 19 路軍的官兵們要打，是他們不服從蔣介石不抵抗的命令，而堅決要打的……。」但是，這卻是徹頭徹尾的汙衊。

「一二八」滬抗戰，固然 19 路軍是參戰的地方部隊，但因蔣介石認為這一戰是該打的，非打不能向國際揚我中國人之正氣，中華民國之國格，所以，他將黃埔精銳 87、88 兩個師合併而成立第五軍，任命後來投共的張志中擔任軍長，積極地、壯烈地戰鬥在上海「一二八」抗日的戰場上。雖然，當時的國際和國內均不知 87、88 兩個精銳師才是淞滬戰場上的真正主力；雖然，國際國內的一切鼓勵、嘉獎和慰勞物資均只送給了 19 路軍，甚至連所有的抗戰榮譽都集於 19 路軍一身，蔣介石和他的中央軍還要背負不抵抗和不抗戰的罵名……。對此，大陸歷史學者早已在 1991 年出版的《蔣介石傳》一書中，就已經深懷著欽佩之心，把蔣介石兩次給 87、88 師的親筆信件公布了：

2 月 28 日，蔣介石在信中勉勵第五軍說：「抗日為整個民族存亡所關，絕非個人或某一部隊榮譽問題，絕無彼此榮辱之分。此次第五軍加入戰線，固為敵人所畏忌，亦必為反動派所汙衊。苟能始終以 19 路軍名義作戰，更是足以表現我革命軍戰鬥力之強。生死且與共之，況於榮辱乎何為？」

其後，蔣又致電張治中說：「在前線必須讓功於 19 路軍，只期殲敵，切勿有所競爭，即有不能堪者，亦必為國家忍辱負重。當知在此生死關頭，與 19 路軍應視同一體，外間毀謗，一切置之。如外間不知我 87、88 兩師同在苦戰，正吾人所求之不得者。」其意無非是為了向外界標明，他的政府欲『不抵抗』，而中華民國的國民誠不可欺……。」如大陸史家借《陳布雷日記》所言：「蔣如此精誠，真堪泣鬼神而動天地者。」我承認，我每一次說到這裡，都不覺眼眶發熱。說蔣介石不抵抗和消極抗日，天理何在！？

除「一二八」淞滬抗戰之外，就在蔣介石「為免除民族之大患——赤禍即俄禍」，而正在進行成功的第四次剿匪的關鍵時刻，由於日本欲占領華北，開始攻擊我長城沿線，只因蔣介石認為「遏制日本對我華北的侵略野心，是為必打之戰」，所以，他才會立即離開江西剿匪前線，轉身數次親赴長城沿線指揮了榆關、熱河和長城諸口的對日戰役。我軍雖然犧牲慘烈，數位國民黨將軍陣亡在長城抗戰的戰場上，卻保住了華北，也為中央政府對未來全面和長期抗戰的準備，爭取了時間。

第三、是戰略退卻，不是「拱手相讓」。九一八之後，蔣介石就曾一再地說過：「千萬不要逞一朝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而應該採取不屈服不擴大的方針，準備好了再幹！」「七七」之後，以蔣介石為首的最高統帥部則將蔣介石早已決定和早已從事準備的抗日總方針定為：「以守為

攻，以退為進，以持久對速勝，不是為了打垮敵人、而是旨在拖垮敵人」的持久戰大戰略。即以「空間爭取時間」的總戰略。所以，一方面，蔣介石既決定在京綏、京漢、津浦三線對日軍節節抵抗，防止日軍自北而南地切割我戰場，占領我後方，然後由西向東逼我就範；一方面卻決心在上海擺出決戰的態勢，大戰日軍，以萬般勇敢和犧牲的精神與頑敵死戰，藉以破滅日軍「三月亡華」的迷夢。一俟目的達到，立即撤軍，以保存有生力量，準備長期抗戰。上海會戰如此，徐州會戰亦如此，武漢會戰、三次長沙會戰同樣如此。在徐州會戰中，我 50 萬精銳神奇地擺脫了敵軍的包圍，撤出魯南和蘇北，使敵人企圖消滅我主力的希望毀於一旦。在武漢會戰前，蔣介石就已經決策「主要是消滅日軍有生力量，而不在保一城一地之得失」，在殲敵 20 餘萬並將華中重要物資安全運往四川之後，方決心棄守武漢，為後來持久抗戰，保留了重要的軍事力量。第三次長沙會戰雖然消滅了日軍六萬餘兵力，只因其時廣州已經失守，長沙已經守無可用，我軍亦是為保存有生力量而主動撤離會戰……。可以說，直至全面反攻前，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革命軍，即所謂的國民黨軍隊，雖然打了太多的大戰，無數的小戰，但是，卻都是遵循著持久戰的總方針，既消滅了敵人的有生力量，又把日軍深深地拖在中國的泥淖之中而不能自拔，直至歷史性的大反攻開始。

然而，中國共產黨卻在他的大中小學教科書中，歲歲年年地指罵國民黨軍隊「望風披靡，把祖國的大好河山拱手相

送。」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卻又歲年年歲歲地在他的教科書裡，把「偉大的蘇聯衛國戰爭」吹到了天上，把「他們的父親史達林」領導偉大的蘇聯衛國戰爭的「豐功偉績」吹得神乎其神。卻忘記了，1941年6月當德國以閃電戰進攻蘇聯時，德軍轉眼之間就打到了莫斯科城下，使他們的「偉大工人階級祖國」的歐洲土地幾乎喪失殆盡。史達林的倉皇應戰和無邊退卻，那才是真正的望風披靡，才真正是將自己的國土「拱手相讓」，並且不是早有計劃的「戰略退卻」。

相反，1812年當拿破崙進攻俄國，俄軍元帥庫圖佐夫以焚燒莫斯科為標誌的大撤退，才是真正的戰略撤退。因為他也是「以退為進，以守為攻」，誘法軍深入，將法軍拖進寒冷的俄羅斯冬天，從而造成法軍的必然失敗，為世界戰爭史提供了一個成功的戰例。而我大中華民國以持久戰為根本方針的戰略退卻，乃是將強大而且瘋狂的侵略者拖進了更加廣闊的泥淖而不能自拔，以期與世界戰爭「接軌」，直至最後地和徹底地打敗敵人，這就在世界戰爭史上，增加了一個弱國如何打敗一個強國的更加光輝的範例。

4、是血寫的事實，不是墨寫的謊言

根據中國大陸歷史學界的種種小心考證，現在我以大多數人已經公認的研究結果告訴大家：誠如大陸學者楊樹標教授所言：「由於蔣介石堅持領導抗戰，國民黨軍隊自始至終地堅持抗戰」，在其十四年抗戰中，發動投入十萬兵力以上

的大型會戰就有 22 次，大型戰役如平型關、台兒莊者就有 1117 次，小型戰鬥 28931 次。面對面地戰死在抗日疆場的國民黨將軍就有 206 人。陸軍犧牲、失蹤者共 3211419 人，空軍犧牲 4321 人，毀機 2468 架；海軍艦艇全部打光。在 1929 至 1933 年自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畢業的兩萬五千名青年軍官中，就有一萬名青年軍官壯烈犧牲在全面抗戰爆發的前四個月。從山海關到上海會戰，從武漢會戰到歷次大會戰和大戰役，國民黨軍隊成連、成營、成團甚至成師壯烈犧牲者，不可勝數……。國民黨軍隊抗日，實在是血寫的事實，而非墨寫的謊言！

正是由於國民黨軍隊在偉大衛國戰爭中的傑出表現，當大中華民國的偉大衛國戰爭，如蔣介石早就預料和準備的那樣，終於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接軌」之後，西方列強終於在蔣介石和他領導的大中華民國抗日政府的要求之下，廢除了所有不平等條約，去除了我們的百年國恥，實現了孫文的一個最大願望，那就是：「廢除不平等條約，是中國國民革命勝利的第一個標幟！」從此，大中華民國不僅成了聯合國的創始會員國，成了「聯合國宣言」的三大起草國之一，而且成了世界反法西斯「四強」之一。不僅掃盡了百年以來中華民族所遭受的欺凌和污辱，而且開始自立自強於世界。從而使得這一場偉大的衛國戰爭傲然矗立在我大中華民族五千年衛國衛族的戰爭史上。——而蔣介石作為一個身先士卒、不顧安危、始終堅定地領導著和堅持著對日抗戰、並終於奪

取了最後勝利的偉大民族英雄，則不論政治上的醜惡敵人和賣國者們要如何地汙蔑他和醜化他，他都將永遠地屹立在我們民族歷史的峰巔地位之上，而永難動搖。

美國總統羅斯福曾說：「假若沒有中國，假若中國被打敗了，……有多少師團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而調往其他方面來作戰？他們可以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們可以毫不費力地把這些地方打下來。他們並且可以一直衝向中東，和德國配合起來，舉行一個規模進攻，在近東會師，把俄國完全隔離起來，合併埃及，斬斷通往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線……。」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途就不堪設想了！」

美國學者易勞逸教授終於能夠公平地說道：「為國民黨軍隊說一句公道話，他與一個在組織、訓練、裝備上占絕對優勢的敵軍的戰鬥中，整整堅持了八年，與法國相比，法國對德國的抵抗僅僅六個星期便崩潰了；和英國相比，英國則從美國獲得了大量的物資支援。所以，國民黨軍隊的抵抗，乃是一個決心和自立的奇跡。他積極地戰鬥在上海、南京、華北和華中平原，徹底地挫敗了日本人對速決勝利的期望，自己也遭受了可怕的損失。然後，他們從沿海地區撤退，遠離交通網絡所能達到的地區，轉向了消耗戰的戰略，從而使日軍陷於中國遼闊的國土而不能自拔。這一頑強抵抗，對於反軸心國的整個盟軍的努力，作出了巨大貢獻。他在亞洲大陸上拖住了大約一百萬日軍，否則這些日軍便會用於太平洋地區對於西方盟國越島部隊的戰鬥。如果歷史在 1945 年之

後對國民黨人仁慈一些，如果沒有內戰，如果戰後年代國民黨能夠成功地在大陸建設一個穩定的國家，現在的歷史學家們將會把國民黨人對日本侵略的抵抗，作為一篇大無畏的英雄史詩來敘述。然而，由於戰後的垮臺，國民黨軍隊在戰爭中的積極貢獻，便不可避免地被他失敗掩去了光彩……。」（易勞逸：《毀滅的種子》一書）。

讓全世界「勢利的歷史學家們」都見鬼去吧！中國大陸的新一代歷史學家們，中國大陸新一代正在追求著「承上啟下、繼往開來」的愛國民主志士們，一定會永遠地記住我們中國國民黨先烈衛國的壯烈史詩，為我大中華民國的輝煌明天而繼續頑強地奮鬥下去！

四、共產黨領導和堅持抗戰是墨寫的謊言

我剛才已經說了，國民黨抗戰是血寫的事實；我還要說的是，共產黨「抗戰」是墨寫的謊言。為了簡潔明快地說清楚這個太大的歷史是非，揭穿那個太大的歷史謊言，我首先想問的是：國民黨說抗戰是 14 年，共產黨則一向說抗戰只有八年。那麼，前六年共產黨在幹什麼？後八年共產黨在怎麼幹？

1、前六年共產黨在幹什麼？

自 1931 年九一八事變至 1937 年七七事變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這六年中，中國共產黨一共幹了這麼幾件大事：

第一件，就是在九一八事變後兩天，即9月20日，中共中央即根據史達林和共產國際的命令，起草並通過了「關於執行共產國際緊急任務案的緊急任務案」。公然聲稱：「九一八是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導火線」，從而再次提出「武裝保衛蘇聯」的方針，而再次「武裝保衛蘇聯」的方法，就是「紅軍要奪取中心城市，以實現一省、數省勝利和在白區普遍實行武裝暴動……」趁國難而將「武裝暴動、土地革命和建立蘇維埃政權」推向了一個高潮，從而大大地擴展了紅軍的力量，從原來只占據五個縣發展到了20個縣……。

第二件，就是九一八事變之後兩個月，在共產國際的直接命令之下，於1931年11月7日前蘇聯國慶日，在中國江西瑞金篡立了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不僅意在分裂中國，製造兩個中國，為日本製造第三個中國——偽滿洲國做出了榜樣，而且頒布「憲法」，號召「中國境內的各少數民族和各個地區的人民都能脫離中國、獨立建國」（第14條）。為此，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米夫立刻於前蘇聯《真理報》撰文說：「當此日本占領滿洲和帝國主義瓜分中國之際，這次蘇維埃代表大會，顯示了一個革命中國的存在！」

第三件，1932年1月28日，就在第一次著名的淞滬抗戰開打、全國人心振奮之際，中共非但沒有派一人一槍支援上海抗戰，卻大派他的地下黨員混入正在上海積極抗日的19路軍軍中，號召下級官兵造反，起來奪取軍隊權力，並成立革命軍人委員會，審判和處決正在與日寇殺得血肉橫飛的「國

民黨反革命軍官」^{註3}。

第四件，1933年春，因蔣介石離開江西親自指揮長城抗戰，中共不僅再一次高呼「第四次反圍剿勝利」，而且進一步擴大了武裝叛亂和武裝割據，從5萬紅軍發展到30萬，從占據20座縣城擴張到占據45座縣城，將贛東至閩西的所有白點、即所謂「白區」全部「拔除」。也正是在這一期間內，中共在他已經占據的「蘇維埃國土上」，對所謂改組派，託派AB團大開殺戒，將整個「蘇區——即前蘇聯在中國的革命占領區」，殺成一片愁雲慘霧。其間，僅毛澤東一人所發動的「富田事變」，就殺了10萬人。

第五件，1933年，中共又勾結曾在上海抗敵的19路軍陳銘樞部叛變南京國民政府，篡立所謂「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甚至篡立「福建人民共和國」，以進一步分裂中國。

第六件，1934年10月21日，在江西的中共中央紅軍——即「前蘇聯紅軍的中國支隊」，雖然一邊聲稱「反對第五次圍剿失敗，南下突圍」，但卻在同一時間內，「宣布長征，北上抗日」，從而製造了紅軍北上抗日的第一大人間謊言。但是，他們先向南逃跑至湘西，後再南逃至貴州東部，因先後想在湘西和貴東建立蘇維埃政權的目的破滅，只好再西上逃跑到川北的懋功，並在此與從大別上西逃五千里而來的紅四方面軍、從原湘鄂川黔根據地逃跑而來的紅2、6軍團會合。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在甘肅俄界會議上，決定放棄川、陝、甘方針，策定經過甘肅東北和陝北，以游擊戰爭的

方式打通國際路線，到接近蘇聯的地方去建立根據地，以便在不測之時，能夠逃入前蘇聯。後因於無意中發現陝北還有一支劉志丹帶領的共產黨紅軍，於是，中共中央遂在 1935 年 9 月 28 日，於榜羅鎮召開會議，決定留在陝北，會合劉志丹。1935 年 10 月下旬，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遂發表講話稱：要在陝北來領導全國的革命！請大家注意，不是「要在陝北領導全國的抗日」。

第七件：紅四方面軍張國燾部，因與毛的中央紅軍內訌分裂，其一部遂接受史達林的命令「西進」企圖占據甘肅和新疆；一部則南下，企圖另立「革命根據地」，實際上是為史達林吞併我國土的野心「作前驅」，結果，幾乎被我國民革命軍全部殲滅，只剩下數百人逃亡到了蘇聯。請注意，他們也是西進和南下，而不是北上或東進打日本。

第八件，就是已經逃至陝北並插腳在劉志丹地盤上的中央紅軍殘餘，居然一邊在毛澤東的帶領之下、以紅軍將領的名義，要求向國民政府投降的同時，又利用軍閥殘餘楊虎城和少不更事的張學良，特別是利用了楊的陰險和野心，張和東北軍失土懷鄉的情緒，策動了西安事變，以至於連史達林都誤以為是日本間諜所為。並且要不是史達林的命令，蔣介石則險為為共產黨借楊、張之手所殺。

朋友們，我還用再說下去嗎？自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的六年中，從我僅僅舉出的這八件事來看，那一件可以稱作是抗日之為？實際上又有那一件不是在乘國難以造反、甚至

乘國難來加緊出賣祖國、分裂中國？日本侵占的是我國的東北，可中共自始至終逃跑的前方都是西南和西北，可謂「風馬牛不能相及」。就不說他的那些「赤裸裸的革命言詞而非抗日行為」了！特別是中共雖然將「逃跑」換成了「長征」，將「西上」說成了「北上」，將「革命」說成是「抗日」，但是，歷史終究是歷史，事實總歸是事實。那被中共及其御用文人年年歲歲都要大吹特吹的「北上長征抗日」，也終於有被戳穿而為人所不齒的這一天！

2、後八年共產黨在怎麼幹？

現在我終於能夠講到「中國共產黨是怎樣領導全中國人民堅持八年抗戰直至最後勝利」這一「史無前例的偉大歷史謊言」了！

是要日蔣火併，不是要擁蔣抗日

七七事變發生，日本全面侵華戰爭打響，當國民黨軍隊的浴血抗戰已經震動全國震撼世界，特別是山西國民革命軍的抗戰已經打得血肉橫飛之際，已經歸順了國民政府和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並已經兩次向蔣介石立下了「四項保證」的毛澤東及其中共，還想繼續拖延八路軍不上前線，已經再也找不到理由了。於是，8月20日至25日，中共就在離延安50公里的洛川縣召開了一次會議，中共黨史即稱他為「洛川會議」。

在洛川會議上，中共名義上的總書記張聞天在開場白中

就已經「引證列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曾採取使沙皇政府失敗的政策為根據，認為中共在抗戰中的基本策略應該一箭雙鵰……，使日本和蔣介石都因戰爭而瓦解」。毛澤東立即支持張聞天的見解。他認為「日本的軍事勢力遠勝中國，抗戰絕無僥倖之理……。他警告不要為愛國主義所迷惑，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要知道日本的飛機大炮所能給予我們的傷害，將遠過於蔣介石以前所給予我們的危害……」。

蘇聯《塔斯社》記者、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彼得·富拉基米若夫曾在他的《延安日記》中記述道：「據他看（指毛澤東）戰爭有利於奪取政權，因為戰爭能削弱和破壞重慶政府的力量……。中共領導把國民黨看成是主要的敵人，不遺餘力地要奪取中央政府所控制的地盤，用各種手段來達到目的。」

毛澤東的前秘書李銳在他已經出版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回憶錄中，已經對此明確地證明說：毛要和日寇夾擊國民黨，還說：「一些同志認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占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國內有國，蔣、日、我，三國誌。」

洛川會議之後，毛澤東即命令林彪的 115 師潛入晉察冀山區，賀龍的 120 師潛入晉西北山區，劉伯承的 129 師向魯冀平原發展。其目的，均在繞到敵後，以謀擴張。因為毛澤東一再指示「八路軍應避開與日軍的正面衝突，避實就虛，繞到日軍後方去打游擊，主要任務是擴充八路軍的實力，並

在敵人後方建立中共所領導的抗日根據地。」

歷史的事實是：「毛澤東曾在9月12日致彭德懷電；9月16日致林彪電；9月21日致彭德懷電；9月25日致朱德、彭德懷、任弼時、周恩來電；同一天致周恩來、劉少奇、楊尚昆電等一系列指示中，反復強調了我軍，……應該把工作重心放在放手發動群眾，……深入敵後，建立根據地，獨立自主地發展和壯大革命力量。」

歷史的事實是：1937年9月21日，平型關戰鬥發起前，毛澤東在給彭德懷的指示電中曾說：「……仍應適時把工作中心轉向群眾工作為宜。」

這就是毛澤東制止八路軍抗日的「五封電報」，也是中共黨內、軍內曾盛傳八路軍參加平型關戰鬥是違背了中央指示的由來。至於中共在1937年8月對內發出的兩個秘密指示，是如何命令他的地下力量變成地上力量，如何繼續打正在抗日的國民黨，以及怎樣利用抗日這頂大帽子來發展和擴張的，我就不說了……。

是游擊革命，不是游擊抗日

大家都知道，在八年全面抗戰中，毛澤東及其中共，曾將「共產黨的抗日游擊戰」吹噓成了他們領導全中國人民走向抗戰勝利的「法寶」。但是，毛澤東制定的中共抗日游擊戰，只是毛澤東及其中共在中國人民艱難萬分的反侵略戰爭中，乘機為共產黨奪地擴張的一個「法寶」，而絕不是中國人民賴以戰勝日本侵略的一個「法寶」。因為毛澤東就在他的《毛

選第三卷》中坦率地承認說：「抗日戰爭的命運取決於運動戰……。」；毛還承認說，共產黨在全面抗戰之前為前蘇聯所命令和指揮的「武裝暴動打的就是運動戰」；他甚至說：「將來要打倒蔣介石奪取政權，還是要打運動戰」；但是，他卻說：「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只能打游擊戰」。直至強調說：「我黨的軍事戰略方針，由國內戰爭後期的正規戰爭轉變為抗日戰爭前期的游擊戰爭，是何等的重要和必須。」

這到底是為什麼？就是因為毛澤東在 1938 年 11 月 6 日所寫的「戰爭和戰略問題」一文中，說打游擊戰有「18 條好處」。其中第二條：「擴大了我軍根據地」——就是擴張了共產黨的地盤。第四條：「相持階段……有利於正面整軍」——就是有利於訓練將來打內戰是能打運動戰的正規軍。第六條：「能最迅速、最有效地擴大軍隊」——就是在抗日的旗號下能夠最迅速、最有效地發展共產黨革命造反軍隊，為打江山做準備。第七條：「能最普遍地發展共產黨，每個農村都可組織支部」——就是為發展共產黨和建立、擴張共產黨的農村獨裁政權大大有利。第八條：「能最普遍地發動民眾運動，全體敵後人民，除了敵人的據點以外都可組織起來」——就是將敵後日寇管不到的廣大地方全部統治在共產黨之下，以便於發動打倒蔣介石的革命運動。第九條：「能最普遍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權」——就是在實際上建立中共敵後獨裁分裂政權，藉國難而進一步分裂中國，使從前公開的「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變成隱形的，並獲得更大的發展。

第十七條：「能最迅速、最有效地創造出大批領導幹部」——請注意，是領導革命而非領導抗日的中共幹部。第十八條：「最便利於解決給養問題」——就是用抗日的名義來取之於民，用之於共產黨的「革命」、擴張、奪權打天下……。顯然，毛澤東所說的這許多「好處」，對於不打日本、卻要藉抗日而進行革命擴張的中共及其軍隊來說，實在是好得「不同凡響」，但也將中共「假抗日、真擴張」的陰謀伎倆暴露得一乾二淨。

等到中共藉抗日而招兵買馬並終於發展壯大，膽子也大了起來時，毛澤東終於敢講出他只准中共軍隊打所謂游擊戰的底牌了。1939年，他首先說在《共產黨員》發刊詞上將中共的武裝鬥爭定性為：「中國共產黨的武裝鬥爭，就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農民戰爭。」然後他才對中共武裝鬥爭和「中共游擊戰爭」的性質及關係，作出了這樣的分析：「游擊戰爭是什麼呢？他就是在落後的國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國中，在長時期內，人民武裝隊伍為了戰勝武裝的敵人（這個敵人可不是日寇而是國民黨！），創造自己陣地，所必須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鬥爭形式。」毛澤東甚至更明白的說道：「離開了武裝鬥爭，離開了游擊戰爭，就不能瞭解我們的政治路線，也就不能瞭解我們黨的建設。我們的政治路線的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武裝鬥爭。……在中國，離開了武裝鬥爭，就沒有無產階級的地位，就沒有人民的地位，就沒有共產黨的地位，就沒有革命的勝利。」

請注意，1939年，毛澤東就已經對他的「抗日」游擊戰對於奪取共產黨革命勝利、而不是中國人民抗日勝利的特別性質和特殊功能，作了上述赤裸裸的說明。大家總該明白毛澤東和共產黨的「抗日游擊戰爭」是個什麼東西了吧！而中共抗日游擊戰的精華戰略——「農村包圍城市」，可是中共曾大吹特吹的，然而，遍布敵後、「包圍」了一座座城市的中共八路軍和新四軍，卻為什麼在抗戰中，連任何一座城市、哪怕是一座小小的縣城都沒有解放過呢？卻非要等到日寇投降之後才發動內戰來「解放」呢？

是專打國軍，不是專打日軍

如果說，在全面抗戰剛剛開始時，毛澤東及其中共還不敢過份地「冒天下之大不韙」，公開地不抗日、假抗日，八路軍甚至還局部地參加了抗日，毛澤東甚至還寫下親筆信歌頌蔣委員長說「先生領導全民族抗戰，凡我國人無不景仰」……，對外做足了團結抗戰的宣傳。但是，到了1939年，當大中華民國的衛國戰爭已經進入艱苦的相持階段，特別是毛澤東及其中共已經發展到了50萬人馬時，毛澤東不抗日和假抗日的陰謀，便開始暴露出來了。中共軍隊終於敢於「專打國軍」、而對日軍卻是「遊而不擊」了！

對此，彼得·弗拉基米若夫曾在他的《延安日記》裏寫道：「中共軍隊放棄前線陣地，向與國民黨軍隊接界的地區調動，這種政治醜聞突然在重慶傳開了。中國的很多組織要求把特區和中共軍隊無條件地移交給中央政府主席管轄，重

慶氣憤地談到了共產黨的出賣，把國土拱手讓給了侵略者。」

然而，毛澤東則反而借此機會，以「反對國民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名義，將共產黨一心要乘機擴張的心機暴露無遺。從來沒有上過前線的毛澤東，就在他延安的窯洞裡，製造了「國民黨頑固派」的概念，稱「國民黨頑固派就是今天的大地主和大資產階級，雖然他們今天還在抗日，但是將來他們一定會投降」。毛因此而進一步製造了反對「國民黨頑固派」的「革命理論」。第一就是毛澤東強調要在各方面對正在領導抗日的「國民黨頑固派」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第二就是毛澤東強調要以軍事進攻及軍事發展來壓迫和打擊正在領導抗日的「國民黨頑固派」。第三則是毛澤東強調要同時以陰陽兩謀的慣技「對外高喊團結抗戰」，以繼續欺騙輿論。

1940年5月4日，毛澤東在向中共中央東南局寫出的指示信中說：「中央曾多次給你們指出，……所謂發展，就是不受國民黨限制，超越國民黨所能允許的範圍，……獨立自主地放手擴大軍隊，……獨立自主地發動群眾，建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權，向一切敵人占領區域發展。例如在江蘇境內，應不顧顧祝同、冷欣、韓德勤等反共分子批評、限制和壓迫，西起南京，東至東海，南至杭州，北至徐州，盡可能迅速地、並有步驟有計劃地將一切可能控制的區域控制在我們手中，獨立自主地擴大軍隊，建立政權，設立財政機關，徵收抗日捐稅，設立經濟機關，發展工農商業，開辦各種學校，大批培養幹部。中央前要你們在一年內，在江浙

兩省敵後地區，擴大武裝至十萬人和迅速建立政權等項，不知你們具體布置如何……。」

在同一封指示信裏，毛澤東還指示說：「在國民黨統治區域的方針，則和戰爭區域、敵後區域不同。在那裏，是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反對急性和暴露，……利用國民黨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會習慣所允許的範圍，穩紮穩打地進行鬥爭和積蓄力量……。」

毛澤東的指示信證實了《延安日記》的作者所揭露的歷史真相：「……中共軍隊只能在表面上服從南京，實際上必須服從延安指揮。南京任何命令，必須先報告延安，以保持獨立的黨，獨立的軍隊，獨立的指揮系統，並且主要是擴張地盤。」

大家都知道所謂「皖南事變」，知道周恩來曾矯情地寫下過「千古奇冤，江南一葉」的「悲憤之詞」，共產黨更將「皖南事變」是國民黨不打外戰專打內戰的陰謀，宣傳得全世界都知道。然而，皖南事變就是在我剛才講的、毛澤東對東南局的指示信背景之下，因新四軍絕不服從最高統帥部的命令，一向專打國軍，不打日軍，甚至是專打我台兒莊大戰的抗日主力韓德勤部，才終於造成的悲劇。誠如當時的《大公報》所報導的那樣，「蘇北方面，新四軍陳毅管文蔚等部，於7月擅自由江南防區渡過江北，襲擊韓主席（德勤）所屬陳秦運部，攻陷如皋之古溪蔣霸等地後，又陷秦於黃橋及泰縣之蔣堰曲塘，到處設卡收稅，收繳民槍，繼更成立行政委員會，破壞行政系統，

並截斷江南江北補給線。統帥部雖嚴令制止，仍悍不遵命，復於 10 月 4 日向蘇北韓主席部猛攻，韓部獨六旅 16 團韓團長遇害；5 日又攻擊 89 軍，計擄去該軍 33 師師長孫啟人，旅長苗端體以下官佐士兵數千人，5 日晚又繼續襲擊，致李軍長守維、翁旅長、秦團長等被沖落水，生死不明，其他官佐士兵遇害者不計其數。現韓主席部已繼續撤至東臺附近，而該軍尚進攻不已」。

《大公報》的這篇報導，道出了事變的真相，也道出了事變的前因後果，但悲劇仍然在於，當總參謀部向延安反映新四軍的惡跡時，他們並不知道，新四軍執行的正是延安的命令，特別是毛澤東對東南局的指示。所以，《大公報》記者亦曾感慨說道：到 25 年冬西安事變以後，共產黨取消了建制，共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軍令統一了，最高統帥權確立了，國家的統一規模才算告成。我們必須切記，國家這點統一規模，是經過 28 年的內戰，流了無量的血，付了無數的犧牲，才產生出來的。我們更須切記，假使我們國家沒有這點統一的規模，我們根本就沒有發動這次民族自衛戰爭的資格。這樣艱難得來的國家統帥權，我們全體國民必然要堅持擁護，業已統一了的國家，我們全體國民必不讓他分裂！」

然而，共產黨從 1920 年 8 月蘇共為他創建的那一天起，他就從來沒有停止過分裂我們的大中華民國，從來沒有停止過要顛覆我們的大中華民國。全面抗戰開始前，他利用國難來分裂中國，顛覆民國；全面抗戰開始後，他就乾脆乘國難

來分裂中國和顛覆民國了！這正是他準備奪權打天下的機會所在，他如何能夠放棄呢！

是種「革命鴉片」，不是大生產運動

大家都知道，有一首歌頌中共開展大生產運動的著名歌曲——名叫南泥灣，唱的是「花籃裏花兒香……」，曾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歲月裏，唱遍了我們的中國大陸。然而，幾代中國人卻根本不知道，那花籃裏飄出來的竟是罌粟的香味，就是鴉片花香！因為八路軍第359旅的「大生產運動」和中共吹了六年的、為抗日而開展的八路軍大生產運動，不是種糧食，而是種鴉片！這對我們大陸的幾代中國人來說，乍一聽到，簡直有石破天驚之感。這是真的嗎？是真的。在今天中國大陸民間的歷史反思成就中，這就是他最重要的成就之一；而毛澤東所寫下的那一篇光輝著作——《為人民服務》裡面所表揚的那位「張思德」，就是「熬鴉片」的，而不是燒碳的！

對此，《延安日記》對他予以了徹底的揭露。彼得這樣寫道：「到處在做非法的鴉片交易。例如，在茶陵，遠在後方的120師部，撥出一間房子來加工原料，製成鴉片後就從這裏運往市場……。政治局已經任命任弼時為鴉片問題專員。因為當尤任問及毛澤東『特區的農民往往由於非法買賣鴉片受到懲辦，而現在甚至是共產黨領導的軍隊與機關也在公開地生產鴉片——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毛澤東沒有吭聲。鄧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代毛澤東回答說：『從前特區

只是把鹽和鹼運往國統區。我們一掛掛大車滿載著鹽出去，帶回來的錢袋卻是癆的，而且還只有一個錢袋！現在我們送出去一袋鴉片，就能夠帶回滿滿的一車錢。我們就用這些錢向國民黨買武器，回頭再用這些武器來收拾他們！」……中共政治局甚至批准，要加強發展公營的鴉片生產和貿易……要在一年內為中央政府所轄的各省的市場（叫作對外市場）至少提供 120 萬兩的鴉片。……鴉片的事情，就是說罌粟的種植與加工，大部分將由部隊來做管。賀龍的 120 師所在地是最主要的提供鴉片的地區（這個師已長期做這項生意）。……毛澤東同志認為，種植、加工和出售鴉片不是件太好的事情。可是毛澤東同志說，在目前形勢下，鴉片是要起打先鋒的、革命的作用，忽視這點就錯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此外彼得還憤怒地說道：「解放區出現了一片怪現象。中共的部隊同樣也出現了這種怪現象。他們全部在盡可能地與淪陷區的日軍做生意。……實際上晉西北各縣都充斥著五花八門的日貨。這些日貨都是由淪陷區日軍倉庫所直接供應的。」這就是中共「大生產運動」的真正內容，就是那一曲「花籃裏花兒香」的創作源泉，更是一曲「靠種鴉片發財，賣鴉片禍民，和「賺鴉片錢來專打國民黨、卻絕不是去打日寇」的「中共抗日絕唱」！

是通敵賣國，不是抗日愛國

中共在「九一八」至「七七」的六年當中，曾鐵定的賣國、裂國事實，我們已經說得很清楚了。然而，就是在後來

大中華民國的八年全面衛國戰爭中，中共除掉和占領了我們國土的日本軍隊「通商」，「互通有無」，和通過日本占領者向敵占區的中國人出售鴉片毒害自己同胞之外，我還想告訴大家的是，今年已經在北京再版的《延安日記》一書，揭露了比中共種植和販賣鴉片更要嚴重的事實。這個事實，就是中共最高領導層曾直接通敵賣國。該書作者寫道：「我無意中看到一份新四軍總部的來電。這份總部的報告完全清楚地證實了：中共領導與日本派遣軍最高司令部之間，長期保存著聯繫。……電報無疑還表明與日軍司令部聯繫的有關報告，是定期送到延安來的。」因為，「葉劍英告訴了毛澤東，我已經知道了新四軍發來的電報內容。中共中央主席跟我解釋了很久，說明共產黨領導人為什麼決定與日本占領軍司令部建立聯繫。」「中共領導人中只有幾個人知道此事，毛的一個代理人，可以說一直隸屬於南京的岡村寧次大將總部的，什麼時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間諜機構的嚴密保護下，暢通無阻地往返於南京與新四軍總部之間。」

其實，作家鄭義先生早就在他的《紅色紀念碑》一書中揭露說，1984年大陸出版的《南京誌史》就已披露了中共當年賣國通敵的事實。該書揭露：新四軍聯絡部長楊帆居然能夠直進直入南京岡村寧次司令部，並受到禮遇。事因則是：……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使日本陷於戰線過長的困境。中國戰場上，國軍仍頑強抵抗。為了挽救這種極其被動的局面，至1945年6月，岡村寧次向新四軍軍部發出了議和資

訊。……新四軍接報，因感到事關重大，立即報請中共華東局請示中央。延安立即密電答覆說：「可以和日方秘密接觸」。於是，6月初，日軍便派出了以日本天皇的乾兒子、日軍總司令部參謀部對共工作組組長為首的使團，向中共提出了「局部和平」的方案，並建議中共方面派出負責官員前往南京與日軍總部首腦直接談判。……經中共中央迅速批復，新四軍聯絡部長楊帆便啟程赴南京。抵寧次日，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副參謀長今井武夫和楊帆開始正式談判，並提出『局部和平文本草案』，除雙方停止軍事行動以之外，日方還答應讓出蘇北的八個縣城給新四軍，新四軍需保持中立，也可以將來和日方合作，共同對付蔣介石的國軍和美、英方面……，同時還協商好了保持秘密接觸的級別、方式、地點、時間，為進一步談判做好了準備工作……。而這一系列賣國勾當便是弗拉基米若夫在 1945 年 8 月發現的秘密……。」

是繼續製造兩個中國，不是建立抗日根據地

中共自 1927 年始直至 1937 年前，前蘇聯交給他的武裝叛國任務，就是「武裝暴動、土地革命和建立蘇維埃政權」。即使是 1936 年已經失敗逃往到了陝北，喘息剛定，中共居然還召開了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要把前蘇聯在中國製造的「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堅守下去。1937 年後，當中共就像張國燾所講的，終於「在抗日的這一頂大帽子下」獲得了存在之後，毛澤東為他的中共所決策的「抗日」路線，卻是針對著正在抗日的國民黨和中華民國政府的「武裝鬥爭、

農民戰爭和建立敵後抗日根據地」。雖然歸順了國民政府的中共不能再將「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的旗號繼續撐持下去，但是，在實際上和在實質上，毛澤東及其中共，還是要在抗日的旗號之下，將他們為分裂中國而篡立的蘇維埃國，不僅要繼續保存下去，而且要發展和擴張開來，以為在戰後發動內戰推翻中華民國作準備。這才是全面抗戰開始後，毛澤東及其中共所有陰謀的假抗日謀略、不抗日行徑、甚至是種鴉片和賣國通敵的種種罪行，之所以「一發而不可以收」的根本原因。

而也正是在這一總方針之下，毛澤東和他的中共終於如願以償了。

1940年3月，毛澤東終於高興地說道：「共產黨領導下的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進步力量，最近時期有一個大的發展，基本上已經奠定了抗日民主政權的根據地」——請注意，連費正清都指責抗戰時期，中共在敵後的所謂抗日民主政權，就是中共的獨裁政權。

幾乎是在同時，毛澤東也已經公然地說道：「目前國民黨反共頑固派極力反對我們在華北、華中等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權，而我們則必須建立政權，並已經到了可能在各主要抗日根據地內建立這種政權的時候。」毛澤東終於公開指出由中共所建立的敵後政權，就是與中華民國政府相分裂的政權。他說：「在抗日根據地內建立政權的問題上，必須確定這種政權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權，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則還

沒有這種政權。」

難怪中共黨史學家們在總結中共抗日根據地的經驗和成就時，竟說了如下的大實話：「抗日民主根據地是黨總結了中國革命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的經驗，進一步認識中國革命的特點，在抗日民族解放戰爭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條件下建立的……。抗日根據地是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理論和實踐的再發展和再創造。土地革命戰爭保存下來的革命理論，通過他才得以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發展和壯大」，「其規模大大超過了黨在十年內戰時的根據地」，為「解放戰爭的勝利提供了豐富的經驗和堅實的基礎……」中共是利用抗日建立革命根據地而根本就不是抗日根據地的底牌，終於被他們自己的黨史學家們徹底地揭開了！

但也正因為如此，當年的《大公報》記者才會更加悲哀地評論說：「八路軍和新四軍成為華北、華中兩支獨立的軍隊，配著他們的邊區政府、抗幣、共產黨旗、國際歌……成為一個獨立的體系。若干友邦人士從重慶飛向延安，乃有『一個中國還是兩個中國』之感。」

是的，在抗戰的首都重慶，掛的是國父孫文的畫像，飄揚的是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唱的是「三民主義吾黨所宗」的國歌；然而，在延安這個不抗戰、假抗戰的共產黨首都，掛的卻是中共黨父馬克思、列寧的畫像，飄揚的是蘇聯共產黨鐮刀斧頭滿地紅的黨旗，唱的更是「沒有祖國、也不要祖國」的所謂「國際歌」……。

是革命奪權的持久戰，不是抗日救國的持久戰

凡在中國大陸長大的這幾代人，可謂無人不曉毛澤東的「光輝著作」《論持久戰》。而我們從小就被共產黨教導說，是毛主席的《論持久戰》，才指導中國人民打贏了那一場偉大的抗日戰爭。然而，稍稍知道一點中共黨史的人都會知道，當蔣介石和他的最高統帥部運用「持久戰」的大戰略，早已破滅了日本「三月亡華」的迷夢，就要完全按計劃勝利完成第一期抗戰的歷史使命時，1938年5月，在武漢主持《新華日報》的王明、博古等中共領袖，卻堅決不刊載毛澤東剛剛在延安所寫的「論持久戰」講話稿，原因就是他們一致認為毛澤東在用「持久戰」的煙霧，來掩蓋他不抗日、卻要藉抗日的旗號來「準備內戰」的可恥目的。我們還是用中共黨史學家們的話來「高度評價」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吧！中共黨史專家們說：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思想，就是在民族戰爭條件之下，發動人民起來革命奪取政權的偉大革命戰略……」。^{註4}

然而，毛澤東及其中共雖然沒有為中華民國的偉大衛國戰爭貢獻他們的持久戰，卻實實在在地為他們自己未來奪權打天下的農民戰爭，堅持了八年的「持久戰」。

他們堅持了六年大種鴉片，並決心要用賣鴉片換來的錢買武器去打抗日的國民黨；他們「堅持只到敵人的後方去」，卻堅決不到敵人「正在進攻我們的前方去」作戰，就是為了在敵後搶地盤、鬧革命，建立他們的紅色政權；他們還派出

了大量人馬到所謂國統區去，「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他們還堅持了整整四年半的「整風內鬥」，不僅將共產黨內真正要抗日的派別和愛國者鬥得七竅生煙、死去活來，而且為毛澤東鬥出了在中共黨內的絕對獨裁地位，使得毛澤東從此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絕對殘暴領袖……。正是由於他們堅持不抗戰、假抗戰，所以，日寇非但不會打延安，更不會像炸武漢、炸重慶那樣，專門找著堅決抗日的蔣介石去炸；毛澤東卻因此才有可能在他安寧的窯洞裡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寫出了《矛盾論》和《實踐論》，為「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而不是「中國人民的抗日事業」，建設了一整套的「光輝思想」；而毛澤東和他的中共領袖們也才可能在他們的紅都延安「笙歌燕舞」；在藍色多瑙河的美麗旋律裡面，摟著從上海投奔而來的女明星們，甚至是從西方來的共產派美女記者們，盡情地放浪形跡……。這，才是毛澤東的「持久戰」，中共的「持久戰」，是與我們「大中華民國的持久衛國戰爭」毫不相干的「持久戰」……。

也許有人會問我，難道中共真的是一點也沒有抗日嗎？

我告訴你，中共曾害羞地說過自己「是一分抗日、二分宣傳、七分發展」。

然而，我要告訴你的卻是：「不對！是一分抗日、十二分宣傳，一百分發展！」

因為，他們只是在國民黨軍隊已經消滅了平型關的日寇主力 22000 人時，林彪才因羞愧而懷著「將在外君命有所不

受」的情緒，命令襲擊了日寇的一支補給部隊，繳獲了 15000 件軍大衣！1986 年，我們大陸的歷史學者就已經把他研究得一清二楚的了！

而「彭大將軍」，也只因為一個軍人的榮譽心，已經使他對本黨的不抗戰和假抗戰再難忍受下去之時，曾在 1939 年底和 1940 年初，不斷地派出小股八陸軍，炸碉堡，扒鐵路，襲擊小股的日軍——主要是偽軍而已。雖然這一「百排小戰」卻被中共吹成了戰績輝煌的「百團大戰」，並且只有勝利，沒有傷亡，但彭大將軍當年就為此做夠了檢討，檢討自己不聽中央不給打日寇的命令，檢討自己不小心暴露了共產黨八路軍的實力……。彭德懷後來在毛澤東發動的「文革」中終究還是為此喪了性命。就因為他在抗戰時期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因為毛主席他老人家不給他抗日，他卻非要抗戰！

是的，在中國共產黨內，當年確實有些愛國者曾參加過局部的小型戰鬥。但是，由於毛澤東明確地制止八路軍、新四軍打日寇；明確地指示「只有在遭遇日寇、並且是不得不打時才可以打，而且主要是打偽軍，打後就宣傳別黨不抗日，共產黨才是抗日的……」^{註5}。所以，被中共打成托派因而負罪在身的八路軍副總參謀長左權將軍，才是遭遇日寇空襲時「求死」才被日機炸死；八路軍的另一位將軍關響應，就更是病死在延安的醫院裏了；新四軍的高敬亭將軍因堅持要求打擊日本軍隊而不是專打國民黨軍隊，竟被新四軍的領導人項英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秘密處決；共產黨的另一位將

軍彭雪楓，更是在河南「打頑」，就是打國民黨的勝利戰場上，被流彈奪取了他卑賤的生命。至於東北義勇軍中的趙一曼，楊靖宇等抗日烈士，他們雖然可歌可泣，但他們不過是在蘇共的直接領導下，為保衛他們偉大的無產階級祖國——蘇聯而戰，與中共毫無關係。所有這些人，他們又有誰能夠是像國民黨的 206 位將軍，是活生生地為國家、為民族而壯烈戰死在偉大「衛國戰爭」的戰場上的呢？

所以，毛澤東及其中共雖只有一分抗戰，卻不是二分宣傳、七分發展；而是一分抗戰，十二分宣傳，一百分發展！因為，戰爭只有創傷，哪能創強？但是，毛澤東卻恰恰是因為不抗戰、假抗戰、甚至是賣國通敵，才創了強了！歷史的事實是，1936 年底，當毛澤東率領紅軍將領「致蔣介石書」，表示願意歸順，請求不要再攻打紅軍時，中共紅軍僅存不足二萬人馬，其勢力亦不足三縣之地。全面抗戰開始後至 1937 年底，中共因靠抗日招兵賣馬和向國民黨索要軍費，已經擁有 10 萬軍隊，占地三萬五千平方公里，挾人口 150 萬。至 1943 年，在敵後共一億八千三百萬的總人口中，中共已經能夠控制擁有五千四百萬人口的根據地。至 1945 年，中共已經在全國建立了 16 個根據地，其中五個有各級政權，八個有行政委員會，三個為軍事區域，中共黨員既已達 120 萬人，其軍隊也已達 120 萬之數，所挾人口已達一億以上。與 1936 年的中共相比，僅在軍力上便是八年前的 60 倍；與在八年全面抗戰中傷亡了數百萬官兵、陣亡了 200 餘位將官的國民黨軍

隊相比，其反差之大，足以令人觸目而驚心。難怪中共黨史學家們要說，中共正是在「八年抗戰」之中，才「為解放戰爭的勝利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歷史就是歷史。共產黨的抗日謊言，終於有了被徹底揭穿的時候。

五、中共自稱建立並領導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是一個「彌天大謊」

1、蘇共為中共制定了一個「繼續武裝保衛蘇聯」的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各位華僑、各位留學生：究竟誰才是大中華民國衛國戰爭的中流砥柱？我想各位自然已經有了結論。但是，由於中共直至今天還在欺騙說——他之所以成為「中流砥柱」的原因，是因他首先號召並建立了全中國人民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才領導全中國人民奪取了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和全面勝利！

什麼叫做彌天大謊？這就叫彌天大謊！

因為所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根本就不是中共號召建立的。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蘇共建立和命令的。

大家都知道，自 1927 年中華民國南京政府重建，史達林就一直命令中共在中國發動武裝暴動，進行土地革命，建立俄式蘇維埃政權——分裂中國，顛覆大中華民國。但是，到了 1934 年夏天，當史達林已經明顯地感覺到了來自東西方法

西斯的威脅時，為命令各國共產黨「繼續武裝保衛蘇聯」，他終於開始改變專門命令各國共產黨、特別是中國共產黨顛覆本國政府的「世界共產革命路線」，轉而指示各國共產黨要和本國政府聯合起來反對法西斯戰爭。

1934年5月23日，法國共產黨總書記多列士首先發表了「為統一戰線而鬥爭的法國共產黨」一文，中共史家們就認為這是「共產國際轉向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第一個信號」。

1934年6月14日，蘇共駐共產國際代表曼努意斯基向即將召開的共產國際「七大」建議說：「各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不是社會主義，而是引導群眾為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而鬥爭的統一戰線。」——共產國際要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陰謀性開始顯露出來了。

1935年7月1日，季米特諾夫在給「七大」籌委會的信中，已經具體地提出了共產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具體陰謀策略手段是：「不要對統一戰線採取包辦的態度，而是要在實際上實現共產黨的領導。」

於是，1935年7月6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皮克就在「七大」報告中明確地對中國共產黨指示說：「在反對本國資產階級和日本侵略者的鬥爭中，要把蘇維埃擴張到全中國去！」季米特諾夫則同時指示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既要反對關門主義、又不能放棄黨在政治上、組織上的領導地位。」就不僅在實際上成為毛澤東及其中共在後來所忠實執行的根本方針及根本手段，還為毛澤東和劉少奇後來既要

說服他的黨人搞「抗統」、又要命令他們的黨人必須爭奪所謂「抗統」領導權、實際上就是利用「抗統」來奪權擴張，奠定了張本。

於是，1935年8月，由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起草、由史達林親署「同意」的中共「八一宣言」終於出籠了。然而，由於史達林和共產國際為中共建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從一開始就深藏陰謀，所以，這個「八一宣言」、即「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也就在公開號召抗日和建立「抗統」的同時，居然聲稱：「要衝破日寇蔣賊的壓迫……，組織全中國統一的抗日政府」，就是說，他們仍然要藉抗日來顛覆我大中華民國！直到1936年，當東西方法西斯對蘇聯的威脅已經日漸其深，中共在共產國際「七大」上公開吹噓的，中共已經在中國占領了1495個縣城、已經擁有一百多萬的正軌軍，並且已經勝利地擊敗了國民黨反動派的「第六次圍剿」……，已經被證明是通天大謊之時，史達林才猛然清醒過來，轉而命令中共要聯蔣抗日和擁蔣抗日，以繼續「武裝保衛蘇聯」。由史達林和共產國際為中共建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終於從陰謀轉向了陽謀，史達林開始要中共真抗戰而不是假抗日了。

2、中共建立了一個「只鬥爭、不聯合、志在奪取政權」的「革命統一戰線」

誠如我前面所講，正因為中共從來就是假抗日，所以，

他從史達林那裡接過來的所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便從來就是陰謀，也就是說，從來就沒有變成陽謀。

這是因為：第一、王明在莫斯科發表「八一宣言」時，毛澤東及其中共正處在遭遇第五次反圍剿的慘敗之中，並與蘇共失去了電訊聯絡。其後在逃亡的路上，中共一直都不瞭解共產國際對中國的政策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等到 1935 年 11 月，毛澤東逃到甘肅和陝北時，林育英才把 1934 年 8 月共產國際「七大」通過的統一戰線陰謀，帶給剛逃到了瓦窯堡的毛澤東。所以，毛澤東才會在瓦窯堡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一邊立即接過了抗日——這個他們從來就沒有想到過的「救命圈」，開始一邊大叫要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致對外，共同抗日」；一邊卻號召說：「號召千百萬民眾，組織浩浩蕩蕩的革命軍，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進攻的需要……」。於是，毛澤東也就順理成章地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具體化為「反蔣抗日」。一方面立即開始聯合著名的殘餘軍閥，以在抗日的名義之下共同反蔣，繼續顛覆；一方面則立即派劉少奇潛望華北，藉發動「抗日救國運動」來「抗日救共」。而共產國際領袖曾指示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所有陰謀指示，便全部為劉少奇所「活學活用」了。

但是，當毛澤東及其中共已經落定在陝北之後，當史達林要求中共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陽謀，也就是要求中共在蔣介石的領導下真抗日、而不是假抗日時，毛澤東則從理論到實踐，自始至終地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持並發展

成了他「不抗戰、假抗戰」之徹頭徹尾的陰謀。請大家看一看《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就立即能夠明白，毛澤東是怎樣對內和對外把玩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又是怎樣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當成了他對外欺騙、對內制約自己黨人的「法寶」。

簡略地說就是：毛澤東首先在理論上一再地警告他的黨人，執行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第一條就是要「獨立自主」。也就是說，他的中共絕不能因為要執行「抗統」來聽蔣介石國民黨的指揮。他的理由是，聽了國民黨的指揮，就是聽從了資產階級的指揮，就是喪失了無產階級在「抗統」中的領導權。其次，則是中共在抗統中必須採取「既聯合、又鬥爭」的策略，用張國燾揭露毛的話來說，就是「不聯合、只鬥爭」——毛澤東製造的打擊「國民黨頑固派」的陰謀理論，中共在抗戰中「專打國軍、不打日軍」的事實，都是突出的例子。再就是用「民族鬥爭說道底就是階級鬥爭」和「階級鬥爭是可以調節的」理論，來警告和要求他的黨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也是階級鬥爭，只不過他的表現形式是民族鬥爭罷了！而正因為「階級鬥爭是可以調節」的，就是說我要他大，他就大；我要他小，他就小；所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才能真正成為中共領導「革命武裝鬥爭、革命農民戰爭和建立敵後革命根據地」的「三大法寶」之一……。至於毛澤東及其中共是怎樣在中國人民艱苦的衛國戰爭中，運用這個「法寶」來幫助他「革命打天下」、而不是「抗日救中國」的目的，我想，毛澤東已經在他的第三卷雄文裡，講得清清楚楚的了，

大家可以一閱。

六、我大中華民國的國民不可能選擇 「不抗日、假抗日和真賣國」的中國共產黨

今年，不抗日、假抗日的中共，曾為紀念抗戰勝利，實際是要用紀念抗戰來繼續進行欺騙和統戰，在黨內發出過一個「通知」。這個通知，除掉老調重彈是他領導了抗戰，並且只有他才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以外，還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說正是因為他才是抗戰的中流砥柱，所以，「中國人民才選擇了中國共產黨！」也就是說，直到今天，中國人民仍然必須置身在中國共產黨專制統治之下，是活該的，更是自找的，因為是你自己選擇我的嘛！由此看來，胡錦濤的中國共產黨，在製造謊言的膽量和技巧上，確實已經發展甚至超過了毛澤東直至江澤民的中國共產黨了！

然而，這卻是徹頭徹尾、徹裡徹外的謊言！是一個以製造「時空錯亂」為手段，所「創造」的更加悲鄙的歷史性謊言。

因為，單就抗戰的事實而言，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十四年艱苦卓絕的衛國戰爭中，非但不抗戰、假抗戰，甚至是分裂中國、通敵賣國的歷史真相，決定了 1945 年的大中華民國國民，不可能選擇他！

因為，倘若中國人民選擇了他，就等於是對大中華民國全體國民艱難抗戰歷史的徹底背叛；

因為，倘若中國人民選擇了他，就等於選擇了一個我們

偉大衛國戰爭的最可恥的賣國者；

因為，倘若中國人民選擇了他，大中華民國的國民就絕不會「迎蔣還都」、而只可能是「迎毛進京」了！

看一看當何應欽上將代表蔣介石元帥飛抵南京接受日本投降時，南京 30 萬市民是怎樣熱淚盈眶、歡聲雷動的吧！

看一看 1945 年大中華民國衛國戰爭終於獲得了勝利之時，我們的國民是怎樣地歡呼他們的蔣委員長是中華民族的「偉大民族英雄」的吧！

再看一看，當蔣介石委員長在重慶慶祝抗戰勝利，特別是他還都南京，巡視武漢，飛臨臺北的時候，我們的大中華民國國民是怎樣為他歡呼的吧！

就連毛澤東及其中共領袖們，當時都不得不稱「抗戰勝利時，蔣介石的聲望真是如日中天啊」！

胡錦濤的中共，之所以敢於繼續撒下如此的彌天大謊，無非是因為，抗戰勝利四年後，那場已經被他們準備了整整八年的內戰，終於被他們發動並打贏了。所以，中共今天才敢用製造「時空混亂」的手段、以一個曾經是「內戰勝利者」的姿態，來撒下「中國人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這樣一個偌大的歷史性謊言。

胡錦濤的中共，之所以必須繼續撒下如此的彌天大謊，尤其是因為，當前已經日暮途窮的中共，更需要靠繼續撒謊來保住被他們曾經用謊言所騙取的「歷史合法性」。因為，全世界的歷史、全世界的人民都不能想像的是，一個在本民

族生死存亡的衛國戰爭時期，一個居然敢於不抗戰、假抗戰、甚至賣國通敵的黨，怎麼可能擁有對這個民族進行統治的歷史合法性呢？就不說這個黨所實行的專制統治，又是徹頭徹尾的「專制復辟統治」呢？是對孫文、辛亥革命和我們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大中華民國的徹底背叛呢？

這才是中共今年一定要藉紀念抗戰勝利 60 週年來大行欺騙和大搞統戰的根本原因。

至於為什麼共產黨在戰後發動的內戰中居然打贏了，那就是我另一個要講的專題了。但是，我今天在這裡還是想講一句話，那就是，誠如大清朝的攝政王多爾袞曾對大明的降臣洪承疇所言：「大清的江山不是得自於大明，而是得自於闖賊！」換句話說就是：「共產黨的江山不是得自於國民黨，而是得自於日本帝國對我大中華民國的長期侵略和瘋狂侵略！」

謝謝。

註釋：

- 1、張宇之女士相關稿件現存黃花崗雜誌社。
- 2、毛澤東著《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1931。
- 3、請大家參閱北京師範大學主編的《中國現代史》。
- 4、翟作君 鄔正紅：《中國革命史研究薈萃》第 288 頁，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
- 5、1937 年 8 月《中共中央對南方游擊區的秘密指示》。
- 6、如要更加詳細地瞭解國共兩黨抗戰的歷史對比，可參閱 1999 年美國藍天出版社出版的《誰是新中國》一書上卷第六章：「中國人民的偉大衛國戰爭」和下卷第三、第四章：「中共假言抗日以圖存、藉口抗日以擴張」）。
- 7、本講演稿引用的所有資料均來自《誰是新中國》一書，全為從大陸帶出的資料。

第四篇

中國命運與臺灣前途

2006年5月25日至6月14日，應邀講於德國的法蘭克福及漢堡，比利時的布魯塞爾，法國的巴黎，荷蘭的海牙和西班牙的馬德里。2006年9月16日，又應邀講於加拿大溫哥華中央圖書館。2006年10月8日，再次應邀講於加拿大蒙特利爾康戈迪亞大學。

前言：我有三個說明

謝謝大家，謝謝主辦人，謝謝在蒙特利爾還有這麼多的華僑和留學生願意和我一起來探討我們祖國的命運，探討臺灣的前途，非常感謝大家。

在講演之前我有三個說明：

第一個說明：我有一個自由身份。我這一輩子除了做過「中共少先隊員」以外，沒有參加過共青團，沒有參加過共產黨，更不是國民黨，當然也不是民進黨，並且在海外也從沒有參加過任何團體和組織。我就是一個獨立的知識份子，真正的自由派。我要講的話都是我自己想講的話，和國內國外的任何政黨、政治組織都沒有任何關係。如果在談到我自己祖國的問題的時候，我不小心觸犯到「他們」的話，那就請「他們」批評或者批判，批倒甚至批臭，直至「將我在地球上徹底消滅」^{註1}是我的第一個說明。

第二個說明，我有我的民族立場。我知道在海外有各種各樣立場的中國人，但我只有一個立場，就是中華民族的立場。說明這個立場只需要簡單的兩句話：一是「一切愛自己民族的人都應該希望我們的民族進步」；二是「一切愛自己民族的人都希望我們的各民族、各地區都能夠真正地團結進步，而不會去為了局部的利益去影響我們民族的整體利益，也就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利益」。站在這個民族的立場上，那我們就能夠真正地為中華民族的中國說話，為了中華民族中

國的進步和團結講我們的心裡話，而不是為了那個「馬列中國」去講拿些「口是心非」的話。我覺得這一點是特別重要的，尤其是在海外各種政治背景林立的情況下。我作為一個來自中國大陸的作家和學者，十多年來一直堅守著這個立場，從來不曾動搖過，將來也絕不會動搖。

第三個說明：今天的臺灣十分熱鬧。臺灣的熱鬧也使得海外各派力量變得十分地熱鬧，甚至是十分地激烈。我雖然與臺灣的任何政黨沒有任何關係，但我還是希望臺灣能夠保住自己的民主，捍衛自己的民國，繼續為全中國和全民族作一個民主進步和民族進步的榜樣。因為他在我的心裡，就是一個三民主義的模範省，是痛苦的大陸人民志在追求自由民主的一座燈塔。雖然我絕不會介入臺灣內部的任何矛盾和衝突。如果我贊成什麼或反對什麼，那都是站在我自己的民族立場上，與臺灣任何政治派別相互間的紛爭沒有任何關係。

這就是我簡單的三個說明。有了這三個說明，下面我就會講得自由起來，既不用逢迎誰，也不害怕得罪誰了。

今天我講演的題目叫做「中國命運與臺灣前途」。要想講中國命運，就必須明白從 20 世紀初到現在的近一百年，不用諱言的是，中國歷史上出現了「兩個中國」。1912 年的 1 月 1 日，創建了中華民國；1949 年的 10 月 1 日，又出現了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他們雖然是先後出現的，可是直到今天為止，他們卻分裂分治甚至是對立在海峽兩岸。所以要想瞭解現代中國的命運，我們便不能夠不把這這兩個中國的命運

理清楚；不能不把這兩個中國的性質看清楚。只有把這兩個問題搞清楚了，我們才能從這兩個中國的各自命運裡面，既看到我們民族和國家的過去和現在，也能看到我們這個民族和國家的未來。特別是現在，當很多朋友連對「中國」這兩個字都發生了疑惑，甚至認為歷史上並不存在有所謂「中國」這樣的國家時，特別是將 1949 年由一個外來政黨在中國篡立的那個「馬列中國」當成我們的「祖國」時，這種「理清和看清」，也就顯得更加地重要了。

因此，為了能夠真正地認識到，在漫長的東亞歷史上，從來就存在著一個中國，他就是逐漸發展形成的偉大中華民族的民族國家。對此，我們當然還是要從歷史裡面尋求答案和證明。

一、中國是中華民族的國家

現在我就講第一個問題：**中國是中華民族的國家。**

那麼，什麼是中華民族？按照著名的前輩歷史學家陳致明教授的定義來說，便是：起先是以華夏民族和華夏民族文化為主體，其後則是以傳承了華夏的漢民族和漢民族文化為主體，長期團結融合周邊民族及其文化而發展搏合而成的一個東方宏大民族。

什麼是中國？

第一，準確地說，中國，就是「中華民族的傳統國家概念」。為什麼？因為，中國由中華民族成長歷史上的所有朝

代、國家所組成，又為中華民族發展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的朝代、國家和境外政治集團所認同。至 1912 年大「中華民國」創建，他從未做過中華民族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和任何一個國家的國號，但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朝代和國家都承認自己就是中國。只要打開 2500 年前中國的歷史文獻，看一看「一經三傳」，即：孔子《春秋》和《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我們就能夠得到太多的證明。

一個證明是：約 3000 年以前所創建的大周封建王朝，便已經承認自己就是中國。約 2600 年前，周惠王就曾對楚成王說：「鎮爾南方夷越之亂，勿侵中國！」

另一個證明：就是大周朝分封的各諸侯國，都承認自己是中國，或是屬於中國。曾協助齊桓公稱霸諸侯的著名政治家管仲，就曾誇耀說：「齊侯保中國而攘夷狄！」這是世界歷史上最早的「尊王攘夷」口號，比日本明治維新時代的「尊王攘夷」口號，早了 2500 年左右。

還有一個證明是，大周「君主封建王朝」的境外政治集團承認大周及其所屬的各封建國家都是中國。因為在春秋的內亂和兼併時期，也就是封建制度已經走向崩解的歷史時代，其時，地廣勢強、又富蠻夷之性的楚國，就曾宣言說：「我蠻夷也。今諸侯相侵、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雖然，楚國後來也成了中國的一部分。這已然說明，在大周一朝，境內境外部已經承認有一個「中國」的存在。

當然，歷史上都稱秦始皇在西元前 221 年統一中國，而

沒有說秦始皇創建了中國，更不會說秦始皇統一了秦國，或統一了趙國、魏國……。這個說法的本身也已經證明，當時的各諸侯國加起來，才是中國。秦始皇只是統一了他，而不是創建了他。也就是說，在秦之前，就有「中國」這樣一個傳統的甚至是完整的「國家概念」的存在了。

還有兩個突出的例子，就是蒙元和滿清。這兩個朝代，雖然曾先後滅亡過中國的大宋朝和大明朝，開國之初，甚至也曾想徹底滅亡中華民族，斷掉整個中國的國統，消滅中華的文字和文化，但他們還是先後都接受了漢族的文化，歸化了中國，承繼了中國的國統，將自己也視為中國歷史上的一個朝代，直至連自己的民族都為中國所同化，康熙大帝就自認是中國的千古一帝，連慈禧太后都認為自己是中國的千古一后呢！

第二、準確地說，中國，還是「中華民族的整體國家概念」。為什麼？因為中華民族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任何一個國家——包括分裂時期的朝代和國家，甚至是彼時的境外政治集團，都承認有一個整體中國的存在，即「一個中國」的存在。並且，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任何一個國家——包括分裂時期的朝代和國家，都承認自己是他的一個部分；他們都曾爭奪過這「一個中國」的正統地位，都不願意放棄這一地位，更沒有宣稱自己不屬於這「一個中國」。

歷史的事實是，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不論是「一朝數國」，如封侯建國的的大周朝和漢初劉邦王朝的部分封侯建

國；還是「數國一朝」或「數國一代」，如多朝多國並存的魏晉南北朝時代；也就是說，中華民族歷史上所有的朝代、國家，不論是大一統者，還是分裂分治者，他們雖各有朝號和國號，但都承認自己是中國，或是中國的一個部分，而不會說，他們是另一個中國，或不屬於中國。

大家都知道「五胡亂華」的歷史故事。但是，被稱為鮮卑、氐、羌、匈奴，羯的這五個民族，由於他們一方面大都保持著原來的部族組織和強悍民風，一方面又多接受了中國的語言文化，有了漢人的政治頭腦。所以，劉氏五郡匈奴裡第一個舉兵起事的左部大單于劉淵，由於他熟讀五經、左傳、孫吳兵法、諸子百家，其學問淵博，儼然為一中國士大夫，所以，他起兵造反發表宣言時，就曾公然以漢家子孫自居，尊劉邦為「我太祖高皇帝」，立高祖以下三祖五宗之神主而祭之，建國號為漢，更以恢復漢統為己任，絕不否認「中國」的存在。還有，北朝的魏武帝和梁武帝，就曾提出和實行「宗周」，也就是藉承認中國的大周朝來承認中國；北魏孝文帝拓跋宏，還強迫鮮卑人接受漢人的衣冠文物，令鮮卑人習漢語，改漢姓，與漢人女子結婚，死後屍骨都要埋葬在「中國」，都要做中國人。如此，他們當然也就不會反對中國，不會不承認自己是中國或中國的一部分。也就是說，他們不會說自己所建立的國家是另外一個國家，而不是中國，更不會說「與中國從來就沒有任何關係」。

在宋代，先是被漢化的北方遼朝要和宋朝爭中國的正統。

金滅遼後，迅速被漢化的金也要和宋朝爭中國的正統。至於當時的西夏一朝，竟然至始至終地要和大宋朝爭奪中國的正統，就是自稱他也是中國。

即便是中國的歷代農民造反英雄們，他們在起義造反，並企圖建立一個新的朝代時，他們反的僅僅是當朝的統治者，想推翻的也只是當時的朝代，而不是中國，更不會勾結外族外邦、認外邦外族為祖宗，反過來背叛和消滅中華民族的中國。他們也只是想在中國建立一個新的朝代罷了。反對元朝異族殘暴統治的義軍領袖朱元璋，所舉的造反大旗，就是「驅除胡虜，恢復中華」，也就是要重建中華民族自己的中國。接受過洋教、並將「西洋宗教與中國農民造反實踐相結合」^{註2}的洪秀全，他所創建的宗教組織「拜上帝會」，就沒有成為國際天主教廷的一個分庭或一個支部，更沒有承認他們的祖國不是中國，而是歐洲的天主教廷；當然，也沒有說他的太平天國不是中國，或是另外一個中國——一個不承認中華民族、卻承認歐洲教廷是自己祖宗的中國。他不過是要站在中華民族的立場上，將滿清視為清妖外族，而希望重建中華民族自己的中國而已。

洪秀全是這樣，李自成也是這樣。雖然他推翻大明朝，要在中國重建新朝，但他絕不與關外的滿清相勾結，來滅亡中華民族的國家——中國。在他們的心裡永遠只有一個中國，這個中國是既不能滅亡也不能出賣的。這便是「一個中國」、即「一中」的歷史由來，歷史形成，甚至的歷史的驕傲。

當然，也有後來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之一部分的民族，如越南。他雖然在西元 1 世紀至 10 世紀的上千年間，曾大部為中國所統治，但唐末五代十國的歷史混亂期間，曾擊敗南漢的軍隊，並從此獲得民族獨立，脫離了中國。這在中國的歷史上，應該說是極少有的事情。

綜上所述，我們理應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就是：中國既是中華民族的傳統國家概念，則又是中華民族的整體國家概念。在歷史上，自從中華民族開始有了自己的國家，這個國家就是中國，並且從來就只有這「一個中國」。

二、兩個中國的出現及其不同的性質、歷史和命運 ——兼述歐洲四大共和國的歷史和命運

1、兩個中國的出現

1912 年 1 月 1 日，由於中國的辛亥共和革命，順應世界民主大潮，推倒了君主制度，草創了共和國家，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國號正式定為「中華民國」，意為「中華民族的民族國家和中國人民的民主中國」。中國，由此才開始成為中華民族國家的一個正式國號，一個獨立的和完整的國家名稱，而不僅僅是「中華民族的整體國家概念或傳統國家概念」了。

但是，1931 年 11 月 7 日，前蘇聯又像 1919 年春天在匈牙利和德國境內篡立他的附屬國「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與「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一樣，在中國境內的江西瑞金，

假手第三共產國際的「中國支部」，就是被他所命名的「中國共產黨」，如法炮製了一個附屬於他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又稱「蘇區」，意即「由前蘇聯在中國直接掌控著政治權力的地區」。第二天，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米夫就在前蘇聯《真理報》發表祝賀文章說：「……這次蘇維埃代表大會，顯示了『另一個革命中國』的存在！」於是，第二年，日本有樣學樣，仿效前蘇聯和中共在中國的東北篡立了附屬於「滿洲國」，但不承認自己是中國。全面抗戰爆發後，日本又指使漢奸汪精衛在淪陷的南京策劃篡立了日偽南京政權，雖自稱是「中國」，但國人只認定他一個漢奸政權而已。

後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篡立者，又於1949年在中國大陸改國號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號取的仍然是前蘇聯「衛星國」的模式，奉行外族倒退的思想意識形態——馬列主義——以統治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宣稱自己是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一員，雖不再好意思再自稱是「蘇區」，卻在他們的「革命歷史和革命傳統」教育中，持續地和熱烈地歌頌他們的「前蘇區」和他們的「前宗祖國」即「前蘇聯」。1949年，被打敗的中華民國南京國民政府敗守臺灣，國號仍為中華民國。這樣，「兩個中國」便從此出現了。

但是，要想說清楚「兩個中國」各自的歷史和命運，我以為，首先則應當從歐洲幾大共和國的共同性質和共同命運，來看第一個現代中國——大中華民國的性質和命運。因為，

有了這樣一個「參照物」，我們便能夠一眼看清現代兩個中國的性質和命運，而不會再受矇騙和欺騙。

2、歐洲四大共和國的性質和命運

既然如此，歐洲幾大共和國的共同性質和歷史命運又是怎樣的呢？

就共同性質而言，一言以蔽之，他們都是順應人心潮流，推翻了專制才建立起來的共和國。其中，以後期的「推翻君主、走向共和」的「直截了當共和」為多，以早期的「君主立憲，虛君共和」的為少。但不論是不要君主的共和，還是要留住君主的共和，都如孫文所言：「均為革命之所賜」。因為，沒有共和革命，君主不會被推翻；沒有共和革命，君主也不會向人民讓步。

但是，歐洲的幾大共和國，卻不是一推倒了君主，就實現了共和，保住了共和，甚至是永遠地擁有了共和的。誠如我在《誰是新中國》一書的「自序」中所說過的那樣：

「……我發現，在民主革命初造成功、共和國體初獲創建之後，將仍然存在著民主革命與專制復辟的反復較量、持續較量和殘酷較量這樣一個艱難歷史進程。在這個歷史進程中，由民主革命初造成功而創建的共和國體，完全有可能為形形色色的專制復辟勢力所推倒，從而在一定歷史時期內，甚至是在革命的名義之下實現王位、王權、王朝和專制制度的公然復辟、變相復辟、或全面復辟。直至能夠因復辟的成

功，而將整個專制統治推向歷史的瘋狂階段……。」

這就是歐洲幾大共和國的共同命運，而且是世界所有「有專制歷史的國家，在走向共和的道路上，所呈現的共同政治現象」。顯然，孫文推翻滿清而創建的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大中華民國，也不會例外。我們且簡單地按照年代的順序，先來看看歐洲的英、法、俄、德這四個具有代表性的大共和國，看看他們的命運是否真的如此。

英吉利共和國

我們先來看一看英國是如何艱難地走向「虛君共和」的。1641年，因爆發清教徒革命，而引發了共和革命。因為國王查理一世號召勤王，首先挑起內戰，英國革命才不得不採取了國內戰爭的形式；也因為國王數度聯合保王黨和蘇格蘭幫助他復辟，才招致了英國人民對他的審判，並終於將他砍頭，其結果就是：1649年5月19日，英國國會以法律形式莊嚴宣布：「英國的人民和隸屬於他的領土及地區的人民，將由此而建立和團結為一個共和國。」——英吉利共和國誕生了！由此而判定16世紀中葉在英國所爆發的清教徒革命，在發展到建立共和國的階段，就已經是「共和革命」，也就言之不虛。

然而，「英吉利共和國」，雖因革命而生，卻為復辟而死。因為，這個在共和思想遠未成熟，共和的建國理論甚至還「子虛烏有」的時代，就已經誕生的共和國，創建伊始，就立刻迎來了國內外復辟勢力的公開反撲。

1660年4月4日，查理一世的兒子查理二世，終於在蒙

克的軍隊支援下，在布雷達發表了「復辟宣言」，推翻了英吉利共和國，宣布了英國斯圖亞特王朝的復辟成功。斯圖亞特王朝復辟君主專制制度整整 28 年。歷史記載了復辟時代英國的種種痛苦和人民的重重災難。

1688 年，英國由政變而爆發和平革命，史稱「光榮革命」。復辟的王朝專制統治終於被推翻——查理二世的弟弟詹姆士二世逃往法國，他的女婿——荷蘭執政威廉與妻子瑪麗率軍入主英國。為了防止新國王復辟專制制度和重奉天主教為國教，更為了確立君主立憲的「有君共和制度」，英國國會制定了一部「限制王權和保障民權」的憲法，即「權利宣言」，又稱《權利法案》，從而開啟了從「有君共和」走向「虛君共和」的歷史進程。而「光榮革命」之所以光榮，一是因為「歐洲之君主立憲均為革命之所賜」（孫文語）——正是革命的壓力，才使得王朝接受了歷史教訓和人民要求；二是由於人民的理性力量占了上風，才保證了歷史的明智選擇，不再讓紛亂和流血成為英國革命的代名詞。

其後，不論是詹姆世二世的兒子詹姆世·斯圖亞特謀求復辟，還是詹姆世二世的孫子查理斯·斯圖亞特，竟然男扮女裝地潛回英國，發動叛亂以圖復辟，均遭遇了失敗。專制的君主統治，終於在英國成為歷史。並為我們這個世界開創了一個「在王冠下從專制走向民主的過渡形式」。

需要記住的是，英國從清教徒革命開始到光榮革命為止，一共經歷了 48 年的艱難反復歷程，歷經三次未成功的復辟，

和 28 年成功的專制復辟統治，而英吉利共和國只存在了短短的 11 年，就不復再生。但是，英吉利共和國的意義，卻在於，他草創了共和的國家，留下了共和的歷史，啟迪並推動了共和思想的發展與成熟，為英國後來走向「虛君共和」奠定了歷史基礎。

特別應該說明的是，正是在英國革命與復辟反復較量的艱難歷程中，甚至是在復辟王朝倒行逆施的歲月裡面，英國的知識份子們，方由於共和的政治魅力及共和國滅亡的悲劇，而越來越從思想上認識到，創建一個共和國所必須的理論建設，和捍衛一個共和國所必須的法理基礎。由是，霍布士提出了「社會契約論」，從根本上否定了專制王權；洛克創立了「分權學說」，倡行君主立憲，提倡平等、自由和保護私有財產；漢·密爾頓建立了「人民主權學說」，提出了自然權利和主權在民的初步理論，為英國「有君共和制」的確認和確立——即創建和鞏固「世界上第一個共和的新政體」，特別是為未來的美國獨立革命、法國共和革命——從「有君共和」走向「無君共和」的又一個巨大歷史性進步，奠定了共和革命的理論基石。

法蘭西共和國

大家都知道：1789 年 7 月 14 日，巴黎爆發共和革命，人民攻占了專制王權的象徵——巴士底獄。1791 年 9 月，法國革命企圖效法英國，確認君主立憲和三權分立，頒布了《1791 年憲法》，於是，法蘭西王國也出現了一個試圖走向「虛君

共和」的新政體。

但是，法王路易十六卻勾結歐洲君主（普、奧、俄）企圖推翻君主立憲。法國徹底的共和派——雅各賓派，面對歐洲反動同盟對法國及其新制度的進攻，和國王與王后對祖國的出賣，遂以「祖國在危急中」號召護國、護法，處死國王和王后，決心實行「直截了當之共和」。

1792年9月22日，徹底的共和派雅各賓派創建了「法蘭西共和國」，史稱「法蘭西第一共和國」；頒布了「法蘭西共和國憲法」，即1792年憲法，創立了「直截了當的共和制度」。然而，由於保王黨煽動王政復辟，落後的農民回應王朝復辟，打著「我們不能沒有國王」的旗號向巴黎進攻，歐洲的專制君主們害怕法國革命，試圖各方聯手以撲滅法國革命及其成果，共和國的執政者們方決心找到一把「利劍」，來捍衛共和的法蘭西。

1799年11月9日（霧月18日），年輕的革命將軍拿破崙從埃及被召回巴黎，但這一把「利劍」，卻藉此迅速地走向了軍事獨裁。

1804年，拿破崙終於公然地推翻了法蘭西共和國，建立了法蘭西帝國，史稱「法蘭西第一帝國」，復辟了君主制度。法蘭西共和國和法蘭西的共和制度，因此而滅亡了整整10年。

1814~1815年，拿破崙兩次戰敗，甚至為歐洲的君主們所俘虜，他的法蘭西帝國也就隨之滅亡。於是，法王路易十六

的弟弟——普羅旺斯伯爵，便在歐洲專制君主的幫助下，復辟了波旁王朝，實現了王政復辟，史稱路易十八。已經滅亡了 10 年的法蘭西共和國和法蘭西共和制度，因此而繼續滅亡了整整 16 年。

1830 年 7 月，巴黎再次爆發共和革命，人民高喊著共和國萬歲的口號，推翻了復辟的波旁王朝，迎來的卻是奧爾良公爵路易·菲力普所建立的 7 月王朝。路易·菲力普恢復的是革命初期的君主立憲，實行的仍然是與共和差之萬里的君主政治。於是，法蘭西共和國和法蘭西的共和制度，又繼續滅亡了 18 年。

1848 年 2 月，巴黎又一次爆發革命，人民再度高喊著共和國萬歲，不僅推翻了七月王朝，而且重建了法蘭西共和國，史稱「法蘭西第二共和國」。拿破崙的侄子路易·波拿巴當選為法蘭西共和國總統。但他卻懷揣著復辟帝制之夢，開始了他的獨裁統治。

1852 年底，路易·波拿巴強迫公民投票，再度復辟帝制，重建他叔叔的法蘭西帝國，史稱法蘭西第二帝國。於是剛剛獲得重建的法蘭西共和國和他的共和制度，又滅亡了整整 18 年。

1870 年 9 月 2 日，法蘭西第二帝國在色當被德國威廉皇帝戰敗，路易·波拿巴被俘。

1870 年 9 月 4 日，巴黎再次爆發共和革命，迅速地推翻了復辟的第二帝國，在共和國萬歲聲中第二次重建了法蘭西

共和國，史稱「法蘭西第三共和國」。

其後，在 1870 至 1889 的 19 年間，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又歷經了共和與專制的五次艱難較量，終於獲得了反對形形色色復辟要求的勝利，最後地確認和確立了法蘭西第一共和國的國統與法統，法蘭西共和國在歷經了與形形色色專制復辟勢力整整一百年艱難反復的較量歲月之後，終於將共和國的國統與法統一代又一代地永遠傳承下去了。

需要記住的是，法蘭西共和國，這個在全世界開闢了「直截了當之共和」的偉大共和國家，卻在這一百年中，滅亡過兩次，滅亡了整整 62 年整。反過來說，就是形形色色的專制復辟，捲土重來整整 62 年之久。但是，共和還是最終地戰勝了專制。如果說英國創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共和的新政體」，法國則創建了世界上第一個「共和的新國家」。

俄羅斯共和國

眾所周知的是：1917 年 2 月，俄國曾爆發共和革命，推翻了沙皇君主制度，結束了羅曼諾夫王朝長達 304 年的殘酷專制統治，創建了「俄羅斯共和國」。為此，曾擔任臨時共和政府總理的克倫斯基後來回憶說：「……1917 年 2 月 27 日是一個長遠而痛苦歷程告終的標誌，從不折不扣的專制政治轉入了絕對的民主政治。這一切，在一天以前還是一個遙遠的夢，現在，突然之間就實現了，而且實現得如此徹底……。人民已經獲得了政權，人民自己充當了俄國的主人。」

1917 年 10 月，列寧在數度武裝叛變 2 月革命不成之後，

終於領導了成功的 10 月背叛，即所謂的「十月革命」，徹底地埋葬了俄國二月民主革命的偉大共和成果——「俄羅斯共和國」及其正在建立的共和制度，全面地復辟了專制統治，建構了教政合一的極權專制制度，俄羅斯及其周邊許多民族，也從此陷入了漫長的血腥之夢，「留下了民族歷史上史無前例的世紀性羞恥」（葉利欽語）直到 1991 年 8 月，共產沙皇王朝——前蘇聯一朝崩潰，俄羅斯人民立即繼承了 1917 年 2 月民主革命所創建的「俄羅斯共和國」。74 年前曾高高飄揚在俄羅斯上空的俄羅斯共和國國旗——「紅藍白三色旗」，才又重新飄揚在今日的俄羅斯土地上。

我們需要記住的是，俄國在共產革命名義下的專制辟長達 74 年，但一朝崩潰之後，俄羅斯人民所選擇和繼承的，竟仍然是俄羅斯民族的第一個共和國——俄羅斯共和國的國統和法統。由此可見，如同法國一樣，第一共和的歷史魅力，不可謂不大。

德意志共和國

熟悉德國歷史的人都知道：

1919 年 2 月，德國爆發共和革命，推翻了第二帝國，創建了「德意志共和國」，歷史上又稱「魏瑪共和國」，同時頒布了《魏瑪憲法》，被稱為世界上最民主的憲法之一。

1919 年 4 月，前蘇聯為保護自己，禍害他國，在 1919 年 3 月剛剛建立了「第三共產國際」之後，即採行立即在歐洲發動共產革命的謀略，策劃了匈牙利和德國巴伐利亞地區的共

產革命。在德國，他們猶如在匈牙利一樣，公然地命令和指揮德國共產黨，在共產革命的名義下，發動武裝暴動，篡立了所謂「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意在推翻剛剛建立的「德意志共和國」，廢除共和的魏瑪憲法，建立一個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專制復辟政權。雖然迅速地遭遇了失敗，但是，他卻在德國開啟了「以共產革命和共產制度來復辟專制統治和專制制度的先例」（這個先例在 1949 年的東德成為事實），和在蘇聯境外別的國家發動共產革命以消滅他人民族、推翻他人國家、顛覆他國共和的惡例（例如前面所說的，策劃和命令中國共產黨在「九一八」之後，於中華民國江西瑞金地區篡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1920 年 3 月，原東普魯士地方長官卡普發起暴動，也要推翻德意志共和國，復辟第二帝國，失敗未成，卡普也死在獄中。前者假革命之名義以武裝復闢專制，和後者企圖公然武裝復闢帝國的夢想，均遭破滅。

1933 年，希特勒正式上臺後，即開始迅速地「毀法」禍國，他打著「國家社會主義」的招牌，「陽冒共和國統之名，陰行專制極權之實」，沒有復辟第二帝國，勝似復辟第二帝國；沒有建立第三帝國，勝似建立第三帝國；既毀滅了共和，也毀滅了德國，直至禍害了全世界。

1945，德國戰敗，希特勒獨裁政權滅亡，德國被迫分裂分治。

1949 年，西德宣稱「繼承德意志共和國」的國統，承認

共和的「魏瑪憲法」，建立了民主的德國，即「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東德卻在在蘇共操縱下，在共產革命的名義下，打著民主的旗號，建立了一個全面徹底地復辟了專制制度、建立了極權統治的共產黨德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

1989年10月，東德共產黨政權垮臺。

1990年，東德自願併入西德，德國遂走向「民主統一」。於是，德國的現代史告訴我們：德國自1919開創共和，到1990年兩德走向「民主統一」，其間71年，真正的和統一的共和國只存在了14年；復辟了專制的獨裁「共和國」——希特勒第三帝國，存在了12年；未能統一的和真正民主的共和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存在了41年；專制的共和國——共產黨的東德也存在了41年；國家分裂44年，包括1945至1949年的軍事占領期。

值得我們記住的是，雖然共和國與共和制度在西德滅亡了16年，在東德則滅亡57年，然而，德國一旦走向民主統一，他繼承的就仍然是的第一共和即「德意志共和國」的建國道路；傳承的也仍然是「魏瑪憲法」所抉擇的憲政制度。可見，「第一共和」，乃是何等地可貴。

這四大共和國，基本上代表了整個歐洲近代走向共和的歷史進程。他告訴我們，走向共和的道路不會一帆風順；形形色色的專制勢力，勢必反撲甚至能夠數度復辟成功。但是，專制最終一定滅亡，共和最終一定能夠實現。不論他是直截

了當的共和，還是從實君共和走向虛君共和。而最重要的，就是要擁有對共和的信念和為共和奮鬥的決心，要能夠識別形形色色的專制復辟，並能夠在專制復辟的黑暗中，敢於為共和民主的最終實現奮鬥到底。

3、大「中華民國」的性質、歷史和命運

現在我們可以敘述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大「中華民國」的艱難共和進程，以與歐洲四國的共和進程作一個簡單的比較了。而我之所以要在中華民國這一共和國號的前面加上一個大字，明確地說，一是有根據——孫文就任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時發表的就職宣言，其落款就是「大中華民國臨時總統孫文」；蔣介石在中華民國偉大衛國戰爭勝利之時所發表的一些文告中，也曾數次署名「大中華民國」。二是為了區別近 20 年來，已經對中華和中國（非共產黨北京政權）離心力愈來愈強的中華民國臺灣地區，藉以排除臺灣「分離」和「親共」兩大政治實勢力對大陸人民反思我大中華民國、直至決心重建我大中華民國的不應有干擾；三是有利於中國大陸人民重新認知亞洲第一共和國——大中華民國的國統與法統的進步性和重要性，以確立對亞洲第一共和的信念，和中國必將走向民主和統一的信心。

先說大中華民國的性質

與歐洲四大共和國一樣，都是順應人心潮流，推翻專制、結束帝制而創立的共和國家。而在亞洲，則是第一個開始走

向共和的共和國。因為，中國曾存在了 2100 年的君主帝制因此而結束，一個少數部族對全體漢民族的 260 年專制統治被推翻；中國在政治上從沒有總統、國會、政黨，到有了總統、國會、政黨，其中僅在民政部註冊的自由政黨就達 85 個之多；中國從只有晚清的專制改良型經濟，到終於可以建立自由的市場經濟，建國之後短短的八年間，其產業投資總額已經超過晚清改革開放 40 年投資的總和；中國從人民只能享有有限度的思想輿論和出版自由，到思想輿論出版自由的全面開放。辛亥之後的人民已經完全可以做到，上可以批評總統，下可以揭露時弊，這是袁世凱復辟帝制僅僅 83 天就只能被全國人民「氣死」的根本原因。中國從文化的相對自由，終於走向了對多元文化的大開放，白話文運動發動在大中華民國，新文學運動成功在大中華民國，和五四愛國民主運動成功在大中華民國的不爭事實，已對此作出了最有力的證明（關於中華民國創建後中國的政治、思想、文化、經濟的狀況，詳見《誰是新中國》一書有關章節）。而這一切，都是在 1949 年後被中國共產黨掃蕩得乾乾淨淨的。

再說大中華民國的歷史和命運

眾所周知：

1912 年 1 月 1 日，孫文領導的中國共和革命，終於推翻滿清，結束帝制，創建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大中華民國。

1912 年 4 月 1 日，大中華民國臨時總統孫文本「天下為

公」的理想，為人民禍福與國家統一，在袁世凱「永不使專制政體復行於中國」的煌煌保證之下，將臨時總統讓給了袁世凱。這是中國歷史上自有堯舜相讓的政治美談以來，唯一的一次對「天下為公」的身體力行。但袁世凱得到了臨時總統的大位之後，就像拿破崙一樣，仗著他的軍事實力，開始緊鑼密鼓地開始了復辟帝制的倒行逆施。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凱終於公開復辟帝制，推翻大中華民國，建立「中華帝國」，復辟君主制度。全國人民因「寶愛共和、厭棄專制」，奮起反對復辟，袁的中華帝國僅83天即被推翻。大中華民國只「滅亡」了83天。

1917年7月1日，張勳擁滿清遜帝宣統復辟滿清和君主制度，宣統頒詔天下廢中華民國國號與國體，全國人民猶因「痛恨滿清、嚮往民國」，舉國上下，同仇敵愾，滿清復辟11天即失敗流產。中華民國僅「滅亡」了11天。

1917年至1928年，一方面是北洋及大小軍閥們的連續混戰，毀法禍國；一方面則是中國人民持續護國護法，直至北伐打倒軍閥成功，重建大中華民國南京政權。其間，由於任何一家有野心的大軍閥，都不敢再作推翻大中華民國的嘗試，只敢在民國的國號與國統之下，「假共和之名義，以行專制之實」，實行軍事獨裁制度，大中華民國的共和法統雖然混亂了幾17年，但「大中華民國」國號與國統猶存。

1928~1949，大中華民國雖然內憂外患，但安內攘外有成，經濟建設有功；更因抗日衛國戰爭的勝利，得以廢除所

有不平等條約，並成為世界反法西斯四強之一和聯合國創始會員國。中國人民是真正地開始站起來了。要不是共產黨借民族戰爭之機而準備內戰，民族戰爭勝利之日就立即發動了內戰，用一輩子愛共產黨、仇國民黨的美國中國現代史研究泰斗費正清死前兩天的話來說，就是：「要是沒有日本帝國對中國的長期侵略和瘋狂侵略，中國國民黨是能夠將中華民國推向民主憲政的道路上去的。」當然，他所說的中國國民黨，自然是 1949 年前蔣介石領導的中國國民黨，而不是 1987 年蔣經國死後在臺灣的那個所謂的中國國民黨。

1949 年 10 月至今，大中華民國廣袤的大陸本土，慘遭共產革命名義下的專制復辟，從此，中華民國的國號被共產黨廢棄，中華民國的國統和法統被共產黨徹底拋棄，人民淪陷專制暴政長達 57 年。其間，在外族馬列思想和專制復辟政權的殘酷統治之下，人民被逼、被害、被處決而死者，據最保守的估計，竟達八千萬之多。

同時期內，大中華民國南京政權因敗退臺灣，而建立臺北政權。在兩蔣時代，持續堅守「大中華民國的國統與法統」，把臺灣建設成了中國第一個「三民主義的模範省」。在全世界，凡有華人處，就有「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大中華民國國旗在高高飄揚。據此可知，由孫文創建的亞洲第一個共和國——我們的大中華民國不僅沒有「滅亡」，而且享有歐洲四大共和國所不曾享有過的幸運。

我們理當牢牢記住的是，自 1912~2006 年，中華民國共

95 年間，就算是因袁氏復辟和張勳復辟而總共滅亡 94 天，因軍閥混戰造成共和法統混亂 17 年，因共產黨的專制復辟而淪陷大陸 57 年，因海峽兩岸兩個中國對峙而使國家分裂 57 年。儘管如此，將我們的大中華民國與歐洲四大共和國作一對比，顯然是命運相同，歷程一樣。只不過，人家已經完成了共和，走向了共和，我們還處在走向共和之最後的和最艱難的歷史歲月之中。

朋友們，我們現在最需要的就是「走向共和」的信念和「完成共和」的信心了！

4、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性質、歷史和命運

世界上的事情，大多數都是有比較才有鑑別。要想看清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性質和命運，首先就要瞭解，現代馬列黨族國家是怎麼來的？這就是我首先要說的：

現代馬列黨族國家的興起和擴張

孫文曾說：「共同的信仰和相同的宗教，也可以形成民族。」猶太人亡國不亡族，不論顛沛流離到何種地方，都還是猶太人，甚至 2000 多年後，還能重建以色列國家，就是因為猶太人擁有共同的宗教。中東的許多國家之所以都成了伊斯蘭教國家，也是因為這些國家的人民都擁有對伊斯蘭教的信仰。雖然，一些伊斯蘭教的國家依然傳承著教政合一的政體，但那不過是「中世紀教政合一」的殘餘形式而已。

孫文還說道：「要想消滅一個民族，首先就要消滅這個

民族的思想。」也就是說，消滅了一個民族的思想信仰，這個民族就有可能徹底被消亡。共產黨國家對境內各民族思想信仰的企圖消滅，實際上就是要消滅各個民族，並將他們變成馬列一族而已。

現在我就說「現代馬列黨族國家的興起和擴張」。

就「興起」而言：馬克思主義不單是近代歐洲一些「社會主義者」的共同信仰，而且是這個世界上所有共產黨人的共同信仰。所以，準確地說，世界上一些國家的馬克思主義信仰者，就正是在這樣一個共同的信仰之下，才形成了一個在名義上被稱為「主義」的現代新宗教，即「馬教」，對我們中國來說，則是一家來自西方的「洋教」。然後，分散在一些國家的共產黨人，才會因擁有一個共同的信仰，而在近代政黨政治的大潮之下，於各國以教建黨，從而在這個世界上形成一個跨地區、跨國家的信仰集團。由於這個信仰集團——各國的共產黨，公開不承認自己有祖國，公開宣稱他們「要得到的是整個世界」，更宣稱要在全世界發動共產革命並在全世界奪取政權，還要在全世界實現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所以，這個信仰集團，就又成了一個跨國家和跨地區的政治集團。由此，他們便超越了各自的民族，而日漸地「以黨成族」，從而在這個世界上造成了一個「馬教黨族」的形成。然後，各國的馬教黨族，均依照馬教的教義——暴力革命、階級鬥爭、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以實現共產主義的信條，而發動革命，奪取政權，以建立一個個所謂的社會主義國家、即

共產國家。「馬教黨族國家」也就因此而興起了。

必須注意的是，與歐洲歷史上所遺留下來的宗教教廷一樣，歐洲各國的共產黨，在創黨之初，就聯合建立了自己的最高「教廷」，即「第一國際」和「第二國際」，特別是在俄國共產革命成功之後，又迅速建立了一切均需要聽命於前蘇聯的第三共產國際，並由這個「第三國際教廷」來發動、支援和指揮全世界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即世界無產階級共產主義革命。這個運動和這個革命，不僅要在各國建立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還要根據馬教的著名教義，與各民族國家的「一切傳統觀念決裂」，就是不僅要顛覆他民族的國家，還要顛覆他民族的思想、文化及其傳統，就是要滅他人之民族。如此，在實際上，一個猶如「伊斯蘭教國家」一樣的「馬教黨族國家」，或曰「馬教黨族連鎖國」，即所謂的「社會主義陣營」，也就隨著他們的共產革命的勝利，而日漸地形成在這個世界之上。

需要說明的是，根據信仰的原則，馬列黨族國家的共同教主，當然就是馬克思。但由於列寧是第一個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根本教義發動共產革命成功，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共產黨國家的領袖，在理論上他又是原教旨馬克思主義的真正傳人，在實際上他又是第三共產國際教廷的建立者和第三國際教廷的最高教主，而第三國際教廷又必須聽命於前蘇聯共產黨政權和共產黨領袖——列寧和史達林，甚至正是因為前蘇聯的發動、支援和指揮，才真正開始了在東歐和東亞一些

國家的革命奪權勝利，所以，前蘇聯共產黨和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們，就常常將馬列並稱，而將馬克思主義習慣地稱為馬列主義。如是，馬教黨族，也就自然而然地變成了馬列黨族。馬教黨族國家也就成了馬列黨族國家。

有兩點還是應該予以說明的。就是我們需要瞭解：一是馬列黨族興起與擴張的思想基礎和社會基礎，二是「共產主義乃是共和主義之死敵」這樣一個歷史關係。否則，我們就不能明白，為什麼馬列的共產革命，其主要者都是爆發在各國的共和革命之後，並且都是以「否定共和革命、推翻共和革命成果」為其目的、性質和特徵的。

所謂思想基礎，要是一言以蔽之，就是「專制時代農民的天生共產主義本能」。還有「傳統農業社會與傳統專制政治的關係」，及其本能地「對共和革命的反對和對共產革命的嚮往」。

我們還是用事實來說話。

第一個例子是，瞭解英國共和革命歷程的人，都瞭解英國共和革命中的「掘地派」。所謂掘地派，就是在英國革命中，特別是在英吉利共和國艱難創建之後，所出現的一個以要求「絕對平等」為政治目標的農民革命派別。他們在克倫威爾不得不以威權來反擊斯圖亞特王朝的公然復辟，以保衛「英吉利共和國」之時，這些來自英國農村的「天生的共產主義者們」，則於社會主義思潮在歐洲和英國尚未形成的時代，猶如中國的歷代農民造反革命一樣，要追求「均貧賤、等富貴」；如同

中國的農民造反英雄們一樣，建立一個人人都可以「大塊吃牛排、大碗喝啤酒」的人間天堂。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如果克倫威爾不是鎮壓了他們對共和的反叛，如果「掘地派」農民要推翻共和的革命成功了，在英國，將會如同中國歷史上的歷代農民革命一樣，建立起一個名稱不再是「斯圖亞特王朝」的另一個君主王朝。這顯然是世界共和革命歷史上，第一個要以「共產主義式的絕對平等要求」來推倒共和、重建專制的初期共產革命。雖然，他只是後來有主義和有理論的共產革命的雛形而已。

第二個例子則是 1793 年發生在法國共和革命進程中的旺岱叛亂。雨果的著名小說《九三年》就詳細地描述了這個旨在推倒法蘭西共和國的可怕農民叛亂。

熟悉法國史的朋友們都知道，不僅是歐洲的反動君主們和英國政府，曾連續組織了七次反法聯盟，企圖顛覆剛剛誕生的法蘭西共和國，扶植倒臺的波旁王朝在法國復辟君主制度；而且，法國的保王黨分子更是為了裡應外合，而不斷地在國內發動形形色色的叛亂，特別是煽動法國缺少文化的貧苦農民，於 1793 年在法國北部貧窮的旺岱地區發動了大規模的武裝叛亂。君主制度的社會基礎——法國農民們，竟然就高舉著「我們怎能沒有國王」的戰旗，呼嘯著向巴黎進攻，以圖一舉推翻法國共和革命的偉大成果——法蘭西共和國（史稱「法蘭西第一共和國」）。叛亂期間，擁有 80 個郡的法國，就有 60 個郡的農民向「共和國」舉起了叛亂的旗幟。

而由保王黨策動的造反農民們，猶如多年以後在俄國與在中國發生的農村共產革命一樣，他們解除國民自衛軍的武裝，殺死共和政府的地方官吏，焚毀共和地方政府的檔，僅里昂一地，就有八百名真正共和派人士——雅各賓派分子被他們殺害……。由此可見，近代共產革命的歷史基礎和社會基礎，就是農民革命；而農民的革命思想和農民的革命行為，不是旨在「推翻一個舊王朝，建立一個新王朝」，就是要以共和革命和共和政權為敵。在近現代世界共和革命與專制復辟的反復較量和慘澹較量之中，農民不僅總是站在共和主義與共和革命的反面，而且一再地和心甘情願地為企圖復辟的舊王朝勢力，和打著革命名義的新興專制復辟勢力所利用，比如共產革命勢力。在歐洲諸國如此，在前俄國如此，在中國更是如此。當然，我們如果將這裡的農民，解釋成為農村流民，可能更為適合。

第三個例子是發生在法國 1848 年共和革命勝利後的 6 月共產革命。就像英國革命期間的「掘地派」農民，因熱望「絕對平等」而為英國的共和革命製造過麻煩一樣；猶如 1793 年法國的「望岱農民叛亂」，早已經吹響過向「共和國」的進攻號角一般；彼時，在思想和社會兩個方面都已經「要成氣候」的社會主義者們，則率先將他們對共產主義烏托邦的熱望，化成了對所謂「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反叛和進攻。1848 年 6 月 22 日，也就是在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剛剛發表四個月之時，已經初步擁有社會主義思想和共產革命

理論的法國社會主義者們，便帶領著他們的「無產階級」，拿起武器，築起街壘，在巴黎街頭高喊起「打倒制憲會議、建立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口號。目標，則是對準了那個剛剛推倒「七月復辟王朝」，剛剛獲得重建的法蘭西共和國，就是「法蘭西第二共和國」，企圖在革命的名義之下，建立「無產階級的專專政」。然而，為了捍衛剛獲重生的法蘭西共和國，即「法蘭西第二共和國」，共和國新任軍政部長卡紛雅克派軍隊「無情地」鎮壓了「打著民主共和旗號的法國社會主義革命家們」，將他們「對法蘭西共和國的進攻」粉碎在「保衛法蘭西共和國」的名義之下。雖然直到今天，中共北京「洋教專制復辟政權」的御用歷史學家們，居然還在他們所撰寫的教科書中說道：「六月起義具有著明顯的無產階級性質，他是現代社會兩大對立階級的第一次偉大戰鬥……。」^{註3}

第四個例子，就是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創建之後的「巴黎公社造反及其反動原則」。如前所述，1870年9月4日，巴黎再次爆發共和革命，迅速地推翻了復辟的第二帝國，在「共和國萬歲」聲中第二次重建了法蘭西共和國，史稱「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其後，在1870~1889的19年間，法蘭西第三共和國雖曾歷經了共和與專制的五次艱難較量，並最終地獲得了反對形形色色專制復辟要求的勝利，最後地確認和確立了法蘭西第一共和國的國統與法統，並將共和國的國統與法統一代又一代地永遠傳承了下去，但是，在法國人民戰勝復辟、並終於創建了法蘭西第三共和國之後，第一個打著共產

革命的旗號，旨在推翻共和民主，建立共產制度，實現無產階級專政，即要「重建專制制度、實現專制復辟」的，就是1871年的巴黎公社造反。因為，巴黎公社造反，其明確的目標，就是要推倒那個剛剛推倒了專制復辟的第二帝國，並剛剛獲得再一次重建的法蘭西共和國。此其一。

其二，如同1848年6月的法國無產階級革命一樣，巴黎公社仇恨的是共和國的議會制度，反對的是三權分立的共和政體，要求的是將司法與行政合併，實行的是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即要建立一個「由無產階級來進行專政的專制復辟政體」。這才是巴黎公社的真正原則所在。

其三，巴黎公社「造反時」，賴以欺騙善良人心的是所謂的選舉制度。然而，選舉制度，或曰普選制度，乃是所謂「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政治制度，而不是「無產階級共和國」的政治制度，他為無產階級指稱的所謂「資產階級革命」所創制，所遵循，而為無產階級和共產主義者們所鄙棄、所推翻。就不說被無產階級和共產黨仇恨不已的「資產階級議會制度」，就是建立在「資產階級的選舉制度」之上的。反之，只需要將巴黎公社意在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原則略加思考，我們就會發現，一個旨在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體制，其「專政」之下還有選舉的可能嗎？近百年來，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是所有實行過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又有哪一國家，曾有過選舉，曾有過人民選舉產生的政府呢？如果有，那也一定是假的，不過是在表演選舉和欺騙人民而已，猶如

中共的那個「人民代表大會」一樣。

巴黎公社敗亡了。讓我們設想一下，假如巴黎公社沒有失敗，那麼，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和無產階級的專政，不就是誕生在法國、而不是誕生在俄國了嗎？那麼，法蘭西人民還能夠擁有民主自由嗎？法蘭西共和國還要遭遇多久的、革命名義下的專制復辟呢？顯然，法國人民還是十分地幸運的。

上述的歷史事實，無疑已經告訴我們，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就是共和主義的死敵，儘管他打著「革命的旗號」，卻反動在「革命的名義」之下。而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不過是歐洲傳統農業社會理想的一個死亡前的迴光返照而已。其實質也不過是對 19 世紀歐洲歷史進步的一個倒退和反動。他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理論，消滅私有制和實行公有制的經濟理論，要做馬列思想統治「傳聲筒」的專制文化理論，要用階級性來消滅人性的人生理論，都是對歐洲 19 世紀「民主政治發展、自由經濟發展、多元文化發展和人性個性解放」的倒行逆施，或者說是全面復辟。

但是，一個頗令人迷惑的問題是，既然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是對歐洲 19 世紀歷史進步的反動，那麼，為什麼他又吸引了如此眾多的「善男信女」，並在世界歷史上，鼓動起了一股革命的狂瀾，以人類一億二千萬條的性命，為他做了一次瘋狂的試驗呢？何況，倘若沒有這樣一個試驗，就不可能有所謂馬列黨族國家的興起和擴張呢？問題到底出在哪裡？

答曰：問題就出在共和革命為自由經濟開拓了巨大的發展空間，自由經濟為工業革命的爆發提供了先決的社會條件。而工業革命卻造成了農村的破產，農村的破產又造就了從破產的農村裡不得已才來到了城市工廠裡的「新興無產者」，即往日的傳統農民們。誠如我在《誰是新中國》一書的導論中所述：

「必須明確的是，一個漫長的舊社會和舊制度的精神傳統，是斷然不會與這個舊社會和舊制度自身的物質形式同時走進墳墓的。一次革命固然可以推翻一個王朝，但一次革命卻絕無可能將與這個王朝有著千絲萬縷聯繫的種種傳統的思想、文化和觀念，同時送進墳墓。因此，從破產的農村裡走出來，脫下了農裝、又換上了工裝的『新興無產者們』，也就絕不會因為自己剛剛從農民變成了工人，便立即拋棄了傳統農民所固有的傳統精神甚至習慣，更不會像馬克思主義者們所一再宣揚的那樣，他們立即便擁有了無產階級所固有的「優秀階級品質」。相反，如果套用毛澤東的一句話來說，這些新興無產者們，因無不打上了傳統農民階級的烙印，因而才與農民有著天然聯繫；更與傳統農民一樣，有著對於傳統小生產和傳統專制制度的天生戀情；和對於逼迫他們破產的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制度的天生仇恨……」。

是的，正是這樣一種「天生的仇恨」，才會在剛剛建立，遠未完善，舊時代的貧富階級差別還遠未解決，而新時代竟然貧富懸殊又迅速拉大起「資本主義世界」，一場由「新興

無產階級」即傳統農民及他們的兒女們充當主力的造反革命，被馬克思和他的共產主義者們重新煽動起來了。

對此，我們的國父孫文曾有著極為精闢的論述。他說：

「……貧富不齊，豪強侵奪，自古有之，然不若歐美今日之甚也。歐美自政治革命而後，人人有自由平等，各得肆力於工商事業，經濟進步，機器發明，而生產之力為之大增，得有土地及資本之優勢者，悉成暴富，而無土地及資本之人，則轉因之謀食日艱。由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則貧富之階級日分，而民生之問題起矣。此問題在歐美今日愈演愈烈，循此而往，非至發生社會之大革命不止也。」

他所說的「社會大革命」，就是馬克思的共產主義革命。

他還說道：「歐美自機器發明，而貧富不均之現象，隨以呈露，橫流所激，經濟革命之焰，乃較政治革命為尤烈。」

而孫先生所謂的經濟革命之焰，就是指馬克思的共產革命之火。這就是歐洲共產革命發生的原因，也是後來馬列黨族國家形成的社會基礎，思想基礎和歷史機遇。簡略地說，就前者而言，便是社會主義思想在歐洲的興起，共產主義思潮在歐洲的橫流，經濟革命之焰在歐洲的燃燒，和馬列黨族在歐洲的開始形成。其結果，就是造成了共產革命的爆發和馬列黨族國家的興起。就後者而論，則是兩次世界大戰，為馬列黨族國家的興起和擴張，提供了歷史的大好機遇。

因為，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才造就了馬克思主義的第一個「實踐國」——蘇俄的興起。因為馬克思主義的原教旨主

義者——俄國的列寧，不僅製造了俄國2月民主革命後的政治混亂，而且製造了「10月武裝叛亂」的得逞。從此，「革命名義下」的專制制度的復辟和共產極權統治的建立，使俄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革命學說而建立的「馬列黨族國家」——即社會主義國家。

列寧在暴力奪權成功後，在國際上所立即著手進行的事情，就是於1919年3月，迅速建立起由他做「教皇」的「第三共產國際教廷」。然後，既出於他要發動世界共產革命的野心，更出於他必須以製造歐洲的混亂來維繫他那個蘇維埃專制政權的目的，他首先便向歐洲發動了進攻。而他選擇的第一個目標，就是剛剛爆發了共和革命，創建了共和國的德意志。革命名義下的專制復辟，終於在列寧的一手策劃下，第一次走出了俄國的疆界，在嶄新的德意志共和國的大地上燃燒起復辟的野火，指揮德國共產黨——於1919年4月13日，在德國的巴伐利亞地區發動「共產革命」，篡立了「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即「蘇區」，但瞬間敗亡；同年他又於正在爆發民族革命的匈牙利發動共產革命，篡立了「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也是「蘇區」，同樣是迅速敗亡。列寧和第三共產國際鑑於直接進攻歐洲的失敗，才改變戰略，決策「進攻歐洲的捷徑是經過北京和加爾各答」。東方、主要是中國，遂成為他主要的野心所在。為此，他才建立了第三國際的共產黨中國支部，即中國共產黨，破壞中國的國民革命，誘發中國的共產革命。失敗後，又在我大「中華民國」

境內的江西瑞金地區如法炮製地篡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即後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蘇區」。於是，世界上篡立了第一個共產黨國家蘇俄，蘇俄更為著在這個世界上篡立更多的共產黨國家，而「陰謀奮鬥」。前蘇聯為了在這個世界上建立認宗他的「馬列黨族國家」，可謂不遺餘力。

同樣，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才在我們的世界造就了一個「社會主義陣營」的存在。這已是眾所周知的歷史。「馬列黨族連鎖國家」由此而正式出現，並始具規模。雖然他復辟專制的性質，決定了他短命的必然。對此，我就不詳細地談了。然而，需要看明白的是：歷史已經告訴我們，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共產主義革命，以及由這一革命所製造的馬列黨族國家，都是在混亂的思潮和混亂的時代才得以誕生，特別是在各國「走向共和」的歷史混亂和歷史陣痛之中，或東歐、東亞一些正在發生民族革命或發生政治變革的國家及地區。反之，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共產主義革命，以及由這一革命所製造的馬列黨族國家，又恰恰製造了我們這個世界的更大混亂、痛苦和血淚交迸的社會政治局面。而且，只要他勝利了，就是專制制度的復辟成功和專制統治的捲土重來。猶如恩格斯自己所言：「如果我們的理論一旦被實現在這個世界的一些封建落後的國家和地區，不啻是將我們的理論變成了一幅幅令人啼笑皆非的漫畫而已。」^{註4}雖然，他說的所謂封建，遠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但他的話，恰好證明了，他和馬克思的革命理論，才正是傳統農業社會和傳統流民造

反的「精神食糧」而已；而由他們所誘發的革命，就正好是對歐洲甚至是亞洲「走向共和」之歷史進程的真正反動。

現在我們可以來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性質和命運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一個「馬列黨族國家」

為什麼要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馬列黨族國家」？其實，我們只需要從他的興起、歷史和現狀，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歷史的事實是：1920年8月，第三國際派東方部長維津斯基來中國聯絡「先進」知識份子，建立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遂被命名為『第三共產國際中國支部』，又名『中國共產黨』」。

1920~1923年間，前蘇聯曾數次派人來中國拜謁孫文，希望孫文將國民黨改成共產黨，屢遭孫文拒絕。後在孫文處於東西方列強不但不支援中國的國民革命，相反卻支援中國的軍閥及其混戰的痛苦時期，孫文又因陳炯明的叛變，而愈加處以孤立無援的境地。這時，蘇俄竟以支援孫文的中國國民革命為由，給了孫文廣州革命政府一定的經濟援助，但是，條件卻是孫文必須同意中共參加國民黨。因孫文只同意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於是，全體中共黨員便成了中國國民黨的黨員，參加了國民革命陣營，並且違背孫文對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的三大紀律，在國民黨中建立了各種地下組織和地上組織，以給國民黨劃分派別的方式來分裂國民黨和國民革命陣營。用維津斯基和鮑羅廷「背後」對中共的

話來說，就是「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不是為了壯大國民黨，而是要將信仰三民主義的群眾吸引過來，發展共產黨……；還要團結國民黨左派（即親共派），孤立國民黨中派，打擊國民黨右派（即反共派）……」。也就是要共產黨在前蘇聯直接指揮下，對國民黨實行「挖心戰術」^{註5}，掛國民黨的招牌，發展共產黨的組織。國民黨因此而分裂，幾至「徒剩軀殼」（戴季陶語）。此後，中國共產革命才得以誘發，中國國民革命陣營開始陷入前所未有的政治混亂期。

在這個實際上是前蘇聯「聯孫容共」，而不是孫中山「聯俄容共」期間內，中國共產黨不僅聽命蘇俄，反對北伐打倒軍閥，而且直接破壞中國國民黨領導的北伐，直至在史達林的直接命令下，公然數度發動武裝暴動，企圖阻止中國國民黨北伐成功，統一大「中華民國」。要不是蔣介石曾於北伐前救黨、北伐中清黨，北伐後除共拒俄，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國民革命早已失敗，無產階級專政馬列黨族國家早已在中國篡立了。

1926~1930 年間，史達林曾一再地直接命令中共要在中國「號召工農革命、發動武裝暴動、建立俄屬蘇維埃政權」，即「蘇區」——就是蘇聯在中國擁有武裝割據權力的地區，或者說是屬於蘇俄的中國地區。之後，中共又進一步在蘇聯的直接命令和指揮之下，明確以推翻大「中華民國」、消滅中國國民黨為目標，在中國落後的農村地區發動武裝叛亂，實行武裝割據。第三共產國際甚至直接派遣軍事領袖來領導

和指揮中國共產黨的「萬岱叛亂」。而中共廣州暴動的總指揮部，就是「前蘇聯駐中華民國廣州領事館」。

1931年9月18日，日本陰謀侵占了中國的東三省，大中華民國「國難當頭」。前蘇聯和中國共產黨認為顛覆中華民族的民族國家——大中華民國的「歷史良機」到了。

1931年11月7日，是中國共產黨人和各國馬列黨族的「祖國」——前蘇聯國慶日。雖然他離日本侵占中國東北還不到兩個月，但中共還是在前蘇聯策劃下，如同前蘇聯在德國篡立前「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和在匈牙利篡立前「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一樣，在中國南方的落後農村——江西瑞金地區篡立了國名完全相同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掛馬列相，舉蘇共旗，唱國際歌，發行印有馬克思頭象和列寧頭象的貨幣，製造了第二個中國——即「認宗蘇俄、不認中華」的另一個中國——馬列中國。

自1931~1937年的整整六年間，中共完全無視中華民族的族難和中華民國的國難，自始至終，一意在前蘇聯的直接指揮和命令下，號召共產革命，發動武裝暴動，肆意擴大屬於俄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版圖，甚至在失敗逃到延安之後，還於1936年春天，召開了「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仍然一心要延續他們的馬列中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1937~1945年，我大中華民族和大中華民國在全面對日抗戰中，為衛族衛國，不知流了多少中華兒女的鮮血，不知犧牲了多少中華兒女的性命，但中共卻自始至終地利用國難

——「高喊抗日，絕不抗戰」，「高喊游擊，遊而不擊」，「專打國軍，不打日軍」，「謀地擴張，準備內戰」，前後整整八年。文革中，毛澤東曾親口說他一輩子隻幹了兩件事，一是打倒蔣介石，二是發動文化大革命，就沒有說他抗過日！

正是在這個關係到中華民族存亡絕續的痛苦歲月裡，前蘇聯在中國製造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只是被悄然地變成了「中共敵後『不』抗日根據地」。而在中共所有不抗日的革命根據地，就是在實際上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內，依然掛的是馬列的頭像，依然飄揚著蘇共的黨旗，依然響徹著共產黨的國際歌，這一切，都曾一再地使從抗戰陪都重慶來到延安的外國友人莫名驚詫：這到底是一個中國還是兩個中國！？^{註6}事實是，正是在大中華民國偉大而又艱難的「衛國戰爭」中——馬列黨族的中國才真正地「發展壯大」起來了。

1945年8月15日，中共於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當晚，毛澤東就在延安的窯洞裡連續發出的七道命令以發動內戰，其後終於打敗中華民國南京政權，劫奪了整個中國大陸。馬列黨族的中國——「中華第二蘇維埃共和國」，竟在中國最廣袤的大陸地區「名正言順」地繼承了「中華第一蘇維埃共和國」的俄式國統和專制法統。同時，大中華民國南京國民政府敗守臺灣，不僅一直堅持到了今天，而且經過軍政、訓政，並終於走向了憲政，實現了還政於民。臺灣真正地被建設成了中國第一個三民主義的模範省。但是，悲哀卻在，一個中國正式地變成了兩個中國，並且分裂分治至今。

自 1949 年至今，盤踞了整個大陸地區的馬列中國——簡略地說：在思想上，則是「獨尊馬列、殺盡百家；用夷變夏，用俄禍華」。具體地說，就是：否定民族歷史，毀棄民族思想；既要和中華民族的一切優秀的傳統思想、政治文化作最徹底的決裂，又要與近代西方的真正進步文明作完全的切割，瘋狂實行「要想消滅一個民族，首先就要消滅這個民族的思想」這樣一個旨在消滅我中華民族的方針，用「外族和敵國的倒退思想」來做為「對全中國人民的統治思想」，並為此設立「思想罪和反革命罪」，廣設監禁，動輒處決，從而製造了我大中華民族的無盡悲劇，為中國數千年所未有。所謂「馬列貴，中華次之，民為賤」，已然囂張中華 57 年之久。

在政治上，則是「獨尊馬列，復辟專制」，架構被「蘇化」了的歐洲中世紀教政合一黑暗政體；全面復辟中國秦以前的早期封建等級制度，建立嚴酷的「黨族封建制度」，瘋狂地將「出身、成份、血統」，嚴酷的「階級和等級」，標舉在這個倒退了數千年的反動政治體制之上；在革命的名義下，不斷地發動政治運動，製造人民之間的惡鬥與窮鬥，以達成「裂民而治」的目的。即便是毛死鄧興，雖然要以改革開放即專制改良來救其一黨的性命，卻仍然是持續地「以黨為族，因黨而貴」，不斷地強化其各級黨族的特權地位和特權利益，既為革命抓權，又為革命抓錢，從而製造了中國五千年都從來沒有的官場腐敗和社會腐敗。

在經濟上，則是「獨尊馬列，消滅私有；實行共產，禍

族殃民」。不僅將中國幾千年的一切社會正常存在，摧毀殆淨；而且掌控著全民的飯碗，迫使全體人民為生存而不得不依附在共產專制權力的淫威之下，餓死了數千萬黎民，百姓竟然不敢稍有怨言。「直至國空民絕毛酋死，方有小平救黨無奈喚改良」^{註7}卻又在所謂的改革開放即專制改良之中，使整個馬列中國的腐敗腐爛成就，超過了他的任何經濟改革的成就；使貧富不均和「黨民對立」日益進展，直至終於發展到了「一觸即發」的危險政治局面之下。

在文化上，則是在「獨尊馬列，殺盡百家」的前提之下，否定民族文化，糟蹋民族文化；製造馬列文化，鼓吹階級鬥爭文化；用外族敵國的反動文化來改造直至消滅我們民族的傳統文化和世界的進步文化。恪守列寧的「教導」，不僅將文化當成共產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和玩偶；而且將文化當場成政治鬥爭的手段和突破口。豈止是全方位地糟蹋了文化，甚至還一再地和大規模地製造了「文化獄」，格殺了一批又一批的文化人。使中國數千年的文化相對自由局面，辛亥之後大中華民國文化的相當自由局面，和中國文化人的傳統自由局面，毀滅殆盡。即便是在推動專制改良之後，由於共產黨的專制統治被迫弱化，文化局面開始鬆動，文化自由略有出現，但是，人民依然沒有真正的文化創造的自由，而文化的創造至今竟然不能超越晚清專制改良文化的「自由和水準」，就不說他較之於中國辛亥之後的真文學，和大中華民國時代中國現代文學的巨大發展成就，就更是不能一比了。

朋友們，我們需要清醒地看到：馬列中國在民族認同上，如同剛剛入關的滿清八旗一樣，仍在以我中華民族的民族國家——大中華民國為敵；在政治制度上，也仍然在用他所建立的「黨族封建制度」，將中國的歷史倒退到了秦以前都不能相比的黑暗歲月。在經濟上雖如慈禧太后般，用專制改良以救命，但因他「改革不改變體制，開放不開放思想」，其結果，自然難逃晚清覆滅的歷史命運。在文化上，則將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和現代中國的應有文化發展，腰斬在無產階級專政的鐵砧之上，和專制改良時代的醜惡扭曲之中。

夠了，不必再說了。因為，如果我上面所說的，都是事實，盡屬真實，那麼，倘使我們願意用一個客觀的和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共同標準，即「愛族和賣族的標準，進步和倒退的標準」，來比較一下我們的大中華民國和馬列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即「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我倒想問一問：馬列中國還是中華民族的民族國家嗎？馬列中國還是一個進步的現代中國嗎？

但我還想說的是，雖然我們的亞洲第一共和國大中華民國，「命運遭際實堪傷」，但那也絕不是「天滅民國」。相反，將一定是「天佑民國」。因為，四百年來，在全世界，蒼天只庇佑真正的共和與真正的共和國，而絕不庇佑虛假的共和國，和馬列黨族的任何一個倒行逆施的壞國家。歷史已經做成了鐵的證明。因為只要我們願意「比較一下世界共和進程的發展，和比較世界各共和國的命運」，我們就能發現，

我們大中華民國「走向共和」的道路，雖然一樣的艱難曲折，但前途也必將是一樣地「光明」！

同胞們，朋友們，要愛我們的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因為那才是真正的中華民族的中國；要為我們第一個共和國的重建而奮鬥，因為他才是我們應該為止奮鬥的未來。何況，一百年前，孫文就提出過「愛國也有愛中華國和滿清國之分」呢！難道今天，我們不更應該在鑑別了歷史的真假之後，去愛我們的「中華國」，而拋棄他們的「馬列國」嗎？今天，我們需要的就是對共和的真信念和對共和國的真信心。因為，曙光必將照耀在大中華民族第一個共和國的全部疆土和美麗國土之上。

三、兩個中國與臺灣命運的關係

1、馬列中國與臺灣的關係

中共與「臺獨」的兩個關係

在海外，很多華僑朋友都很愛國，愛自己的故土，並且不希望我們自己的國家處在分裂的狀況之下。老實說，這種感情，在海外待長了，那是共同的。其中，雖然有些華僑是出於「面子愛國」或「利益愛共」，近年來甚至各地都出現了一批「紅僑」，成了中共統戰勝利的象徵，那也怪無可怪，統戰本來就是共產黨的法寶嘛！可是有一點不知道當今的「紅僑」們是否知道，你們今天拚命幫助共產黨反對的「臺獨」，是從哪裡來的呢？

現在，就讓我來告訴你們。

1927年，「第三共產國際」將臺灣共產黨托交給日本共產黨代管。1928年，臺灣共產黨又正式由「第三共產國際」把他轉交給中國共產黨代管。中國共產黨代管了臺灣共產黨以後，1928年4月15日，在上海霞飛路一家照相館的樓上開了個會。中國共產黨指示臺灣共產黨，要宣布三大主張，哪三大主張？就是「臺灣民族，臺灣革命，臺灣獨立」。這三大主張是中國共產黨交給他的，是要他在臺灣借著反對日本殖民統治、爭取臺灣獨立的名義，發動臺灣的共產革命，所以我稱這個時候的「臺獨」，叫做「共產革命臺獨」。「共產革命臺獨」由於日本帝國在臺灣的強勢統治和武力鎮壓，才使他沒有能夠發展起來，並且歸於失敗。那個時候，共產黨自己還在打天下，還顧不過來臺灣獨立的事情。這是共產黨與臺獨的第一階段關係，也是第一代臺獨共產黨的關係。

但是，自從大中華民國贏得了抗日衛國戰爭的勝利，將臺灣收回民國的懷抱之後，臺灣的共產黨們又活躍起來了。因為他們接到了新的使命，就是要推翻國民黨在臺灣的統治。所以，自1945年起，共產黨與臺獨的關係進入了第二階段。就是領導和被領導的關係，雖然在臺灣仍然存在著不被共產黨領導的一些臺獨勢力，但他們不是主流。1947年臺灣「二二八」事件剛剛發生，毛澤東在延安發表廣播講話時就說：「我們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武裝部隊，完全支援臺灣人民反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的鬥爭。我們贊成臺灣獨立，我們贊成臺

灣自己成立一個自己的國家。」請大家查一查《解放日報》1947年2月底的社論和毛澤東的廣播講話。所以，「二二八」事件才會在臺灣地下共產黨立即建立的「臺灣二二八運動指揮委員會」的指揮下，發動起義，製造暴亂，把全臺灣鬧得烏煙瘴氣，甚至滿島血腥。有興趣的朋友只要看看已經在大陸出版的《謝雪虹與臺灣民主自治同盟》這本書^{註8}，就能將共產黨與臺灣二二八的關係知道得清清楚楚。這是第一階段臺獨向第二階段的過渡期，也是第一代臺獨想第二代臺獨的過渡期。從這一過渡期，我們已經能夠看出共產黨與臺獨的領導和被領導關係了。

之後，中共在大陸篡國建政成功，特別是到了六、七十年代。臺灣包括海外，臺灣的第二代「臺獨」開始發展起來了。這一時期的「臺獨」叫什麼？我看就應該叫做「社會主義臺獨」。當年臺灣有一家雜誌叫做《七十年代》，他有一篇社論寫得很清楚，「我們僅僅只需要根據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我們就完全有能力製造出一個臺灣民族來」。一聽這話，大家就應該能夠想到，60年代和70年代的臺灣的「臺獨」朋友們，很多人是馬克思主義者，是社會主義者，甚至是臺灣和海外的地下共產黨員。他們在北京的支援下，某些人竟被召到北京受訓，然後又由共產黨派砲艇把他們送到臺海中線，然後換成木船，再向全世界做民主的「闖關秀」。其中還有一些人，利用海外特別是美國的自由，藏匿武器彈藥，準備去臺灣發動武裝暴動，推翻國民黨臺北政

府。這些人的名字我就不想提了，其中有些人我還認識。而他們也早已載入了共產黨的史冊。今天，如果你們再讀一讀他們當年寫的文章，你就會發現，他們都是一些「假臺獨」，因為，他們鬧臺獨，實際就是為了配合共產黨解放臺灣。最近我又遇到了幾位當年反對國民黨的所謂臺獨人士，他們就很老實地告訴我說，他們當年鬧臺獨，就是要把老蔣推翻，好讓共產黨過來。所以，他們當中的某些人，至今仍然在標榜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曾經是共產黨員，現在還和共產黨保持著說不清的關係。這才真正是第二階段的臺獨，也是共產黨與第二代臺獨的關係。

第三階段，就是李登輝上臺之後的「第三代臺獨」，他們活躍在八、九十年代，特別是在李登輝時期。因為李登輝「假民主之進取，以築臺獨之橋」，然後以所謂推動臺灣的民主，把臺灣推向了要「走出中國」這樣一條不再回頭的的道路之上。這是什麼「臺獨」？這當然已經不是「社會主義臺獨」，更不是「共產革命臺獨」，而是要真正「脫離中國的臺獨」，並且不是共產黨領導的了！因為此後共產黨領導的，已經換成又一撥「國民黨左派」，就是今天的「國民黨親共派」了！再說得確切一些，他們是以李登輝為精神領袖，絕不想和中共的馬列中國統一的，對共產黨甚至中國大陸都沒有興趣的。當然，他們當中也還有一些人，便是連中華民國也不想要了，想要的，已經變成了他們心中的「臺灣國」。第三代臺獨終於給共產黨帶來了很大的麻煩，成了他想「專制一統」的障

礙，所以，這幾年來，共產黨才會改變謀略，要以統戰國民黨及其泛藍人士為手段，來達到「專制一統中國」的目的。

「臺獨」經過了這三個階段，大家看一看，是誰造的孽呀？是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造的孽嘛！「臺獨」三階段裡面，第一階段是他支援；第二階段是他領導、訓練和支持；第三階段是他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今天，共產黨又與臺灣弄出了另一番關係。為了軟化臺灣，統戰臺灣的政治勢力，他今天把臺灣這個黨的主席請到北京去大喝一頓；明天又把那個黨的主席請到北京走一回紅地毯；然後又把臺灣海外那些意志不堅定、立場不清楚的國民黨人和泛藍華僑請到大陸去，領他們各地旅遊一番，待到好山，好水，好酒肉，好姑娘都讓我們海內外的臺灣同胞享受夠了，再來一番高層次的接見。於是，不僅是臺灣，甚至是海外，開始親共的臺胞華僑，還有那些無良的華裔教授，也就愈來愈多，幫共產黨說話的，甚至做了共產黨在臺灣和海外反自由民主先鋒的角色也就愈來愈多。紐約有一位華裔臺灣教授，只因為中共有個大頭目接見過他，那個大頭目就成了他的口頭禪，就成了多年來驕傲於美東華界的資本，凡是親共的事情，凡是需要歌頌共產黨新君的文章，都是他做，都是他寫。在美國西部的舊金山也有一位臺裔僑領，他也是新黨的一個有名僑領，以前還是反共救國的「先鋒」，只因為大陸去過了幾回「酒肉穿腸過」與「酒色享受夠」的好日子，就說了這樣一句所謂的大實話：「大陸真好，山也好，

水也好，姑娘更好，共產黨最好！」臺灣一個最大的在野黨，在美國東部的幾位中央委員，候補委員，紛紛被共產黨請到大陸，在美國犯了法也是往大陸跑，而不是往臺灣跑，回來以後曾親口跟我講：「哇！共產黨好哎，給我們鋪紅地毯哎，請我們吃大宴會哎，在人民大會堂接見我們啊……」。共產黨過去是支援「臺獨」反國民黨。今天是拉攏國民黨反「臺獨」，臺灣的將來會是個什麼局面，也就可想而知^{註9}。

我經常告訴臺灣朋友，要珍惜你們的民主，珍惜你們的自由，特別是要珍惜你們已經擁有的民權，那可是大陸人民連做夢都做不到的。特別是你們的民主還是烏雲下的民主。因為臺灣就像一艘大船，在共產黨那一朵巨大烏雲的壓迫下，你不知道他什麼時候颶風，什麼時候下雨，什麼時候下冰雹啊。而不論他颶風，下雨，下冰雹，臺灣的大船都會搖一搖，動一動，蕩一蕩的呀，要是自己不留神，不知道哪一天就會讓這朵烏雲將臺灣這艘大船鬧翻了！臺灣人民，包括海外臺僑，都應該為臺灣自求多福才是。

這就是馬列中國、共產黨和臺獨的兩個關係。第一個關係已經結束。第二個關係還在發展。大家有沒有注意到，海外親共報紙把這一次臺灣的「倒扁運動」，公然稱作「紅軍」。我們甚至於在電視報導裡聽到了「紅軍」在廣場上唱《國際歌》，唱共產黨的革命歌曲《八月裡來桂花香》。那臺灣成了什麼呢？不是差一點就要變成中共的「蘇區」了嗎？不要糊塗啊！因為成長環境的關係，臺灣人善良，比我們大陸人要

單純得多。可是，單純雖然可貴，但是，當你面對一個狡猾的狐狸和凶惡的豺狼的時候，你的單純就會葬送自己。狼外婆的故事，可不是什麼好故事。我經常開玩笑說，臺灣朋友什麼才能都有，就是缺少一種才能，那就是和共產黨做抗爭的才能。李登輝倒是能夠跟共產黨玩兩下，鬧得共產黨心裡發堵，但是，他又玩歪了。原因是什麼？原因就是，你們才是暖房裡面長大的花朵。你們不像我們，從小到大，毛澤東共產黨就要把我們「浸在鹽水裡嗆三次，浸在滷水裡泡三次，浸在血水裡滾三次」啊。我們給他嗆得、泡得、滾得「渾身是傷、心思深沉」，對共產黨的那些整人、害人和統戰人的花樣，一看就明白，一看就知道該如何提防。我們和臺灣朋友真的不一樣。

有一點十分重要。大家都以為共產黨非常反「臺獨」，「臺獨」也很反對中共的馬列中國。我告訴你事實不然。沒有「臺獨」在臺灣推動所謂的「臺獨」進程，全世界的大多數華僑，不會因為反「臺獨」而糊裡糊塗地走到了馬列中國的五星紅旗之下。反過來「臺獨」鬧得越急，共產黨就越能高舉一竿從來不要民族的「虛假的民族主義大旗和很壞的民族主義大旗」，在大陸煽動人民反臺獨，反臺灣；對臺灣和海外則進行統戰，特別是統戰國民黨，如今的局面不就是這樣嗎？依我看，這樣的局面還在向壞的方向發展。雖然這不是臺獨人士的本意，但卻是他最大的客觀效果，一個絕不利於臺灣自由和民主的很壞效果。

中共對臺灣的「兩種痛苦」

我認為，共產黨對臺灣有兩個痛苦。第一個痛苦是，他真想統一臺灣，就是統一不了。在毛澤東時代，我從小學到中學，一年到頭都要上街去高喊「我們一定要解放臺灣！」可就是沒解放得了。從鄧小平到江澤民，再到也敢殺人的胡錦濤，他們都在天天喊著要和平統一臺灣，但絕不放棄武力，但是，到現在也沒能統一。

一個專制君主，只要還有一塊地方沒有被他所統治，他心裡就是不舒服。所謂「率天之下，莫非王土」，才能使他稱心如意。今日的共產黨不僅希望「率天之下，莫非黨土」，而且認為，一旦他統一了臺灣，那麼，他的壽命至少又能夠延長 20 年！可臺灣今天掛的仍然是青天白日旗，畢竟還沒有變成五星紅旗，他怎麼會不想把臺灣「專制一統」，而絕不是「民主統一」呢。

當年，滿清滅了中華的大明以後，臺灣島上仍在承續著大明的政治傳統。可是，康熙皇帝繼位以後，不過 30 年就「解放」了臺灣。共產黨在大陸建國已經是 57 年之久了，到今天為止，那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的中華民國國旗，還飄揚在臺灣，甚至還飄揚在全世界，飄揚在蒙特利爾唐人街的上空啊！共產黨能不痛苦嗎？我都為他感到痛苦（一笑）。

第二個痛苦是，他真想打，但不敢打。共產黨動不動就說，我們的天下是打下來的。他雖然不打日本，但打國民黨啊。順便說一句，毛澤東在文革的時候曾說過：「他一輩子

只做過兩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打倒蔣介石……；第二件事就是打倒劉少奇」。他就是沒有說他領導抗日，打倒了日本侵略者！

1949 年以後至今，共產黨他不想打臺灣嗎？古寧頭一戰不就是打了嗎？但是「天佑民國」！進攻古寧頭的一萬四千名解放軍全完了，臺灣從此沒有打下來。韓戰爆發了。臺灣的安全係數更高了。後來，臺灣經濟起飛，成了「亞洲四小龍」之首。今天，臺灣不論他怎麼「折騰」，他已經確認和確立了民主制度。不論這個民主是烏雲下的民主，還是存在著太多的問題，他畢竟民主了，他畢竟可以把總統貪汙的事情，公開揭發在報紙上，而且可以將他送進監獄，依法懲處了！

1996 年，臺灣不是有一個朋友寫了一本《一九九五閏八月》嗎？他告訴全臺灣人民，明年就要打臺灣了。現在已經九年過去了，還沒打。可是當飛彈彈頭，從北京的一個軍火倉庫裡往外運的時候，北京的老百姓怎麼說？人家臺灣人活得好好的，你又要打人家去幹什麼嘛！大陸人民才是真愛臺灣的。

我們《黃花崗》雜誌的社長是臺灣華僑，她到大陸去，因有一個親戚在浙江大學做教授，她便捐了些錢給浙大。在公開的官方宴會結束之後，她的這位親戚教授把我們的社長拖到一邊，跟她說：「妳不要在海外幫著共產黨搞什麼『反獨促統』。中國多麼難得有臺灣這麼一塊民主的地方，等大陸民主了再把他要回來不遲嘛。妳就別在海外瞎起鬨了！」

十幾年來，不論是採訪，還是講演，在談到中共要打臺灣的問題上，我都是只說三句話：「共產黨對臺灣是：死也不敢打，要死了才有可能打，打了就『死』。」起碼這十幾年的事實證明我是對的。為什麼？不是臺灣打不動，不是怕美國，他是怕大陸人民，怕大陸人民在中共再一次挑起「內戰」的時候，大陸人民要造反，要趁機推翻他！現在的大陸網路上，有許多憤青，看似真地為民族主義所鼓舞，要中共打臺灣，要解放臺灣，要統一臺灣，實際上他們是想讓中共「上當」，好乘中共打臺灣時，起來革命，推倒「馬列中國」，重建共和中國！

1996年，當李登輝得意洋洋地說，共產黨發射過來的不過是四個空彈頭的時候，你們以為他講的是假話嗎？第一，彈頭是空的，沒錯。第二，他知道的消息比我們早。要知道，中國人民解放軍青海軍區的一個少將副司令，在89年之後，他屬下就成立了一個秘密的組織叫「人民解放陣線」。他們在西北沙漠地帶埋藏了大量的現代化武器，準備伺機發動武裝起義。伺什麼機？就是準備中共在決定攻打臺灣的時候發動武裝起義，用快速部隊打向北京，奪取政權，宣告中國走向民主。因為事情不慎，89位軍官被捕，其中49人在三天之內就被全部被秘密處決。當我得到這個消息時，就在一次閒談時告訴給當時的《世界日報》總社長馬克任先生。誰想馬先生對我說，灝年啊，你是不是反共心切啊？我說，你愛信不信。半年以後，就是他的報紙，用了整整大半個版面，報

導了中國人民解放軍青海軍區內部的「人民解放陣線」的 89 名軍官，如何被逮捕、處死的詳細情形。

所以，我才要問大家，中共敢打臺灣嗎？當然不敢。想歸想，但就是不敢。近幾年來臺灣的特工、間諜、不就花了幾萬美金，就能夠把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指揮學院的院長、政委都給統統收買了。他們把共產黨對臺的一些軍事情報賣給了臺灣。「軍心不古」了，不是維護共產黨的了！要知道，他們的歷屆學員就有兩萬多，如果真打起臺灣來，他那些學士駕駛的飛機上天以後到底是往臺北飛，還是往北京飛，共產黨都拿不準，能打嗎？如果共產黨能打，打臺灣不過是「囊中取物」而已。康熙時代用木頭船，都能夠打到臺灣，都能夠「解放臺灣」。可是共產黨就是不能！

大陸人民用自己對自由民主的追求，對臺灣的愛，在保護著我們自己的國土！真正保護著臺灣島的是他們啊！我希望海外的朋友，特別是臺灣的朋友心裡要知道這一點。所以共產黨，馬列中國對臺灣有兩個痛苦，一個痛苦是想統一，統一不了；第二個痛苦是想打，不敢打呀。那怎麼辦？他只好對臺灣採取慣用的「革命兩手」了！

中共對臺灣的「兩個手段」

第一手是「以戰逼統」。就是用戰爭的方式來逼臺灣為他「專制一統」。其一，他天天說，不放棄武力解放臺灣，並且從來就沒有放棄過。其二，他不是今年向福建省運軍糧，就是明年向福建省調兵運武器。最近的報導說已經有 784 顆

飛彈專門瞄準了臺灣。幹什麼？當然是藉此威嚇我們的臺灣同胞；但更重要的是，他確實一直在做著打的準備，這是事實。這就叫「以戰逼統」。

「以戰逼統」還有一個手段，就是今年春天，共產黨有一個名字叫做朱成虎的將軍，公然在中國的青島，中國的香港和中國其他地區的研討會上叫囂，「不惜與美一戰」。怎麼戰？他說，寧肯把中國西安以東的所有的大好山河，都給美國的原子彈炸光，也要把美國的兩百個城市夷為平地。

朱成虎的這一招對我們不管用，因為我們一看就明白他想幹什麼。但對「美帝國主義」管用，對臺灣管用。於是，美國的國防部長馬上就向總統報告中國軍事發展的「新實力」，要求增加軍費開支，研發新式武器；於是，臺灣馬上就開始出現問題，立即牽涉到臺灣內部的政治鬥爭和權力鬥爭了，一場親共還是反共，和一場藉機發動的「統、獨」之爭，馬上就在臺灣朝野鬧得熱火朝天起來。其實，共產黨採取的就是一個「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其中，得乎其下」的戰略。說穿了，就是我連「美帝國主義」都敢打，還怕我不能解放你臺灣嗎？這一招對臺灣很靈哦，許多臺灣朋友，就總在問我們說：共產黨真的會打了嗎？要是真打臺灣的話，我們是要怕怕的啊……。我就會跟他們開玩笑說：共產黨打來了，你就不是「怕怕」的了，你就是「死啦死啦」的了。雖然是句玩笑，但是，果真如此，這就絕不是玩笑了！因為，到了那個時候，臺灣的自由，臺灣的民主，還有臺灣的族群

分裂與鬥爭，都統統地要「死啦死啦」的了！這可是一個不能開的悲劇玩笑啊！

第二是「以和逼統」。什麼叫「以和逼統」？就是借著「臺獨」打起民族主義的旗號搞「統戰」。臺灣在海外建立了一個「民主和平世界組織」。這個組織將和平和民主作為他的宗旨，不提「統一」二字。大陸的共產黨也在海外建立了一個叫「和平統一促進會」的組織，他以和平統一為宗旨，不提「民主」二字。他們一個不要統一，一個不要民主，自然也就在海外無休止地互相打將起來了！就好比臺灣的藍與綠打一樣。我在美國，一些僑界團體請我去開會，我都不願意去開。為什麼？只要一牽到統獨問題，在會場上就打起來，就揪領子，拉領帶，鬧得「不亦樂乎」。共產黨真有本事啊，因為他就有本事把中國的問題全部歸到「統和獨」這兩個字上，海峽兩岸的國人，讓西方和東方的華僑，都圍繞著「統和獨」來鬧，並且一個個都鬧得將「要保護臺灣的自由和民主」，「要反對中共的專制和鎮壓」等等最需要中國人來重視的問題，忘到了九霄雲外！今天臺灣的「泛藍」和「泛綠」之爭，其中除了在臺灣「爭權」之外，他們的核心問題，不也還是有「統」和「獨」觀念所形成「差異和衝突」嗎？

共產黨「以和逼統」的手段是相當豐富的。他請連戰到中南海吃飯，那個吃飯的地方叫什麼，大家知道嗎？就是當年慈禧太後軟禁光緒皇帝的地方，叫瀛臺。什麼叫做瀛臺？「瀛」這個字在中國的漢字裡就是「超越、抓取、奪回」的

意思。請你連戰在瀛臺吃飯就是告訴你，我要把臺灣拿回來。你們那個連戰還傻呵呵眉開眼笑地在那裡胡主席長、胡主席短的。這就叫「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厭其不智，恨其無骨」！我今天不想批評臺灣的國民黨，我也不想批評臺灣的某些勢力，我只想講一句話，千萬條路都可以走，就是有一條路不能走，這條路就叫做「挾共以在臺島爭權」。倘若如此，那就是前門「拒虎」，後門「迎狼」！你們要把臺灣這個民主保住，不僅是臺灣人民的幸福，也是大陸十幾億人民的期望。如果你今天為了在臺灣爭奪權力，去勾結中共，「挾共」以爭權，你的苦頭就在後面。

我在此想再一次提醒國民黨的是，從歷史上看，哪一次「國共談判」國民黨沾了光呢？哪一次「國共談判」的結果是「雙贏」呢？哪一次「國共談判」不都是共產黨在「假談真打」，最後叫你國民黨輸了精光呢？1945~1949年的國共內戰時期^{註10}，共產黨打得贏的時候，就拒絕談，談好了也不算；共產黨打不贏的時候，馬上便要美國人出面幫他和談，等到國民黨真地和下來了，他馬上就來一次大進攻，並且「屢試屢贏」。這個題目今天我就不細說了。臺灣的國民黨還是好自為之吧。

大陸人民對臺灣的兩種情緒

馬列中國痛苦的大陸人民，對臺灣有兩種情緒。第一種情緒，是理解臺獨，反對臺獨。為什麼？大陸人民理解的臺獨是臺灣人民民主了，他不願意被共產黨的專制統治統過來。

也就是說我們吃過共產黨的虧，受了共產黨的苦，幹嘛讓你兩千三百萬沒受過苦的臺灣人，現在趕回來受苦呢。這是人之常情。

大陸老百姓很疼愛臺灣。你們過了好日子，就像我們家的一個小兄弟從小被人帶走了，養大了。他在海外，在別人家裡過得很好，儘管我們家裡很窮，可是我們的弟弟在人家過得很好，我也高興啊，只要他過得好就行了。如果他還念著我們，我就更高興。他還知道我們在受苦，還願意聲援我們支持我們，我們就很安慰，就很感激了。

所以大陸人民的一個情緒就是理解「臺獨」。理解什麼「臺獨」？答曰「良性臺獨」。什麼叫「良性臺獨」？「良性臺獨」就是承認中華民族，承認中華民國才是一個中國，就是不想承認那個「馬列中國」，更不想被共產黨的馬列中國「專制一統」。這叫「良性臺獨」。一切熱愛中華民國、痛恨馬列中國的臺灣國民們，他們都是「良性臺獨」。

那麼，既然大陸人民能夠理解，為什麼又要反對「臺獨」呢？

因為有人說臺灣跟中國從來就沒有關係。幾年前我在舊金山參加一個學術研討會，我後來才發現這個會是有背景的。臺灣的一個「臺獨」的領袖竟在臺上說，我們臺灣跟中國從來就「一點關係都沒有」。我們大陸有那麼多人坐在那裡，居然就沒有人吭聲。我這個人平常人家不點我名講話，我是不去講話的。點到我名，我沒法推了才講。可是這一天，是

我這大半輩子，唯一地一次主動上臺和人家「辯論」了。

我上臺就指著他說：你說臺灣跟中國，臺灣人跟中國人，1949年後就沒有任何關係了，我還可以勉強接受。但你說臺灣跟中國，臺灣人跟中國人從來就沒有任何關係，我就完全不能理解了。因為我怎麼想，都覺得「不可能從來就沒有任何關係！」因為你開口就是中國話，下筆便是中國文，長的一張黃臉跟我並無二樣，頂多比我漂亮一點，因此，你憑什麼就說臺灣跟中國，臺灣人跟中國人從來就一點關係也沒有呢？就算你最尊崇的、最崇拜的「大日本帝國」，在他的教科書裡面都明明白白地寫著，日本接受了中國漢唐的優秀文化，日本還借用了許多的中國漢字，日本的許多學者文人都會將中國話，甚至會寫中國的古體詩，就不說東南亞那麼多國家，越南、老撾、柬埔寨、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哪一個國家曾說過他們跟中國從來就沒有任何的關係呢！他啞口無言了。

所以，大陸人民所謂理解的「臺獨」，只是不想被共產黨專制一統的那種「臺獨」。大陸人民所反對的臺獨，只是那些反華的臺獨，反華不反共的臺獨，那些連中華民國都要推翻都不想要的臺獨，那些要脫離中國、「回歸日本殖民統治」的臺獨，和一切想分裂中國，或永遠都想保持中國分裂的形形色色國際勢力。這樣的「臺獨」我們當然反對，並且堅決反對。這是大陸人民的第一種情緒。這種情緒直到今天為止，有被弱化的傾向，但是絕不會被共產黨弱化到哪裡去。

大陸人民對臺灣有第二種情緒，那就是嚮往臺灣民主，厭惡臺灣親共。因為近幾年來，大家從海外社會、華人社會的版圖上已經看出來，親共勢力正在「茁壯成長」。中國共產黨，這個曾經「非民族、無國家」（蔣介石語）的政黨，當前他正在做什麼？就正是在利用中國的故土、鄉情和文化，來吸引、勾引、拉攏，腐化和統戰我們那些愛故土、愛民族、愛民族文化的臺灣民眾，特別是臺灣的外省人，尤其是早年到了臺灣的國民黨老一輩及其家族子弟們。他們今天不斷地被共產黨邀請到北京，上海，南京去，並給以高規格的接待。我所認識的宋家的一位親戚，只要一遊到了北京，共產黨就請他住「釣魚臺」；一遊到上海，共產黨就請他住「錦江飯店」，一遊到海南，共產黨就請他做什麼校董……其他的國民黨高官子女，共產黨對他們也一樣。我們大家也都看到，國民黨今天這個訪問團上北京，明天那個什麼團到上海，後天又是什麼團赴南京，再有就是什麼團下廣州，上北京的不去拜見香山碧雲寺的孫中山衣冠塚，到上海的不去參觀孫先生的真正故居，到南京的不去看蔣介石的南京總統府，去廣州的絕不去探望黃花崗的先烈，至於被中共殺害的數百萬國民黨、政、軍、警、特及其兩千萬可憐的家眷後人，誰都不會提一句，就像壓根兒就沒有這些人一樣！只是今天有這麼個會談，明天又有那麼個研討會，後天自然是和共產黨一起遊山玩水，或者是一同三溫暖，幕後，卻全是共產黨在操縱，在指揮，在謀劃，在將今日的國民黨們搞的暈頭轉向，不知

「今夕何夕」，不知「今年何年」，更不知「今黨何黨」了！

這一切，讓大陸人民看了會心裡怎麼想啊？連戰第一次去大陸，大陸人民在南京夾道歡迎，那個陣勢是共產黨做出來的，可是每個人臉上的那種表情和眼淚，可不是共產黨擠得出來的呀，那是發自內心的。因為那是在歡迎國民黨歸來，可不是歡迎那個沒有骨頭的連主席！兩年過去了，大陸人民很快就明白過來了，你們回來不是為我們哪。你們回來一不敢講三民主義；二不敢講中華民國，三不敢誇耀臺灣的自由化民主，連戰居然不敢說自己做過中華民國的副總統，卻說「我在臺灣也負過一點政治責任」……。大陸人民不傻呀！

所以，今天在中国大陸漫流著的第二種對臺灣的情緒，就是希望臺灣的民主能成為全中國的民主，期望臺灣的民主模式能夠在全中國蕩漾開來。從而厭惡臺灣形形色色、各種各樣的親共勢力在出賣臺灣的同時，「助共為虐」，阻擋中國大陸人民對自由民主的萬難追求。

我想馬列中國與臺灣就這麼四個關係。如果這四個關係繼續維持下去，如果天不佑「共和」，天佑「共產」，甚至「天佑馬列中國千秋萬代永不變色」，那麼臺灣的命運是什麼呢？臺灣的命運就是中華民國的滅亡，就是中華民國臺灣的滅亡，和中華民國臺灣民主制度的滅亡，就是臺灣所有的民主政黨，都會成為共產黨領導下的第九個，第十個，第十一個，和第十二個「兒子黨，花瓶黨」……。這就是臺灣和馬列中國的最終關係，以及他的危險結局。

2、大中華民國和臺灣的兩個關係

傳承共和

第一個關係，大家知道，今天臺北總統府上面，飄揚的依然是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那就是說，不論今天在臺灣的政壇上出現了何等的逆流，甚至是惡流，臺灣地區仍然是大中華民國的一個地區，仍然傳承的是中華民國的「共和國統和共和法統」。

所以，大中華民國，也就是孫先生創建的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和臺灣的關係，便是傳承的關係，是整體和局部的關係。這一點，我希望臺灣人民一定要明白。我們自己也得明白。明白了這一點，你們才有了一個「根」的感覺：原來中華民國是中華民族的民族國家，原來中華民國是中華民族的民主國家。而我們臺灣，既是對他的傳承，也是他的一部分。這就是歷史和現實的兩個關係。

實踐共和

第二個關係，就是中華民國是在孫中山先生規定的「軍政，訓政，憲政」的革命歷程上，經過長期的奮鬥和追求，今天終於在臺灣實現了「還政於民」。所以中華民國的政治制度，乃是中國幾千年歷史上開天闢地的共和制度，而臺灣今天傳承的就是這個共和制度。在臺灣不過是實現了「還政於民」，就是從軍政，訓政，終於走向了憲政。

所以，如果我們認識清楚了大中華民國和臺灣的關係，他就能解決兩個問題：

一個問題是，有一天中國大陸民主了，大陸人民又回到了孫中山的道路上，重建，也就是光復了自己的民國，那麼大陸和臺灣的統一就不存在「兩個中國」的問題了。國號、國統、法統、民主的傳承、歷史的發展，他就都完全吻合了。另一個問題是，有一天大陸人民終於實行了民主，回到了孫中山的建國道路上。到那個時候，兩個民主地區一大一小聯合起來，就不存在「一國兩制」了，當然是「一國一制」了，就是實現的都是「民主共和制度」。我正在寫一本小冊子，題名《一國兩制與美國內戰》^{註11}。美國的南北戰爭就是「一國兩制」造成的。所有的國家，同一個社會，同一個地區都是不可以兩制的。兩制就等於是埋著政治炸藥，準備引爆衝突。總有一天，當機會來到的時候，這個國家就會發生禍亂，不是戰爭，就是分裂，要不就是動盪^{註12}。

所以，當我們明確了大中華民國和他的臺灣地區的關係是傳承關係，明確了大中華民國的政治制度和臺灣今天的民主制度的關係是完全一致的關係，並且也是傳承和實踐的關係，那麼我們未來的「中國民主統一」還能夠沒有希望嗎？

也許在座的朋友會問我，你是不是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呢？你只是憑著你自己的研究，自己的感情，自己的想法，認為中國一定會像德國、像俄國，像法國，像歐洲所有有專制歷史的共和國家一樣，也能夠重新高舉起第一共和的旗幟，重新認宗孫中山先生創建的亞洲第一共和——大中華民國。你是不是想的太簡單了呢？不，我是有我的理由的。

3、中國必定走向共和的三條理由

第一條，大家想一想看，「三民主義」在 1920 年就被共產黨和列寧，史達林稱為「過時」的。而且三民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已經衝突了 80 餘年。今天馬列黨族國家都已經崩潰了，就剩多災多難的馬列中國和他的三個小兄弟了！可是「三民主義」呢？雖然他失敗過，也有過曲折，可是因為他既沒有錯，也就不會過時，甚至世界正在證明他的正確，大陸社會有識者正在渴望回到他的道路上去，而指斥他「過時」的，不是自己已經完蛋——如前蘇聯；就是自己正在走向滅亡——如中國的共產黨。

為什麼？

因為孫中山先生的對他提倡的「民族主義」是這樣說的：「……余之民族主義，特就先民所遺留者，發揮而光大之，且改良其缺點。對於滿洲，不以復仇為事，而務與之平等共處於中國之內。此為以民族主義對國內諸民族也。對於世界諸民族，務保持吾民族之獨立地位，發揚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與諸民族並驅於世界，以馴致於大同。此為以民族主義對世界之諸民族也。」他的「民族主義」，對內平等，對內獨立，傳承好文化，吸收好文化，這樣一個「民族主義」還會是錯的嗎？此其一。

其二，對「民權主義」，孫中山先生說：「余之民權主義，第一為民主，第二為民主專制必不可行，必先立憲然後可以治。」所以說，他講民權的第一個要害，就是講民主，就是

講憲政，這難道是錯的嗎？臺灣的國民黨在大選中失敗以後，不是常說「失去了權力就失去了一切」嘛，可見你要的是黨權，還不是民權。要知道，你的黨權就是為實現民權服務的，民權已經實現了，你還要霸著黨權不放，那你想要的還是專制權力嘛！所以，只有瞭解了孫中山「民權主義」的真諦，你就不會再說「失去了權力就失去了一切」，如果你還自稱是一個民主政黨的話。

孫中山「民權主義」的第二個要害，就是「民主專制必不可行」。在座的大陸朋友一定知道，毛澤東有一篇「光輝」著作，叫做《論人民民主專政》。就是說，共產黨要建立的制度，是既要民主又要專制。現在姑且不去說毛澤東忘記了他們的早期黨首李大釗說過的話，叫做「民主與專制不並行」，只說所謂「又民主又專政」——請問誰來民主？誰來專政？當真是民主也是你，專政也是你嗎？我們大陸人民最能體會共產黨的那個「民主集中制」了。所謂民主，正如毛澤東所說的那樣，在他們只是一種手段，只要目的達到了，民主這個手段當然就可以不要了。雖然他所講的民主，從來就是喊給別人聽的，而且是為了打倒國民黨才喊的，從來就不曾也絕不願意施行。而孫中山先生早就告誡過了：「必先立憲然後可以治」。必須有人民的憲法，一部好憲法，然後才真的可以治理國家。這就不僅是對的，而且正好打在毛澤東和共產黨「七寸」上了！且不說中共專政 50 餘年，他可有一天施行過「民主」嗎？

孫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就是愛民生的主義啊。他的原話說：「歐美自機器發明，貧富不均之現象隨以呈露，橫流所至，經濟革命之焰，乃較政治革命為尤烈。為此，余欲以將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三大革命並於一爐而治之，以塞經濟革命之源。」他說的「經濟革命」是什麼？就是共產革命。他早就看到了共產革命將為禍這個世界，所以他才要用「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來杜絕所謂的共產主義，來遏制鼓吹專制的革命，來保衛和發展自己的民族。請問在座的朋友們，他的「三民主義」錯了嗎？過時嗎？80多年，「三民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天下之爭，今天應該有結論了。

第二條，大陸人民從1979年開始進行民間反思，反思文革，否定文革；反思反右，否定反右；反思社會主義改造，否定社會主義改造；反思三反五反，否定三反五反；反思土地改革，否定共產黨的土地改革……。一直到1985年，終於反思到了「抗戰是誰打的」，「究竟是誰領導打的？」。這一段反思的結果是什麼，一是像我這樣的一大批中國的學者知識份子，開始重新認識究竟《誰是新中國》？

從時間上看，1912年成立了中華民國，與1949年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當然後面新，前面舊。可是從制度來說，是前面新，後面舊。因為孫中山的革命不是「改朝換代」，孫中山的革命是「改朝換制」，是秦王朝之後兩千多年的所有中國革命裡面，唯一的和第一個進行改換制度的革命，是

不要皇帝的革命，而中華民國就是改變專制制度、建立民主制度的新中國，這才是真正的新！1949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造就了他的「革命」，卻是推翻了孫中山的共和革命，顛覆了中華民國（大陸地區）復辟了綿延二千年的專制制度，並對他的人民施行了極權專制統治的假共和國。他不是真新，而是假新！

正是因為如此，在中國大陸才出現了歷史劇《走向共和》。我們那麼多的藝術家們才用命、用心、用情、用淚，甚至是用了大陸人民的鮮血，才拍攝了這樣一部歌頌孫中山三民主義，歌頌辛亥革命，歌頌大中華民國，並肯定曾為中國民主進程做出了卓越貢獻的中國國民黨的歷史劇。那裡面有孫中山先生講三民主義的熱烈場面。那裡面有表現了中華民國創建時，在思想、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已經表現出來的一個完全嶄新的共和國家的形象……。

也是在這個反思的基礎上，我寫出了《誰是新中國》。因為我們必須重新認識，誰才是共和革命？誰才是共產革命？誰才是要推翻專制？誰卻要重建專制？誰要走向共和？誰才要開專制的倒車？一句胡話，中華民國才是真正要走向共和的新中國，而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馬列中國，才是一個出賣了民族、阻斷了共和，毀滅了民生，和要開專制倒車的，貨真價實的「舊中國」！

有了中國大陸人民對歷史的基本覺醒和根本覺醒之後，我們還愁我們的中國人民不會像俄羅斯人民，不會像德意志

人民，不會像法蘭西人民一樣，在「第一共和」的光輝旗幟之下，在思想覺醒的基礎上，重新凝聚我們的心靈，把孫中山未盡的民主建國的事業，把中華民族未盡的民族統一的事業，推向前進嗎？

第三條，朋友們別以為共產黨很厲害，他真的是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但是他怕兩個東西，他怕中華民國，他怕那個現在不爭氣的國民黨。為什麼？因為中華民國是正統，是現代進步民主中國的正統。由中國同盟會改組而來的中國國民黨才是這個正統的創造者和捍衛者呀！

一九六五年，毛澤東接見法國《紅色人道報》記者愛麗絲的時候，愛麗絲曾經問他：主席，你這麼偉大，也犯過錯誤嗎？毛澤東說：「我當然也犯過錯誤。」愛麗絲又問：「那你犯過什麼錯誤呢？」毛澤東沈吟不語，半天沒有回答。愛麗絲卻追著問道：「是不是發動韓戰？」毛澤東一聽，臉馬上嚴肅起來，搖著頭說：「不，那不是錯誤，那絕對是正確的」。愛麗絲只好問：「那你到底犯了什麼錯誤呢？」毛澤東又沈吟了半餉，才說了一句話：「我不該改了國號。我們原來就有一個好端端的中華民國嘛，為什麼一定要改成什麼中華人民共和國呢？」

毛澤東在中華民國的土地上，另外篡立了一個國家。他推倒了中華民國的國統和法統，並在大陸消滅了他的國號，造成了兩個中國的存在。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真的是千秋萬代，永不變色，那毛澤東的地位真的不在孫中山之下。

可惜的是馬列黨族國家，早已開始崩潰，共產黨中國的滅亡同樣是必然的。因此，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真的像歐洲和世界上所有那些復辟了專制的國家一樣，都必然遭遇滅亡的命運的話，那毛澤東的墓碑上該寫下個什麼呢？那只有「亂臣賊子」這四個字啊！對於毛澤東來說，他要的是歷史給他的封號，歷史給他的地位，所以1965年自從他接受了這個採訪，說他懊悔改了國號，一直到他死，越臨近他的死亡，他越是日日不能忘記他改了國號的「彌天大錯」，因為他不想歷史給他戴上一頂「亂臣賊子」帽子。但是歷史是他自己寫的，他就得自己負責任。

因此我們才可以說，大中華民國是一定要在中國大陸重新崛起的，在全中國重新崛起的。我勸臺灣朋友們眼光要放遠一點，要放開到「大歷史」中去；我們要把世界的共和進程和中國人民的共和進程，放在一起來進行考量；我們要把歐洲共和國家的歷史命運，和大中華民國的歷史命運一起進行考量；我們就會發現，「結束復辟時代，重歸中華民國」，定是必然。孫中山的事業是一定要走向他最後的成功的！中國大陸的許多青年知識份子，中國大陸的好幾代知識份子和專家學者，我們在這個問題上已經越來越走向了「共識」，甚至是很深的「共識」。這是20餘年來中國大陸民間在沒有言論，輿論和出版自由的情況下，民間反思的最偉大的成果。而我不過是出來向海外朋友報告這個成果而已，我只是他的一個參加者。

四、臺灣如何應對兩個「中國」

今日臺灣如何應對兩個中國呢？不論你是從保衛自己出發，還是從你的前途著眼，你如何應對呢？如何應對，就牽涉到臺灣的命運。我以為有這麼幾點，希望臺灣朋友們能夠注意：

第一，要站在孫中山先生民族主義的立場上，承認中華民國，傳承中華民國，不認馬列中國，反對馬列中國，這才是臺灣兩千三百萬人民應該做的呀。這才是傳承嘛，才是民主的實踐嘛。如果臺灣人民能夠站在民族主義立場上這麼做的話，臺灣的前途將與中國大陸人民同命運，共光輝。我發現臺灣很多國民黨的高中級官員們，海外的一些國民黨黨官們，他們對「三民主義」和中華民國是有感情的，是真有感情。可是他們今天講起「三民主義」和中華民國來，卻如「小和尚念經，有口無心」了。他們通常第一句話便說的是「國父的三民主義」，第二句話則是「自由，民主，均富」。我在一次講演中曾說過：「自由，民主，均富也許沒有錯，但是自由，民主，均富不等於『三民主義』，頂多是『二民主義』。」為什麼？因為他把民族主義給甩掉了。就不說國父還親口說過：「我的民生主義絕不是均富主義」呢！

你們看，臺獨是不講「三民主義」，但臺獨還講「自由民主」啊。那他為什麼不講「三民主義」？是因為他不要中華民族的正當民族主義。如果國民黨和民進黨都不要民族

主義了，不僅國民黨的歸屬成了問題，而且臺灣的歸屬更出了問題。什麼問題？就是「族群撕裂」的問題。而族群撕裂的問題一出現，再加上島內島外的有心人，再添一把柴，加一把火，臺灣的族群問題就成了「族群廝殺」，今日臺灣藍營和綠營的對抗和互鬥，是否就是他的寫照？而藍綠一鬥，共產黨就來勁了，就拚命會統戰藍營，去反對綠營，結果，只能是「仇上加仇，仇怨無邊」了！臺灣要是這樣地鬧下去，他的結果是什麼呢？自然是「共產黨不戰就屈臺之兵」了！所以，我認為，臺灣人民還是要不分藍綠地都站在中華民族的民族主義立場上，承認中華民族的民族國家——中華民國的國統和法統，並且傳承他，捍衛他，非但不認馬列中國，而且仍然要像蔣介石所說的那樣，要「苦撐待變」，等我大陸人民向馬列中國討換中華民國的河山，那才是臺灣最應該的選擇，也是唯一的前途所在。

第二，今天在臺北的總統府裡面，孫中山的像好賴還掛在那裡。如果孫中山像掛在那裡，那麼臺灣人民就應該為著全中國的自由民主憲政而奮鬥。這也是你們的使命啊！所以，站在「民權主義」的立場上，臺灣就要關心大陸人民，起碼是關心大陸人民對自由民主的追求，聲援大陸人民推翻共產專制復辟，重建中華民國大陸地區一切行動。臺灣人民則要捍衛中華民國的民主臺灣，發展臺灣的民主，建設臺灣的憲政，把臺灣的民主憲政變成一塊咬不動，打不爛，踢不走，踩不斷的鐵牛筋，那才是臺灣人民之福，也是大陸人民的期

望所在。

第三，站在孫中山先生「民生主義」的立場上，就要公開地，堅定地支援中國大陸人民反對專制的共產腐敗統治。同時，也要在臺灣本島上，反對用貪汙來腐化民主的臺灣。「三民主義」對臺灣人民真的過時了嗎？沒有吧？

但是臺灣今天確實存在著幾個危險的傾向。一個傾向就是，有一批愛中華民國、愛孫中山先生的人，禁不住共產黨的糖衣炮彈。他們以「寧予中共，不予臺獨」，就是寧肯把臺灣送給共產黨，我也不送給你「臺獨」的心態，要在共產黨的支持下，與臺獨決戰到底。從人的個人感情來說，可以理解。就像滿清的西太后說「寧與外邦，不予家奴」一樣。但是這個心態是不對的。這個心態不但會將臺灣島上的族群撕裂發展到無以復加的地步，會葬送掉整個藍營，葬送掉臺灣的中國國民黨，甚至葬送掉整個臺灣，同時也絕不會買到大陸人民的好，因為，你無理性地反對態度，卻跟共產黨走到一條道上去了，因而不自覺地成了大陸人民的敵人。這樣做只會葬送臺灣和葬送自己。

第二個傾向，那就是「走出中國，分裂中國」。

首先，我想問你走的出去嗎？「臺獨」是個破碎的夢，你走不出去的，因為，就算是臺灣島置身於美國的東西任何一邊海岸，也像是美國的一個肚臍眼那樣，民主的、自由的和多民族的美國，會讓你們分離出去嗎？就不算從臺灣對於整個中國的戰略地位來說了。你們除掉能搞亂臺灣，引爆族

群鬥爭，搞得共產黨能舉起一竿假「民族主義」大旗，到處搞統戰來對付你們以外，你們還能得到什麼呢？依我看，破碎的夢最好還是不要做。

其次，你們能分裂得了中國嗎？你當真能夠在中國大陸出現亂局時，「不戰而屈人之兵」嗎？就像一位社會主義臺獨人士向你們提出的建議那樣^{註 13}？你們難道真地想引發一種「多米諾骨牌效應」嗎？以自己為榜樣，誘使中國的三大邊疆民族，全部能夠獨立分離出去嗎？你們還是要想一想，看一看，但凡一個中國人，除掉共產黨之外，只要他還是一個愛祖宗，愛民族的人，他就會因此而痛苦地，也是堅決地反對你們的，一旦中國大陸人民真正獲得了民主之後，你們分裂中國的報應就會浮現出來了。這種結果中國大陸人民看不到，看不透嗎？當然看得到，當然看得透。所以你走不出中國，也分裂不了中國！一個日本的極右派議員在德國的一次海外大陸民運會議上說：「就是中國民主了，我們也要把中國分成七塊八塊！」結果，他只能將海外民運的名聲在中國大陸一落千丈！

所以，今天，我也藉此機會，想告訴我的臺灣同胞們；

第一，希望今天在臺灣的中國國民黨，不要忘了中國，特別是不要忘了中華民國那些遭難的大陸人民。希望中國國民黨不要把「三民主義」只當「經」念，要把「三民主義」當作你們的黨魂，並要重新喚回他。只有他，才是你們真正的生命。這樣，你們才會為全中國最後的民主統一，也就是

中華民國的民主統一，盡到你們的一份心，一份責，或者說盡到「最後的責任」。

第二，我也期望，民主進步黨，即臺灣民主進步黨，不要忘記你們是中華民國臺灣的執政黨，如果要把你們的國號和你們的黨名聯在一起，你們就是中華民國民主進步黨，簡稱中國民進黨。這是順理成章的。如果你們更有智慧，更有胸懷，能夠將眼光轉向整個中國，從臺灣民主進步黨走向中國民主進步黨，那麼全體中國大陸人民，包括海外絕大多數華僑，都會張開雙臂來歡迎你們，擁抱你們的。你們的前途就在全國，整個中國的藍天就是你們真正的「出頭天」！

第三，我也希望中國共產黨「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只要你們在最後的關頭，敢於重做中華兒女，不再做馬列子孫，能夠深刻地認識自己的罪行，拋棄馬列，回歸孫文，重新走向孫文的建國道路上來，中國大陸人民也一定會像前俄羅斯人民一樣，為了國家、民族和人民的禍福前途，而完全可以做到「不計舊恨，不算舊賬」的，但是，對你們來說，這樣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最後，我的希望是，包括我在內的所有普通中國人，我們心中都要有一個信念，要有一個追求，那就是中華民族要進步，就要搞民主。我們搞民主，就是為了中華民族的進步。什麼才是中華民族的進步？那就是我們念茲在茲的「先民主，後統一和真繁榮！」

謝謝！

註釋：

1、自 2003 年以來，在中國光明日報網站，毛澤東思想網站等，曾連續發表對講演者的「革命大批判」文章，甚至一再地在文章中要將「辛灝年在地球上徹底消滅」。近年來，他們更是公開要求中共國安派人到海外對辛灝年加以嚴密監視，「一有機會，即予處決」。

2、這句話是套用毛澤東的名言：「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

3、上海華東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世界通史》第二編：《工業革命的興隆》。

4、轉引自辛灝年《誰是新中國》一書導論。

5、1949 年後，共產黨曾一再地和驕傲地公開承認，當年他們與國民黨的所謂「國共合作」，其實就是他們對國民黨的「挖心戰術」。

6、當年《大公報》原話。

7、辛灝年著長篇古體詩歌：《中華百年歌》。首發於黃花崗雜誌總第 16 期。

8、張傳仁著，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 年 5 月第一版。

9、十幾年過去了，事實誠如講演者所言，臺灣已經被統戰、被赤化到了叫人難以置信的地步，並終於迫發了反共的「太陽花學潮」。

10、今日大陸人民已經認識到，那不是內戰，而是外戰，是中國人民反對赤俄顛覆中華民國之國際戰爭的繼續。

11、該書已經由美國藍天出版社和香港夏威夷出版公司相繼出版。

12、講演者預言已經在中共施行「一國兩制」的香港開始了。

13、紐約一位資深的社會主義臺獨人士，曾在給民進黨的報告中，要求民進黨要支持大陸的海內外民運，並明確指出，目的就是要在大陸發生「亂局」時，乘機獨立，以「不戰而屈人之兵」。

第五篇

孫中山與共產黨的 三個分野

本文講演用題是「孫中山與共產黨」，2006年11月26日講於多倫多大學。作為「紀念孫文誕生140週年」專稿，《黃花崗雜誌》曾分別發表於2006年總第18期和第19期，題目為「孫中山與共產黨的四大關係」。此次編入文選，分為「孫中山與共產黨的思想分野」、「孫中山與共產黨的革命分野」和「孫中山與共產黨的建國分野」等三篇，以方便讀者閱讀。

前言：已經造成的歷史誤解和亟須製造的政治誤解

我今天講的這個題目，不新鮮。但是，我今天講的這個題目，對於今天的大多數中國人來說，卻包含著太多被「強權」所塵封的歷史內容，所製造的虛假概念，和一大批中外歷史家們的勢利和膽怯。是他們，才造成了歷史的誤解，更為繼續製造政治的誤解，提供了方便之門。

之所以產生了這樣的悲哀情形，原因是，孫中山先生確實與中國共產黨有過關係。這個關係，雖然前後只維持了兩年左右的時間，就隨著孫先生的逝世而終結；但因這個關係留下了過於沉重的影響，太多可以被利用的空間，特別是為製造歷史謊言和政治謊話，留下了一個很難動搖的歷史「源頭」。於是，這個關係，就既變得「光彩眩目」，又變得「迷霧漫天」。

特別是當 1949 年的勝利者中國共產黨，又採取年年講、月月講和天天講的手段，更在他的大中小學教科書裏，年復一年地已經進行了半個多世紀的「啟蒙教育」之後，這個關係，就由於共產黨長期宣傳孫中山曾「聯俄聯共」並實行「國共合作」，孫中山曾決策「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孫中山還用「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代替了他的民族民權民生的「舊三民主義」，而共產黨還在孫中山危難之際支持了孫中山和他的國民革命……等等。於是，這樣一些「歷史的事實」，也就顯得「言之鑿鑿」的了。後來，共產黨「逢

年過節」都要把孫先生拉到天安門廣場上去，偶而也讓他跟在馬恩列斯的後面「曬曬太陽」；共產黨更是對臺灣和海外頻繁地使用孫中山，高唱曾被他自己棄之如敝屣的「民族主義」；直至他今天終於開始努力宣傳「共產黨才是孫中山革命建國之最忠誠的繼承者，……」，以在危難之際繼續博取他的「權力的歷史合法性」；卻又因為對孫中山的國民革命惶恐不已，而繼續使出「革命的兩手」，「放言放人」到海外大肆汙蔑和「惡攻」孫中山先生……

如此一來，在一個「只准許自己說謊、卻絕不容許別人說話」的時代，一個完全違背了歷史事實的歷史性誤解——「孫中山與共產黨合作過」，和一個在眼下已經為共產黨所迫切需要製造的政治性誤解——「共產黨繼承了孫中山」，便理所當然地形成了，和順理成章地被製造出來了。

然而，這一切不過都是些歷史的謊言，不過都是些共產政治的伎倆，當然也是中外許多歷史學者的膽怯和勢利所使然。

今天，我將就孫中山和共產黨的真實關係，作一個較為詳細的敘述。主要內容就是孫中山和共產黨的三大分野：思想分野、革命分野和建國分野，就是已經逝去的孫中山和眼下還沒有死掉的共產黨之「三大分野」的關係。

一、孫中山與共產黨的思想分野

孫中山有三民主義，共產黨要馬列主義

眾所周知，孫中山有一個革命建國的思想理論，就是三

民主主義。而共產黨所要的「革命建國」的思想理論，卻是馬列主義。顯然，這個事實，不需要證明。因為，他已經人盡皆知，所謂鐵的事實。但是，為了鑑別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共產黨的馬列主義，孰是孰非，誰為進步，誰為倒退，我們還是有必要對他們各自的基本思想，作一個極簡單的比較。

我個人認為，在孫中山數十萬字闡述三民主義理論的著述中，其對自己的理論進行過最簡單明瞭之概括的，就是他在1923年11月所寫的「中國革命史」，曾對三民主義的理論作過一個簡要概括和介紹。我主辦的歷史文化季刊《黃花崗雜誌》第18期在發表這篇文章時，曾將他的題目改成為「中國共和革命史」，其意，就是要與中國的共產革命劃清界限，以示涇清渭濁。

在這篇文章裏，孫中山是這樣地論述他的民族主義的。他說：「……余之民族主義，特就先民所遺留者，發揮而光大之，且改良其缺點。對於滿洲，不以復仇為事，而務與之平等共處於中國之內。此為以民族主義對國內諸民族也。對於世界諸民族，務保持吾民族之獨立地位，發揚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與諸民族並驅於世界，以馴致於大同。此為以民族主義對世界之諸民族也。」

生活在、又革命在晚清時代的孫中山，如此地提出了他的民族主義理論，當然是正確的。因為，晚清時代的中國，外有東西方列強——既包括民主列強、又包括專制列強的欺凌；內有滿清一族的專制統治和滿清貴族對漢民族的歧視和

欺辱。辛亥元勛李福林將軍就在他的回憶錄裏面說過：「……享有特權，不把漢族平等相待的滿州人，自從入關以來，為了鎮壓漢族，就分兵駐紮在各重要省會，謂之八旗駐防營。駐防之區，我們漢族同胞稱之為『旗下街』，有的說是旗營。……民國元年以前在旗下街被劫財劫色，是一件無法無天不敢過問的事情……^{註1}。」所以，他才認為，「辛亥革命的確成功了國內民族的平等。生在辛亥革命以後的人對於這個問題不會惹起多大注意，因為這已經是過去的問題了。人們總有一種不良的習慣：過去了，便遺忘！」^{註2}今天，有所謂民運人士在狠批孫中山先生的時候，其論點之一，就是「孫文提出民族主義毫無必要」，因為「那個時代根本不存在民族的問題」。不知他們是「過去了，便無知」，還是為了「助分裂，裝無知」了。

所以，那個時候的孫中山，才要堅持繼承中華先人所留下的好江山和好文化，吸收世界之好文明，對外求中華民族之獨立地位，對內求各民族平等相待。而對於那個不知道殺了多少革命黨的滿清的遺民，也絕不還以報復。這該是何等高尚的民族情懷！難怪被中共禁演的大型歷史劇《走向共和》，就稱讚孫中山發動的「辛亥革命是歷史上少有的革命」！因為，孫中山的革命成功後，既不鎮壓反革命，又不殘殺地主富農資本家，更不會發動各種運動來迫害新舊知識分子們……。

如此，我想問一句：以滿清作歷史的背景，不論是對內

或對外，孫中山提出這樣的民族主義到底是對不對呢？當然是對的。

在這篇文章裡，孫中山又是這樣地論述他的民權主義的。他說：「余之從事革命，以中國非民主不可，其理由有三。……既知民為邦本，一國之內人人平等，君主何復有存在之餘地……滿洲之入據中國，使中國民族處於被征服之地位，國民之痛，260 餘年如一日，故君主立憲在他國，君民無甚深之惑感者，猶或可暫安於一時，在中國則必不能行，此自歷史事實而首之者也。……中國歷史上之革命，其混亂時間所以延長者，皆由人各欲帝制自為，遂相爭相奪而不已。行民主之制，則爭端自絕，此自將來建設而言之者也……。」

孫先生在這裏已經說得再明白不過了：一有帝王不平等，二因滿族專制統治不平等，三是歷史上的造反者都想當皇帝製造不平等，所以，「中國非民主不可」。如此，孫先生才會總結說：「有此三者，故余之民權主義，第一決定者為民主，而第二之決定，則以為民主專制必不可行，必立憲然後可以圖治。」在這裏，孫先生已經指明，他的民權主義「第一就是民主」。第二是民主專制必不可行，也就是「民主專制不並行」，早就預言毛澤東後來實行的「人民民主專政」，不過是「假民主、真專制」而已。第三是必須實行民主憲政才能建立一個民主的國家。現在有一些人士，日日叫喊西方民主憲政，天天哀求共產黨實行民主憲政，卻又時常要罵一罵孫中山及其共和革命，到底是你們錯了呢？還是孫中山先

生錯了呢？

在這篇文章裡，孫先生又是怎樣地敘述了他所要提倡的民生主義的呢？孫先生說：「……歐美自機器發明，而貧富不均之現象，隨以呈露，橫流所激，經濟革命之焰，乃較政治革命為尤烈。……故決定以民生主義與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同時並行，將一舉而成政治之功，兼以塞經濟革命之源也。」

顯然，民生兩字，人皆能懂。民生主義，一目了然。而孫先生「一以民生為社會歷史發展之中心」的民生史觀，又是十分的正確。特別是孫先生不僅強烈地表示過反對貧富對立，而且也一再地表白過「余之民生主義，絕不是均貧富之主義也」！而他之所以要將民族革命、民權革命和民生革命「並一爐而治之」，就是因為，雖然近代歐洲民族獨立已經蔚成風氣，民權問題已經近乎解決，卻由於機器發明、生產日盛、貧富不均現象日益嚴重，從而造成「經濟革命」之焰，「較之政治革命為猶烈」，這才使孫先生感覺到，只要民生問題不能解決，則煽動窮人造反的經濟革命，即馬克思的共產革命，就會像洪水猛獸，吞滅民族革命和民權革命的成果，直至復辟專制而後止。所以，孫先生在他的時代，就要戮力提倡民生，這就遠遠地超過了一般地倡言民生的意義。他是為堵塞洪水猛獸的共產革命而來。

誰能說這不是孫先生的英明預見！因為，近一百年來共產革命在東歐和東亞，特別是在我們祖國荒唐和血腥的革命造反歷史，早已對他的預言作出了最令人痛心的證明。

我今天當然不能在此大談馬克思主義。因為我在倫敦政經學院、美國賓州大學的講演中，曾專門將 19 世紀歐洲的歷史發展，當作一個參照物，從四個方面證明過馬克思主義是對 19 世紀歐洲歷史發展的反動。這也是《誰是新中國》一書的「導論」曾專門論述過的。所以，我今天便想更簡單地以孫先生的三民主義作為出發點，來簡單地證明一下馬克思主義是對近代歷史發展的反動。

第一、孫中山提出了一個正確的和科學的民族主義，馬克思則將德國流亡巴黎的手工業工人的幫語行話——「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改造成了「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發展成了「工人階級沒有祖國」，和「要與一切的傳統觀念作最徹底的決裂」。並且，他還在對世界各民族歷史極其無知的情形之下，將人類社會劃定為五大歷史階段，更因為德國封建歷史漫長——直到他發表「共產黨宣言」的時代，德國還處在分裂的封建社會之中，他便以為全世界各民族國家都和德國一樣，都和德國的封建歷史一樣漫長，都還在封建社會裡面痛苦地生活著……。

他的上述思想，說白了，一是要無知地劃分人類的歷史，二是要否定拋棄各民族歷史，三是要否定和腰斬各民族傳統。以至後來世界上所有國家或地區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黨，都不僅要顛覆自己的國家，否定自己民族的歷史，毀棄自己民族的文化，甚至都把前蘇聯當成了自己的「祖國」。為此，他們不僅曾為了保衛前蘇聯而反對自己的民族和國家，而且

為了保衛一個壞蘇聯便可以背叛自己的民族和國家。1929年，當前蘇聯對我們的祖國發動了大規模的武裝侵略時，中國共產黨就曾堅決地和一再地服從史達林的命令，實行「武裝保衛蘇聯」，以與前蘇聯侵略中國裏應外合。就不說毛澤東和共產黨是怎樣地「要與我們民族的所有傳統觀念作最徹底的決裂」的了！所以說，馬克思主義不僅是反民族主義的，而且是禍害各民族和閹割、糟蹋各民族之自身傳統的。

第二、孫中山提出了一個正確的和進步的民權主義，馬克思主義卻在 19 世紀正在走向民主和自由的歐洲，高喊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問題是，無產階級專政，也是「專政」呀！我們的先賢梁啟超先生早在 1926 年就說過：「什麼資產階級專政，什麼無產階級專政，凡是專政，都不是什麼好東西！」更何況馬克思鼓吹的無產階級共產主義革命，是一個「砸爛的只是自身的鎖鏈，得到的卻是整個世界」的革命，既然無產階級已經在革命中得到了整個世界，那麼，他們還是「無產」的階級嗎？世界上已經滅亡的和還沒有滅亡的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其無產階級專制政權在一切方面的貪婪和無恥，就正是他們在歷史的轉眼之間就會走向亡黨亡國的根由。

第三、孫中山提出了正確的和具有永恆生命的民生主義，以追求民生幸福和堵塞經濟革命，即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革命。馬克思主義則在 19 世紀歐洲已經擺脫專制經濟和行會經濟，正在走向自由經濟和建立市場經濟的進步歷程上，不僅號召發動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革命，以圖摧毀這一偉大的歷

史進步，而且在他們的革命旗幟上，還鮮明地寫著這樣幾個血淋淋的大字：「消滅私有制」！至於已經滅亡的和還沒有滅亡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他們曾在「消滅私有制」的「血旗」之下，迫害了多少無辜的生命，製造了怎樣痛苦的民生，這在今天已經不是什麼秘密了！

我當然不能就馬克思主義這個毒瘤所製造的一切人間災難繼續說下去，比如他鼓吹階級鬥爭，更要用階級性來消滅人性等種種無邊罪孽……。因為我今天要講的只是孫中山和共產黨的關係。而我剛才講的，就正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共產黨的馬克思主義之間的關係。結論是：歷史已經證明，雖然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才是正確的、科學的和進步的，但中國共產黨卻不要三民主義，他要的恰恰是他的反面，即對世界歷史進步起到了可怕倒退作用的馬克思主義。

所以，我們才可以肯定地說，在思想上，共產黨絕不是孫中山的繼承者，而是他的敵人。

1、孫中山至死只有一個主張「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

一個鐵定的歷史事實是，孫中山先生從來只有一個主張「民族、民權和民生」的三民主義。1905年8月，中國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11月，《民報》發刊，孫中山為他作發刊詞，正式揭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以為中國國民革命之思想方針和理論基礎。其後《民報》自然對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進行了很多的討論，但那

個時候還沒有將孫先生的三大主義簡稱為「三民主義」。至1906年8月，香港《中國日報》在廣告上介紹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因用語太長，不夠簡練，才開始簡稱「三民主義」，此後各地報紙才開始採用「三民主義」，三民主義便日漸地成了一個專有的理論名詞，或曰政治概念，而得以迅速普及。

之後，直至孫中山先生於1925年3月12日辭世，其間20年，孫先生雖曾專門演講和著述三民主義不下十數次，涉及三民主義猶不下數百次，也都是講的民族、民權和民生。其中，於1919年撰寫成稿的卓越的《三民主義文言本》，和1924年的春天，即在先生已經被「聯孫容共」之後，因先生於廣州作三民主義之最後一次系統講演而出版的白話本《三民主義講演錄》，凡20餘萬言，講的也都是「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不僅從來沒有講過其他任何內容的三民主義，還曾明確、科學和系統地批判過馬克思主義的「內容」，我在後面會說。

所以，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從來就無所謂新，更無所謂舊；無所謂真，更無所謂假。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後來居然有了「新和舊」的問題，真和假的問題，並且還有人要用新的取代舊的，用假的否定真的，甚至用新的批判舊的，直至要用「革命的三民主義」否定「不革命的三民主義」，特別是要把孫先生的三民主義詆毀成「舊的、偽的、過時的、不革命的和資產階級」的三民主義，那已經是孫中山先生「死

後」兩年、甚至是離他的死更久遠的事情了。

2、鮑羅廷為死後的孫中山製造了一個「新」三民主義

然而，悲劇在於，孫中山死去兩年之後，自 1927 年至 1949 年的，被蓄謀製造出來的「新三民主義」，早已在共產黨內部和那個思想十分自由、輿論也相當自由的「國民黨反動統治」下，發生、發展、發酵了整整 22 年。而自 1949 年起，即共產黨已經奪取了政權，建立了國家，將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正式改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並在一切方面都實行了無產階級的專政之後，直到目前，由於共產黨只准許在教科書和一切宣傳材料上，歌頌他製造的「新三民主義」，而絕不容許任何人揭露他製造「新三民主義」的來龍去脈，所以，共產黨製造的「新三民主義」，便在中國大陸獲得了絕對的思想和「學術」統治地位。以至於今天中國大陸的很多歷史學者，他們雖然早已經知道了真假三民主義的真相和由來，然而，當他們為共產黨編寫教科書時，還是要違心地說假話。因為，不如此，他們就不能夠當教授，做專家，更不能成名。就像那些為了出名求利，甚至為了做共產黨的文壇「寵物」，而不問良知、良心的一些所謂作家、藝術家和文藝「大師」們一樣。如此，中國大陸的絕大多數人都只能「以假代真」，或甘心「顛倒真假」，也就毫不奇怪，所謂「習慣成自然」嘛！

但是，也請容許我引用毛澤東說得很漂亮的一句「最高

指示」，那就是：「假的就是假的，偽裝應當剝去。」

因為，事實是，孫中山先生直到死，就只有過一個《三民主義》，因而也就從來沒有所謂新舊之分、真假之分、革命的和革命的之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分。那麼，新三民主義究竟從何而來，又是何時問世的呢？

對此，我在 1999 年於美國出版的《誰是新中國》一書中，曾明白地寫道：所謂「新三民主義」，即被蘇俄和中共解釋為「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純屬捏造。近年來中國大陸歷史反思的結果，已一再證明他們不過是共產黨的「創作」。

中國大陸學者陳錫其教授早已在他的論文「孫中山與國民黨一大」中指出：「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這是日後『總結』的提法。」至於日後是誰總結的，他顯然不敢說。

另一位中國大陸學者黃彥教授則進一步於論文中指出：「如果有人看了某些文章上面說的，國民黨一大宣言確定了三大革命政策以後再去查閱宣言的話，肯定會感到失望，因為他的 23 條（一作 22 條）對內對外政策都沒有這樣的條文。」這一點非常重要，務必請大家記住。

還有一位中國大陸學者魯振群教授，尤在他的論文「三大政策研究中的幾個問題」裏面，進一步地證明說：「三大政策是在 1926 年 11 月及 12 月間由陳獨秀和中共中央所提出。」歷史的事實是，為了拖延、反對和破壞中國國民黨與

蔣介石所領導的北伐迅速走向成功，1926年11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曾作出決議說：「迎汪（精衛）復職，以與蔣分權，繼續總理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這個目前所見到的第一次完整提出「三大政策」概念的檔，竟是共產黨的文件。是因為孫中山先生逝世，蔣介石護黨，北伐就要走向成功，才逼迫著中共為再度分裂國民黨，破壞國民黨北伐，和意在打倒國民黨新領袖蔣介石，而使用的陰謀策略。

1927年春天，蘇俄顧問鮑羅廷終於在武漢創辦的中共機關報「英文版」《人民日報》上，首次公開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並首次公開「為已經死去的孫中山」宣稱這個所謂的三大政策，就是「孫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義」（參見《誰是新中國》下卷第一章）。然而，此時，孫中山先生已經逝世兩年有餘。

臺灣著名現代史學家李雲漢教授對此提出了更早的佐證，證明了大陸學者言之不虛（——大陸學者哪裡敢「虛」呢！）。他說：「共產黨人對於三民主義的最大汙蔑和曲解，是捏造了所謂『三大政策』，並妄圖以『三大政策』來取代三民主義。事實上，在孫先生的全部言論和國民黨歷次的宣言、決議案中，從來就沒有『三大政策』一詞，而且在孫先生在世的時候，共產分子也不敢提出這一偽造的名詞。這一名詞不見於國民黨的文獻，其最早出現，乃在中共上海區秘密通訊第七號，時間在民國14年的12月（1925年12月）。共黨的《秘密通訊》上有這樣的話：承認一些贊成繼續孫中

山、廖仲愷的聯俄、聯共和輔助工農這三個政策的份子都是左派，反對者便是右派。」李雲漢教授還說：「民國16年1月起，鮑羅廷和他指使下的共產黨人乃大肆叫囂所謂『三大政策』。特別是在武漢地區，只聽到『擁護三大政策』的叫囂，很少人敢宣傳三民主義了。」

李雲漢教授的話，證明了大陸學者小心翼翼地求證。因為「毛主席教導我們」：「假的就是假的，偽裝應當剝去」。

3、共產黨宣誓要為孫中山三民主義的徹底實現而奮鬥

撒謊者都有一個經驗，那就是：撒謊並不困難，困難的是「圓謊」。就是怎樣才能記住自己的謊言，直至將他變成「本能的謊話」。因為，只要撒謊者還沒有將謊言變成本能或本能的一部分，一旦重覆謊言，或經常重覆謊言，就可能露出「破綻」，甚至露出「天機」。

1937年3月15日，中共為圖存，曾第一次向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提出了「四項保證」。其內容為：

一、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今日中國之必須，本黨願為其徹底的實現而奮鬥。二、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四、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我軍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並待命出動，擔任抗日前線之職責。

這是中共第一次公開向國民黨和全國人民提出「三民主義為今日中國之必須，本黨願為其徹底的實現而奮鬥。」而且，根據「四項保證」的內容，這裏提到的三民主義，應是孫文「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而不是鮑羅廷製造的「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新三民主義』」。共產黨和毛澤東好像將蘇聯顧問為他們製造的「新三民主義」暫時地忘卻了。

所以，就在共產黨剛剛做過第一次保證之後——

1937年5月3日，毛澤東才會在「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一文中，高亢的宣誓說：「我們不但不拒絕三民主義，而且願意堅決地實行三民主義，而且號召全國人民實行三民主義。我們認為，共產黨、國民黨、全國人民，應當共同一致為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這三大目標而奮鬥^{註3}。」

請大家注意，毛在這裏為共產黨的「三民主義為今日中國之必須、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作出了明確的說明：這個三民主義，就是孫中山「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而不是連一個「民」字也沒有的「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新三『民』主義」。

1937年7月15日，因蘆溝橋事變已經發生，中國人民偉大的衛國戰爭就要全面爆發，中國共產黨巴不得國民黨趕快對外，不再對內，又第二次向國民黨和國民政府作出了上述的「四項保證」。由於「保證」未變，所以「三民主義為今日中國之必須，本黨願為其徹底的實現而奮鬥」的誓言也沒

有變，毛在上面提及的三民主義的內容也沒有變。所以：

1937年9月22日，即在中共剛剛做過第二次「保證」之後不久，中國共產黨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復又高亢地宣稱：「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須，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註4}

1937年9月29日，毛澤東又在「國共合作成立後的迫切任務」一文中，再一次高亢地宣誓說：「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須，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註5}

彼時，全面抗戰雖然已經開打，但是，由於一方面是中共的「四項保證」剛剛重覆作過，不好立即翻臉；另一方面，中共這個時候還僅僅有三兩萬人馬，兩三個縣地盤，也還不敢馬上翻臉。所以，在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發表宣言、表示堅決抗日的決心時，他們說話還是較為小心，而不敢大膽妄為，更不敢馬上就公開大撒其謊。

4、共產黨改口稱他們宣誓的是「革命的新三民主義」

然而，僅僅不到一個月，大概毛澤東已經意識到自己「大意失荊州」，忘記了蘇俄顧問和共產黨早已為死去的孫中山製造過一個「新」三民主義，即「聯俄聯共扶助工農」，加上此時全面抗戰已經打響，中華民國的國民革命軍正處在對日寇的奮勇抗擊之中，京綏、京漢、津浦三線和上海「8.19」淞滬抗戰正打得難分難解、血肉橫飛，於是，毛澤東才會「在他延安的窯洞裡興高彩烈地喝著紅葡萄酒，大笑著說道：「蔣

介石這股禍水終於撞到日本人那裡去了！」（參閱《張國燾回憶錄》）意思就是蔣介石國民黨已經不能奈何他們了，所以：

1937年10月25日，毛便在「與英國記者貝特朗的談話」中，含混地改口說道：「……我們同意以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義、三大政策及其遺囑，作為各黨派各階層統一戰線的共同綱領。但這個綱領至今沒有為各黨派所承認，首先國民黨還沒有承認發布這樣一個全部的綱領」。^{註6}

請大家注意，時隔不到一個月的功夫，毛澤東就已經悄然地將孫中山「民族獨立、民權自由和民生幸福」的三民主義拋棄了，重新拾起了「革命的三民主義」和「共產黨的三大政策」，為鮑羅廷「圓謊」。

但是，毛澤東還不敢來真的，還是有些羞羞答答。因為，他還不敢說「共產黨的三大政策」就是孫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義」；他甚至承認，這個「假的三民主義的綱領」還沒有得到國民黨和全國各黨派的承認。因為，毛澤東知道，繼續撒謊和撒大謊的時機，顯然尚未成熟。

然而，對於毛澤東和共產黨來說，這個「時機」終於迅速地走向成熟了。

1939年12月，當蔣介石「持久戰」的戰略已經實現，大中華民國的對日抗戰已經轉入艱苦萬分的「相持階段」；當「只有後方、沒有前方」的中國共產黨^{註7}，在敵後已經擁有「遊而不擊，專圖擴張」的50萬農民「革命」軍隊時，這時，專

心在窯洞中研究中國未來「共產建國」理論的毛澤東，終於在他的「光輝著作」《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這本小冊子中明確宣稱：「中國共產黨在 1937 年 9 月 22 日發表宣言，聲明『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須，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這種三民主義即是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即聯俄、聯共和扶助工農的三民主義。在新的國際國內條件下，離開了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就不是革命的三民主義。」^{註 8}

請大家注意，毛澤東終於徹底地「翻案」了，不僅「言之鑿鑿」地將他和他的黨，在 1937 年曾兩次向國民黨和國民政府「保證」過的，並且堅決地和高亢地宣誓過的——「三民主義為今日中國所必須，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的誓言，及其所包含的「民族獨立、民權自由和民生幸福」的孫文三民主義內容，徹底地拋棄了；而且，毛澤東還將前蘇聯顧問為他們製造的「新三民主義即三大政策」重新塞給了死去的孫中山，甚至為這個真正的連一個「民」字也沒有的「假三民主義」冠上了「革命的」三個字，其言下之意，自然是指責孫中山原有的三民主義是「不革命」的了。

5、毛澤東汙衊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是「舊的、假的、偽的、過時的、不革命的和資產階級的」

1940 年 1 月，不過兩個月之後，毛又在他的延安窯洞裡為共產黨將來建立一個什麼樣的專制國家，寫作了他的又一篇「光輝著作」《新民主主義論》。毛在這部新著中先還說：

「孫中山先生之所以偉大，不但因為他領導了偉大的辛亥革命（雖然是舊時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為他能夠「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革命政策，對三民主義作了新的解釋，樹立了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註9}。

為了要讓謊言顯得比真話還要真實，毛澤東將蘇聯顧問和共產黨為死後的孫中山所製造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塞給了死去的孫中山本人。毛的話等於是在說：「死後」的孫中山先生，因能夠「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才將他的三民主義作出了新的解釋，並重新樹立了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毛就「偉大」在敢為死人編謊。雖然，毛在假惺惺地表揚孫中山領導了偉大的辛亥革命時，仍然沒有忘記點明孫先生領導的是「舊時期的民主革命」。

我前面說過，一旦說謊開了頭，就煞不了尾，為了圓謊，就必須繼續撒下去，直到將謊言變為赤裸裸的和公然的強詞奪理，直至公然汙蔑。

為了將鮑羅廷為他們製造的新三民主義「合法化」，毛終於開始攻擊孫中山的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是「舊三民主義」了。還是在這部《新民主主義論》中，他無中生有地指稱1924年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區分了三民主義的兩個時代。在這以前，三民主義是舊範疇的三民主義，是舊的半殖民地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三民主義，是舊民主主義的三民主義，是舊三民主義。」^{註10} 他還進一步

地說：「1924年國民黨改組以前的三民主義，乃是舊範疇的三民主義，乃是過時了的三民主義。」^{註 11}

在這裡，毛為了給鮑羅廷製造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圓謊，乾脆造了一個更大的謊言，居然說「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宣言」，區分了三民主義的兩個時代，甚至公然指稱：「1924年前的三民主義是舊三民主義，是過了時的三民主義」。也就是說，第一，1924年1月1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提出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第二，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前，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就是舊三民主義。

我不想說了，因為，我在前面已經說過了，第一，中國大陸學者早已明確指出：「如果有人看了某些文章上面說的，國民黨一大宣言確定了三大革命政策以後再去查閱宣言的話，肯定會感到失望，因為他的23條（一作22條）對內對外政策都沒有這樣的條文。」原來，所謂「某些文章」，就是毛澤東的文章，是他的文章在子虛烏有地大撒其謊。難怪中國大陸的學者不敢「駁謊」。

第二，姑不說「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無一字、無一句提到過所謂三大政策，更沒有提出過什麼「新三民主義」，全文講的都是孫先生的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而且，孫中山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之後，曾在廣州連續講了三個月的三民主義，還出版了他20餘萬言的演講錄，其內容就是「民族主義六講」、「民權主義

六講」和「民生主義四講」，同樣無一字提到他還有一個「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新三民主義」，更沒有宣布他講了 20 年的三民主義是舊的，是過時的，是不革命的；他當然更沒有說，要以「國民黨一大」來作為他的「新、舊」兩個三民主義的「分水嶺」。

由於毛澤東的謊越撒越離譜，已經越來越收不了攤子，於是他乾脆悍然不顧地要「弄假成真」、直至「去真存假」了。他說：「……這種新時期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或真三民主義，是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沒有三大政策，或三大政策缺一，在新時期中，就都是偽三民主義，或假三民主義。」^{註 12}

至此，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在毛澤東的嘴巴裏，終於徹底地變成了假三民主義，偽三民主義。而蘇聯顧問為死後的孫中山先生所製造出來假的新三民主義，倒成了孫中山的真三民主義了。

為了維護直至捍衛謊言，為徹底收回共產黨在抗戰開始時要「為孫中山三民主義的徹底實現而堅決奮鬥」的高亢誓言，在毫無言論自由的延安，毛澤東終於放開膽量無比蠻橫地進一步宣稱：

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或真三民主義，必須是聯俄的三民主義。

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或真三民主義，必須是聯共的三民主義。

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或真三民主義，必須是農工政策的三民主義。^{註 13}

為了將謊言變成真理，為了劃清共產黨的馬克思主義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的思想界限，更為了徹底地拋棄和反對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毛澤東終於向死去的孫中山攤開了底牌，說明了共產黨和孫中山在思想上從來就不是一路人，他說：「共產主義的宇宙觀是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三民主義的宇宙觀則是所謂民生史觀，實質是二元論或唯心論，二者是相反的。」^{註 14}

毛澤東終於把話說絕了。毛澤東也終於把孫中山為之研究、宣傳、奮鬥了一生的——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徹底地埋葬在共產黨無窮的謊言之中。

至於毛澤東和共產黨為什麼要如此地攻擊、汙蔑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如此地吹捧蘇聯顧問為他們製造的「新三民主義」，並且欺騙至今，其根本原因則是，只要承認了孫中山三民主義的革命建國思想：中國共產革命就無路可走，毛澤東要奪權打天下就毫無道理，中國共產黨的無產階級專政「黨天下」就不可能實現……。就不說列寧早就指斥孫中山的民主主義，是「以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反動學說為基礎」的呢！^{註 15}。因為，自稱「孫中山和我們具有各不相同的宇宙觀，從不同的階級立場出發去觀察和處理問題」的毛澤東^{註 16}，和他的中國馬列子孫集團，是必須對馬列的任何「最高指示」都要頂禮膜拜的，更是必須把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歸結為資產

階級的。惟有如此，才能做到「承認他，就是為了打倒他」。

毛澤東從來就是這麼說的，共產黨至今也還是這麼做的。至於被鄧小平稱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現在卻自稱是孫中山忠實繼承人的胡錦濤上臺後，又陽冒三民主義之名，搞笑般地又搞出了一個「新三民主義」，說到底，還不是要繼續用假的來取代真的嗎？當然，可以原諒的是，胡錦濤本人，以他的學識，又怎麼會知道，一手栽培了他的共產黨前領袖們，又是怎樣地欺騙、背叛死去的孫中山，並為孫中山製造了一個假的新三民主義的呢？

二、孫中山與共產黨的革命分野

孫中山要走向共和，共產黨要復辟專制

我所說的「孫中山與共產黨的革命分野」，就是指孫中山發動領導的中國國民革命，和由蘇俄領導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發動的共產革命，是兩個性質完全不同的革命。而這兩個性質完全不同的革命，自然也就造成了兩個完全不同的建國結果。孫中山於 1912 年創建的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大中華民國，與共產黨在 1931 年及 1949 年所篡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前者是一個要走向共和的三民主義好中國，一個真正的新中國；後兩個則是要在「外族敵國」的命令和指揮下，和在共產革命的名義之下，從分裂中國入手而篡立的「馬列中國」，也是兩個全面復辟了舊專制制度，實行了極權專制統治的假新中國。

1、孫中山領導的是要「走向共和」的中國國民革命

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革命，從性質上來說，就是孫中山提倡和發動的中國民族革命、民權革命和民生革命的總概念，或總名稱。他以三民主義為革命的思想理論基礎，在民族革命方面，對外反對東西方列強的欺凌和瓜分，追求民族的獨立地位；對內推翻滿清少數部族的貴族統治，追求滿、漢和各民族間的平等。在民權方面，則志在推翻專制，結束帝制，創建一個民主共和國，「是為了走向共和，而不是為了奪權專政」。在民生方面，則意在發展自由經濟，節制資本經濟，為民生幸福而奮鬥。所以，他既包含了美國獨立革命的民族意義，又包含了歐洲民主革命的內容，還創舉了具有世界意義的中國民生革命的旗幟。民國創建之初，袁世凱復辟帝制之前，新中國——大中華民國，確實是在上述方面有著卓越的表現的。對此，我在後面將會用事實予以說明。

孫中山發動和領導的中國國民革命的使命，一是推倒專制，建立共和，所以又稱共和革命。二是在革命初造成功前，要堅定地反對「專制改良」，因為專制改良是為了維護專制統治的；而當專制勢力捲土重來之時，則要堅定地反對「專制復辟」，因為專制復辟是要葬送共和民主的，是倒退，更是反動。所以，孫中山領導的中國革命，在革命初造成功之前，就曾明確地反對專制改良行徑；在革命初造成功之後，又堅定地反對形形色色的專制復辟——比如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反對張勳復辟滿清，反對北洋軍閥「假共和之名義以

行專制之實」。對此，他確實是無負於自身的使命的。特別是他反對專制復辟的堅定表現，才又使他同樣地具有了歐洲各國共和革命的鮮明性質和特徵。後來，他雖然和俄國 2 月民主革命一樣，遭遇了共產革命對他的進攻甚至遭遇失敗，但是，他的前途卻是十分的光明的。因為，共和必將勝利，共產已經敗亡。共產黨早就說過：「蘇聯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嘛！

2、共產黨遵俄命發動的是要復辟專制的世界共產革命

一個無須贅言的事實是，用馬恩列斯和中國共產黨歷任領袖的話來說，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就是中國共產革命；中國共產革命，則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個部份。

這個革命在思想上，就是鼓吹暴力革命，宣揚階級鬥爭和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目的是既要用暴力推翻共和，又要用暴力維護專政。同時要求以階級性代替人性，進而用階級性來消滅人性，並為此製造新的嚴酷等級來重新劃分階級，將「出身和血統」提高到了史所未有的地步。中共土貴族子弟不僅在文革中高唱「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可以任意宰殺、活活打死「成份不好或出身不好」的男女青壯、老幼婦孺，甚至是為他們「傳道解惑」的老師，便是他的血腥表現。在歐洲，這是對 19 世紀民主共和思想發展及其實踐的一個徹底反動；在中國，則是對春秋戰國以來，秦始皇「廢封建、置郡縣」之後，特別是辛亥共和革命之後的一

個極端反動。至於共產黨的一個小科長死了，「向馬克思報到」去了，當地的黨報上，都要刊登一條新聞，報導他生前享受「正科級」待遇，早已是人民所不齒的笑談。

這個革命在政治上，就是要消滅全世界的資產階級，推翻全世界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以建立一個由全世界的「無產階級」永遠實行專政的國家，即「千秋萬代永不變色的鐵打江山」；實際上則是要推翻剛剛創建了共和制度，並開始艱難走向共和的嶄新民主國家。列寧的俄國共產黨推翻了由俄羅斯二月民主革命所創建的俄羅斯共和國，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推翻了辛亥革命所創建的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我們的大中華民國，都是歷史的明證。

這個革命在經濟上，則是要「消滅私有制，實行公有制」。為此，他們消滅資本家，屠殺地主；弘揚阿 Q 精神，煽動窮人造反；把殺人取貨喚作革命，將抄家劫財當作兒戲；高喊「一大二公」，卻在實際上，使世界上所有的「共產黨國家」及其層層腐敗統治集團，都曾擁有、或還在繼續和瘋狂地擁有著一個「獨一無二和完美無缺」的血腥私有制。所謂「吃喝嫖賭都報銷」，便是大陸人民對共產黨大小官僚最富於形象的描述。

這個革命在文化上，首先號召「要與一切傳統觀念徹底決裂」。也就是說，他要求各民族國家的共產黨人和共產黨政權，都要批判、否定自己的民族傳統，並指責各民族的傳統文化都是封建文化，都在被打倒、被焚毀之列。其目的，

就是要製造出一種以馬列文化作為其文化基礎的，新的「反民族文化」。然後，則實行「獨尊馬列、殺盡百家」，以建立一個有「世界教廷」的「教政合一」式極權專制國家。正因為如此，革命的無產階級是沒有祖國的，革命的無產階級後來則均要認前蘇聯為自己的祖國，並為了保衛他們的無產階級祖國蘇聯，而瘋狂背叛自己的民族和國家。我在前面已經提及，後面還會說到。

所以，我才會在《誰是新中國》一書中論證，馬克思主義是鼓吹專制復辟的哲學，世界共產革命是在革命的名義之下重建專制制度的復辟，中國共產革命是對中國辛亥共和革命的徹底反動，毛澤東和共產黨篡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是復辟了專制制度，建立了極權統治，「認馬列為祖宗、不認中華為祖先」的假中國和假新中國，即不是中華民族的民族共和國家，而是馬列黨族的黨族專制國家。

這才是中國共產革命的性質和使命。

3、共產黨指責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革命是「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革命」

理所當然的是，有一個什麼樣的思想分野，就會有一個什麼樣的政治分野。我們中國人說：「道不同，不相為謀」，就是說，只有存在著思想上的共識，才能相謀；若不存在思想上的共識，就不可能同道。由於孫中山發動和領導中國國

民革命的思想基礎是進步的三民主義，而共產黨要在中國發動共產革命的思想基礎是反動的馬克思主義，中共要受蘇俄的命令，在中國發動共產革命，建立一個從屬於蘇俄的共產黨專制國家，他們就不可能不反對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因為，只需中國的國民革命要朝著民族獨立、民權自由和民生幸福的方向發展並獲得成功，就不符合中華民族的世仇大敵——新老沙皇的利益，就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就不符合共產主義革命一心要為所謂的「無產階級」得到全世界——而進行的，無休止的和殘酷的階級鬥爭道路。

為此，在中國共產黨的「共產革命辭典」裏面，中共秉承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列寧、史達林的旨意，更在列寧和史達林的教導之下，雖然在謀略上曾著意混淆中國國民革命和中國共產革命在性質和使命上的根本區別，意在利用和誘變中國的國民革命，但在思想、理論和行動上，則從來都是指責孫中山的中國國民革命，否定孫中山的中國國民革命，和堅決要打倒孫中山的中國國民革命的。

毛澤東就曾在他的「光輝著作」《新民主主義論》中，完全根據馬克思對世界無知、對中國更無知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稱：「自周秦以來，中國是一個封建社會，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經濟是封建的經濟。而為這種政治和經濟之反映的占統治地位的文化，則是封建的文化。」^{註 17}

然後，毛澤東便居心叵測地把 1840 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認定為「開始由封建社會改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

並且把「太平天國運動、中法戰爭、中日戰爭、戊戌政變、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直到今天的抗日戰爭」，都視為「改變這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形態」的革命，即資產階級的舊民主主義革命」。^{註 18}

當毛澤東存心將已經結束二千年君主帝制、志在走向共和的辛亥革命——即中國國民革命的「勝利發端」，與太平天國造反這一類意在「推翻舊王朝、復辟舊制度」的造反革命混為一談之後，他終於不懷好意地說：「辛亥革命，……按其社會性質來說，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的革命，不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孫中山先生說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然需努力』就是指的這種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註 19}

這是因為毛澤東根據列寧的「革命階段論」，把中國近現代所出現的革命，分為先後兩個部分：第一步是民主主義的革命。第二步是社會主義的革命。而在第一步的民主主義革命中，又分為由資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革命，和由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而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革命，便被毛澤東劃為資產階級的舊民主主義革命。毛澤東的這個劃分，不僅把孫中山的中國國民革命推到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對象地位，而且把孫中山正在領導的反復辟的中國國民革命，推到了必須被無產階級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所取代的地位。毛等於在宣布說，雖然孫中山的革命，現在還沒有到被我們當成對象的時候，但現在就已經應該為我

們所取代。

4、孫中山不是中國共產革命的先行者

綜上所述，我們必須清楚的是，孫中山先生是中國國民革命的領袖，也是中國國民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卻不是中國共產革命的先行者。因為不僅孫中山的革命和共產黨的革命性質完全不同，甚至相反，而且，共產黨早就指斥孫中山的國民革命是資產階級的革命，早就指認孫中山的革命是共產黨的無產階級革命必須打倒的革命，孫中山先生又怎麼能夠成為共產黨的革命、即中國共產革命的先行者呢？

正因為如此，辛亥之後的孫中山要繼續領導反對形形色色專制復辟的中國國民革命，而共產黨則要受俄命在中國發動世界共產革命；孫中山要繼續領導中國國民革命以捍衛亞洲第一個共和國——我們的大中華民國，共產黨卻要受俄命一心要顛覆我們亞洲的第一共和國——大中華民國；孫中山要反對「假共和之名義以行專制之實」的軍閥及其復辟混戰，決心北伐打倒軍閥，共產黨才會為受俄命發動共產革命，而反對北伐、利用北伐、破壞北伐，直至背叛北伐，徹底叛變中國的國民革命，從此便在前蘇聯史達林的直接命令和指揮下，在中國發動武裝暴動，煽動土地革命，建立認前蘇聯為祖國的蘇維埃政權……。如此，我們只能說，孫中山是中國國民革命的歷史領袖，絕不是中國共產革命的先行者，而是蘇俄領導指揮的中國共產革命的對象。

三、孫中山與共產黨的建國分野

孫中山創建的是要「走向共和」的進步中國

共產黨篡立了一個「復辟專制」的倒退中國

當然，毛澤東之所以要否定和推倒孫中山所領導的中國國民革命，其目的，就是為了推倒孫中山先生領導的所謂「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成果——「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就是我們亞洲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大中華民國，建立他們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的「俄屬新馬列國」。但這個「俄屬新馬列國」，他的前身就是前蘇聯在別人的國家所篡立的第三個蘇維埃共和國即「中華蘇維埃共和國」，1949年後則號稱「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復辟了專制的倒退中國，和一個實行了一家洋教黑暗統治的假新中國。也就是說，共產黨「在革命名義下」的專制復辟，如同英國的斯圖亞特王朝、法國波旁王朝、和前蘇聯革命名義下的共產專制復辟一樣，成功了。雖然他們好景難長，都是短命的，最後都要垮。

為了證明事實究竟是不是這樣，我們還是先從民族、民權和民生三個方面對他們進行一番比較，好讓這「兩個中國」在事實的比較中，揭開真相，以證明這「兩個中國」的根本不同性質。再說，有了大中華民國這個「參照物」，我們就更能夠看清楚「馬列中國」的政治本相了。

1、民族分野

簡單地說，一是孫中山先生公開宣稱，由辛亥共和革命所創建的大中華民國，是對「文武周公、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之中華民族世代歷史的一脈相承，這就等於是向世界宣稱了——大中華民國就是大中華民族的現代民族國家和現代民主國家。

二是推翻滿族貴族的專制統治，其性質就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是中華民族第二次驅除外族統治、恢復中華的偉業，是繼朱元璋「驅除胡虜、恢復中華」之後的又一次偉大的民族革命。他使國內各民族開始走向了平等。特別是因為他能夠做到「絕不以復仇滿清為能事，而務與之和平共處於中國之內」，才使他確實像歷史劇「走向共和」的臺詞所說的那樣：「辛亥革命是歷史上少有的革命」——因為他不報復，不殺人，不抄家、不向前朝的遺老遺少大事復仇，更不對全體人民、特別是前朝的遺老遺少，講出身、分階級、劃成份、實行專政。

三是從此明確必須對外爭取民族獨立，猶以「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為中國國民革命成功的第一個標幟」，並以反對前蘇聯藉口在中國發動共產革命來顛覆我中華民族的民族國家，為自己的民族革命天職。對前者這個歷史性的民族願望，終於因大中華民國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貢獻，而由蔣介石於 1942 年春天在開羅會議上光榮完成；對後者這個中華民族的深災巨禍，卻因為日本的長期瘋狂侵略和中共奪權篡國的

成功，而慘遭失敗，才使得中華民族的民族國家，墮落成為幾乎消滅了中華民族的「馬列黨族國家」。

四是「繼承我優秀的民族文化，並吸收世界之先進文化，以並趨於世界……」。孫先生開創的大中華民國和曾在大陸執政的中國國民黨，不僅對自己民族的傳統文化十分看重，其有心繼承、傳揚、發展，俱為歷史的事實；而且對世界文明、特別是西方近代的進步政治文明等其他文化，作有心的介紹、移植和傳播，也為歷史所證實。在大陸慘遭失敗的大中華民國，在退守臺灣之後，當然是在兩蔣時代，其對於中華民族歷史，特別是中華民族傳統優秀文化的整理、研究、傳承和宏揚，確實為保存我中華文化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至於今天臺灣的國民黨和民進黨，我這裡就不必說了。

2、民權分野

由辛亥革命所創建的大中華民國，較之朱元璋的民族革命更為進步、更在本質上與朱明王朝完全不一樣。因為他不僅驅除了滿洲貴族的專制統治，而且從根本上結束了自秦始皇之後中國已經綿延了 2100 年的君主帝制，並從此開始「走向共和」。他不僅劃開了中國數千年「專制國統」和剛剛誕生的「共和國統」的界限，而且劃開了「君主憲政」和「民主憲政」的界限。前者被孫中山先生稱為「不完不備的共和」，後者則被孫先生稱之為「直截了當之共和」。誠如我在《誰是新中國》一書中曾引用中共御制的教科書說道，辛

亥之後的中國，「民主空氣濃厚，民主潮流高漲，民主憲政在實驗中。僅 1912 年，即中華民國元年，中國出現的新政黨，已註冊者即達 85 個，政治團體 22 個。各種政黨合法並存，合法競爭，三權分立的國家體制基本上得以維繫，各類法政學校遍布全國，以宋教仁為代表的民主革命家，力圖通過合法鬥爭的手段，推行政黨政治，組織政黨內閣，獲得了很大成就……」^{註 20}

人民擁有了思想輿論出版自由，至 1913 年 7 月，民辦報紙已經達到 500 多種。1916 年，袁世凱稱帝前後，全國報紙群起而攻之，遂使得「敢有帝制自為者，全國人民共擊之」的誓言，不僅成為歷史的事實，而且造成了勝利的結果。即便是在他被共產黨即中國的「馬列子孫」一再攻訐的國民黨訓政時期，就是上個世紀的 30 年代，中國人民所擁有的思想輿論出版自由，也是今天的中國大陸人民連想都不敢想的。我曾在講演中不止一次講過：至 1937 年 3 月止，中國文化人自己創辦的民間報紙就有 1117 份，民辦的各類文化刊物就有 1518 份……，不獨如此，當時中國的大報——《申報》、《大公報》、《國聞日報》……，當時中國的大出版社——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當時中國的 70 餘家大型電臺中的絕大多數，全都是民辦的……。其時，共產派知識分子可以公開在國民黨的中央日報上一邊撰文歌頌我們敵國的首領史達林是他們的父親，一邊責罵大中華民國的領袖蔣介石是「獨裁無膽、民主無量」……。朋友們，這就是大中

華民國在國民黨蔣介石訓政時期，他的人民所擁有的民權！至於在我們的大中華民國時代，我們的老百姓們，我們的知識分子們，究竟享有過多少的民權和怎樣的民權，我今天就不講了，好在大陸歷史學者們的反思成果昭然，我也在《誰是新中國》一書中作了詳細的敘述。

政治、經濟、新聞和言論的自由，勢必要帶來文化的蓬勃發展。誠如《誰是新中國》一書所述，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之所以只能發動在辛亥之後，中國的白話文運動之所以只能成功在辛亥之後，中國的新文學之所以在歷經晚清改良文學的自將磨洗之後，亦能夠成熟、成形、成功在辛亥之後，中國的五四愛國民主運動之所以只能夠勝利在辛亥之後……，甚至中國的新文學，就更是在「蔣介石國民黨的反動統治」下，才產生了舉世聞名的作家和好作品，其根本原因，就是因為由辛亥革命所創建的大中華民國，和北伐勝利之後已經在走向統一和進步的大中華民國，是一個已經創建了共和，並正在艱難地推進著民主，反對著專制復辟的真正新中國。我們只要稍稍設想一下，1949年之後，只要中國大陸還存在著一份人民自己辦的自由報紙，上可以揭露共產黨的統治罪惡，下可以揭開社會主義的黑暗，我們的人民還會被共產黨葬送掉八千萬無辜的生命嗎？毛澤東及其四人幫還能夠橫行無忌整整十年，使神州陷入萬般血腥之中嗎？

3、民生分野

同樣是這本中共的近代史教科書又這樣說道：「辛亥之後的中國，迅速扭轉了革命前民族工商業的蕭條局面，各種實業團體紛紛建立，各類私營企業競相出現……自辛亥前四十年中國民族、民間工業誕生至 1911 年止，資本萬圓以上的廠礦有七百家，資本總額僅一億三千萬圓。然而，自 1912 年至 1919 年的八年內，大型廠礦建成 470 多個……新增資本達一億三千萬圓以上，相當於辛亥革命前 40 年（清王朝改革開放時期——講演者註）投資的總額……。」^{註 21}。於是，這本近代史教科書繼續寫道：「1914 年 3 月 15 日，由民間籌備的『中華全國商會聯合會』成立」。這豈止是在中國數千年的歷史上不曾有過的盛舉，而且也是自 1949 年以來，在中國大陸所絕不准許發生的事情。試問，在今天的中國大陸，那些民營企業家們又有哪一個敢去籌備一個「沒有中共黨組書記的全國民間工商聯」呢？不用說全國了，就是一個鄉鎮的真正民間「商會」，也沒有人敢去籌辦的。由此可見，這個剛剛誕生的中華民國，即便是在中共的近代史教科書裏，是不是也像一個正在建立真正自由經濟、發展真正市場經濟的新中國和好中國呢？

應該說，就民生而言，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是否能夠保證人民擁有私有財產的權利。由於中國數千年歷史上從來就有保護人民私產的制度，甚至有「制民之產」、也就是要幫助人民發展和保護私有財產的思想和做法；由於大中華

民國創建之後，中國健康的市場經濟，就是真正的自由經濟制度，不僅立即得到了建立，而且得到了很大的發展；由於北伐之後的大中華民國南京政府，其能夠調動的民間財力，僅占全國民間財力的百分之三；更由於大中華民國的各級政府從來就沒有對人民劃成份、分階級、進行階級鬥爭，動不動就抄家劫財沒收財產，甚至是為了抗戰，國民政府也只是號召國民認捐，而不是強迫國民「交產」，更不會「抄家」。衛國戰爭期間，在國民政府陪都重慶發生的上萬青年學生跪求商人捐款支持抗戰的行為，實在是只能使得 1949 年後的商人感慨萬千！^{註 22}

特別應該說到的是，全面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為了保護中國的知識分子，維護他們的生命，保證他們的生活，曾想盡辦法將當時中國高級知識分子中的百分之九十、中級知識分子中的百分之五十、和初級知識分子中的百分之三十統統轉移到了大後方……。我們要是將國民政府對中國知識分子生命和生活的重視，與 1949 年之後中國大陸知識分子之無端地、大規模地和一再地慘遭屠殺、蹂躪、批判、鬥爭、貧困和饑餓相比，又豈止是「天差地別」一句話所能形容的。

至於大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 1930 年就已經頒布土地改革綱領，及其在內憂外患之下，甚至是浴血抗戰之中，在凡是沒有戰事、而可能實行土改革的局部地區所進行的 375 減租等一系列的農村改革，自然都是這個政府所做的民生奮鬥的一部分。這才是 1949 年之後退守臺灣的中華民國臺北政權，

之所以能夠立即全面地推行「未殺一人」的土地改革，更因此而將整個臺灣地區的民生水準推向了世界先進地區水準的最根本原因……。

四、同樣用民族、民權、民生來檢驗共產黨

現在，我們可以也從民族、民權和民生三大方面入手，將共產黨奪權建國之後是怎麼幹的，大致地作一番交待，並與孫中山創建的、蔣介石曾捍衛和建設的大中華民國再作一些具體的比較。雖然，我們剛才已經作過一些比較了。

1、從民族歷史和民族文化的傳承上來看

1921年，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專程赴廣西桂林拜訪孫中山時，曾當面問道：「先生的革命思想基礎是什麼？」孫先生當即回答說：「中國有一個道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繼不絕，我的思想基礎，就是這個道統；我的革命就是要繼承這個正統思想來發揚光大。」

蔣公介石則確認三民主義的中心思想就是中國道統，他說：「三民主義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留傳的大道，亦就是中國政治倫理哲學的基礎。」所以，陳立夫先生才會說：「蔣公繼承國父遺志，復興民族文化，使中國道統的時代精神，愈益發揚光大。」^{註 23}

而蔣公在臺灣發起「復興中華民族文化運動」的時候，共產黨正在發動文革，正在與中國的傳統文化實行最徹底的

決裂，並且決裂的方法，就是對一切代表著中國傳統文化的文物進行徹底地毀滅。

所以，如我在前面所述，孫中山創建的大中華民國，當然與文武周公、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一脈相承……，因而他才是我們中華民族自己的民族國家，而所有創建、捍衛和建設過我大中華民國的奮鬥者，當然都是我中華的兒女。

但是，中共所篡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承的卻是「馬恩列斯毛鄧江……」，並且至今現在還在想著怎樣才能「馬恩列斯毛鄧江湖……」地傳承下去。直到今天，中共仍然對一切反對馬克思主義的言論均視為對他們的「反動挑戰」，並且還要花大錢，下大氣力來加強「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工程建設」^{註 24}。只因毛帶了頭，所有共產黨人便都說「死了便要去向馬克思報到」，絕不向中華民族的歷代祖先報到。這裡就不說中共的專制統治理論，專制統治制度，專制統治手段，乃與蘇共及所有共產黨國家一模一樣，絕非是對中國傳統專制政治的繼承。所以，中共所篡立的這個國家，當然不是中華民族自己的民族國家，而是如我在「中國命運和臺灣前途」的講演中所說的那樣，是「馬列黨族的國家」，而所有為篡立和維護這個「馬列中國」而賣命的，自然就都是「馬列子孫」，雖然他們當中有許多人，開始的時候是因為受了一個所謂美好理想的欺騙。多年來，我在講演中都一直在講要「驅除馬列、恢復中華兒女的民族精神」，期望當代的中國人，「要做中華兒女、不做馬列子

孫」……。誰想，最近我才發現，1957年，四川省重慶中學的鄧祐曾老師就已經說過：「……中國有五千年燦爛文化，為啥還要立一個大鬍子洋人作祖宗？」就為這，鄧祐曾老師就被共產黨劃為右派並剝奪了生命的權利！^{註 25}

難道鄧祐曾老師說得不對嗎？當然對，太對了！不說馬克思主義是一個倒退的、反動的主義，就算他好得不得了，我們中華兒女也只需要有好說好，有好學好，也沒有必要非把馬列頂在頭上做祖宗，更沒有必要拋棄、批判、否定和打倒「中華國」，卻篡立什麼「馬列國」呀！任何為人父母者，難道只因為別的人家好，就會逼著自己的兒女改姓更宗嗎？任何一個為人子女者，難道只因為別的人家比自己家好，就要給別人家做孝子賢孫，還一定要推翻自己的父母，否定自己的祖宗，毆打甚至屠殺不聽自己話、不跟著自己走的兄弟姐妹、甚至是下一代嗎？

二是孫中山在1924年春天的三民主義系列講演中，曾系統地批判了馬克思主義，明確地反對「用馬克思的辦法來解決中國的問題」。但是，中國共產黨卻要堅持「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就是一定要用「馬克思的辦法」來統治中國。所以，他才會堅持製造階級鬥爭，堅持實行所謂無產階級的專政，始終迷信暴力和堅持運用暴力來殘酷地鎮壓我們中華的兒女。所以，他才會全方位地消滅中華民族歷史上從來就有的，並以「制民之產」（孟子語）為特徵的私有經濟制度，實行所謂的公有制，即實際上的「黨

有制」——說到底就是中共「層層統治集團完美無缺的私有制」（——這是我 1986 年 11 月 11 日在武漢大學講演時所說的話，險些倒了大霉！）來剝奪全國人民的財產，以奉其一黨的享受。所以，他才會強迫馬列中國的所有臣民都必須「言必稱馬列、書必證馬列、事必奉馬列」——也就是說，用刺刀逼迫所有的中國人，「說話必須先稱馬列的教導，著述必須根據馬列的理論，做事必須以馬列的思想作為指導」。直到今天，連北京師範大學的歷史系教授白壽彝先生主編的《中國通史》，雖然洋洋千萬言，浩浩 20 餘卷，卻依然要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之下，既要用五千年的中華民族歷史，來證明馬克思主義的無比正確，又要用馬克思的所謂歷史唯物主義理論，來剪裁、編造、竄改中華民族的歷史發展，實在令真正的中華兒女蒙羞之至。

至於鄧小平依然要「掛馬克思主義的羊頭、賣專制改良狗肉的改革開放」，其實質就是「專制改良」，也就是中共的「洋務運動」，說到底，他還是要「繼續傳承馬列和救社會主義的命」！而那個被鄧小平誇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的中共「黨儲」胡錦濤一上臺，就不僅宣稱「北朝鮮和古巴在政治上一貫是正確的」，而且還要大大「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基礎工程建設」，繼續用大陸人民的血汗來維護他那個反動的「洋祖宗」——馬列在中國的政治統治，以圖反撲我中華兒女意在第三次「驅除馬列、恢復中華」的思想和意志——對此，我們真正的中華兒女，還有多少人能夠

「不以為恥」呢？

這一切，既為中華民族五千年所未有，更為中華民族帶來了無比的羞辱。一言以蔽之，若要與孫中山奉行的對外獨立、對內平等的民族原則相比，共產黨奉行的則是：「馬列貴、中華次之，民為賤」；或曰：「馬列貴、共黨次之，中華賤。」雖然，我們的祖宗老早就說過：「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三是孫中山在他於 1924 年春天的三民主義系統講演中，曾以日本占領者對朝鮮民族思想和民族文化的消滅為例，一再地指出：「要消滅一個民族首先就要消滅這個民族的思想」，而共產黨就是要用馬克思的思想來消滅中華民族的思想和文化。

可悲的歷史事實是，當中共終於篡立了馬列中國之後，就開始「獨尊馬列、殺盡百家」，就立即把馬克思的那一句「要與一切傳統觀念徹底決裂」，當作共產主義革命和專政的「聖經」，不但把秦始皇之後早已「廢了封建、置了郡縣」的中國兩千餘年歷史和中華民族的整體民族文化，全部汙蔑為「封建歷史和封建文化」，毫不手軟地予以全面的和徹底地批判與否定；而且，於文革期間乾脆高喊起「要與一切傳統觀念作最徹底決裂」的口號，在全中國大陸發動「破四舊、立四新」，到處鬥打砸抄燒殺，焚燒四舊，批判「封資修」，就是焚燒中華民族所謂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和批判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同時，在

馬列中國，馬列子孫們對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也絕不放過，非但汙蔑，竄改，還要在全國範圍內抓捕、流放、勞改和處決 1949 年前的「三民主義青年團員」，其行其徑，令人髮指。其實，共產黨要鎮壓的，絕不僅僅是一個在抗戰中建立、旨在報效民族的先進青年團體，並藉以摧毀所謂舊社會的整個社會基礎，他是要所有的中國人「聞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而恐懼。這個目的他達到了。長期以來，海內外、特別是海外絕大部分所謂「民運人士」，他們不僅始終遠離孫文的三民主義，而且一再拒絕甚至持續反對孫文三民主義的言行，便是令人感到不安的明證。最近更有所謂「著名民運人士」居然發展到明確針對孫文思想在海內外、特別是在大陸本土的迅速傳播，和被年輕一代所廣泛接受的現狀，而用極其惡劣的語言撰文全盤否定、瘋狂攻擊和誣陷孫文的所有思想和全部歷史。

到了 80 年代，當中共不得不用滿清早已用過的「洋務運動」來救自己和社會主義的命時，他又培養和利用了一批所謂改革派知識分子來辱罵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以替共產黨「遮羞諉過背書」。他們口口聲聲、不厭其煩地喊叫著的，就是中華的「天不好、地不好，山不好、水不好，人不好、民不好，歷史不好、文化不好……，卻絕不說共產黨一點不好」——當時，一位普通的中學教師就曾這樣氣憤地對我說過。

到了 90 年代末 20 世紀初，當人民的革命覺醒已經漸成風潮，中共離「大限」已經越來越近之時，中共為保一己之

命，便用「革命的兩手」即「表面反對以製造影響、暗中放行以大打出手」的辦法，縱容所謂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來高喊什麼中華民族的孽根性，來大罵什麼中華文化的愚昧性，來高喊「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並終於發展到惡毒攻擊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特別是攻擊他的正確的民族主義思想，甚至為了不擇手段地誣陷、汙蔑孫中山而「放言放人」到海外……。80年代的所謂改革派知識分子和90年代之後的所謂自由派知識分子們，就是這樣地「在他們跟共產黨的感情關係、依附關係與自身的名利欲望、保險係數」之間，尋找到了一種「平衡」，在海內、更在海外對共產黨展開了一連串的「小罵大幫忙」之舉……。然而，說到底，他們也就是在用「民族虛無主義」這樣一個「武器」，來為共產黨及其馬列中國的罪行「背書」而已。這既是共產黨「反民族」之惡劣行徑的一種變態發展，更是共產黨長期「否定和踐踏」自己民族歷史和文化的必然惡果。對此，我在後面還要專門地談到。

至於馬列中國又是如何地阻絕西方進步文化的傳播，如何地製造「唯有馬氏一家、絕無他人分店」這一所謂無產階級的反動洋教專制文化的，我在「反思民族歷史、找回民族自尊」的講演中，早已說過了。

2、從對外獨立和對內平等上來看

第一、孫先生在生前曾一再地對他的國民黨人交待過，

就是「廢除不平等條約乃是中國國民革命勝利的第一個標幟」！民族英雄蔣介石先生終於在我們偉大的衛國戰爭中，因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卓越貢獻，而實現了先生的遺願，於 1942 年春天在開羅簽字，廢除了列強與滿清簽訂的所有不平等條約。

第二、孫先生在晚年一再地呼籲「和平統一」及「和平統一救中國」。先生所說的和平統一，當然就是我大中華民國的和平統一；先生要追求和平統一的意願，就是要反對分裂中國——就是反對分裂我們的大中華民國！

第三、孫先生在中國國民革命的號召期和發動期，則號召「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因為，正是滿清貴族對漢民族的專制統治和腐敗統治，才造成了中國境內的民族壓迫和東西方各家列強對我們中華民族的欺辱；而當中國國民革命初造成功、大中華民國已經創建之時，孫先生就立即提出了「各民族派平等的思想」，並一再聲明「決不以復仇滿清為能事，而務與之平等共處於中國之內……」。

然而，中國共產黨——這個現在自稱是「孫先生最忠實革命傳人」的馬列子孫政黨，在他打下了天下之後，究竟又是怎樣地「繼承」了孫先生的真民族主義精神和價值來「建國、治國」的呢？說白了，就是三句話：一是「喪權辱國為蘇、俄」，二是「支持臺獨搞分裂」，三是「製造階級滅平等」。

我先說第一句話：喪權辱國為蘇俄。

應該說，稍微瞭解一些真實的中國現代歷史的人，特別

是稍稍瞭解一點中共「感情世界」的人，都知道，中共這個馬列子孫集團，既有一個「父親」，還有一個「恩人」。父親，當然就是前蘇聯的史達林，中共詩人郭沫若就曾公開高唱「史達林是我們的父親……」；恩人就是日本。我在前面已經介紹了毛澤東說過的話。所以，中共從起家革命到勝利奪權，對他的「父親」和恩人，特別是他的「匈奴父親」，曾一二再、再而三地敢於「喪權辱國」。甚至直到今天，在他的父親史達林和前蘇聯都已經命歸黃泉之後，他依然因「父子情深」，而不斷地在「喪我們中國之權，辱我們中華之國」。

我們還是用事實來說話。

1949 年，中共剛剛篡國建政，毛澤東就立即率團訪問了前蘇聯，並立即按照史達林的要求，簽訂了敢於大膽喪權辱國的「中蘇友好協議」。這個協議的第一條，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無條件承認外蒙古獨立，取消國民政府（指蔣介石政府）關於外蒙的不平等條約。並願意根據聯合國民族居住權原則，把南京政府用武力霸占的外蒙領土還給外蒙。」

除此之外，這個「協議」還厚顏無恥地將中國的主權大送特送：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認海參威（包括海參威所轄之郊區）是蘇聯固有領土，承認江東六十四屯為蘇聯領土，承認圖門江出海口是蘇聯主權，新疆北郊是蘇聯領土」；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停止 1945 年以來南京政府所有索土要求。承認清朝政府 1850 年以來所有領土條約」；三是「承認清政府關於大連的協議，承認蘇聯在大連旅順的特權……。」

如此一來，被蔣介石廢棄的所有不平等條約中，凡晚清與老沙皇所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就是這樣地被重新「簽了回來」。他證明了什麼，他只能證明了「中國國民革命」的失敗，證明共產黨推倒了中國國民革命之民族革命的勝利果實。誰愛國，誰賣國，還有什麼能夠比這個更具有說服力的嗎？

然而，中共至今還在賣國。

充滿著愛國熱情的《中國失土論壇》報導說：1999 年底，江澤民、李鵬背著中國大陸人民和葉利欽簽訂了秘密的《中俄全面勘分邊界條約》，用遠大於珍寶島面積的 150 多個中國地區換回了被俄羅斯實際控制的珍寶島……，出賣了 1953 年由聯大裁決為中國領土的南唐努烏梁海地區，徹底廢棄了俄國一直想推翻的《尼布楚條約》，出賣了《尼布楚條約》規定的中俄最後一塊位於滿洲裡北部的地區，再一次承認了清政府與沙皇俄國簽訂的所有不平等條約。

其後，《中國失土論壇》尤懷著愛國的憂憤，繼續報導稱：中俄日前簽訂《中俄國界東段的補充協定》，胡錦濤賣權辱國：不但承認江澤民的賣國條約，出賣了大黑瞎子島 2/3 的主權……，面積 350 平方公里（比 272 平方公里的臺北市還大），更比珍寶島（面積 0.7 平方公里）大 500 倍。

香港記者程翔以筆名「鍾國仁」在香港《明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江澤民要向中國人民交代的一件事」。該文強調：「中共向俄國出賣了約 160 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不算外蒙古），相當於 40 個臺灣。」^{註 26}。上了臺的胡錦濤立即乘

程翔到中國大陸採訪抓捕了他，並將他判刑，至今不放。在對蘇、俄的感情上，中國的馬列子孫可謂「代代深情難已」。這與孫中山先生的真民族主義精神和蔣介石所代表的中華兒女的真民族主義情懷相比，實在是天地之差。誰叫他們是馬列子孫呢？更多的，我就不說了。

我再說第二句話：支持臺獨搞分裂。

乍一聽，許多朋友都會一「懵」：中共現在不是天天在反對臺獨嗎？他怎麼會支持臺獨呢？其實，中共才是分裂中國製造臺獨的始作俑者。我早在「民主統一為中華」的講演中，就已經詳細地說過在上個世紀 30 年代，中共是怎樣在前蘇聯和第三共產國際的領導下，建立了臺灣共產黨，並為臺灣共產黨製造了「臺灣民族、臺灣革命、臺灣獨立」這三大政治綱領，發起「共產革命臺獨」的。中共今天的對外發言人，也已經主動證實：1947 年的臺灣「二二八」事件，事實上是中共為打贏內戰而在全中國發動「反蔣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是中共支援和領導的。當年，毛澤東就曾在延安對臺灣發表講話，公開地和明確地支持過臺灣獨立。

如果說這都已經是歷史，那麼，問題是，中共建國之後，直至整個七十年代，臺灣的獨立運動，實際上如他們自己說的那樣，就是「社會主義的臺獨運動」。其實質，就是中共要利用「追求社會主義的臺獨人士」來推翻中華民國的臺北政權，以為中共解放臺灣作內應。雖然，「社會主義的臺獨運動」，後來曾在理論上明確地將他們的運動，敲定為「推

翻中華民國」和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臺灣共和國」這樣兩個階段。為推翻中華民國，他們接受中共的訓練和支持；為建立臺灣共和國，一些臺獨人士竟然自稱是馬列主義者……。被稱為狂左狂獨的臺獨雜誌——《七十年代》，就曾一再地用馬克思的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理論，來宣傳臺獨，論證「無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就是製造一個臺灣民族的理論根據，更是臺灣民族革命的綱領……」。至於在海外的社會主義臺獨勢力，不但由中共送給「津貼」，而且受中共召回「訓練」，然後再由中共用炮艇護送「闖島」，向全世界作「民主秀」……。臺獨人士、臺灣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在第一次大選挺扁時，就曾公開說出過這樣一句真情實意的話：「我們早期的臺獨人士大都是社會主義者，我們才跟共產黨最接近……」。這句話，還用得著我來解釋嗎？

我在「民主統一為中華」的講演中早就說過：至於今天，中共和海內外的臺獨人士，他們一個天天叫打，卻死也不敢打；一個歲歲叫獨，卻不曾見他獨；一個藉口「反獨促統」，而在海內外高舞著那一竿虛假民族主義的大旗，大搞紅色統戰，只想實現「專制一統」，而絕不是「民主統一」；一個卻因中共「舞旗逼統」，而愈加有了高喊臺獨和追求臺獨的理由。他們，一個是靠出賣民族、分裂中國起家的中共，一個卻是絕不願意被共產黨「統」過去的臺灣一些政黨和眾多老百姓。可是，臺獨人士不知道的卻是，中共是在玩弄你們，他可是巴不得你們將臺獨鬧得越大越好！因為，只要你們鬧

的越大，他就更有可能把國民黨統過去，更有可能把海外華人統過去，更有可能把大陸可憐民眾，玩轉在他那竿虛假的和惡劣的民族主義大旗之下，甚至更有可能對你們進行「文攻武嚇」……。臺灣的臺獨人士們，百姓們，你們在歷史上已經上過共產黨的兩次當了，千萬不要再第三次上當啊！

今天我們回首往事，難道還看不出共產黨在他篡國建政的歷史上，一心想幹的和一直在幹著的，就是分裂大中華民國，就是顛覆大中華民國，就是企圖勾引臺獨人士顛覆中華民國的臺灣，就是要和臺獨人士「相互依存和互相利用」嗎？這一切，與孫中山先生曾經真正要「和平統一救我大中華民國」的歷史願望，實在是南轅北轍的。

至於中共奪權篡國之後，又是怎樣對待國內各民族的，我就不想多講了。大家只需要記住兩句話就行：一是製造了階級和實行了專政的馬列黨族——就是馬列子孫們，永遠「高高在上」；其他一切民族——包括我們漢民族的所有人民，都只能在嚴格的階級劃分中「低低在下」，受盡迫害和蹂躪。二就是毛澤東所言：「民族鬥爭說到底還是階級鬥爭的問題」。正是從這個馬列主義的根本立場出發，中國馬列子孫最高統治集團對中國境內（臺灣除外）各民族所進行的鬥爭、鎮壓、甚至是屠殺，實在是觸目驚心。否則，在中國數千年的歷史上，都是各週邊民族曾用各種方式參加進了我中華民族的大家庭；唯獨在當今的馬列中國，卻處處在出現著要求脫離中國的悲劇景象，不論是旨在本地實行武裝鬥爭

的公開獨立要求，還是旨在國際上奔走呼籲的和平分裂願望，都在海內外緊鑼密鼓地策劃著，準備著，進行著，甚至還有中國的「民運人士」們，也在積極地為他們出謀劃策，提出「臺灣、西藏、新疆、內外蒙古從來就不屬於中國的分裂理論……。」卻忘記了一個起碼的歷史常識，就是國家是發展的，根本就不存在「誰從來就不屬於誰」，或是「誰從來就屬於誰」！

3、從天下唯黨和民權喪盡來看

我剛才從民族問題出發，談了孫中山和共產黨在建國上完全對立的分野。我之所以多談了一些，是因為，在民族問題上認識共產黨，是目前我們中華兒女覺醒的弱點所在。他很有些像晚清革命之初，因為對民族問題沒有認識或認識不清，加上各類改良派又都甘心做滿人的奴才，才使得革命的發動，遲遲難成氣候。後來，正是因為國內的青年知識分子和日本的中國留學生們突然意識到了「革命排滿」的迫切性，喊出了「打倒洋人朝廷」的口號（陳天華），特別是孫先生又及時地在他的三民主義中提出了正確的和科學的民族主義理論，中國的國民革命，才從此一發而不可收，不數年就驅除了韃虜，恢復了中華，並從此開始了「走向共和」的艱難歷程。可是，誰能想到，我們今天所面臨的，恰恰又是同樣的一個歷史局面，只是這個歷史局面，在「民族自尊」的問題上，顯得更痛苦也更迷茫，更令許多人、包括那些自稱的

精英們都迷糊不清，或乾脆是不敢弄清，或是只敢裝糊塗，改良派們更是對那個外來政黨和政權衷心無比。所以，說清楚當代中華民族民族問題的要害，就是馬列中國絕非我中華民族的民族國家，是「馬列國」而非「中華國」，便顯得格外重要。

我現在可以從民權問題出發，來和大家一起探討孫中山和共產黨在建國方面的第二個分野了。也就是說，探討孫中山要建立的是一個擁有怎樣制度的國家，共產黨已經篡立的又是一個什麼制度的國家。這個問題，我似乎可以講得簡單一些。因為，共產黨半個多世紀以來的殘暴統治方式和血腥統治行為，凡中國人皆有目共睹。海外還有點良心的華僑，也會承認這個歷史和現狀。我只是想將共產黨的「絕對黨權治國」和孫中山的「民權建國思想」，作一些簡單的比較而已。

眾所周知的是，孫中山發動的中國國民革命，又稱民權革命。因為三民主義的中心主義，就是民權主義，而民權主義和民族主義及民生主義的關係，就是「一根扁擔挑兩頭」的關係。因為，「即便是漢人做君主，也要革命，因為幾千年的專制政治是普通的國民所不能承受的……」（孫中山語）。而他的政治革命，就是反對專制和維護民權的革命。他的民生革命，則是他革命建國的根本追求，是建立在民權革命的基礎上的。因為，他也曾明確地指出過：「沒有民權，就沒有民生。」用今天大陸老百姓的話來說，就是：「經濟

發展得再好，錢都流到共產黨的荷包裏面去了，這樣的發展對人民又有什麼用？」用孫中山的話來說，就是「專制國愈強，其民愈苦」。所以，孫中山的革命，才稱做中國國民革命，他要建立的國家，應該是一個民權得到伸張、保障和發展的國家，就是現代民主國家。這也是孫先生所一再說的：「中國非實現民主不可」的本意所在。

因為孫先生提倡民權，所以，他就要提倡並身體力行「天下為公」，共產黨便恰好是他的反面，就是厲行「天下唯黨」。

因為孫先生要天下為公，所以，他才會主張四大民權，即「選舉、罷免、創制、複決」這四大權利，並進一步提出「訓政」的中心內容，就是教會人民使用這四大權利，從實行「縣自治」開始；他才會主張多黨制，主張一黨臺上執政，一黨臺下監督——1913年春節，他在上海的茶話會上就是這麼說的；他才會認為中國人民必須擁有「言論、出版、結社、集會、遷徙、居住的完全自由……。」這句話，就寫在1924年「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宣言上；他才會提出「人民有權、政府有能」的政治權能理論，請人民當老闆，請政府當司機，從而既要讓人民擁有選、換司機的權利，又要政治專門家來擔任司機的工作。孫先生說得是夠透徹的了……。而孫先生本人，則是近三千年來，能夠真正身體力行「天下為公」之第一人。因為惟有他，才會做到「三讓天下」：在壇香山創建興中會時，他就將主席的位置讓給了劉祥；在第一次廣州起義前夕，他又能夠做到將「未來總統」的地位讓給

那個要做「未來總統」的楊衢雲；在開國後，又能夠將到手的總統大位，讓給了滿清權臣袁世凱——從來就不是為了自己「坐天下」而「打天下」。而他讓總統的唯一條件，就是袁世凱必須向全體國民宣誓「永不使專制復行於中國」——袁世凱當然發了誓、後來又毀了誓，所以，他只當了 83 天的皇帝就在全國人民的反對下，一命嗚呼了。

那麼，為什麼說共產黨是厲行「天下唯黨」呢？

因為，共產黨說得、也做得再清楚明白不過了：一是「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所以，他是一點民權也不給，連當今的「村自治」都是假的。廣東汕尾村民只因選出來的村長，不是共產黨員，不是共產黨想要的，胡錦濤的共產黨居然就敢用裝甲車和機關槍去血洗汕尾，實在將海外「保共改良」派們，長期以來在西方國家政府面前，為共產黨所製造的「村自治」謊言，掃蕩得一乾二淨！何況這還不是個別現象，而是普遍現象。屠殺了汕尾村民的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非但沒有遭遇懲罰，還被「當今最大的馬列子孫」胡錦濤請到北京大加款待，當然還是繼續做他的「廣東王」。

二是要實行和堅持無產階級的專政，說白了，就是要實行和堅持共產黨的「獨黨專政」。由於無產階級的身份是可以變的，比如昔日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現在就比「資產階級大富豪」還要富有和腐爛，但只要他們還叫共產黨，就還是要實行和堅持專政，對被專政的人民來說，所謂民權也就無從談起。這就是今日有權更有錢的共產黨從不談、也絕

不給談什麼「民權」之類「敏感」話題的原因。眼下在海外鬧得甚歡的大陸維權運動，要維的就應該是「民權」，但是誰也不敢說出這「民權」兩個字。為什麼？共產黨不許！

三還是共產黨說的那句，一定要讓「無產階級鐵打的江山永不變色」的話，再說白了，就是要實行共產黨一黨的永久專政，世代專政，就是千秋萬代都必須由共產黨專政，所以，共產黨才在他的憲法裡，對他實行的「多黨制」作了最明確不過的說明，即：「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也就是說，不論中國將來有了再多的政黨，也都是必須接受共產黨領導的，權力還是都要掌在共產黨的手裡。換句話說，再多的花瓶黨與「民權」還是一點關係也沒有；或者說，所有的花瓶黨根本就沒有本事代表人民的一絲毫利益和一丁點權利！那個連戰，就是當真把臺灣那個所謂的「中國」國民黨帶到北京，讓國民黨做了第九個民主黨派，到那時，這個臺灣的「中國」國民黨就連在臺灣「鬧騰」的權利也會喪失得乾乾淨淨。用共產黨的話來說，就是「只能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可悲的是，臺灣的「中國」國民黨，似乎正在朝著這個「可怕的方向」辛勤地努力著呢！

四是共產黨不論幹了多少壞事，毀了多少民權，滅了多少民命，卻始終堅持自己永遠是「偉大、光榮和正確」的，所以，共產黨就永遠都在強迫人民要「愛」他。半個多世紀以來，什麼「五講四美三熱愛」之類目的就是強迫人民「愛黨」的形形色色教育，可謂五花八門何其之多！長期以來，

共產黨握著刀槍、厚著臉皮地強迫人民愛他，目的何在呢？就是不准你向他要民權，不准你分他的黨權，就是不能讓人民擁有民主的權力！因為，你既然愛我，當然你的一切就都是屬於我的了，那你還要向我要什麼民權呢？只要好好地愛我，一切都聽我的就行了！這樣，共產黨就能夠通過「權永為我所用，利永為我所謀，情永為我所專」，而把我們人民的民權永遠地和毫不保留地剝奪了一個乾乾淨淨。

如此，共產黨便終於做到了「天下唯黨」，而不是「天下為公」；如此，共產黨便終於因為剝奪了所有的民權，才可以對全體人民厲行專制。因為，被剝奪了一切權利的人民，就是想反也很難反得起來。

還用我敘述大量的事實來證明嗎？恐怕不必要了吧！

4、從二度共產、盤剝殆盡來看

什麼是民生？孫先生在他的三民主義講演中，說得明明白白：「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即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群眾的生命便是」。由於孫先生「一以民生為社會歷史的中心」，所以，孫文用三民主義建國的核心價值，就是民生這兩個字。也就是說，中國的國民革命，不論是他的民族革命、民權革命、還是民生革命；孫先生手創的大中華民國，不論他是走在軍政、訓政、還是憲政的任何一個歷史階段上；他們都是在為著改善國民的民生、創造國民更好的生活在奮鬥。明白了這樣一個核心價值，就能夠明白孫文革命建國的真諦

所在，就能夠明白孫文革命建國的根本追求。

正是從這一根本追求出發，孫先生才會要求「從政治上著手來解決民生問題」，而從政治上著手，除掉民族革命，就是民權建國。而民權建國，說到底，就是「國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用」。

因為，隨著時代的進步，一個國家，只要不能夠做到，「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就必須由天下人來共治」，這個國家非但管不好，而且民生就不能得到起碼的保障，更不能得到應有的發展。這就應了孫先生的另一句話，就是我在前面所說的，叫做「專制國愈強，其民愈苦」。

孫先生當然說得對。因為，專制國越強，民權就越薄；專制統治越殘酷，民生就會越加慘遭剝奪。說遠了，尼古拉二世的專制俄國，曾是 18、19 世紀之交世界上的強國，而且是一個老大的專制強國。但正是因為「其民愈苦」，所以，人民才會在轉眼之間就推翻了他。19 世紀末，在全世界看起來，前蘇聯就是一等一的強國，連美國都怕他，你防著我，我防著你，互相冷戰了 40 多年，害得我們中國人，也要天天跟著馬列子孫高喊「打倒美帝國主義」。可是，他的人民，卻沒有讓西方花一文錢，更出乎西方所有人所料地，僅僅在三天以內，就自崩自解了，而且還連帶著東歐的一大把「社會主義強國」，統統地垮了個一乾二淨！為什麼，就是因為，他這個專制國越強，其民就越苦，人民一有機會，就把他給掀翻了。所以，孫先生所言：「……蓋專制國通例，國愈強

者其人民之苦亦愈甚；共和國則反之，在共和國度中，其國民利益之增減，視國家之強弱成正比例。國家強盛，其國民之利益日日增多；國家衰弱，其國民之利益日日減少。蓋共和國以國民為國家之主體故已。」共產黨垮臺以後的俄羅斯共和國，在渡過了萬般艱難的變革期之後，近幾年來，已經開始走上了「其共和國愈強，其民愈富」的道路。海外眾多報刊網站上刊載的，2006年俄羅斯共和國「普通人民」的平均收入增長了百分之十二（——當然，共黨殘餘普廷似乎要重新走向獨裁的統治，有可能給俄人的生活帶來反復）。就不說東歐那幾個前社會主義國家在民生問題上的迅速進步了。相反，中國大陸普通人民的平均收入竟然降低了百分之二。而由海內外報刊雜誌所揭露出來的越來越多的大陸工人、農民和太多普通民眾生活的苦況，及其遭受壓迫和壓榨的迅速加劇，和大陸民間反抗的烽火四起，恰恰證明了「專制國愈強、其民愈困；共和國愈強，其民愈甘」的道理。而這個道理，又恰恰說明了現今馬列中國「強大」的本相，並不像海外這些親共報紙所吹捧的那樣。而之所以說，這才是真相，就是因為，中國的共產黨，在民生的問題上，就像在其他的建國問題上一樣，也是處處都是跟孫中山先生反著來和對著幹的。所以，結果才會完全兩樣。

那麼，共產黨在民生問題上，又是怎樣地處處都和孫中山對著幹的呢？

首先，孫中山以民生為核心，共產黨以權力為核心。中

共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曾在黨的全會公報中，公然地宣稱：「有權就有一切，喪失了權力，就會喪失一切」。大家看看，共產黨的話說得有多「到位」，這還不是以權力為核心的價值觀嗎？而共產黨從奪權打天下，到打下天下便掌控著一切權力，而後更從「為革命抓權」發展到今天「為革命抓權又抓錢」，甚至今天遍中國大陸都是「權錢交易」——「有權者必有錢，有錢者必找權」的現實，可以說，實在已經將共產黨將權力當作核心價值的本質，證明得再清楚明白不過了。

其次，正因為共產黨是把權力當作國家社會的核心價值的，所以，他一旦權在手，便立即要「國家為我黨所私有，政治為我黨所獨占，利益為我黨所獨享」了。其中，國家為我黨所私有，還需要我再作解釋嗎？其中，政治為我黨所獨占，我也已經在前面解說過了；其中，唯有「利益為我黨所獨享」，我就再簡單地說兩句。

其實，共產黨本著打天下就該坐天下的專制奪權理念，其目的，就是為了他們「哥們」來集體享受的。這就是「黨享」的歷史由來。但隨著時勢的變化，和人心對他的厭惡，直至人民對他反抗的發生，他的黨享的意義，就開始「一分為二」了：

一是保命，鄧小平的名言：「殺 20 萬保 20 年」，就是這個意思。因為共產黨是渴望著永遠地活下去的，而要活下去，就必須為保自己的命，殺他人的命。在這個意義上，共產黨已經將「黨享」的內容發揮到了極致。

二是享受。就是說，共產黨絕不屬於「好死不如賴活」的那一類，他既要活，就要好好地活，要活得比其他人都好，還要好得多。所以，他就要竭盡享受之道，「我的我要，你的我也要」，於是，貪汙腐敗就成了共產黨好好活和活得好的不二法門。上個世紀 60 年代初，中共製造了人為的大饑荒，毛澤東就告訴他那些親近的黨徒們說：「放心，我們的幹部和士兵是餓不死的，至於人民會餓死多少，我就管不了那麼多了！」^{註 27}，所以，那時，我們便沒有聽說共產黨當官的、當兵的餓死過一個，卻都知道，老百姓餓死了幾千萬！當時我們安徽就餓死了七百萬，我可是親身感受到什麼叫餓，親眼見到過人是怎麼餓死的。到了上個世紀 80 年代，鄧小平便說：「既然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我們的子女為什麼就不能先富起來？」所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子女們，不但為了無產階級的江山要全面接班，而且更為了接班抓錢，全都「暴富」了起來。最近，海外那家最大的親共大報——臺灣背景的《世界日報》，居然在一個極不起眼的角落裡，報導說：

「……站在金字塔頂尖的人，大部分帶有濃厚官方背景，經營金融、外貿、國土開發、大型基礎建設工程、證卷五大領域，百分之九十都是高幹子弟，共擁有資產人民幣兩兆以上。……香港《太陽報》引述《世界經理人》報導，截止今年（2007）3 月底，中國擁有財產 5000 萬元以上的人有 27310 人，超過億元的有 3222 人，其中 2932 人是高幹子

女……。」

當然，這在互聯網上早已不是新聞了。

朋友們，毛澤東的共產黨打了天下，就抄家劫財，將中國的中產社會、民間財富統統搶了一個精光，讓中國人的民生連同我們太多無辜百姓的腦袋，全都搬了家，人民連民生這兩個字講都不敢講，誰講，誰就是「封資修」和國民黨反革命。鄧小平之流的共產黨，為救他們黨的命，便重新搞起慈禧太后的洋務運動，雖然不得已在表面上對人民作了幾年的讓步，但是沒有幾年，高樓大廈就起來了，他們和他們的子女們就更是大大地享受起來了，既「泛榮」，又「娼盛」，而我們的人民就下崗的下崗，流竄的流竄，流離失所的流離失所，哭告無門的哭告無門，「專制國愈強、其民愈苦」的景象，也就愈來愈令我們觸目而驚心！我前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講演時就講過，什麼才是民生發展好了，就是愈來愈多的人民都能夠「安居樂業」了！可是，在共產黨那裡，所謂民生，全為黨享所霸；所謂民生，全為黨享所壓……，中國的馬列子孫為「敲剝天下之骨肉，離散天下之骨髓，以奉其一黨之享受」，實在是又創造了一個「史無前例」了！

有一句話，是我骨鯁在喉、不吐不快的。這句話就是，我們所有的人，都應該明白，只要共產黨一天不打算「走向共和」，一天不打算承認民權；只要他一天不還我「中華國」，拋棄他「馬列國」，並把中國改造成一個民權得到申張的真正共和國；所謂民生，大家就都不要想！因為，共產黨只會

為了自己的命和權而竭盡黨享，而絕不會將所有的「強大和發展」都拿來為了民生！因為這早已為共產黨「以權力為核心價值的立國取向」所決定。

謝謝。

註釋：

1、《李福林革命史料》，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1995年7月第一版，第4頁。

2、同上：第3頁。

3、《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239頁，人民出版社，1968年，北京。

4、《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611頁，人民出版社，1968年，北京。

5、《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338頁，人民出版社，1968年，北京。

6、《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348頁，人民出版社，1968年，北京。

7、《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348頁，人民出版社，1968年，北京。

8、《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611頁，人民出版社，1968年，北京。

9、同上，第661頁。

10、同上，第650頁。

11、同上，第654頁。

12、同上，第650頁。

13、同上，第652-653頁。

14、同上，第649頁。

15、列寧：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1912，俄文版。

16、「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1361頁，1968。

17、《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625頁，1968。

18、同上，第627頁。

19、同上，第625頁。

- 20、《中國近代史》，中國社會科學院，1981。
- 21、同上。
- 22、參閱《黃花崗雜誌》十九期「蔣介石領導浴血抗戰」一書連載之七。
- 23、陳立夫：《中華民族的道統觀》。
- 24、胡錦濤上臺伊始，即投巨資建立「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工程研究院」。
- 25、李才義：「呼喚右派難友鄧祜曾」。轉引自魏紫丹教授的《中共發動反右鬥爭的前前後後》一文，《黃花崗雜誌》總第 20 期。
- 26、程翔文集《漫漫愛國路》第 51 頁。
- 27、《毛澤東正傳》，太史著，臺灣黎明出版社。

【專訪】辛灝年： 連宋登陸 國共俱傷

辛菲

就連宋訪問大陸事件及相關問題，辛灝年先生指出，邀請連宋訪問大陸，是中共一貫使用的統戰分化手段，目的是分裂臺灣，操控臺灣，是中共對臺使用的「打進去，拉出來」或者說「拉出來，打進去」的詭計。中共拿著臺灣當牌打，一牌多用，所以中共根本不想統一，但他卻打著假民族主義的大旗來打壓迫、分化和瓦解海內外的民眾。

歷史上從來沒有過所謂的「國共合作」，不存在「國共合作」這這四個字，不存在「國共合作」這個概念。第一次是蘇聯命令中共對國民黨挖心，第二次，是毛澤東率領被打敗的中共紅軍向國民政府和蔣介石先生投降。他們都不是合作，這些都已經被歷史的文獻和今天中國大陸歷史反思的巨大成果所證明。共產黨是利用、依靠國民黨生長起來的。

連宋去大陸，連三民主義都不敢提，國號、年號都不敢提，把 13 億人民撇在一邊，只和共產黨搞所謂的「合作」，只按共產黨定好的劇本去表演，這個情何以堪哪！這才會造成中國大陸 41 位民運人士要求參加臺灣中國國民黨，17 個省

市的秘密同盟會組織的代表宣布重建中國國民黨，結果一再被拘審，並被立案偵查。

對於臺灣國民黨來說，可能是一場自取消亡的戲；對於北京的中共政權來說，可能是一場引火焚身的戲。連宋到大陸去跟共產黨聯合，打著反獨的旗號，聯共反獨，實際上是在破壞著臺灣、也在破壞著大陸對民主的追求。

在中國大陸處在一個巨大的民主變革的前夕，在中國大陸近年來數萬起反對共產黨的抗議示威的前提下，中國大陸正面臨著一場巨大的革命，在這個關鍵時刻，以連戰為首的臺灣國民黨，把自己絞進了中共這個要倒臺的專制泥潭裡去，是在自掘墳墓。中共死路一條，誰跟他一起，就也是死路一條，奉勸任何人不要對中共心存幻想。

下面是訪談實錄：

一、邀請連宋登陸 中共分裂臺灣

記者：辛先生，您好，連宋訪問大陸事件以及各方面的相關評論，我想您一定也都看到了。不知您是否可以談談您的想法呢？

辛灝年先生：好的。中共利用臺灣國民黨緩解危機，這是肯定的。我曾經講過：中共的反分裂法實際上是不統一法，是反統一法，是非法之法。在網站上登出來之後，北京一個高層幹部子弟馬上寫封信給我，他客氣的稱我為「辛老師」，他在信中說：在海外，辛老師是最瞭解共產黨的。我們共產

黨才不想統一呢，臺灣這張牌拿在手裡玩得多開心啊！

其實共產黨並不是因為反分裂法在全世界造成了一個反對和抗議的危機，才邀請連戰、宋楚瑜到大陸去的。海外的抗議、聲討、臺灣的反彈，這正是他所需要的，因為他的目的就是「威脅代替妥協」，以攻為守，以進為退。為什麼這麼說呢？八年前，空彈頭就放出去了，八年來，糧食調到福建，飛彈調到福建，軍隊調到福建，已經調了很多次了。去年臺灣大選的時候，他就發表社論，說：「臺獨就意味著戰爭，阿扁上臺就意味著臺獨。」他甚至已經講二二八事件是他搞的，他指揮的，根本與臺獨沒有關係。這就說明，他已經把臺獨和陳水扁上臺作為要打的重要原因。可是，陳水扁一上臺後，中共再也不說打了，又開始唱和平統一。已經講了八年的打，用打來威脅臺灣，威脅了八、九年，中共這張臉怎麼下得去呢？臺獨不聽他的，共產黨下不來臺。

如果從威脅方面不能解決，只有採取一個辦法：打進去，拉出來或者反過來說，拉出來，打進去。就是把那些在臺灣還有一顆中國心，由於自己非常愛祖國，愛自己的大陸故土，不知不覺間把「愛中國」變成了「愛中共」的那些華僑，特別是臺灣的泛藍的朋友們，讓他們在反獨的目標上和中共取得表面上的一致，然後分化、瓦解他們，把他們請到北京去，和他們拉關係；在反獨的前提下，形成所謂的共識，實際上，就是分裂了臺灣。

記者：中共的目的就是統戰分化。

辛灝年先生：是的，他統戰的目的是兩條：一個是為了團結。所謂團結，就是把人拉出來。還有一條就是分化：能拉的就拉，不能拉的就打。總而言之，不論是拉過來，還是分化出去，都是要增強中共自己的力量；削弱了對方的人馬，也是增強了自己的力量。

所以，我覺得，中共的根本伎倆就是分化臺灣，然後在臺灣找到一些把愛中國不知不覺地變成了錯誤的愛中共的親共勢力，一些因為反對臺獨而和共產黨的表面立場相一致的親共勢力，找到最具有歷史影響的臺灣國民黨和由臺灣國民黨分裂出去的親民黨，讓這些人在中共虛偽的反臺獨的旗幟下，在中共虛假的民族主義大旗下，和共產黨聯合到一起，以便達到共產黨操縱臺灣，分裂臺灣，削弱臺灣的一個根本目的，這樣就可以起到以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根本目的。

中共的這種作法就是這種動機，但是臺灣的一些人、特別是國民黨，看不破中共的這條詭計。如果他們能看得破，他們今天也就不會待在臺灣了。

二、中共不想統一，把臺灣當牌打

記者：您怎麼看這個「和平之旅」的稱號呢？您覺得中共真是出於民族利益而想統一臺灣的嗎？或者只是利用「和平統一」這個名義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辛灝年先生：他現在幹嘛要統一呢？統一了，臺灣這張牌不就沒有了嗎？這張牌不僅能夠對臺灣打，對海外的華僑

打，對大陸老百姓也能打，對美國和國際上也能打，一牌多用。他如果失去了這張牌，無論是臺灣分裂出去了還是臺灣被統一回來了，他都無牌可打了，所以他根本不想統一，他只是要拿著這張牌「玩」。

他在 11 年前曾經有一個戰略，並不急著統一臺灣，是要在政治上統空臺灣，在經濟上勒空臺灣，在國際上打空臺灣。這三條看樣子，差不多就要做到了。

記者：您覺得中共可能會用武力解決臺灣問題嗎？

辛灝年先生：中共是不敢打臺灣的。我八年來堅持了我的三句話：「中共死也不敢打，要死了才有可能打，打了就死。」因為「穩定壓倒一切」，給鄧小平送個花圈都要抓起來，一個女孩子被強姦致死，同班同學開個追悼會，教育部都要下命令說不利於穩定。共產黨哪還敢打一場在 49 年以後被中斷了 56 年的臺海戰爭？這可是內戰！那不是最不穩定的嗎？最容易製造不穩定的！

這一點，我覺得海外的很多華人朋友看不清，這也不能怪他們，因為他們沒有在共產黨的統治下成長，不瞭解共產黨。所以我曾經開過一句玩笑：真要說瞭解大陸，瞭解中共的，還是我們這些大陸人，才跟共產黨「心有靈犀一點通」，我們可是他「培養」起來的。

三、中共假借民族主義 分化人民維護專制

記者：中共慣用煽動民族主義來達到他的目的，包括反

日遊行、統戰分化臺灣等事情上。

辛灝年先生：中共在立黨的宗旨上，就是一個沒有祖國、不要民族的黨。他在他自己的歷史上，曾經出賣過民族、分裂過中國。他公開的喊過他的祖國是前蘇聯，他的詩人郭沫若公開寫過一首詩，叫「史達林——我們的父親！」這樣一個根本無視民族、不要祖國的黨，這樣一個沒有祖國的工人階級黨，他今天為什麼忽然要打起一個民族主義的旗號呢？對內用民族主義的旗號挑動國內的憤青和普通不瞭解情況的民眾，對外用所謂的民族主義的旗號來打擊臺獨和誘引海外的愛國華僑。這是因為民族和民主不是一個概念。他講民族可以不提民主。他用民族主義不僅可以統戰海外華僑，統戰臺灣的愛國勢力，或者叫做今天的親共勢力，他還可以拿民族主義來壓迫國內民眾在民主上對他的反抗。

壓迫海外民主力量在民主問題上對他的譴責，民族主義這竿旗子他用得是非常開心。可是，大家必須明白，共產黨這面旗子是假的。我在多次講演中提過：我們海外所有的民主力量，全中國的民主力量，包括臺灣的民主力量，絕不要輕易的只講民主，不講民族。我們決不能把民族主義這竿美好的大旗，拱手讓給共產黨，讓他來打我們。共產黨假借民族主義就可以在國內蒙蔽老百姓，他是在利用一個純正的民族感情為一個罪惡的目的服務。這個罪惡的目的就是分化我們的人民，維護他的專制政權。

所以我們所有人都應該把民族主義這竿大旗緊緊的攥在

自己手裡，所有的民主力量，都要把中華民族舉在自己頭頂上，反過來戳穿共產黨的假民族主義面目，打擊他的假民族主義的立場，這樣我們就會在民族和民主的問題上獲得雙豐收，而不是把民族主義大旗拱手讓給共產黨，讓共產黨拿著這個假民族主義大旗來打我們，壓迫我們，分化我們，瓦解我們。

記者：老百姓還有一個觀念，很容易把中共和中國等同起來，這也許也是中共能夠利用假民族主義的原因。

辛灝年先生：其實大陸的老百姓挺懂的，不容易受騙，主要是海外的華僑不明白，容易受騙。為什麼大家覺得大陸老百姓不懂，是因為大陸沒有言論自由，我們聽不到，看不到，只有跟他接觸，跟他談心，才能知道嘛。

其實海外的世界基本上是反共的世界，只是近幾年共產黨統戰比較厲害，國民黨在往回縮，民進黨在擴張勢力，海外華僑因為利益和其他原因而產生了親共勢力，但是沒有人是真心想喜歡共產黨的。紐約建立全世界華人協會紐約分會，大概有 2、300 個華僑，都不是過去和我接觸過的。他們請我去講演，他們的會長是英國女王頒布的一個爵士。我先說：「毛澤東的共產革命讓你的祖國遭遇了災難。」然後我講：「華僑是最懂民主和自由的，你們不可能喜歡共產黨，不可能喜歡共產黨的制度。」我還講：「海外華僑從來支持的是孫中山的共和革命，從來就沒有支持過毛澤東的共產革命……。」我講了不到十分鐘，掌聲不下十次，講完我從臺上下來坐回

了座位，主持人又號召大家全體起立繼續為我鼓掌。又是掌聲雷動。這不是因為我講得好，而是講了一個基本事實：沒有人真喜歡共產黨！

四、歷史上不存在「國共合作」

記者：歷史上的兩次所謂的「國共合作」是否都是共產黨在利用國民黨呢？

辛灝年先生：是這樣的。共產黨的話語現在成了大家的話語了！其實，從來就沒有什麼「國共合作」。第一次所謂的「國共合作」，是中共在蘇聯共產黨的命令下，打進國民黨，要把國民黨變成共產黨，要把中國的國民革命變成中國的共產革命。1949年以後，從毛澤東、周恩來，到所有的共產黨大小官員，都曾經在國內做報告，不止一次的講過：那個時候的「國共合作」，是共產黨在蘇聯的指揮下對國民黨進行「挖心戰術」，「挖心戰術」這四個字是共產黨自己講的。這叫合作嗎？只不過那個時候他要利用國民黨，他的力量太小了，到1923年11月底，他才有432個黨員，而國民黨在全中國到處都是，他必須利用國民黨，他才能夠在國民黨建立的廣東革命政府之下發展起來。同時，他要把中國的國民革命變成共產革命，所以根本不贊成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莫斯科的中山大學，雖然名叫中山大學，但從來沒有開過一個小時的孫中山先生思想的課。這怎麼能叫做合作呢？這是朋友之間的合作嗎？這是一個人要搞垮另外一個人。汪精衛

當時說了一句話：這是豬精鑽到孫悟空的肚子裡舞了起來，孫悟空如何受得了？豬精指的是豬八戒。

第二次所謂的「國共合作」，是 1936 年到 37 年，七七事變之前，西安事變之後，蔣介石對剩下來的二萬中共軍隊採取「婦人之仁」，不再打。共產黨為了讓蔣介石不再打他們，不再消滅他們，在半年之內向國民黨做了四項保證：一、承認三民主義；二、再不搞階級鬥爭了；三、再不在農村沒收地主和富農的土地；四、一定在蔣委員長和國民政府領導下共同抗戰。

1936 年底到 1937 年 7 月，在 7 個月的時間裡，他向國民黨做了兩次保證。毛澤東在 8 屆 10 中全會上的講話，已經公開講了：那個時候，我們其實就是投降，投降沒什麼了不起，投降是為了我們保存實力，然後再來打國民黨。國民黨的五屆三中全會的文件就說接受中共的「輸誠」，「輸誠」就是投降。做保證去投降叫合作嗎？毛澤東自己講的：這怎麼是合作呢？就是我們投降嘛，不要怕講我們共產黨向國民黨投降，只有投降了才能保存實力。毛澤東前秘書李銳先生寫的《毛澤東回憶錄》，1999 年在中國大陸出版的，裡面寫的，根本不存在「國共合作」。

我們搞歷史研究的朋友，包括我本人在內，翻遍了國民黨的文件，看不到「國共合作」這四個字，只能看到 1924 年的國民黨的文件裡有「聯俄容共」四個字，這是策略，也是失誤。因為這個策略回過頭來看是錯的。只有在共產黨的文

件裡才能看到「國共合作」這四個字。這難道還不說明問題嗎？

所以不存在「國共合作」這四個字，不存在「國共合作」這個概念。第一次是蘇聯命令中共對國民黨挖心，第二次，是毛澤東率領被打敗的中共紅軍向國民政府和蔣介石先生投降。他們都不是合作，都已經被歷史的文獻和今天中國大陸歷史反思的巨大成果所證明。

五、沒有國民黨 就沒有共產黨

記者：是否可以說，要沒有國民黨，共產黨也成不了那麼大氣候？

辛灝年先生：沒錯。共產黨就像有種植物，是在樹根下面繞著樹幹長上去的，古詩裡叫做「菟絲繞蓬麻」，是靠著、繞著別的植物長上去的。

當時，如果共產黨不靠著廣東的國民黨，和國民黨建立的廣東革命政府的話，他根本不能存在。用當時李大釗在國民黨 1924 年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發言的話來說，大意就是：中國國民黨是一個有主義、有歷史、有貢獻、有威名、全國人民都知道的革命政黨，今天我和共產黨的黨員們全部加入國民黨，就是為了服從國民黨的主義，遵從國民黨的精神，參加中國國民黨領導的國民革命，為中國的前途而奮鬥。這叫合作嗎？

半年後，他在莫斯科的一個代表大會上，又說了下面這

段話，大意是：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在第三共產國際的命令下，參加中國國民黨，是為了把那些信三民主義的人拉到本黨的共產主義理念上來，是為了在國民黨裡面建立本黨的組織，是為了在中國利用國民黨來發動共產革命。

中國大陸現在出版的《李大釗傳》裡面，這兩段話都有。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中共所謂的「國共合作」實際上是一件多麼卑鄙的事情。那個時候，他和國民黨的力量不成正比，他是利用、依靠國民黨成長起來的。

六、按中共劇本演戲 連宋登陸國民遭殃

記者：國民黨經過慘痛的歷史教訓，為什麼還沒有看透共產黨？

辛灝年先生：今天的臺灣國民黨，他不是看透不看透的問題。我們從客觀上來講，兩岸分離了 50 多年，他們對中國大陸情也少了，義也沒了，所以雖然叫中國國民黨，實際上只是一個臺灣國民黨。但他們畢竟到今天為止，還打著中國國民黨的旗號，表示他還要繼續將中國國民黨的牌子頂下去，那麼就應該對中國負有一份責任。這份責任是什麼？那就是在中國實現中國國民黨的領袖孫中山先生、蔣介石先生的歷史願望，在中國大陸實現以民權為中心的三民主義，追求民族對外獨立、對內平等，追求民權的自由，追求民生的幸福。

可是，我們看不到今天臺灣的國民黨還有一點點把大陸 13 億人民放在心裡的意思，還會帶領和推動大陸 13 億人民去

追求三民主義的那份心腸。我們也可以看到，江炳坤去大陸，甚至國號、年號都不敢提；連宋登陸，連三民主義都不敢提，提了國號、說年號還要怕。這哪像一個要帶領全中國人民去走三民主義道路的中國國民黨？

作為大陸人，我們不怪他們，我們理解他們的許多難處，但是你們在和中國大陸發生交往的時候，把 13 億人民撇在一邊，只和共產黨搞所謂的「合作」，只按共產黨定好的劇本去表演你們不該表演的「大戲」，對大陸老百姓來講，對 13 億人民來講，他們可是把你當作「回來了的國民黨」。如此情何以堪！

他們一不提中國國民黨的歷史奮鬥和歷史功績；二不提中國國民黨為民族、為民主所作的奉獻；三不提 49 年以後數百萬國民黨人的冤魂，和他們數千萬被欺侮被凌辱的家屬；四不提中國大陸人民今天對自由化民主的追求……，這些都一字不提，置若罔聞。這還像一個中國的國民黨嗎？還像曾經志在為完成中國人民走向共和的中國國民黨嗎？看看在被中共禁演的歷史劇《走向共和》裡面，我們的大陸藝術家們是怎麼謳歌孫中山先生的中國國民黨吧，是怎樣肯定中國國民黨為「走向共和」曾付出巨大歷史貢獻的吧！從這個方面來講，我作為大陸人，心裡是非常難過的。雖然我理解他們，但是這個理解，對於我，對於絕大多數中國大陸人民來講，那是一種很痛苦的理解。

所以連戰登陸，才會造成中國大陸有 41 個民運人士要求

參加臺灣中國國民黨，並給連戰寫信，要求在中國大陸建立各省國民黨黨部。因為既然你跟中共握手了，那我們為什麼還不能在大陸建立國民黨組織呢？結果，他們立即被拘審。就在連戰於大陸和共產黨杯酒言歡的時候，那些給他寫信要參加中國國民黨和要在大陸各省建立國民黨組織的人，就正在被南京市公安局、武漢市公安局和各地的公安局傳訊，逮捕，直到判刑……。到目前為止，有的已被拘捕多次，有的還關在監牢未被釋放。

記者：您的《黃花崗》雜誌受大陸朋友委託，4月24日在紐約曼哈頓羅斯福飯店舉行重大新聞發布會宣布：中國17個省市的秘密同盟會組織的代表曾於4月23日在南京中山陵前宣布重建中國國民黨，以表示對臺灣中國國民黨的失望和對中共政府的不滿。這是否說明大家認清了中共的伎倆，對臺灣國民黨很失望？

辛灝年先生：是的。在連戰去大陸的時候，中國大陸有17位志士重建了中國國民黨。

其實這個事情跟《黃花崗雜誌》完全沒有關係，就像蔣彥永醫生曾委託我們上書一樣，我們也根據他們的要求，為他們做了宣傳。因為《黃花崗雜誌》在海外堅持反共愛國和追求民主統一的政治立場，所以國內很多朋友相信我們。再加上我本人出來這麼多年，一直在四處奔波，宣傳大陸人民反思中華民國的成就，宣傳中華民國才是新中國的理念，既為中華民國正名，又為中國國民黨的歷史辯汗，更與現在的中

華民國和臺灣國民黨沒有絲毫的關係，所以國內的許多讀者也相信我個人，這才是他們要找我和《黃花崗雜誌》的原因。

七、共產黨引火焚身 國民黨自取消亡

記者：您認為邀請連宋訪問大陸，中共緩解危機的企圖能夠得逞嗎？

辛灝年先生：緩解不了。舊的危機沒有過去，新的危機又起來了。而且臺灣即便是有一些人在利益上和中共保持了一致，替中共解決臺灣的問題起了一定的作用，可是臺灣的變數太大了。因為臺灣已經是一個確認了民主制度的地方，雖然面對共產黨的「革命兩手」，一些政黨可以在許多方面弱化自己的品質，做出一些不利於自己的事情，但是已經被確認的民主制度，對他們還是擁有著強大的調節性。我相形，這個調節性在不久的將來大家就會看到（編者按：辛灝年先生接受採訪剛剛結束，臺灣選舉的結果就已經宣布，國民黨敗給了民進黨，親民黨慘敗，連宋登陸的成效立竿見影，而不像海外一家臺灣辦的親共大報所言，幾個小時前所公布的「民調」已經證明「泛藍的國民黨和親民黨一定會大贏」……）。共產黨一廂情願的以為自己已經掌握了臺灣一大半的力量，恐怕也就是黃粱一夢；臺灣的親共勢力以為自己找到了靠山，恐怕更是一枕黃粱。臺灣民主制度的建立，已經為中國未來的政治體制建立了榜樣。

連戰這次去大陸，應該從歡迎他的人群裡，看到大陸人民對「國民黨回來了」的那種真正的興奮心情。這個興奮的心情，就是大陸民間 20 年歷史反思的結果。所以，他的另外一個效應，就是令共產黨引火焚身。因為共產黨絕對沒想到，連戰到大陸去和他握手言歡，會得到無數老百姓的真心歡迎，會逼出了大陸 41 個民運人士要求參加中國國民黨，甚至會逼出大陸人民要重建中國國民黨，並且要在中國大陸建立各省黨部。他當然也不會想到，當他在北大講演的時候，一個年輕的學生竟敢從自己的胸中掏出一面中華民國國旗，雖然旗子還沒有展開，中共的六個便衣撲上去就把他銬走了。我要是連戰的話，我的臉還能往哪兒擱？我們真地為他感到悲哀。他大概以為大陸人民因為尊敬他而歡迎他，他說全錯了！實際上，大陸人民是歡迎和渴望真正的國民黨回來！

這次共產黨玩的統戰戲，對於連戰，對於臺灣國民黨來說，可能是一場自取消亡的戲；對於北京的中共政權來說，可能是一場引火焚身的戲。如果我們今天沉醉在笑臉鮮花當中，卻看不到剛才我所講到的這兩個結果，那就太沒有政治眼光和政治遠見了（辛灝年註：被採訪者在十多年後校訂該採訪錄時已經可以證明，當年被採訪者的回答是完全正確的。因為，在臺灣，已經被中共統戰很深的國民黨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在大陸，則懷念民國的社會思潮大起，正在催發一波又一波的「民國熱」，大陸人民要求「光復民國」的政治訴求，正在迅速發展，正處在將死未死之最後階段的共產黨，正在為此膽顫心驚。歷史就是

這樣地爲他們的所謂「第三次國共合作」，鋪開了他們不是「雙贏」，而只可能是「雙輸」的悲劇道路）。

記者：等於是兩敗俱傷。

辛灝年先生：是的，兩敗俱傷。因為連宋打著反獨的旗號，到大陸去和共產黨「聯共反獨」，甚至尋求對國民黨和新黨的支持，實質上是在出賣著臺灣，也是在破壞著大陸人民對民主的萬難追求。在中國大陸正處在一個巨大的民主變革的前夜，正面臨著一場偉大的革命變革之時，不論這個革命民主變革將採取什麼形式，他的使命都一定是為了「推翻專制、走向民主」。在這個關鍵時刻，以連戰為代表的臺灣國民黨，卻把自己絞進了中共這個為人民所痛恨，並且必定要垮臺的專制惡黨裡去，這不是在埋葬自己嗎？因為不論他們是有意還是無意，都是把自己站到了大陸 13 億要追求民主的人民的對立面，都把自己放到了臺灣民主即臺灣人民之根本利益的對立面上，他們還能夠不被大陸人民和臺灣人民所反感、所厭惡嗎？

我們當然也有不怪他們的地方。他們不瞭解大陸，也不瞭解共產黨的歷史，不瞭解什麼叫專制統治，特別是共產黨的專制極權統治，什麼才是大陸的社會人心。但是要怪他們的是：他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而且拒絕知道。他們甚至連 20 年來中國大陸民間反思中華民國，肯定中華民國，甚至是肯定中國國民黨歷史的巨大成果，都拒絕知道，甚至不屑一顧，更有甚者，還要在海外，肆意破壞、搗亂和汙蔑，這

就叫人難以理解，很難原諒了。

他們今天還在沾沾自喜，以為自己已經跟共產黨在利益上取得了一致，還沾沾自喜於獲得了共產黨給他們的支持，認為將來在臺灣的選舉中可以穩操勝卷了。但是，他們忘記了自己已經輸掉了多大的「本錢」。中國國民黨該有多麼光榮的歷史，對民族、對民主曾有過多大的貢獻，甚至還有著何等慘痛的失敗教訓；他們的領袖孫中山、蔣介石，還有他們走向共和的整個道路，居然都在被他們悄悄地甚至是公開地埋葬著，所以，未來的失敗，才會等著他們。說心裡話，我真的為他們感到很可惜。我只是一個文化人，一個普通知識份子，我這一輩子也不會參加任何政黨，也不會去搞什麼政治組織，但是，我還是在從內心裡為他們感到惋惜，甚至為他們感到莫名的悲哀。雖然我希望他還會醒過來，做中國的國民黨該做的事情。要知道，哪怕大陸只有 17 個人重建了中國國民黨，中國國民黨的正統地位也已從臺北移向了大陸。因為，中國大陸有 13 億人。這就是歷史。而孫中山、蔣介石不是臺灣人，而是大陸人，更是包括臺灣在內的中國人；孫、蔣更是從來就沒有說過，中國國民黨只能在臺灣的小島上混下去，更沒有說過，大陸人民不能重新建立屬於自己，也屬於全中國的「真正的中國國民黨」！

他們原來有一個多麼美好的前途，大陸人民在為他們留著，甚至正在他們準備著他們的光榮歸來，但他們竟然就這樣地在共產黨送給他們的「鮮花笑臉」當中，悄悄的埋葬著

自己。我真地感到很可悲。

八、助中共為虐 只有死路一條

記者：中共的邪惡本質就是永不停止的害人，現在國民黨也被拉進了火坑。

辛灝年先生：共產黨一天沒倒，大家就以為他「穩若金湯」。其實，我跟一個朋友曾經開玩笑說：共產黨明天早上倒了，你也不要詫異；十年、八年不倒，你也不要喪氣。我為什麼替臺灣國民黨惋惜呢？你剛才講共產黨是邪惡的，說心理話，臺灣國民黨是不惡的，但如果像這樣跟共產黨搞下去，慢慢也就邪掉了。他把自己的正路拋掉了，他走上邪路了。

記者：誰跟中共沾上邊，都沒好。

辛灝年先生：是的，絕對是沒好的。這已經為世界歷史的經驗教訓所證明。

記者：不管是對於臺灣人來說，還是大陸人，最大的障礙，最應該破除的、反對的就是共產黨？

辛灝年先生：是的，就是共產黨。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不要為我們國家民主和統一的前途增添障礙，不要給共產黨幫忙和幫閒，因為共產黨在騙大家，你也幫他騙人，和他一起騙人，歷史遲早是要算這份賬的。

大家都要做好一個思想準備，就是中國大陸是一定要走

向民主的，中國一定要走向「先民主、後統一」的道路的。如果共產黨今天還能順應時勢，真正的走上民主改革，開放黨禁，開放輿論，開放選舉，那他可能還有活命的可能。如果他抵制到底，就是死路一條。誰和他一道去抵制大陸人民的民主追求，誰就和他一樣死路一條。

九、先解決中共 再談統一問題

記者：先實現民主，消除中共這個障礙之後，可能下一步的事情就比較容易解決了。

辛灝年先生：是的，到那時，臺海兩岸就可以坐下來談，和平的談判桌就會在臺海之間升起來了嘛。到那時，我們就可以討論：是做一家人好，還是不做一家人好。我相信，到那時，臺灣也不想獨立了。就是想獨立，也還有很多要討論的：天空怎麼劃，海水怎麼分，人口怎麼算，經濟要不要全面開放等等，跟大陸的關係還有很多需要討論的。臺灣和大陸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我覺得大家都應該齊心協力在中國的民主道路上推一把，幫大陸人民推一把，就是在幫自己。將來中國走上民主後，統一問題就會迎刃而解。最近臺灣的一個朋友對我說：你說要統一，你就是專制。我開了個玩笑：說不定等大陸民主了之後，你比我還急著要統一呢！

記者：其實一些主張臺灣獨立的人士，可能主要是衝著中共來的，是由於對中共專制政權不滿。他們不想跳進被中共統治的火坑裡，不想像大陸人民一樣被奴役，身處水深火

熱之中。

辛灝年先生：絕大多數臺灣人民不願意被中共專制一統，我們不但同情，也能理解，因為我們受了共產黨那麼多年苦，幹嘛也要讓臺灣人民去受苦呢。人家過得好好的嘛。但是還有少數人屬於反華臺獨，他們謾罵中華民族，侮辱中國人民，汙蔑中華文化，這種人我是不能贊同的。

不是因為共產黨講統一，我們就不能講統一。共產黨的統一是專制一統；我們講的統一是民主統一。本質和原則上完全不一樣。

記者：可能共產黨垮臺之後，很多事情就水到渠成，大家都能好好商量決定，不像現在想得那麼複雜。現在很多問題變得複雜、對立，都是因為共產黨的阻礙和破壞，共產黨是罪魁禍首。

辛灝年先生：是的。因為現代中國的分裂就是從共產黨開始的，他是始作俑者。是他分裂了中國，是他製造了兩個中國。一直到今天為止，如果沒有共產黨篡國奪權，用共產革命推翻中華民國，中國哪有什麼分裂的問題，1945年臺灣不就回來了嘛！

十、中共窮兇惡極 不要抱任何幻想

記者：不管什麼黨派，不論什麼主張，大家現在共同的目標就是廢除共產專制，促進中國的民主化，是這樣的嗎？

辛灝年先生：是這樣的。我曾在《黃花崗》的一篇社論

中寫道：先民主，後統一；民主在先，統一在後。為了中華民族和未來中國的民主、統一、和平與發展而奮鬥。中國人嘛，我們都想中國好嘛。

其實現在你不想他垮臺，他都要垮臺了。他不真改革，非垮不可。因為世界上所有為保護自己的專制政權而只搞經濟上的「改革開放」的，就沒有一個不垮臺的。我在 80 年代就做了這方面的研究，得出了這麼一個信念。

記者：前蘇聯、東歐當時共產黨垮臺的時候是否和現在很相似啊？

辛灝年先生：他們先改革開放，後徹底垮臺嘛。如果是像前蘇聯共產黨，戈巴契夫、葉利卿，他們很聰明地，交接棒似的解決了這個問題，那就是由共產黨自己來廢除共產主義制度，毀棄共產黨的專制權力，人民還是能夠寬容共產黨過去所犯的罪行，允許他繼續存在。像羅馬尼亞的齊爾賽斯庫那樣頑抗到底，最後的結果就是共產黨不可能再存在了。

所以，我們不講什麼要求共產黨救國家，救民族，他也不可能這樣做；如果共產黨還想救自己，那他就要真正地洗心革面，寧可失去權力，也要把中國的民主改革做起來，也許他還有存在的可能。改個名字啊，換個形式啊，如果他堅持他的權力不放，頑固不化，只有滅亡這一條路在等著他們。

記者：您剛才講中共引火焚身。好像有評論員也指出中共高層也在因這件事分化。

辛灝年先生：共產黨內部的分裂永遠存在，鬥爭激烈，

第一、二把手都難有好死。可是對外，在鎮壓人民的態度上，從來沒有過不一致，即便有不一致，他也不敢公開地反對他自己的黨。像胡耀邦、趙紫陽，大不了就是不幹了，也頂多只能做到這一點。所以共產黨的拳頭對外是一致的，對內他們會互相鬥爭，非常陰險，非常窮兇惡極；但是對人民更陰險，更窮兇惡極，而且是一致的，不要寄託任何的幻想。

記者：民主是歷史發展的方向，是任何人都阻擋不了的，所以共產黨的垮臺也是必然的。

辛灝年先生：是的。孫中山先生講的「世界大潮，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當然有個過程，世界上許多專制國家走向民主的過程，和我們中國一模一樣。所以，我們要充滿希望。

——本文轉載自大紀元新聞網

辛灝年講演藝術初探

葛陵元

辛灝年先生是近十年來活躍於北美華人思想文化界的重要獨立知識份子。在擔任中國現代史研究所所長、兼任《黃花崗》雜誌主編的同時，他還往返奔波於美加各地，頻繁地參加各種研討會、座談會、賞析會、報告會，他的講演成了這些集會的亮點和盛事，「許多人主要是為了聽辛灝年的講演而來的。」（羊子語）

筆者在大學任教多年，並擔任過一份教育研究雜誌的主編，十分注意教學藝術的探索。雖「貴」為教授，卻曾被教研室逼著參加過系裡的題為「如何上好一堂課」的講演比賽，與青年教師同臺演講，最後居然獲得一等獎。好漢不提當年勇，筆者不打算在此吹噓自己的得意往事，而想根據自己的經驗和體會，對辛灝年先生的講演為何如此引人入勝進行初步探討。

一、思想清晰：概念源於思想，並成為推理和論證的基礎。一場好的演講必須思想清晰，這樣才能提出明確的概念，並在此基礎上展開嚴密的推理和論證。辛灝年先生在這一點上做得十分突出。例如，《中國統一的原則、道路和時機》這

一講演的核心思想就是「中共喊統一，時機不當、原則不對、道路不通」。辛先生緊緊扣住這一核心思想，從國際談到國內，從歷史談到現在，使得全場演講邏輯嚴謹、條理分明。

二、知識豐富：辛灝年先生在史學和文學上都有很深的造詣。他的演講總是旁徵博引，蘊涵著豐富的文史知識。例如談統一的原則時，辛先生從正反兩個方面列舉了美國、蘇聯、中國、越南等國家歷史上的多個例子，證明了有原則的統一是民主的進步的；無原則的統一是反動的退步的。有原則的統一是民主統一；無原則的統一是專制一統。在這裡，辛先生不是為了炫耀自己的淵博而故意「掉書袋」（辛灝年語），而是用歷史事實作為論據來進行必要的論證。

三、說理深透：由於辛先生的講演建立在清晰的思想基礎上，又以豐富的文史資料為佐證來展開推理和論證，所以辛先生的講演貴於以理服人。在條理清楚、層次分明的闡述中，辛先生把自己確立的論題說得十分深透，使聽眾心服口服，心領神會。講演之後的提問時間裡，聽眾的提問又起到了補遺的作用。利用這段時間，辛先生又進一步地、有針對性的對聽眾的提問進行了答疑和解惑。

四、感情充沛：一個外國記者曾對陳毅的記者招待會發表過這樣的評論，「起初他像鴿子一樣溫和，後來他像獅子一般吼叫。」辛先生在他的講演中也有類似現象。在剛開始講演時，辛先生心平氣和，隨著痛批中國共產黨的逐步激烈，辛先生的情緒也逐步高漲，語氣自然而然地變得逐步強烈。

辛先生的憤慨激情也會感染在場聽眾，在他們心中引起強烈的共鳴……，在這裡，沒有任何忸怩作態，無論是辛先生還是聽眾，都是真情的流露。

五、幽默風趣：但是，不要因此就認為辛先生的講演老是嚴嚴肅肅、死刻板板的。辛先生妙語連珠，常常引起全場聽眾會心的歡笑。辛先生在談到中共不敢打臺灣時說：「這個根本道理說白了就是三個字，『不敢打』。再說得詳細一點，那就是三句話，『共產黨死也不敢打，要死了才有可能打，打了就死！』」三句話連用三個死字，把中共反正得死、遲早會死這麼重大的問題用幽默風趣的繞口令似的語言表達出來，全場聽眾不禁都發出了會心的笑聲。

六、比喻生動：辛先生在講演中很注意用生動形象的比喻來深入淺出地說明問題。這對於增進聽眾的理解，活躍會場的氣氛是大有好處的。在談到要深入思考，不要被中共 50 年的謊言所蒙蔽時，辛先生是這麼說的，「用自己認識的小船，衝向中共 50 年的謊言所壘成的大壩……」小船沖大壩，這是多麼豪邁的氣概！不要以為這是飛蛾撲火、自取滅亡，在熱愛民主自由、執意追求真理的有識之士的共同努力下，我們許多人的「認識的小船」已經衝開了「中共 50 年的謊言所壘成的大壩」。只要我們大家繼續努力，總有一天，全中國人民的認識都能衝開「中共 50 年的謊言所壘成的大壩」。

七、語言精煉：辛灝年先生的演講沒有任何重複、拖拉、梗塞、中斷、贅述、粗痞話、口頭禪。這使得他說的每一個

字都含有一定的信息量，從而時時刻刻都能扣住聽眾的心弦，使聽眾情不自禁地、身心愉快地緊跟他的思路聽下去，絕對不會分神溜號，因此也就不會產生疲勞的感覺或者厭倦的情緒。對辛先生口若懸河、滔滔不絕的口才，我的太太十分敬佩。她曾經深有感觸地說：「一般人就是寫好稿子照著唸，也不能說得像他那麼好。」

八、準備充分：其實我並不同意我太太的看法。因為我認為辛先生肯定是有稿子的（儘管他沒有拿出來照本宣科）。無論是什麼人，哪怕是天才，不進行充分的準備，僅僅靠口才來即興發揮，絕對作不出辛先生那麼有思想、有條理、有激情的講演。對每一個講演，辛先生必須事先準備：查找資料、核實引文、擬定提綱、書寫草稿（辛灝年註：真的沒有草稿，但有帶資料提綱）。有些關鍵的認識和精幹的語言甚至來自長年累月的積累。對此，辛先生自己也有所流露。對我們前面提到的「繞口令」（「共產黨死也不敢打，要死了才有可能打，打了就死！」）辛先生自己告訴我們說：「大家不要以為我今天即興發明了這三句話，我這三句話是八年前和一批美國的中共問題專家，和一批華裔學者，和一批著名的民運人士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大家都認為馬上就要打臺灣了，我說了這三句話。」

關於辛先生的講演，我暫時評論到這裡。王若望先生在他的回憶錄中說，在 50 年代初，上海有三個人的講話廣受歡迎：陳毅、顧准和他本人。筆者沒有榮幸去聆聽他們三人的

講演，頗感遺憾。感謝科學技術的進步和《新唐人》電視臺，現在筆者有幸在電視節目中經常看到辛灝年先生的講演。每看一次都大有收益——不僅來自其講演內容，而且有感於其講演藝術。現草成此文，以《辛灝年先生講演藝術初探》為題發出，望能作為引玉之磚，供有心人進行深入研究時參考。

2005 年 4 月 11 日凌晨 3 時完稿

——本文轉載自看中國

中國命運與臺灣前途

辛灝年講演錄・第一卷

作者：辛灝年

編輯：黃蘭亭、陳柏年

美術編輯：吳姿瑤

封面設計：吳姿瑤

出版：博大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電話：886-2-2769-0599

網址：<http://www.broadpressinc.com>

臺灣經銷商：采舍國際通路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2段366巷10號3樓

電話：886-2-82458786

傳真：886-2-82458718

華文網網路書店：<http://www.book4u.com.tw>

新絲路網路書店：<http://www.silkbook.com>

規格：14.8cm × 21cm

國際書號：ISBN 978-986-88976-9-4 (平裝)

出版日期：2015年8月

出版：博大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劃撥帳號：19925899

電話：02-2769-0599

定價：新臺幣450元

網址：<http://www.broadpressinc.com>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